

上袁世凱

辨别

端木賜香

著

真假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袁世凱

真假

辨别

端木賜香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不是哈哈镜：真假袁世凯辨别 / 端木赐香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55-0312-7

I . ①历… II . ①端… III . ①袁世凯 (1859 ~ 1916)
—人物研究 IV .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42706号

历史不是哈哈镜：真假袁世凯辨别

著 者 端木赐香
策 划 么志龙
责任编辑 荣挺进
特约编辑 单宇红 常 昕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312-7
定 价 36.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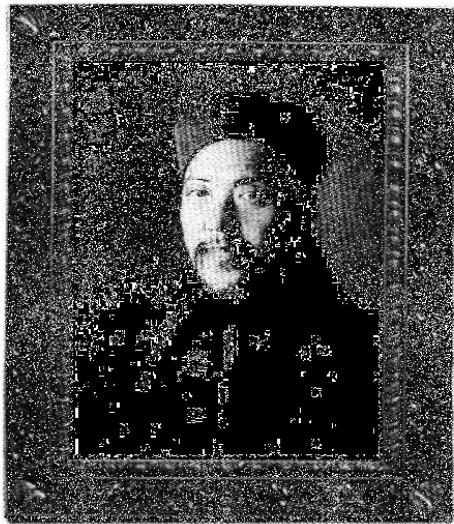
编 辑 部 (010) 64214534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荷兰画家胡博·华士 19世纪末所绘袁世凯肖像

前言

一百年了还没读懂袁世凯，不如回家面墙去

在私德愧于清王室、公德愧于革命党人的主流视角笼罩下，不拘巨细地重新梳理袁世凯（1859—1916）的一生，既需要良知更需要勇气。何况是以这样一种贴近草根民众的方式，注定了使命的艰难，因为传统观念和深入人心的朴素感情，都是真相的顽固障碍。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不管是体制之因还是文化之故，总之，中国民众在智力上是很懒惰的。网名三七、笔名刀尔登的邱小刚称之为“道德下降”。他说中国人“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1]

我们还可以发现，民众在吃“坏人”的时候，其负责的精神和踊跃的情绪令人刮目，很少有人在心底疑问，或者对事实做一下追寻的。更不妙的是，好不容易出个疑问者、追寻者，其他人就会蜂拥而上，干脆将其也当“坏人”一并吃掉。

不管是“道德下降”还是“智力懒惰”吧，总之，用辞不雅些，就是愚蠢。理智者都知道，千万不能同愚蠢者对话，因为他会把你拉到与他一样的档次，然后再用自己丰富的经验打败你。民间谚语

[1] 刀尔登：《刀尔登读史：中国好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云：有饭给饥人，有话给智人。圣经也云：宁可遇上丢失崽子的母熊，不可遇上无知的妄人。所以理智者最好的办法是自言自语，不要期望听到众多的回声。想当年梁启超很具智力上的优越感和道德上的勇气，1901年写有《举国皆我敌》的诗篇，云：“眇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当然他也知道，这种挑战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他在诗中还云：“阐哲理指为非圣兮，倡民权谓曰畔道。积千年旧脑之习惯兮，岂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非今。十年以前之大敌，十年以后皆知音。”^[1]一句话，他认为十年后，民众就都是他的知音，能听懂他改良与启蒙的呼声了。问题是不但当时的民众没有听懂他，反倒踩着他的身子上位了，半个世纪之后革命的主流思想还把他骂作保守派、保皇党；他的老师康有为更是被伟大的红卫兵当“四旧”直接给破了——康墓遭毁，康的头骨被绑在棍子上，抬着游街示众……

中国民众很怪，有大忽悠说人民万岁，他们就亢奋半个世纪一直下不来；有实在人说民智低下，他们就恼得，恨不得把人拉过去撕扒着吃掉！某种程度上，中国百姓就是《让子弹飞》里的鹅城居民，谁赢跟谁，谁输抢谁。所以，我这辩护更多的是自言自语。当然，托改革开放及互联网的福，现在自言自语的人多了，民众道德的下降与智力的懒惰也正处于消退中，对此我们应该表示谨慎的乐观。

事实上我一直很纳闷。某种程度上研究历史从来都是后见之明。问题是在中国，后见之明都难得，有些人士表现得比身处历史当局中还要无知无觉。这其中最不能原谅的当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也许他们的专业精神及情趣偏好只是不

[1] 汪松涛：《梁启超诗词全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问青红皂白地搂政治的腰子。总之他们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表现得智商低下，道德更低下——这种双重低下，对民众造成了严重的误导与伤害！如果非要举个例子的话，我想举吴晗。从民国到新中国，一个《朱元璋传》，吴晗先后写了四个版本：1944年版、1949年版、1954年版和1965年版。^[1]初版认为朱元璋是从“流浪青年”到“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二版中出于政治的需要，拿朱元璋影射蒋介石，于是“流浪青年”改成了“流氓”，“三个伟大”变成了“暴君”——“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云云。这稿子被上面看了，要求吴晗把朱元璋写好些。于是，“流氓”又改成了“流浪青年”，“暴君”变成了“农民领袖”。至于吴晗本人，还在1965年版本的序言中津津乐道，当初民国某编辑部让他把朱元璋的“红军”改为“民军”，而他很有骨气地拒绝了：“宁可不出书，这字万不能改！”^[2]可是上面先后给他三条不伦不类的改稿指示，^[3]他却屁颠屁颠地努力遵行。直到最后跟不上，成为“文革”祭旗的第一道牺牲。

据1949年版本，吴晗把元朝的专制统治概括为：“构成了天罗地网，铜墙铁壁，没有一点漏洞，透不出一点气，没有声音，连耳

[1] 吴晗：《朱元璋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苏双碧序：《吴晗和朱元璋传》。此版依据的是1965年版。

[2] 同上，自序。

[3] 这三条指示是：其一，吴晗认为西系红巾军首领彭莹玉功成不居，起义成功后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上面不以为然，认为彭这样坚强的领导者，不应有回避行为，不是自己犯了错，就是史料有问题；其二，上面认为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其三，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语也不敢，没有文字的抗议，连数说历史都是犯法的。”^[1]对朱元璋开国大典后的政治形势描述曰：“奉天殿受贺后，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也都加官进爵。……一霎时间闹闹攘攘，欣欣喜喜，新朝廷上充满了蓬勃的气象，新京师里平添了几百千家新贵族，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统一的新朝代。”^[2]对于朱元璋的文字狱，概括得更形象：“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胆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外围外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3]

看着这些预言或者说恶谶式的历史片段，难免让人冷颤。吴晗哪里是在说史，分明是在总结现实指向未来。所以，无论是吴晗治史，还是吴晗制史，都无一例外地告诉我们，与其说我们的历史学家是在研究历史，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制造相同的历史。吴晗可能至死都想不明白，自己分明是在奉命“数说历史”，为什么也是“犯法”呢？

连吴晗这样优秀的历史学家都没有看透——哪里有法？历史学家只有御用与秉笔独书之分；既然选择了御用，新宠终归要变成旧宠，而且难免失宠。

当然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就是个挖历史墙脚的。所以无论出于哪个角度，那种道义上的谴责也轮不到我身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没事了，我有我自己的事儿。那就是，以良知与勇气赢得另一

[1] 吴晗：《朱元璋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此版依据的是1949年版。

[2] 同上，第145页。

[3] 同上，第236页。

种谴责——寻历史的真相，探文化的陷阱，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历史人物呼吁，给过多涂饰的历史事件脱彩。

我不想媚众，更不想媚愚众。有人把它搞成民粹。哪里是民粹？简直是民秽！因为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大量的民众在面对袁世凯的时候，既不乏智力上的自信，更不乏道德上的优越。简直是千夫所指，万民唾弃，也不想想，你配吗？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云：“任凭你像尧舜那么圣贤，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人答应。”^[1]问题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却告诉我们，皇帝还是有的，只不过改换其他名称罢了。中国百姓没人不答应，他们喊万岁喊得比上辈老奴隶还要投入还要激昂。

海派学者李劫说：“历史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在中国遇到了其天敌——中国人顽强的文化心理定势：在没有皇帝的年代里人人都想做皇帝。一个皇帝推翻了，千万个皇帝在成长。”他还说：“孙中山这尊雕像的意义在于仅仅制止人们搞穿龙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类的复辟形式，却并不能阻挡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2]

可惜，袁世凯缺少李劫的智商，像梁启超一样脑子不转弯儿，不知道在中国，不穿龙袍，照样是皇帝。巴巴的搞小女人扶正的游戏，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小样儿嘛！

当然，躲开这些政治上的宏大叙事，我还可以指出一个简单的中国逻辑——成王败寇，人家不就是没弄成、退位了吗？如果他是

[1] 《饮水室文集点校·第5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1页。

[2] 李劫：《我们的文化个性和个性文化：论世纪现象》，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在位之身，这么对待他，像美国百姓写信骂奥巴马白痴、法国百姓当面骂萨科齐混蛋那样，也算符合做人的正当性和做公民的正常逻辑。

遗憾的是，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中的许多人既没有读懂袁世凯，也没有提升自己的智力与道德——不如回家面墙去罢！

目 录

第一章 不幸生在地主官僚军阀世家	001
1.1 出生在富人家庭，祖上也受过穷	001
1.2 出生在官僚家庭，也是学而优则仕	012
1.3 出生在军人世家，家风不差	019
第二章 万般皆轻松，唯有读书累	029
2.1 袁世凯，一个官三代降生了	029
2.2 说袁世凯不喜读书，哪个孩子喜读书？	034
2.3 不就是科举失败吗？怎就成了不学无术？	042
第三章 干爹再好，不如自己干得好	047
3.1 投奔干爹吴长庆，才算投对了人	047
3.2 朝鲜，你要向何处去？	051
3.3 雄赳赳气昂昂，泥菩萨它过河去了！	064
第四章 枪杆子里面出威权	093
4.1 大清军队：从八旗到绿营，再到各色乡勇	095
4.2 众望所归袁世凯，新兵还得你来练	102
4.3 袁世凯：我练兵，你立正	111

第五章	维新理念与人不同，怎么就成了假维新？	125
5.1	康有为来了，快跑	128
5.2	袁世凯腿短，没跑	141
5.3	杯具啊，就这样成了别人牌桌上的赌注	155
第六章	当袁世凯遇上义和团	191
6.1	没有维新告密，袁世凯照样要冉冉升起	196
6.2	镇压义和团，袁世凯费力不讨好	204
6.3	八国联军进中国，袁世凯的机会来了	219
第七章	北洋新政谁能敌？	235
7.1	继续巩固枪杆子	239
7.2	其他新政建设	247
7.3	做官难，做个名官更难	261
第八章	躲进洹上成一统，管它风声雨声子弹声	287
8.1	垂钓洹水，自得其乐	289
8.2	一二三四五，在家数老虎	294
8.3	让子弹飞一会儿	304
第九章	老乡，请问共和咋走？	327
9.1	袁总统驾到	328
9.2	内阁走马灯地换	350
9.3	帝制闹剧	388

第十章 历史的吊诡	409
10.1 皇帝死了，皇帝梦没死	410
10.2 一个模糊的愿景	419
10.3 共和，你在哪里？	427

第一章

不幸生在地主官僚军阀世家

从某种程度上讲，特别是面对传统话语系统，袁世凯降生在“地主官僚军阀世家”，也是一种不幸。

中国人各有各的不幸！

1.1 出生在富人家庭，祖上也受过穷

在中国，富就是一种原罪。

按常识，穷人不代表道德，富人不代表缺德。问题是中国缺少常识。所以富人富得很惭愧，穷人穷得理直气壮。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几千年的均贫富的传统思维。

没有人先天是富人。阿Q说他家祖上也曾阔过，可是袁世凯家呢，祖上也曾穷过。先简单列一下他家的主干家谱：^[1]

1) 袁志恭 - 袁九芝 - 袁耀东 - 树三、甲三、凤三、重三

2) 袁树三 - 保中、保庆

 袁甲三 - 保恒、保龄

 袁凤三 - 保颐

[1] 参见金亮、南方：《袁氏家族·珍闻轶事》（内部资料）[2005] 004号，周口市滨河印刷厂，第12-19页。

袁重三 - 保晋、保纯、保愉、保经、保永

3) 袁保中 - 世昌、世敦、世廉、世凯、世辅、世彤

袁保庆 - 世凯（嗣子）

袁保恒 - 世勋

袁保龄 - 世呈、世显、世扬、世荣、世同、世传、世威

袁保颐 - 世恪、世斌

袁保晋 - 世猷、世籲、世亨、世仁

袁保纯 - 世诺

袁保愉 - 不详

袁保经 - 不详

袁保永 - 世襄、世贞、世琦、世铭、世伟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袁世凯乃是袁保中的第四子，因袁保中的弟弟袁保庆无子，遂把世凯过继给他做了嗣子。

有人说，袁世凯的曾祖——袁耀东时期，袁家开始发迹。袁世凯的天祖袁志恭，当时在袁阁（今项城市高寺镇袁阁村，袁氏旧居、祖茔及家祠所在地）拥有土地三十余亩。^[1]三十亩地是个什么概念呢？应该算是贫农与中农的过渡地带，能吃饱肚子，间或可以买几本书读读，买几张纸写写。因为那时的农业科技不发达，全是靠天吃饭，所以收成很低。娘给我算过这笔账，当时姥姥家有七亩地（七口人），水地种小麦，旱地种棉花。水地每亩收六七斗麦子。一斗麦子二十三斤。也就是说，平常的年成，每亩地也就二百来斤的样子。所以我们不能高估袁家这个时候的富裕程度。事实上，有西方传教士给算过，晚清山东的五口之家需有十五亩地才能维持起码

[1]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 2005 年版，第 8 页。

的生存；^[1]有社会学家调查过，民国山西太原警卫旅中从农村来的士兵，如果有自耕地，平均所耕的地在 27.74 亩之下，其中 71.1% 不能单靠种田维持生活。^[2]所以，拥有三十亩地，精打细算、勤于耕耘的话，日子可能一天天地好起来，也可能一天天地败下去，就看有没有天灾人祸了。

到了袁世凯的高祖袁九芝这一代，他和哥哥袁九能联手发展，又各生两个儿子，在六个男人的努力下，土地扩展到三百余亩。日子算是小康了，富农。袁九芝与袁九能去世后，四个儿辈们分了家，袁世凯的曾祖袁耀东分得田地八十余亩。^[3]但是按其老家的资料，袁耀东并不是小康，而是仅分得土地三十余亩，房屋不足十间。^[4]也就是说，还是贫农的上沿，中农的下缘。所幸其父袁九芝是个私塾先生，袁耀东自幼读书。

站在读书人的角度，说袁家从袁耀东时开始发迹也未尝不可。因为袁耀东最后的文凭是庠生。中国古代称学校为庠，故学生称庠生，明清时候庠生又成为府、州、县学的生员的别称。用普通话来讲，庠生就是秀才。一提秀才，大家可能就会想到穷酸二字。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就是小知识分子吧，科举的第二阶梯，前面还有个童生。当然也不能小看秀才。因为好多人八十还是老童生呢。起义领袖洪秀全，四次去广州考秀才，四次失败，第三次失败就得失

[1] 张思：《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的破产与义和团运动》，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3 页。

[2] 陈志让（加）：《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3 页。

[3]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 2005 年版，第 8 页。

[4] 金亮、南方：《袁氏家族·珍闻轶事》（内部资料）[2005] 004 号，周口市滨河印刷厂，第 30 页。

心疯，搞起了革命。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洪秀全若像袁世凯的曾祖这样，好歹考个秀才，那他可能就不会造反了。《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19岁倒是三场第一考上了秀才，可是之后就再也没进步。72岁考上一个贡生，还是秀才，只不过是优秀秀才，选送到国子监深造。可惜生命历程也宣告即将结束，于76岁仙逝。著名学者唐德刚拿他老家、与项城相隔半日车程的合肥唐家做了比较，说他们可怜的唐氏老农，历经大清二百六十八年之中，只考中了一个秀才。所以“屡试不第，才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总之，科举就跟抓彩似的。好多百姓干脆不掺合这事，想都不想，除非吃饱了，或者，虽然吃不饱，但是有那么点野心与抱负！

袁耀东与父亲，一个读书郎，一个私塾先生，并且拥有一定的土地，声望与口碑又都不错，所以引来一房很好的媳妇儿，淮宁望族（一说穷儒）郭氏！不管是望族还是穷儒，这媳妇儿出嫁之前在家读过《论语》《孟子》等儒家著作。在那个年代，这就算很丰厚的嫁妆了。众所周知，推动世界进步的手，是推动摇篮的手。袁家最后的发迹，全是这女人推出来的。

当然那时候的袁耀东可能还预料不到这一点。袁耀东18岁结的婚，22岁考取的秀才。小两口郎才女慧，一个专心读书，一个操持家务，小日子过得也算不错。但是天不假年，袁耀东还没来得及再上一个台阶就因病而亡。笼统的说法是“勤学竟志以歿”。^[1]有说得了霍乱，有说得了痨病的。不管什么病，都是致命的。其中王忠和先生的评议最有意思：“只可惜他不懂得身体是本钱的道理，一味地以勤补拙，大概营养跟不上，平时又不锻炼身体。”^[2]

[1] 李宗一：《袁世凯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页。

[2]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袁耀东一死，留下四儿一女，长子袁树三只有十几岁，最小的女儿尚在襁褓之中。幸亏家有贤妻，郭氏撑起了整个天空。这个家族后来的枝繁叶茂，全是这个女人打理下来的。不管是贫农还是中农，在顶梁柱及男主人缺位的情况下，又要打许多折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袁耀东四个儿子确实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特困优等生走向功名富贵。前文说过，推动世界进步的手，就是推动摇篮的手。郭氏是一个非凡的女人，没有她的推动，袁家的发迹是难以想象的！而且，相对于袁家男性从袁世凯这代往上数，四代男人都活不过 60 岁的怪圈，这个女人居然奇迹般的“历经六朝”，于 1875 年（光绪元年）逝去（两年后才正式安葬），享年百岁，被人称作寿星人瑞。总之，袁家真正的发迹，应该是袁耀东四个儿子长大成人，取得功名之后。郭氏孵育了这一切，端的是开国元勋了！

1859 年（咸丰九年）袁世凯出生时，家富到什么程度呢？

家有田地四五十顷。古代一顷百亩，那么当是袁耀东当年那八十亩地的五十倍了。据考，除此之外，袁家还在北京天成亨钱庄和陈州于家典当铺等处，大量放着高利贷。^[1]

袁家所在的河南项城，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全县田地九千多顷，袁家占地比例是 1:180，所以不算什么。与袁世凯同时代，后来甚至赞助过蛰伏安阳的袁世凯的马青霞，是安阳籍清朝清官、人称马青天的广西巡抚马丕瑶的小女儿。她婆家河南尉氏县，仅其夫刘耀德这一门就占地两千多顷，俗称刘半县，大半个中国都有刘家的钱庄与当铺。

1874 年（同治十三年），袁世凯 16 岁的时候，袁家分了家。虽

[1] 李宗一：《袁世凯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年版，第 1 页。

然是四世同堂，上下五十口，但是郭氏白发人送黑发人，眼看着四个儿子全部先她而去，眼看着十个孙子中的老大保中、老二保庆先她而去，除了老三保恒、老四保龄在外做官还比较争气外，其他诸孙不是逃学就是抽上了鸦片。常言说，富不过三代，这个大家族也撑不下去了。于是在保恒、保龄的主持下，设计出了如下分家方案：不论老房头，也不论辈次，按当前实际情况，保恒同辈兄弟与世凯同辈兄弟，每人一等份，以后各自经理。另外留出四份作为郭氏的供给和宗族公用。而且，保恒、保龄还因自己是国家的公务员而高风亮节，把他们名下的两份让给了因兄弟少而吃亏的老房头，同时，兄弟两个还主动担负了弟侄中的读书教养及保中、保庆遗留下的诸子女的婚嫁资助等。^[1]

袁世凯这一支，分得三顷土地。^[2]嗣父已死，留下一妻两妾五女，外加袁世凯这么一个嗣子。虽然私房积蓄多不到哪里去，但是凭着三顷土地，怎么着也算是先富起来的人了。但是我们在袁世凯青年时期的家书中，分明看到他手头紧的意思——比如他在北京堂叔父保恒、保龄所设家塾中读书时，给二姐写信诉说：“零用积少成多，如写信向家要钱，弟甚无脸。弟在外不能养家，反在外使家养己，断不成道理。”^[3]按照中国传统的虚岁计岁法，这个时候的袁世凯19岁。在家书中，我们还可看到他月薪四十两银子时的欣喜——初次出道，投奔的是干爹、庆军统帅吴长庆，虽然四十两的月薪对他来说“仅可敷衍”，但是相对于长年在天津任四品道员的堂叔父袁保龄每月百两银子的工资（既要支付办公费用，又要养两房妻室及七

[1] 《黎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11页。

[2] 同上，第31页。

[3] 同上，第13页。

子三女），袁世凯既知足又“惶悚抱愧”。^[1]这个时候，袁世凯 24 岁。与此同时我们更可以看到，分家之后的袁世凯有了经济自主权，在家里办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主要业务就是“捐资供给食用”，比如徐世昌参加顺天乡试，缺少盘缠，袁世凯慷慨解囊，奉上一百两白银。^[2]徐世昌被这笔银子催得青云直上，1882 年（光绪八年）中举人，1886 年（光绪十二年）中进士，并授翰林院编修，从此成为袁世凯的终身朋友。

袁世凯虽然也哭穷，但是平心而论，小伙子起点不算低了。而且，随着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得势，他的经济势力还会水涨船高。金亮、南方编撰的《袁氏家族·珍闻轶事》中列有袁家两张房产、地产统计表。一张是晚清袁氏家族房地产表，大致是地产一万亩、房产四百八十八间。另一张是民国初期袁世凯房产、地产统计表，地产大约是六万亩，房产大约是八百六十间，外加六栋大楼和唐山一处房间。^[3]孔乙己的茴香豆，多乎哉？我们看看其他同志就知道了，史载，袁世凯的前辈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六人，每人地产平均约有十万余亩。^[4]所以我们只能说，让官员先富起来，乃是大清的国策。袁世凯比上他们，还略逊风骚。而且在中国体制下，显官大吏如果不显示一下贪污好色之类的人性，蒙着头往清官能吏那个方向走，皇帝佬儿还可能怀疑你有贰心：丫是不是想赢民心，也想称个孤道个寡啊？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王翦将军带兵 60 万前去攻打楚国，为了免除秦王的疑心，几次三番给秦王要求“美

[1]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 2005 年版，第 29 页。

[2] 张华腾：《袁世凯与近代名流》，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 页。

[3] 金亮、南方：《袁氏家族·珍闻轶事》（内部资料）[2005] 004 号，周口市滨河印刷厂，第 28—29 页。

[4]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9 页。

田宅院”；据《史记·萧相国世家》：汉高祖刘邦在前线灭黥布的时候，后方仅靠萧何一人。萧何为了免于刘邦的疑心，也不得不做些问舍求田自贱其名的事儿。这种传统，当然被清朝大吏们继承了。史载，曾国藩弟弟、湘军大帅曾国荃“每克一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1]一句话，中国过去那种体制下，占田置舍也是高等奴才在主子龙椅前的一种自保措施。

另外，虽然公子哥儿出身，后来还做了总统甚至立宪皇帝，但是袁世凯对于金钱并不看重。据时人笔记、胡思敬的《大盗窃国记》，袁世凯“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年轻时如此，比如鼓捣文社，捐助徐世昌进京赶考等。年长时更是如此，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她的父亲做了民国总统，搬进中南海之后，曾在办公室接待过东北大土匪张作霖（时为二十七师师长），办公室放着四块打簧金表，谈话的时候，张作霖多次注视，袁大总统当场就送给了他。过后哈哈大笑不已，对家人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2]

作为富家子弟的袁世凯，当然见过世面。但是他不看重金钱的这一面，相对来讲比钻在钱眼、一毛不拔的那些墨官渎官可是强多了。他的目标，不在这方面。在袁世凯的内心，人生如此剽悍，又岂在钱钱财财？袁世凯死后，子女们分家两次。所谓的分家，主要就是分财产了。老家项城田产两千余亩，均归其六弟袁世彤所有。^[3]在彰德、汲县和辉县有田产四百余顷，为袁世凯所有。这是明面上的，能说清。其他，黄金白银，古玩玉器，现金股票，甚至英镑法郎，别说我们说不清，就连他们家族中人也说不清。原因很简单，

[1]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2]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安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227页。

[3]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袁世凯都说不清。这也不是袁世凯一个人的毛病，但凡在中国做官，一般就都说不清了。典型的代表就是袁世凯之后的军阀张宗昌，号称狗肉将军三不知：不知自己多少兵，不知自己多少钱，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袁世凯一妻九妾，子十七个，女十五个。^[1]这个还能数清，但是财产就数不清了。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工资不低：年俸 36 万元——比美国总统高多了，时任美国总统年薪是美金 7.5 万元，折合中国银元是 15 万元。除此之外，袁世凯每年还领公费 48 万元，交际费 36 万元。^[2]当然我们不能和美国相比，虽然都是共和，但人家是美国特色的共和，我们是中国特色的共和——共和的初级阶段，总统当然要被安排在先富之列了。当然财产还是要算一算的，也好让一般的平民百姓心中有个数。关于袁世凯的遗产，我觉得最好用《检察风云》上陈明远先生的综合性报道。^[3]

一种说法：袁世凯于 1916 年 6 月 6 日上午 10 点钟咽气。临终前曾召长子袁克定到病榻前，令总统府内史夏寿田执笔，记录“口述遗训”。后据袁克定公布，财产是一百余万英镑。

一种说法：袁世凯死后，其妻妾子女各自为计，由徐世昌主持分遗产，就田产、股票、现金共分为三十份，诸子各一份，未嫁女两人一份，姬妾无子女者得一份，每份 8 万余元，合计共约 260 余万银元。

一种说法：袁世凯病重时，曾召见河南老乡、实业家王锡彤，案头置一单，所有现钱、存款、股票等共约 200 多万银元，指给王锡彤说：“余之家产尽在于斯。”

[1]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5 页。

[2] 李宗一：《袁世凯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年版，第 264 页。

[3] 陈明远：《袁世凯的遗产分配》，《检察风云》2008 年第 3 期，第 66—68 页。

一种说法：张伯驹记其父张镇芳（袁世凯亲信之一）在袁世凯死后，为袁分家产，其子女每人分到现款两三万银元，股票两三万银元。除河南项城原籍田产 2000 余亩，均为袁世凯六弟袁世彤所有之外，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汲县、辉县还有田产 400 顷左右。

此外，袁世凯生前在法国银行存有 200 万法郎，这笔巨款由袁克定秘密掌管。

此外，袁世凯在北平和天津两地至少还有五处房产，在河南彰德、辉县也各有房产。

.....

陈明远先生最后给了大家一个大约数：袁世凯遗产至少为 1000 万银元，其中大约一半为存款、银元现金、外汇，另外一半为房地产等。当时 1 银元的购买力至少约合今人民币 100 多元，折合现在的人民币，是 10 亿元。多乎哉？想想我们现在，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一个科级干部，就拥有违规资产 3 个多亿呢。

袁世凯的遗产曾有两次大分配，我们可以再围观一下。

袁世凯死后，第一次分配遗产。

一种说法：据文献记载，袁克定分给自己和他生母的数目一直保密，分给其他人的有记录可查：六个姨太太（九个姨太太，去世三个）每人各分得 6 万银元，黄金 30 两；十七个儿子每人分得 8 万银元，黄金 40 两，各种股票 7 万银元；十三个女儿（十五个女儿，去世两个）每人分得银元 1 万元，作为出嫁时的陪嫁。以上合计银元 185 万元，黄金 860 两，股票 119 万元。总数 300 多万银元。

一种说法：据袁世凯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袁克定因系嫡出长子，独分 40 万银元，其余庶出的儿子，每人各分得 12 万银元。他们所分的钱数，除了现金以外，还有折合银元数字的股票在内。袁静雪说，他们兄弟每人还分得有 10 条金子。但是否包括在上述的钱数

以内，她也记不清了。女儿们每人给嫁妆费 8000 银元。妻妾都不另分钱，各随她们所生的儿子一同过活。

一种说法：据袁世凯的第六子袁克端之子袁家宾回忆，长大成人后曾见到过一份分家的账单。此单未记袁世凯正妻于氏所得多少，除三、四、七姨太太去世外，大、二、五、六、八、九姨太太，每人分得现款银元 6 万元、黄金 30 两，作为养老费。诸子各分得现款 8 万银元，黄金 40 两，股票总价值约 7 万银元。诸女中四、八两位早逝，余者每人得嫁妆费约 1 万银元。

二十年之后，1938 年，袁克定主持，第二次分配遗产。

一种说法：这次所分的是卖掉的北平和天津两地的五处房产，还有彰德、辉县的各一处房产。这时第十六子袁克藩已经去世，所以由活着的十六个兄弟平分，据说各分得伪联币 24.84 万元。当时伪联币 1 元可买 20 个烧饼，约合今人民币 12 元。

一种说法：十六子每人分得 249 万银元，总计 3984 万银元。

一种说法：袁克定以长子优势，独吞了袁世凯存在法国银行的 200 万法郎以及大量田地、房产、古玩、文物、珠宝、字画等，价值连城。据有人估计，他所独占的财产总价值，在被分掉的全部金银股票的总和之上。但是存在法国银行的那 200 万法郎，据说从未取回，也不知便宜了谁。

这里说这么多，是想说明，我们说事的时候，就说事，不要总盯着人家的财产。人家祖上也穷过的。而阿 Q，祖上也阔过的。中国当时的游戏规则，就是读书科举，做官致富。非常时期，刘项可以不读书，可是正常时期，唯有科举是最接近公平的游戏规则。直到今天，我们的高考制度，比清朝的科举制，你认为更加公平了吗？

一句话，规则很重要。民众先给政府制订规则——政府在一切

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然后政府给民众制订规则——民众不需要服从任何人、任何组织，他是自由的，仅服从法律就够了！

1.2 出生在官僚家庭，也是学而优则仕

出生在富人家庭也就罢了，袁世凯居然出生在官僚家庭，这就更不地道了。

中国的规则，学而优则仕；仕优仕劣则都富，因为至少有工资与养廉银，有灰色收入，还有潜规则。贪呢，财多些；不贪呢，财相对少些。与多的相比，少的就是清官了。所谓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根本不是指大清的知府，而是指清廉的知府。不信看看我们安阳的马氏庄园，中原第一大宅，当时占地 7 万多平方米，现在占地 2 万多平方米，比乔家大院阔多了。庄主——清末头品顶戴、封疆大吏（最高做到广西、广东巡抚）马丕瑶是响当当的清官，光绪称他是“百官楷模”，百姓称他是“马青天”。青天都这样了，你还指望什么呢？

袁世凯家族，也是靠读书出仕的。

前面说过，袁世凯的曾祖袁耀东是个穷秀才，英年早逝，与官无缘。但是其妻乃难得的人瑞，明白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在她的支撑下，四个孩子都读书。他们乃是袁世凯的祖辈，总计四位。

第一位，袁世凯的祖父、袁耀东长子袁树三是个廪贡生。什么叫廪贡生呢？就是以廪生的资格做了贡生。廪生，就是公家供给优秀生员廪膳的。明朝是给廪米六斗，清朝是廪饩银四两，就跟现在的优等生的奖学金差不多。贡生，系府、州、县由自己的生员中选

出的、赴京师国子监深造的优等生，名为贡生。因选送方式不同分五种类别：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通称五贡。总之，袁树三是个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先是勤工俭学，后干脆中止科举正途，开始了工作，做了低级学官——以候补训导的功名署陈留县训导兼摄教谕事。明清时期县设“儒学”，为一县最高教育机构，内设教谕（正八品）一人，训导（从八品）数人。教谕主持文庙祭祀，宣扬儒家经典和皇帝的训诫，教诲及管束所属生员。训导地位略次于教谕，协助同级学官管理教育所属生员。约略地说，混合了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中学校长、大学辅导员、县宣传部部长等职责。教谕和训导岁俸银子四十两，由于品秩不够，所以没有养廉银。但是由于家教有方，聪明懂事，品学兼优，所以袁树三一工作就是个优秀干部的苗子，受到陈留县上至地方官绅、中至士子、下至普通百姓的一致爱戴。道光年间，黄河发大水决口，冲毁了开封城墙。袁树三被封疆大吏挑上，请他出面主持修复。事情重大，袁树三请假回项城向母亲禀明，得到了母亲为国为民须不畏苦难的训诫，当即返回开封接任。他亲临工程现场，革除了诸多时弊，堵塞了各种漏洞，工程进行得很顺利，但他的身体却垮了，以身殉职。

第二位，袁世凯的二叔祖、袁耀东次子袁甲三（1806—1863），字午桥。像自己的兄长袁树三一样勤工俭学，品学兼优，十几岁就中了廪生功名，1834年（道光十四年）中举人（这个举人来之不易啊，连考十次才成功的），1835年中进士。袁家这才算熬出了头。甲三先是在京做官，任过礼部主事、军机章京、江南道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等。曾与曾国藩同师事理学大师倭仁，所以有同窗之谊。与曾国藩同年中举，所以还有同年之谊。两个人在京城做官时还是密友。我说过，中国传统社会，第一认的是血缘亲，第二认的是准血缘亲。围绕这些，还有同窗亲、同年亲、同乡亲。发展到今天，

又被人戏谑为“一块扛过枪，一块嫖过娼，一块同过窗，一块下过乡”。总之，在中国，混的就是个血脉与人脉。所以，袁甲三考中进士，仕途得意，从此给袁家铺就了一条阳光大道。袁世凯后来的出山，当然也要得益于此。民间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现在我们又改个新词，叫代际遗传。也就是说，穷家孩子翻身，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富家孩子致富，嗯，不用他干什么事，拼爹就行了。

咸丰初年捻军起。由于八旗、绿营都成了饭桶，所以政府另起炉灶，要求大臣们各回各家办团练。1853年（咸丰三年）工部侍郎吕贤基奉命到安徽督办团练，奏调袁甲三到安徽做帮办团练大臣。袁甲三因此被提升为淮军将领，终身以文挂武，端的是文武双全。最后做到钦差大臣，官拜一品漕运总督。工资每年180两，养廉银9520两。而且，因了袁甲三的功勋，其曾祖父袁志恭、祖父袁九芝、父亲袁耀东均被朝廷追封与袁甲三同样的官衔：一品光禄大夫兼漕运总督。母亲郭氏、原配陈氏、续妻陈氏也都获赠封一品诰命夫人。虽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不是鸡犬们持家有方，一人如何得道呢？郭氏在丈夫死后教育树三与甲三说：“你们的父亲胸怀大志，可是天不假年，一命归西。你们如果不继承先志，发奋读书，你们的父亲就算没有儿子。”^[1]她白天干活，晚上督课，夜半三更才能休息。坚持了十多年，这两个孩子才相继考取秀才。树三的妻王氏与甲三的妻陈氏嫁到袁家时，袁家还是很清贫的，常年素食不说，两个女人相伴早作晚息：天到四更了，还对着一盏孤灯缝补衣服，熬得两眼通红。鸡鸣时分，就又起床操劳了。甲三的妻子生下第一个儿子后，连传统的月子都没坐，第三天便下地干活了。

第三位，袁世凯的三叔祖、袁耀东三子袁凤三，庠生出身。但

[1] 侯宜杰：《百年家族——袁世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是再发奋，也没有再上一个台阶——中举。想想范进，大家就知道这事的难度了。于是郭老太太开了个家庭会，让两位哥哥帮小三捐个官。清代仕途四条道：科举、捐纳、荫袭、保举。袁凤三走的是捐纳。汉朝著名的大才子司马相如、清朝著名的清官李卫，都是走的这条道。不得不承认，郭老太治家有方——如果把国给她，她可能比慈禧太后强多了——家风和谐敦厚，两个哥哥，包括嫂嫂，争相解囊相助。甲三的续妻陈氏甚至把自己陪嫁的首饰都拿出去典当了，给凤三捐了个禹州训导。从八品，每年工资 40 两雪花银。凤三一干就是二十年，而且做得兢兢业业，声望奇佳。虽然凤三的职位略相当于县教育局副局长，但是每次闹匪，他都被派守城，也算是文武双全。捻军起时，许多州县被攻破，独禹州城完好无缺。凤三甚至典当了自己的衣服来捐助守城经费，待他死在禹州任上之后，禹州百姓哭天抹泪——老天爷，天上掉下个好官不容易啊你怎么就急急地把他收走了呢？！

第四位，袁世凯的四叔祖、袁耀东的四子袁重三，生员出身。不仕在家，管理家政。所谓的家政，一是家和万事兴；二是理家财。这个老四虽然没有做官，但是理财能力很高。当然了，如果咱家有三位做官的哥哥，咱也会理财。

这里小结一下，袁世凯的四位祖辈们，三位秀才，一位进士；三位出仕，一位留守；出仕者中，最高者一品，最低者从八品。工资都不高，有些连养廉银都混不上。但是清国流行灰色收入，或者说流行潜规则。照清官的模子做，也挡不住源源而来的富贵。虽然大清没有私有财产制，身家性命全在统治者手里，但是这富贵实际上还是代际遗传的，所以这个朝代才能维持二百年。而政权的稳定就建立在“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共谋关系上。众所周知，王安石当年变法时，同僚很翻白眼的。宋神宗认为自己为老百姓服务呢，以

类似于人民领袖的口吻理直气壮地说：“更张法治，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大官僚文彦博当场回曰：“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1]一句话，天下是皇帝与臣僚的。如果政治设计不是首先为官员们服务的，人家何苦呢？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至于袁世凯的父辈们，计有十位。骨干人物四位，咱这里只说骨干。

第一位，袁世凯亲爹、袁树三的长子袁保中（1823—1874），副贡出身，据说天资较差。作文时，别人都交了卷，他还得拿到家里继续接着做，一直做到三更天。后来捐了个同知。同知，知府副职，正五品。但他并没有出外做官，而是在家宅着做地方绅士了。当然做得很到位，练乡团，保地方平安。有逃难者来附，打开寨门接纳。家族更是和睦，从无吵骂现象。袁世凯的妻妾后来因做嫔妃排名次而争风吃醋，说明家风有所败坏！

第二位，袁世凯嗣父、袁树三次子袁保庆（1825—1873），年轻时追随叔父袁甲三从军，小伙子虽然说资质中等，背书及领会教义都比别人慢半拍，但他也有自己的优点，就是理解之后，即能牢记不忘，还能借题发挥。更重要的是，很有些文武双全的底子，边从军边读书，1858年（咸丰八年）中举。同年，因战功获光禄寺署正。两年后，帮助毛昶熙（这家伙的弟弟毛亮熙与保庆是儿女亲家。娃娃亲。只可惜袁世凯的二姐袁让还没有出嫁，那边的女婿就死了。小女人从此望门守寡）督办河南团练，授刑部郎中。亲自带兵镇压捻军，打了诸多漂亮仗，叙功授盐运使，加四品衔，并赏戴花翎。后来最高做到江南盐法道。这位嗣父还给过继来的儿子袁世凯留下

[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

一本语录体书《自义琐言》，中有诸多为官为民之道：

官不负民，民断不负官。为官者，不责己而责民，却动曰百姓不好，是醉语耳！

“来清去明”四个字，做官之要诀也。人能“来清去明”则出处不苟，进退之间可以脱然爽洁，此身心无所污亦无所累。

“清”“慎”“勤”三字为做官要诀，缺一不可。^[1]

袁保庆知道自家官多品大，京城中甚至有“项城官难做”，大家都不愿意到项城当县令的传言。于是他通过袁保中给族人定了五条规矩：第一，袁家所有成员不准干涉政令；第二，不准往县衙送片子为别人说情；第三，不准品评官吏；第四，按指令完成应服差役；第五，足额缴纳税银。^[2]

第三位，袁世凯堂叔、袁甲三长子袁保恒（1827—1878），这位极聪明，小小年纪就中了举，之后考了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1853年（咸丰三年）随父从军。1857年因钦差大臣胜保举荐，授侍讲学士，赐顶戴花翎。1858年又加“伊勒图巴图鲁”（勇士）封号。父亲死后，朝廷推恩恤典，命他以侍讲学士即补。之后，做过李鸿章淮军的冀长，即参谋长；还做过左宗棠西征军的粮台，即后勤部长；甚至做过左宗棠的帮办，即副手。并且因此而获头品顶戴，再后升户部侍郎、内阁学士；最后官至礼部侍郎、刑部侍郎等。

[1] 金亮、南方：《袁氏家族·珍闻轶事》（内部资料）[2005] 004号，周口市滨河印刷厂，第162、166、168页。

[2] 同上，第24页。

第四位，袁世凯另一个堂叔、袁甲三次子袁保龄（1841–1889），22岁就中了举，也是文武双全，早年曾随父亲从军镇压捻军。父亲死后，被政府赏了个内阁中书。服满后，进京供职。后被李鸿章调到北洋（李鸿章父亲李文安曾给袁甲三做过幕僚，李鸿章本人与袁甲三又是同僚。所以袁家与曾李两家算是世交），做旅顺港工程总办。做事勤勉认真，因操劳过度，先是中风病倒；治好后重上监工前线，过劳死。清政府比照军营积病故例优恤，授次政大夫，晋封光禄大夫，赠内阁学士，入国史列传。

袁家官员名单，就列到这里为止吧。至于工资单，更没有一一列举的必要。因为清朝没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咱这样做，违反人家大清家法。而且，中国规则，官与富一直是正相关关系。像海瑞那样，穷到买二斤肉给过娘生日都会成为帝国新闻的事件，仅是一种例外，全体同僚，包括皇帝都看他不顺眼，所以被黄仁宇先生称作“古怪的模范官僚”。

“文革”时期，袁氏旧居遭到毁灭性破坏，当年院内保留的一些颁赐给袁氏家族的大清圣旨，早就被村民拿回家做鞋样了，端的是脚臭当年万户侯！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所谓的袁氏旧居，乃是袁世凯一支所居住的袁寨。袁家先是居住在袁阁，后因人丁繁茂而改迁袁张营（原名骡马张营，因袁家迁入而更名）。再后，为解决袁家男性阳寿太短的致命问题，袁甲三请风水先生看视了袁阁祖茔和袁张营阳宅，风水先生的建议是迁宅分居，所以，袁甲三一支搬迁到了陈州（今天的淮阳），袁凤三一支迁到了禹州。袁重三重回了袁阁村，只有袁树三留在了袁张营村。同时，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和叔父袁重三还联手在项城石腰庄建寨修府，这就是现在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袁寨。由于袁保中乃长门长孙，所以他居住的袁寨也就成了袁氏家族的中心住地，被称为袁氏旧居。袁张营的袁府，

则称作帅府。

袁氏旧居虽然遭到毁灭性破坏，毕竟没有从地球上消失，原先248间，现在还残存不到50间，可供人观瞻，让人心里直感叹，再好的东西，也能被“文化革命”搞得灰飞烟灭。最可惜的是袁甲三，其在陈州的墓地被毁得片瓦不存，尸体更是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从墓中“请”出示众，墓中随葬品，据说被村民换回十三台手扶拖拉机。端的是要想富去挖墓！袁世凯的亲生父亲袁保中埋在袁寨西北，也被革命群众扒了。棺材上面没发现宝物，便用抓钩把他的尸体从棺材里抓了出来，仍然没什么收获。袁世凯的亲生母亲刘氏因是偏房出身，去世之后，同父异母哥哥袁世敦作为嫡长子（保中的正妻郭氏只生一子，就是袁世敦。其他子女全是由其妾刘氏所生。袁世敦虽然不是长子，但却是唯一的嫡子，就是嫡长子啦），按封建礼俗，坚决不同意刘氏葬祖坟正穴，也不能同嫡妻和丈夫并葬，只准她附葬在坟所的地边。袁世凯与袁世敦争执了多次，后者就是不答应。袁世凯一赌气，另葬母亲于洪冢洼。抗日期间被国民党挖了坟，说是补充军费。

相形之下，还是袁世凯运气，当年红卫兵也想炸他的墓来着，但是没炸开。所以安阳才有了当今的旅游一地及摇钱一树：袁林。

1.3 出生在军人世家，家风不差

旧时中国的执政伦理是重文轻武。政府如此，民间百姓更是如此。也许百姓是被政府引导成这样的，反正上上下下奉行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只不过，对文武的需要因时而异。

打江山的时候更需要武，所以武将们吃香，领袖对武将们那是

恩宠有加，兄弟相称。但是江山一旦打到手，瞧着武将们咋也不放心，兄弟不是兄弟，臣子不是臣子的。当然文也不放心，只不过视具体情况有所侧重有所先后罢了。大略来讲，就是稳定时期崇文，不稳定时期崇武。比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清政府愣是不想给他实权。可是没有实权，镇压就没有实效。所以清政府无奈之中步步放权。太平天国一灭亡，曾氏就赶紧激流勇退了。

总之，乱世出英雄。袁世凯家族本都是读书人出身，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武举，但是由于清朝面临末世，更由于清朝制度，没有专业分工，没有职业院校，只有读死书、死读书这么一条道，导致好多文人须得是多面手。比如林则徐，京官外官、言官武官、河工水利、狱讼夷务……样样得拿，样样半通不通。袁世凯家族呢，也许本性就是文武双全，也许是旱鸭子被赶上了架，总之，都免不了带兵打仗的差事。

这其中最厉害的就是袁甲三。袁甲三做文官也很厉害，在京时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郎中、御史、给事中，以参奏广西巡抚郑祖琛“慈柔酿乱”、江西巡抚陈阡“贿赂交通”、定郡王载铨“卖弄横势，擅作威福”、刑部侍郎书元“贪鄙险诈，谄事载铨”而声名大震。巡抚们都免职不说，就连载铨这个王爷也被免去侍卫大臣并罚三年工资，端的是敢把王爷拉下马。袁甲三做武将更厉害。1853年（咸丰三年）外放，随督办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至军营，剿办捻军。先是帮办文案，后亲自带兵。得既是同年又是同学的曾国藩推荐，驻防临淮。长子袁保恒、侄子袁保庆随其参军。1855年遭同僚诬告，解职回京。当地百姓不舍，跪泣阻拦。朝旨命两江总督怡良查办，虽得昭雪，但并没有恢复他的职务，于是回老家侍奉母亲去了。而袁甲三一离开安徽，捻军势力就乘机发展到了与安徽接壤的河南东部。包括两江总督怡良在内的地方官员交章推荐，要

求政府重新起用袁甲三。怀远百姓胡文忠更是卖掉自己的女儿做路费，徒步走到京师，请求都察院让袁甲三回安徽镇守，因为他的状纸没有被都察院接受，竟怀揣状纸上吊自杀。^[1]咸丰帝听了，大为动容。1856年，朝旨命甲三随同河南巡抚英桂剿灭河南捻军。袁甲三到归德（河南商丘）召集旧部三千，连战连捷，从河南打到安徽，一直打到捻军的大本营雉河集。捻军首领苏天福被逮，张洛行孤身逃跑。朝廷特诏嘉奖，命以三品京堂候补。其子袁保恒也赏侍讲衔、赐花翎，1857年被升任为太仆寺卿，赏戴花翎。1858年，朝廷命袁甲三督办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剿防事宜。不到三月，河南捻军即被消灭干净。可是由于钦差大臣胜保屡次参劾，把淮南失守的责任推给了袁甲三。1859年，诏责袁甲三只防不攻，没有直捣贼巢，日久无效云云，著回京供职。湘军统帅曾国藩闻之，曰：袁一走，“中州事恐遂不可为”。^[2]湘军名将胡林翼也曰：袁本人不足惜，胜保弹劾袁也不足深怪。只是“袁在尚不能支，劾袁而袁得所……袁公毕竟忠心，亦殊不可多得”。^[3]意思是说，袁不在，他自己倒是回京乐得清闲了，我们这里却更难为了。更关键的是，他不但是难得的军事人才，更是难得的忠臣。这一点，连咸丰帝都发现了。袁甲三父子回京后，咸丰与袁甲三独对达14次之多。^[4]认清袁甲三的才干与忠心后，咸丰马上任命袁甲三为漕运总督，并且暗示袁甲三，将以他代胜保的钦差之职。1860年，咸丰下诏责胜保无功，撤其钦差大臣，命往河南督办剿匪事宜，袁甲三被升任钦差大臣，

[1]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2] 《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899页。

[3] 《胡文忠公遗集·卷62》，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7页。

[4] 《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卷1》，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督办安徽军务。咸丰帝甚至召见在京的袁保恒，亲自过问袁甲三的身体健康，认为他太胖，在战场上过于劳累，自己不放心，所以责袁保恒随军护理。这种恩宠世上少有，大小官员闻之无不惊骇，羡慕的羡慕，吃醋的吃醋。树大招风，袁甲三此时也知道走江湖要低调，不能让同僚们犯酸过度。袁保恒有了战功，手下欲上报，让袁甲三给制止了。咸丰帝知道后，还专门告知袁甲三，以后保恒有功，亦应实叙，不必引嫌。^[1]待英法联军进北京，咸丰逃亡承德后，袁甲三欲引兵北上保卫北京，被咸丰阻止了，认为临淮前线更需要他。咸丰死后，政府颁赏咸丰帝遗念御冠一顶，青狐皮袍一件，表一只，玉扳指一个。又是难得的异数，袁甲三感动得涕泪交流，益思鞠躬尽瘁报答天恩。1862年（同治元年），因安徽巡抚翁同书（著名的状元帝师翁同龢之兄）被曾国藩弹劾（折子是李鸿章代写的，由此导致李鸿章与翁家的恩怨），袁甲三也受了连累，交部议处。袁甲三身体本就有疾，正休病假中，这下更没兴致了，遂起了告老回家的念头，又续请病假一月，袁保龄也至临淮侍奉。曾国藩给北京上奏，给袁甲三做了诸多解释，并以其要侍奉八十岁老母为由，建议政府批准其退休。可政府就是不批，认为他一走两淮就更空虚了。其时，儿子袁保恒被升了侍讲。袁甲三又想把军务转交给他的，与曾国藩商量。曾国藩觉得这孩子“有治军之才”，可一下子让他当统帅“则资望稍嫌不称”。^[2]随后，袁甲三又奏请由署安徽布政使马新贻暂统其军。年底，袁甲三终于如愿，领着保恒、保龄两个儿子回到了老家。

虽然回到了老家，但是也没歇着。一是叛将苗沛霖威胁到了河

[1] 《清史列传·卷 53》，中华书局 1928 年版，第 13 页。

[2] 《曾国藩全集·书信 4》，岳麓书社 1994 年版，第 3020 页。

南的安定，二是河南府陈州及项城等地都是捻军活跃地区。袁甲三遂在地方号召团练，袁保恒做帮办。父子两个搞得很成功，苗沛霖入豫未成，张宗禹攻陈州未得。1863年，袁甲三病死，享年58岁（袁世凯也是58岁，与这位叔祖寿命相同）。政府赐谥“端敏”，在陈州、临淮建专祠纪念。擢袁保龄为侍讲学士，袁保恒为内阁中书。

袁甲三之后，袁家兄弟子侄全凭着“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精神，奔赴前线效命疆场。虽然他们的生命历程都比较短暂：1873年（同治十二年）袁保庆病死于南京任上。享年49岁。1878年（光绪四年），袁保恒病死于开封任上。享年52岁。1889年（光绪十五年），袁保龄病死于旅顺任上，享年49岁。但是这其中没有一位官风不好的。袁保庆在江南盐法道任上，除了察看河工，督办盐务，还指挥江防水陆各军，终因操劳过度，感染霍乱而亡。袁保恒的死，更是与著名的1877年（光绪三年）河南大灾相关。此年，河南遭遇了真正百年不遇的旱灾与蝗灾。赈灾不力的河南巡抚李庆翹被革职，朝廷以东河总督李鹤年署理河南巡抚，时任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帮办。面对河南人民的惨状，袁保恒泪如雨下。惨到什么状态呢？袁保恒此行带了侄儿袁世凯，袁世凯在写给二姐袁让的家书中云：“有人自渑池、洛阳等处来，言伊地人肉，卖廿十八文一斤，孙杀其祖母而卖之，弟杀其兄而卖之，种种未闻之奇，不一而足。”^[1]

更要命的是，天朝体制下，天灾必伴人祸，袁保恒赈灾中发现，河南地方官中，实力奉行赈灾的几乎没有。他赈灾的第一项业务居然是反贪，第二项业务是凑钱凑粮。第三项业务才是赈灾组织与技术，也就是如何让赈粮赈款能送到真正的灾民手中。他带头捐款捐

[1]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0页。

物，且不拿国家一分工资，随从与仆人的生活费用及差旅费用也都是他个人支付。甚至为此发了毒誓：倘若这场灾疫是天谴，那么我是奉使救民的，愿以身代之。结果，他真的如愿——累病交加中死去了。按骆宝善先生的描述：“他常常一个人无言枯坐，十分劳顿和疲惫，最终染上时疫，于光绪四年四月病死于河南省城开封赈务公所。距他离京回籍只有五个月的时间。”^[1] 灾区百姓听说袁保恒病故，无不痛哭流涕。朝廷赐谥“文诚”，事迹列陈州袁甲三祠内以资纪念，赐其长子世勋员外郎之职。

袁保龄当时在京城刚刚升为侍读学士，钦命以知府即补。他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了哥哥的遗志，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开底缺停选谒——也就是辞去实任官职和晋升的阶梯，放弃十几年来积累的官场资本与条件，以在籍绅士的身份，前往河南赈灾。袁保龄虽然与袁保恒同父异母，但兄弟俩比亲兄弟还亲。袁保恒少年即丧母，继母陈氏视其如己出，并且对子女们说：“薄待前妻子女，稍有自爱者不为。然而有些后母为了避嫌，只是一味地宠爱，却不去严格教育他们，我不忍心这样做。我之所以不怕别人的闲言碎语，为的是造就你们，你们应该明白我的苦衷啊。”^[2] 至于袁保龄，当年甲三只带侄儿保庆与长子保恒在抗捻前线，积劳成疾病于辕帐之后，祖母郭氏与母亲陈氏命他前往探望。小伙子痛哭流涕曰：“吾父力疾督军，诸兄频年戎马，吾不能执干戈卫社稷非丈夫也，所不忍离者，重慈奉养耳。”^[3] 祖母与母亲看这孩子被忠孝两难折磨成这样，遂放

[1]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7页。

[2]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3] 金亮、南方：《袁氏家族·珍闻轶事》（内部资料），周口市滨河印刷厂[2005]004号，第42页。

手让他上了前线。上前线之后，小伙子日夜捧读戚氏兵书。与此同时，还不耽误自己的高考，于1862年（同治元年）中举。是年小伙子虚龄才22岁。这样的家教下，保恒与保龄岂能不是好儿郎？

袁保龄赈灾时的决绝，还不仅仅停留在放弃政治前程。他把家里的财物也尽数捐出了。当然，老天爷还是开眼的，他顺利完成了兄长的未竟事业，并且赢得了民间与官场的一致赞誉，最后官、衔均升一级：即选道员，加三品衔。1881年（光绪七年），李鸿章把袁保龄调到北洋办理海防。那时候的淮军驻扎津沽一带，军民冲突时有发生。他历来袒护百姓，严责军人，力图做到军民鱼水一家亲。随后，他被调到旅顺督办海防兼办水陆军。这可不是个好活儿。一般内地同僚望而止步，但是袁保龄上任了。李鸿章出洋检阅，对袁保龄的旅顺海防工程大加称赞。此时政府正准备设立海军衙门大办海军。李鸿章不耻下问，命袁保龄密议献策。1886年（光绪十二年），醇亲王奕譞视察旅顺，也对他的海防工作大加称赞。由此可见，袁保龄的政绩与忠心也不是我们吹的。遗憾的是，袁保龄为自己的政绩与忠心付出了巨大的身体代价，因劳累过度而中风。朝廷特派御医前往诊治。治好后重新上岗，却再次累倒。他数次因身体的原因申请辞职退养，但都被李鸿章拦住了，终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死于任上。当然李鸿章也不容易，一辈子除了应付高高在上的主子与咄咄逼人的外患，还得对付一拨又一拨的反法、反日愤青。简单来讲，大清当时分三拨人：一拨是混日子混官位的；一拨是嘴上抗战混淆嘴混名的；一拨是想做事却左右不讨好混汉奸卖国名头的。李鸿章算是最后一拨，好不容易从底下逮住一个做事的，当然不会轻易放手了。袁保龄虽然是做事的，但是爱国心肠也不是没有。临终时，他还吟诵着“丈夫未死龙泉在，他日终当斩郅支”

的诗句。^[1]郅支乃是匈奴单于的代名词。这个时候的大清，已经处于严重的外患中了，旅顺又是中朝、中日、中俄关系第一线，中法战争时期，法国都扬言要北上进攻旅顺呢。袁保龄的差事自然不轻，其精忠报国之心迹也可见一斑。

袁保龄死后，李鸿章奏请政府从优抚恤。朝廷赐祭葬，赠内阁大学士衔，生平事宜宣付史馆，附刊袁甲三传后。其妻何氏、继妻高氏、妾刘氏均封一品夫人。七个儿子六个受封（四子世荣早故）：长子世承荫封山东直隶州，次子世显江苏同知，三子世扬附贡生分省同判高出，五子世同纂贡生湖北知府，六子世传附贡生二品顶戴候补四品京堂，七子世威候选布政使经历。^[2]

官风与家风，应该是一致的。而这种家风与官风，是有来由的——袁家有一个深明大义、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开国老太郭氏。她不但教子有方，教媳也有方。儿郎们读书出仕，精忠报国；媳妇儿们贤慧持家，丈夫的军功章，有男人的一半，也有女人的一半。袁世凯二姐袁让从少女时代即望门守寡的贞节就不说了，袁家众多的子、女、媳都曾割股疗亲的诚孝也不说了，只说郭老太太对内教育儿孙忠贞，对外和睦乡邻，把慈善与赈济做成常规事业，并且不让子孙在本地置买土地，认为乡邻四处乞讨，袁家脸面没地儿搁，做官也不光彩。老太太的英明让袁甲三大加称赞，袁保恒还为家人写了副对联：“十三学书十五学剑，百万买宅千万买邻。”^[3]这样的家风与官风，我们现在的一些史者居然好意思说袁家是军阀世家，岂

[1]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2] 金亮、南方：《袁氏家族·珍闻轶事》（内部资料）[2005]004号，周口市滨河印刷厂，第45页。

[3] 同上，第22页。



项城袁寨袁世凯出生地（王鸣铎摄）

据说袁世凯就出生在这间楼房的底层。袁克敏回忆说：“西边前院的北屋比较古老，据老人讲，袁世凯就出生在这座腰屋东间。”

非咄咄怪事？

按常识来讲，袁世凯家应该是将军世家。即使不叫将军世家，至少也是军人世家。其实更大程度上，人家更应该是仕宦世家，为什么愣要给人扣个军阀世家的大帽子？袁世凯都是军阀了，试问中国历史从古至今还有哪位带兵者不可称为军阀？众所周知，军阀都是战乱时期或者因政府威权不够而割据一方不听政府号令的私人化军队领袖。袁家子弟个个忠臣，哪里算得上是军阀？即使袁世凯本人，也不叫军阀。他梦想国家大一统，军队国家化。可惜被革命党的激进全盘打乱了。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队群龙无首，与南方不革命但只独立的军头们混战不已，分裂割据，他们才都是货真价实的军阀。

第二章

万般皆轻松，唯有读书累

虽然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只做过八品的教谕与训导，但我们还是把他算做官一代吧。袁世凯的亲生父亲袁保中捐过一个同知，虽然在家做绅士，但职称上乃是五品。嗣父袁保庆最高做到江南盐法道，正四品。所以袁世凯算是官三代，兼富三代，你不承认也得承认。就这样定了。

主流史学家在标题里就把袁世凯定位为纨绔子弟。^[1]真替他们不好意思。翩翩富家少年，将门世家虎子，与当时逗鸡遛狗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怎能混为一谈？现今的富三代与官三代中，只听说有时尚先生及名门贵媛的，又有哪个堪与袁世凯相提并论？

总之，做人要厚道。袁家当年在方圆百里以厚道闻名，袁世凯做到洪宪皇帝，也没有以万骨白枯为血祭。

2.1 袁世凯，一个官三代降生了

1859年9月16日（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一个男婴在袁寨呱呱坠地。他就是后来名扬中华大地的袁世凯（字慰庭，又慰亭或慰廷，号容庵）。其父袁保中，其母乃保中之妾刘氏。

[1] 李宗一：《袁世凯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8页；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袁世凯的亲娘沦为袁家小妾是有原由的。袁保中原先订的郭氏，将要迎娶的时候，病了。估计病得不轻，所以袁家想退婚。郭家死活不同意，无奈两家订了一条协定：袁保中现在可以另娶，以后如果郭氏女死亡便罢，如果病愈，袁保中须再娶郭氏，而且正室的位置要给保留着。^[1]之后保中另订了刘氏。刘氏虽然先进的袁家，而且给袁家生了五个儿子三个闺女，但一辈子只能屈居妾的位置。因为郭氏女又活过来了。嫁到袁家后，生有一子：袁世敦。虽然袁世敦比刘氏所生的长子世昌年纪小，但由于是嫡妻所生，乃稳占了嫡长子位置。袁世凯乃是刘氏所生的第三子，保中的第四子，人称四公子。

袁世凯出生的时候，因身在镇压捻军前线的叔祖袁甲三在家书中说自己打了胜仗，所以被起名世凯。

与袁保中的多子多女相比，其兄弟袁保庆就很不幸。元配牛氏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但儿子均未长大成人。按中国人那时的生活逻辑与生活常识，就该找人算命了。算命的结果，有人说他命中克妻，还有人说他命中该有几个夫人。充分说明，中国的算卦术才是真正多元化，不同的算命先生，就有不同的结果。袁保中综合考虑了一下，认为，既然命中有几个夫人，不如一下子凑够数，或许也能减免克妻的恶果呢，于是他一下子纳了两房妾。一姓王，一姓陈。由此可见，袁保中是真正的厚道。不像咱们的文化怪胎辜鸿铭先生，13岁留洋，通晓英、法、德、意、日、拉、希等多种语言，却狂热地维护中国的妻妾制，说什么在中国丈夫纳妾是出于对妻子的爱与保护。相形之下，袁保中这才是真正出于对妻的爱与保护。而且，妻妾都保护住了，但是想象中的儿子还是没有降临——

[1]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王氏生了两个女儿，陈氏生了一个女儿。加上元配所生，总计五朵金花。

刘氏生了世凯之后，奶水很缺。偏偏这孩子饭量很大（成年后的袁世凯仍以饭量大而闻名），吃不饱就哇哇大哭。而其婶母牛氏则奶水充足（在刘氏生子的当月，牛氏也产一子，夭折了），所以世凯便常被抱去吃牛氏的奶。袁保庆与牛氏夫妇待世凯如亲生儿子一般。几年之后，袁保中见弟弟年近四十尚未一子，干脆把世凯过继给了他。时间是1864年（同治三年），袁世凯虚龄6岁。

兄弟之间互相过继儿子，乃是儒家文化浸染的结果之一。可以说，直到计划生育之前，中国民间一直流行这种习俗。特别是我们河南，如果哥哥特别是长子没有儿子，那么其兄弟哪怕只有一个儿子，也得让渡给哥哥。如果弟弟没有儿子，哥哥子多，也需要让渡出去一个，总之，不能让任何一门绝祀，更不能让家门绝祀。中国是一个伦理宗法社会。伦理就是政治，政治就是家法。众兄弟得互相帮衬，不能眼瞧着兄弟绝后，绝后就是绝祀。现在民间百姓骂人，最狠的一招还是骂人绝户，或者绝户头。总之，袁世凯过继给叔叔，那是名正言顺，合情合法。只不过，他比大清四大公子之一、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要幸运多了。谭的父亲谭继洵官也不小，做到湖北巡抚。但谭打小没少受后娘的虐待，其后来的激进与愤青情绪可能跟这种后娘虐待有某种关联。他自己解释曰：“吾自少至壮，偏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1]袁世凯却是在一片温暖的爱意中长大的。建议有兴趣者搞个调查统计，历史人物中，凡是幼年缺爱的，长大后很可能成为暴君、杀人狂；

[1] 《谭嗣同全集·仁学·自叙》，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3—4页。

凡是在爱的包围中长大的，长大后才可能温和敦厚、仁孝有加。袁世凯虽不能当此美誉，但在他执政时期，也没有滥杀（执行军法除外），章炳麟那个著名的疯子，想当年如何地骂袁世凯，人家也没咋着他。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袁世凯的温和与圆熟，当是家风所致。

袁世凯的出生，既是时候又不是时候。为什么这样说呢？普通老百姓常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但那是普通老百姓的出息。对于天将降大任的斯人来讲，则是乱世出枭雄了。袁世凯就属于后者。袁世凯出生时候的国际国内背景，用咱们最熟悉的一句话来概括，那是资本主义一天天好起来，封建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具体来讲，英法正结伙与清朝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呢；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捻军乘乱而起，以淮河流域为中心，转战于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项城地处豫皖交界，正是捻军最活跃的地盘。袁世凯算是赶上时候了。其父袁保中正在大修袁寨，把它修成了一座城堡，以防御捻军的骚扰：寨墙一丈六尺高，厚度二尺余。寨东寨西各有寨门。寨门楼两层楼房，上下层各三间。其中寨门楼下层中门安装有丈宽丈高的寨门。东寨门上方书有“众志成城”，西寨门上方书有“同登仁寿”。寨的四角各有一座炮楼，炮楼也均为两层。寨墙上每隔丈余即有一垛口，用于观察敌情和安装武器。30多名卫兵轮流站岗放哨，日夜不间断。寨墙外每间隔两丈远有一盏油灯，夜晚有专人负责。每遇兵荒马乱之际，方圆十里八村的百姓都“跑反”来到袁寨，袁家打开寨门迎接，并且组织青壮年上寨守卫。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袁世凯当然非同一般了。据说捻军一来，“群儿骇走。公方五龄，家人负之登陴，纵观万众沸腾，略无惧色”。^[1]

[1] 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一》，1913年版，第1页。

看来，自古英雄出少年有些落后了，应该是自古英雄出童年才对。

袁世凯小时候长得很漂亮：大眼睛，圆脸盘，唇红齿白。^[1]这个倒是没得说。因为据照片，成年之后的袁世凯依然很帅。张社生同志说袁世凯“身材短小，体态臃肿”，“相貌不佳”，并且拿袁世凯与李鸿章做比较，说李鸿章要高度有高度，要风度有风度。^[2]我觉得他的眼神儿还是有些偏了。李鸿章固然是个帅哥，西方人笔下帅呆了。但是李鸿章式的帅，只能算帅之一种。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看男人首先要看他的眼。袁世凯的眼睛，是很有力道、很有穿透力的那种。很男人，也很帅。就连张社生，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虽然他还是有些看偏了，更多地从美学角度审视袁世凯那双眼了：

大双眼皮，属于重叠式太和殿风格的那一种，两个黑乌乌的眸子占掉整个眼帘的百分之八十。如果有人印刷袁世凯标准像，油墨老师必须选择纯黑的那种，一点儿杂质都不许有。

看着这对黑眸子我就纳闷了，袁世凯大半辈子待在降雨量低于600毫米的北方干旱地区，怎么就养就他这么对一泓秋水？^[3]

男人的力量，首先在于眼睛。袁世凯是做事的，看他的眼睛就可以知道。做事的男人，永远是帅的，不看他的眼睛就可以知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给他一双有力量的眼睛，否则他啥也做不成。当然，在中国做事，还要一个天时地利与人和。袁世凯终身

[1]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4页。

[2] 张社生：《绝版袁世凯》，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3] 同上，第10页。

的假想敌就是日本；而日本，也把袁世凯当作了中国这块肥肉的最有力道的防护者。不是给他麻烦，就是给他拆台。虽然张社生也注意到了袁世凯那双眼睛的力量，给其估价为“抵得上日本的一个师团”。^[1]但是光国内情形就够袁世凯焦头烂额了：一是中央权威不够，诸多督军拥兵自重；二是革命党激进派和议会诸般混乱。一句话，国内的政治与社会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根本形不成有效的力量。比上李鸿章当年抗日，袁世凯的外交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李鸿章抗日，“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2]袁世凯当时，虽然谈不上一个人的抗战，但是若得到了有效的整合与巩固，日本在中华肯定没戏了。所以袁世凯一死，最高兴的，除了革命党激进派，莫过于小日本了。

1864年，小帅哥袁世凯被过继给嗣父袁保庆。1866年袁保庆赴山东济南补用知府。袁世凯随同前往。嗣父为他办了家塾，小小儿开始读书啦，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

2.2 说袁世凯不喜读书，哪个孩子喜读书？

过去的史家，似乎很喜欢拿袁世凯的不喜读书说事。不是说他“对读书十分缺乏兴趣”，^[3]就是说他“读书心不在焉，经常托词逃课”。^[4]言外之意，这小子打小就不是个好东西。其实，以平常心论之，哪个正常的孩子喜欢读中国所谓的“书”？科举制度发展到明

[1] 张社生：《绝版袁世凯》，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2] 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3]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4] 李宗一：《袁世凯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8页。

清，早沦落为扼杀人性的工具了。理论上我们都承认这一点，并且实际上给予曹雪芹、蒲松龄等众多的科举失败者以理解与同情，何以到了袁世凯这里，就变得如此吝啬与苛刻？

不说明清时的科举制，就说现在的应试教育，哪个正常的孩子会表示喜欢？哪个孩子不是厌烦得头疼甚至以自杀相抗？只不过，在中国读书似乎成了唯一的出路，再烦也得扛着。曾几何时，我们的孩子写作文，都喜欢表态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其实，中华没崛起，孩子们倒都先趴下了。我正读初中的儿子在自己的阅读笔记中说：“以我个人经历来讲，我从没见过一个上了初中还喜欢上学的。”下面，我们看几组清末民初方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教育吧：

镜头一：在西方，一个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成为杰出的一员或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如国会议员，或者在某个政府部门中担任主管，而这些职位都能使他在公众面前得以抛头露面。但在中国，这些途径狭窄得只剩下一条，即从学校教室里走出来的一条路。^[1]

镜头二：中国的课本，也许是学生手中最枯燥、最沉腐、最古怪的东西了。书的作者恐怕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学生们的兴趣爱好。书的内容因单调而显得死气沉沉，既缺幽默又少机智……可想而知，中国孩子的早期学校生活是多么乏味单调。……中国人总是为成年人着想，两千年来没有哪位作家为孩子们写过什么，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艺术家为孩子们的欢乐而拿起画笔，去描绘孩子们的生活，也没有一位学者提议编写一套易学、有趣的教科书。^[2]

[1] 麦高温（英）：《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2] 同上，第83、84页。

镜头三：孩子们那一张张古板没有神采的小脸总是显得严肃而镇定，仿佛笑声、嬉戏与微笑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犯罪，是他们不应该有的。孩子们的眼睛都紧盯着课本，他们不能发出任何快乐的声音。^[1]

镜头四：中国的教师自大、傲慢，极其保守，把任何外国的东西都视为宿敌。以一个英国的观点来看，他们犯有明显的错误，且无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他们的知识面实在是太狭窄了。那些对英国学生来说再熟悉不过的知识，在他们却一无所知。……每个老师在自己的学校就是皇帝，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干涉、指责他的所作所为。^[2]

袁世凯虽然有幸生在所谓的“地主官僚军阀世家”，但是再世家，再有庇荫，也得亲自读书，因为人生得意，尽在读书中。所以袁保庆很舍得给唯一的嗣子搞教育投资，给小小子儿聘请了当地颇有名望的秀才王志清。

小小子儿也不算愚笨。据说“智慧过人，智力远超出他的年龄”。^[3]可能愈是这样，愈是不喜欢读死书，死读书。小小子儿最喜欢的是出外游玩。老师没有扭曲他的天性，倒是经常满足他的爱好，带他游大明湖，参观铁公祠。听了铁公的事迹，小小子儿流泪了。是的，幼小的心灵载不动大明统治者的残忍——朱棣夺了侄儿朱允文的大位，兵部尚书铁铉表示反对，朱棣就把他的肉割了，烧烤一下，塞其嘴里，问他：“甘否”？铁铉回答曰：“忠臣孝子之肉有何

[1] 麦高温（英）：《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时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3 页。

[2] 同上，第 87 页。

[3]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 页。

不甘”？除此之外，小小子儿还喜欢看戏，对戏中的忠臣孝子，乐看不倦。如果是神神鬼鬼的古怪戏，他则扭头不看。看这些苗头，还真是个好小子。

也许是天性，也许是家族及环境的影响，小小子儿还喜欢上了拳脚功夫。看到街头卖艺的把式，就想拜人家为师。武把式逗他，拜师要十两银子，第二天他就带了银子过来。^[1] 端的是憨厚可爱。

传闻说，小小子儿有次捉了萤火虫，把它们捣烂涂抹在脸上，一到夜晚，脸上就闪烁发光，以此来恐吓他的先生。^[2] 这个倒可能是真的。

1867年（同治六年）袁保庆升为候补道员。1868年，袁保庆好友、两江总督马新贻奏调袁保庆到南京管理淮军右标营务处。袁世凯随同嗣父来到江南。路过扬州的时候，袁保庆遇见故交张亮基。估计是考虑到江苏出才子佳人，科举教育搞得不错，就跟我们现在河南好多家长想办法把孩子弄到上海读书一样，袁保庆把袁世凯丢到了扬州，让他就读于张亮基的家馆。这个时候，袁世凯虚龄十岁，在一次作文中，他写道：“以杀止杀，杀杀人者，即止杀矣。”据说老师对此“惊诧不已”。^[3] 看来北方人与南方人就是不一样。也许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在扬州也没呆多长时间。王忠和先生猜测说：“有可能是他经常施展从济南学来的拳脚的关系。”^[4] 这样猜测，也算八九不离十吧。不过，估计袁保庆也没打算让唯一的嗣子长期在别人的家馆读书，安排好南京事宜后，自然要接走他的。

[1]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2] 陈志让（加）：《乱世奸雄袁世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3]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4] 同上，第35页。

袁保庆在南京，先是任职督标营务处，后是任职江南盐法道。江南是个好地方，南京还是个烟花城。太平天国虽然把它改称天京，并且把它糟蹋成了一片废墟，但是经过短短的四年恢复，已经又是“滚滚红尘”（罗永浩语）了。袁保庆虽然给袁世凯请了有名望的老师，但是一者是嗣父嗣母的溺爱娇纵，一者是孩子的天性，再者是外面的“滚滚红尘”，都让这小子坐不住。为了督促他更好地读书，袁保庆甚至把袁世凯的两个哥哥世敦、世廉接了过来，当然，二位哥哥的劝诫也很难见效。

袁保庆为了子嗣的关系，在南京纳了一个名叫金玉的小妾。^[1]她与袁世凯的嗣母牛氏搞不好关系，小小的袁世凯从中调解，居然能哄得两位女人都高兴，并且不约而同地为他的不好好读书而打掩护。可见小小子儿情商不低，打小就是个混官场的料。

小小子儿不喜欢读书，但是喜欢拳脚，还喜欢上了骑马。幸亏塾师曲沼也是文武双全，就教他些武功。袁世凯马术也不错，据他的女儿袁静雪回忆，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就能自如地控制那些不驯服的烈马了，而且经常骑马出去游逛。^[2]常在马上骑，哪能不跌脚呢？小子有种，根本没跟家里人说，自己弄了些药胡乱敷了，耽误了治疗，导致走路有些蹒跚。这就为后来清廷以“足疾”为由把他开缺回籍埋下了伏笔。^[3]

1872年（同治十一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被刺之前，拟

[1] 关于此妾，存在争议，详见侯宜杰：《袁世凯早期史实订误》，《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侯先生认为她可能就是袁保庆二妾中的王氏。我认为她可能是袁保庆在南京额外纳的一小妾，只不过袁保庆亡卒后，她未能纳归袁家。所以在袁世凯以后的家书中，我们只能看到他问候嗣母牛氏与两位姨奶奶的话。

[2]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安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209页。

[3]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1903年，袁世凯视察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与管学大臣张百熙（右）、译学馆监督朱启钤（左）合影。

上密折保袁保庆为知府。折未及发，人被刺死了。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袁保庆也就成了曾氏的僚属。紧接着，曾氏也病死了。南京城里谣言四起。袁保庆与其家人闭门守户，谨慎处事。就在这当口，已是14岁小小少年的袁世凯写下一对联：“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塾师大吃一惊。除此之外，小小少年还写过一首《感事诗》和一首《怀古》。前者云：“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千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后者云：“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大江滚滚东流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羽毛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1]

1873年（同治十二年），袁保庆因操劳过度感染霍乱，走向了人生的终点。这对于少年袁世凯绝对是巨大的打击。聊感欣慰的是，嗣父的生前故交、淮军将领吴长庆前往料理后事，喜欢这个少年，认做了义子，对他备加关照。

是年底，袁世凯伴随嗣母牛氏，扶柩回到项城老家。

1874年（同治十三年），袁保恒从左宗棠的西北兵营请假回籍探亲。发现这侄子资质不错，就是无人管教，恐荒废了学业，新年刚过，就把他和他三哥世廉弄到了北京，交由另一个堂叔父、内阁侍读袁保龄管教。此时的袁氏北京家馆，除了保恒、保龄自己的孩子和世廉、世凯兄弟，还有世凯的大姐夫杨寿岩等。聘请的家庭教师，阵容还是比较豪华的：举人周作溥教作诗，举人谢廷萱教作文，进士张星炳教写字。

袁世凯到北京就读后，叔父袁保龄对他做了初步观察，在致袁保中的信中概括说：“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2]一句话，不是读

[1]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2] 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页。

书的料，坐不住。

问题是哪个正常的孩子能坐住？

将心比心，或者有一点人道的同情，就不应该对袁世凯的不喜读书大加讽刺。只不过对于袁保恒那样严肃板正的传统士大夫来讲，对于科举的认识与我们现在大相径庭。面对侄儿的调皮顽劣，他制订了诸多矫正措施。白天，把袁世凯的书桌安排在老师的书案侧旁，并将世廉的书桌安排到里间，将兄弟两人隔开。晚上，安排世凯睡在老师隔壁。平时有严格的作息时间。从早上开始读书，直到晚上十点结束就寝。嗯，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像咱们这样，把本来很愉快的学习弄成苦差事的。科举有毛病也就罢了，没有科举的时候，苏秦就头悬梁锥刺骨地开场了。以至于直到今天，一般教室里还都挂有“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条幅。作孽啊。

作孽多了，自然见成效。年底，保龄给保恒汇报说：世凯可堪造就，文章尚不入门，但“竟是中上美才”了。^[1]期间，袁世凯的亲生父亲袁保中去世，为了让他备战科考，保龄以世凯已经出嗣给保庆，不许他回家奔丧，只安排世廉回家。世凯虽没有回家，但出于父子天性，哀恸泣血，咽喉溃烂。^[2]估计是这次哀恸留下了病根，以至于我们在他光绪三年的家书中可以看到，他给二姐汇报自己犯吐血症十余日，并嘱二姐“不可禀于母亲大人，免得老亲挂念”。^[3]在他 1882 年（光绪八年）的家书中也可以看到，他要求二姐务时来信，说自己“前以盼家信呕血喉疼，今已服药数副，全愈矣”。^[4]

[1]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鹿书社 2005 年版，第 18 页。

[2]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8 页。

[3]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鹿书社 2005 年版，第 13 页。

[4] 同上，第 30 页。

可见这孩子还是至纯至孝的。而且袁世凯的这个二姐虽然比袁世凯仅大了两岁，但对袁世凯管教极严。袁世凯在她眼皮底下若不学好，常被这位二姐饿肚子。直到袁世凯功成名就，这二姐的权威仍高高在上，袁世凯遇事总让着她，以至于袁家上下都知道，老爷就怕二姑奶奶。从袁世凯致二姑奶奶的家书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袁世凯的孝顺，每封信的主要内容，都是喋喋不休地问候母亲大人的精神、饮食，甚至衣服保暖等。富三代中能出这样的孩子，不错了。

1875年（光绪元年），袁保恒奉召进京，先后出任户部、吏部、刑部侍郎，也可以直接督责袁世凯读书了。这可苦了世凯，两个叔叔盯着，不苦读也不行。下面，就该上考场了！

2.3 不就是科举失败吗？怎就成了不学无术？

清朝时的科举分四级：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其实光童生试就得连考三级：县试、府试、院试。知县主持的叫县试，知府主持的叫府试，由中央派往各省的学道（或称学政、学台）所主持的，叫院试。参加这种三级考试的统称童生，三级连跳，最后院试被录取者即成为所在地县学（州学或府学）的生员，俗称为秀才。与秀才同等资格的，乃国子监中的监生，唯监生可由父荫或捐纳而来。凡取得秀才资格的就可以不出公差和免纳田粮了，更重要的是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了，由此一级一级往上考，无险风光在高处。

1876年（光绪二年），袁世凯回老家参加陈州童生试。县试顺利通过了；府试时受到了陈州知府吴重熹的嘉赏，被录取在前十名；院试时栽了——当时的河南学政、后来做了军机大臣、并且一度与袁世凯成为政敌的瞿鸿禨跟吴重熹闹别扭。别扭的原因很简单，按

当时的陋规，一省学政前往各州主持院试时，各州府要按学政的品级赠送棚规。瞿鸿禨在归德府（现在的商丘）得到的棚规很丰厚，可是到陈州，吴重熹给的棚规很干瘪。学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陈州府的考生全军覆没，没一个被录取！^[1]袁世凯第一次出道就这样栽了。问题是以后的瞿鸿禨还是清流派中人，看不起袁世凯这个浊官。袁世凯几次跟他套交情、拉关系，他都拒了。

非常奇怪的是，诸多史家把袁世凯的初次科考说成是参加“乡试”^[2]或者“应考举人”。^[3]而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则回忆其父有限的两次科考（第二次是1879年）都是童子试。^[4]王忠和先生笔下，虽然详细论述袁世凯第一次科考是童子试，但是第二次科考，则变成了是乡试，说袁世凯“以捐来的监生资格参加乡试”。^[5]找不到资料以查证袁世凯何时捐得监生资格的。但以袁当时的家境，捐个监生当是举手之劳。

考场失意，婚场得意。第一次科考失败之后，袁世凯顺便在家结了婚，娶妻于氏。于氏乃河南沈丘人，家里很富有，挂过双千顷牌。是年，袁世凯虚龄18（于氏比他大两岁）。按现在的规矩，恰好是高中毕业生的年纪。

短暂的婚期过后，1877年（光绪三年）初春，袁世凯重上北京。其实，第一次科考失败后，袁世凯就想放弃读书这条路，只不过在堂叔父保恒与保龄的督责下，他抵抗不过。此年袁世凯致二姐一封

[1]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2] 李宗一：《袁世凯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0页。

[3]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4]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安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4页。

[5]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家书。^[1]从中可以发现他已懂事许多：

第一，嗣母令于氏上京陪伴袁世凯，被袁世凯拒绝。他的意思是，如果母亲来，则于氏可同来；母亲不来，则于氏不可来。还说：“弟既不能承欢膝下，又使内人亦来，是何事也，弟心何安也。”

第二，袁世凯是保庆这房唯一的男性，嗣父死后，他得当门立业了。于是有全家上北京同住的意思。而他最大的意思是，他远在北京，母亲五十多岁了尚无人照应，让做儿子的他过意不去。而且北京良医多，还可以给母亲调治身体云云。

第三，明年母亲大人五旬正寿。袁世凯回也不是，不回也不是，两下作难。不归，心难安；归，怕耽误学业，影响后年的大考。而且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好，自从到北京，大小病二十余次。而且最近十天，吐血症犯了。

第四，虽然老病犯了，但是切不可稟于母亲大人，免得老亲挂念。

第五，零用钱积少成多，自己不能养家，反在外使家养己，断不成道理，甚无脸。

第六，出来数月，功名不成，无脸无家。欲在开封谋个差事，可以糊口即可，可惜三叔保恒不同意，他也无奈，总不能跟三叔硬来。

第七，本该回家接母亲大人来京的，可是下科将至，怕自己再考不好，“何面见人也，即妻子亦何面见也”。所以虽多病也不敢自弃：“每当卧病，思己之功名不就，无不攘背而起，展书诵味，但不知老天负我不负我乎。”

也许这封家书，才更能显示袁世凯青年时的真面目吧。此时的

[1]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11-15页。

他虚岁 19。

除了读书，时任刑部侍郎的袁保恒还有意让袁世凯帮办一些公务。袁世凯书读不好，做事则既踏实又老练。这对他以后走向官场应该是个不错的铺垫。也就是此年，河南大灾。袁世凯陪同袁保恒来到开封赈灾。袁保恒染上时疫，病逝。袁世凯拒绝了上面发给他的三百两银子的生活费，并把所有的公务移交手续办理得井井有条后回到原籍。^[1]一般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袁世凯由于过惯了都市生活，对乡村生活感到乏味，所以不再住在袁寨，而是改住陈州，袁甲三生前所购的一座大宅院里。事实上这应该不是唯一的原因。如前所述，1874 年（同治十三年），袁家就分了家。现在，保字辈的，不只保中、保庆，就连保恒也去世了。这让袁家很是不安，从袁耀东、袁甲三再到袁世凯的父叔辈，袁家男性真的很短命。在风水先生的建议下，袁府决定“析土分家”。所以，袁世凯改住陈州，估计也是这种背景下导致的。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经济独立兼住宅独立的袁世凯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骑马斗酒，结交朋友，并组织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是不是附庸风雅、博慷慨之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现在还有诸多孩子读不起书上不起学，我相信他们宁愿遇上袁世凯这样的人，也不愿意遇上袖手说风凉话的这些历史学家。

袁世凯虽然独立了，但是书还是要读的。一是二姐还经常让他饿肚子；二是此年年底，他当上爹了——长子袁克定出生了。

1879 年（光绪五年），袁世凯的姑丈、道员张向宸办理河南省赈捐，委托袁世凯分办陈州捐务。由于他集款独钜，之前其堂叔父袁保恒在河南赈灾时也捐了一笔款项，所以张向宸就合并款项，给

[1]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1 页。

袁世凯弄到一个“中书科中书”的官衔。清制规定，由捐纳而得官者，亦必须先捐监生作为出身。所以袁世凯的监生，当是在此时捐得。官衔虽是虚的，但监生资格则是实的，可以跳过童子试直接参加乡试了。也就是在此年秋天，袁世凯第二次走向考场，第二次失败。

失败就失败，不是啥意外。可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对其讽刺奚落也就罢了，居然直接骂上了“大草包”。^[1]其他不说，只说若有邻家孩子高考失败，咱就骂人家大草包吗？做人的平常心怎么都没了呢？

再说袁家出了几多秀才几多举人几多进士已是上天的格外眷顾了。袁家出几个不喜读书的很正常，出几个高考落榜生更正常。风水轮流转，好事不能让一家占绝吧？

袁世凯也有自己的价值标准。第二次科考失败后，他把自己过去的诗词文章付之一炬，曰：“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2]

如果把这一节弄成动画，让我们中小学的孩子观赏一下，相信他们会給袁世凯热烈鼓掌，并且哀叹自己生不逢时呢。

最后需要提一下的是，世人都对清末科举制的被废大加称颂。殊不知这科举制的被废，出力最大的，首先是袁世凯，其次是张之洞。袁世凯是科举的失败者，张之洞是科举的得意者。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值得称颂的推手是袁世凯而不是张之洞。袁世凯自己，也把废除科举制认作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经常跟人谈起。^[3]可惜我们的历史学家经常对此表示忘记！

[1]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2] 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一》，1913年版，第4页。

[3]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安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210页。

第三章

干爹再好，不如自己干得好

也许，称袁世凯官三代，比富三代更准确一些吧。虽然官与富在天朝是正相关关系。但是，至少截止到袁世凯之前，甚至包括袁世凯，袁家上上下下，还真找不出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贪官污吏来。相反，他们的官声政声名声都是挺好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后来张謇写给袁世凯的那三千字长信中发现，他在痛述袁世凯的种种毛病后，希望袁世凯一个月不出门，好好看看他推荐的书，脚踏实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1]

一句话，除了军人世家的门脉，袁世凯还有家族的名脉，这一切，有助于他的仕途起步，但只能构成一个人的起点。之后，还得看自己。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才能见分晓。

而袁世凯在起步的时候，就表明自己不是吃干饭的。

3.1 投奔干爹吴长庆，才算投对了人

其实，如果不是后来袁世凯的发达，那么，截止到他出道之前，袁家已经有些败了，至少他的父叔辈们已经大都陨落了，只剩下一个堂叔父袁保龄。而保龄在继承兄长遗志，完成河南赈灾任务后，政府赏他一个三品衔，以道员候补。

[1] 张华腾：《袁世凯与近代名流》，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4 页。

如前所述，按照过去一些人的逻辑，袁世凯既然出生“官僚军阀世家”，当然就是纨绔子弟了。可世上恁多纨绔子弟，像袁世凯这种真正想做事的，又有几何？而且，虽然是世家子弟，做个事也是很不容易的，门道与人脉很重要。

袁世凯那时首先想到的路子，就是到北京捐个实缺官职。由于分家了，更由于他平时大手大脚惯了，所以捐官的银子他都拿不出来。他的生母与嗣母都把自己的私房钱拿了出来，可钱还是不够。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小舅子。没想到小舅子不但不借，还说去了也是白去，不如在家里坐着好些。

如果在家里坐着，那袁世凯真可能坐成斗鸡遛狗的二混子了（纨绔子弟估计不行，经济支撑不够）。他没有，揣着所凑之钱上了北京。

据他的女儿回忆，袁世凯揣着银子进京后，却把捐官的正事搁在了脑后，一味地讲吃、讲穿、讲玩乐。有些人看他孤身一人可欺，便引诱他赌博，把他所带的钱全赢走了。结果官没捐成，钱也输光了。就在这当口，他遇见考中进士、已做了京官的徐世昌，才资助他回了项城。^[1]

这里袁静雪的回忆可能有误。袁世凯上京捐官是1881年（光绪七年），此时他的堂叔父袁保龄被李鸿章调任到了北洋海防，没有他的关照，袁世凯在北京被人哄骗是可能的。但是袁世凯遇上徐世昌似不可能，因为徐世昌中举是1882年，中进士是1886年，既不可能遇上袁世凯，遇上了也没有川资赞助袁四公子。不管怎么说吧，捐官这事没弄成。

北京归来后，在家当然呆不住。恰其时，正在登州帮办海防的

[1]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安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210—211页。

庆军统领、身为袁世凯干爹的吴长庆有信前来，“招其往学军旅”。^[1]这一点倒是颇合袁世凯的心思，于是他决定前往。吴长庆与袁世凯嗣父袁保庆的交情非同一般。想当年吴长庆与其父吴廷襄在安徽办团练。1854年（咸丰四年）太平军攻克安徽大部，吴廷襄乘太平军大意，反手攻克庐江城，旋被太平军包围。于是派儿子吴长庆前往袁甲三的抗捻军营求援。袁甲三与保恒、保庆商议，保恒认为强敌当前，不能分兵；保庆认为士绅团练不易，孤城垂危，力持救援。商议不决中，庐江城破，吴廷襄阵亡。事后，吴长庆与保恒绝交，却与保庆结拜兄弟。保庆死于南京任上之后，前来主持丧事的也是吴长庆，并且纳世凯为义子。所以袁世凯投奔吴长庆，从哪方面来讲，都算投对了人。

投奔路上，袁世凯先到了天津，堂叔父保龄送他四十两川资。此举可谓雪中送炭，也让袁世凯感觉到亲情的温暖，以至于八年之后，当保龄死于旅顺任上之时，袁世凯在致二姐的信中，还提到了这件事：“此一事终身不敢忘，所谓在情不在财也。”^[2]

袁世凯热切切来到吴长庆营幕，没想到身为儒将的干爹却还把他当孩子看待，估计也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拜把子兄弟、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所以让他在文案上挂了个名，领一份干薪（月给银子十两）。伙食费也不用掏，还派两名差弁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并且请幕府大才子、当时的秀才、后来的名状元张謇指导他读书。袁世凯没想到干爹还要他科考，不好意思违背其一腔热忱，就硬着头皮学。结果抑郁成疾。无奈之余向张謇诉苦曰：“我家中有田可耕，此来不是为谋糊口。我以为中国现在受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

[1]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2] 《北洋军阀史料·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

扰及我南洋沿海，指顾之间，战事将起，假如对法失败，则列强或将群起瓜分。我当初因吴公膺海防重镇，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之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赴敌之意，谅我亦不甘久居也。”^[1]

张謇也发现他不是读书的料，办事却干练有条，再加上被这番谈话感动，遂极力向吴长庆推荐。吴长庆听到袁世凯想做事，也很高兴，马上委任他为营务处帮办。月支银四十两，另配两名勤务兵。袁世凯对吴长庆的知遇之恩非常感激，对工资更是非常满意，所以小伙子憋足了劲儿，既要报答干爹又要报效朝廷。

营务处主要职责是辅佐主帅办理军政和行军布阵、联络将官、监督训练、考核弁兵、审查军纪等业务的。袁世凯一个毛头小伙子，新官上任，那些油条老兵当然不服。但是袁世凯不怕，他办事勤快，任劳任怨，严于律己，不徇情面。春节放假时，士兵因赌博发生枪击流血事件，袁世凯迅速带兵赶到，抓住几个带头人就地正法。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处理经过，并请治其“专擅杀人”之罪。吴长庆非但没有责怪反而欣赏他有应变之才。在致二姐的家书中，袁世凯汇报曰：“凡事必认真稽查惩办，尚犹平顺，不过小人耳目不能不怨耳。然不能任劳任怨，安能成大事？故虽吴大叔本家亲故，亦无不惧弟者。我辈年甫二十有四，非先自立足根，安能约束他人？弟赖能服人者，已不荒唐耳。即吴大叔信任我者，亦知我谨慎耳。”^[2]在致二姐的另一封家书中，袁世凯说吴长庆待人“无不忠厚，而与弟相处最好，相待极优，朝夕晤谈，诸蒙赏识，恨无以报知己也”。还有，自己四十两银子的薪水在吴长庆这里已是“第一薪水，无有

[1]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6页。

[2] 《北洋军阀史料·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出乎右者”，且伙食喂养和勤务兵的薪水也由吴长庆开支，自己“能不勉力前进也乎？”^[1]

从这些信可以看出，袁世凯投对了人，成熟多了，能干多了，而且机遇马上紧跟着来了——大清的小兄弟、朝鲜出事了！

3.2 朝鲜，你要向何处去？

说起朝鲜来，那是小孩儿没娘，说来话长。

朝鲜是中国的朝贡国，明清时候发展为“模范藩属国”。^[2]中朝朝贡关系，其由来渐矣，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齐国的管仲用“重金政策”吸引得周边小国纷纷前来进贡，这其中就有朝鲜。至于模范藩属关系，则起于朝鲜李氏王朝的太祖李成桂。李成桂当年乃高丽大将、东北面兵马使。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高丽与明朝边境起了冲突，高丽王决定联合北元出兵辽东（元朝没有灭亡时，高丽王供奉的老大乃是元朝，所以对他来讲，元明仅有旧老大与新老大之别）。李成桂认为这是“以小逆大”，划不来，遂学着赵匡胤的小样儿，兵变了。把主子幽闭后，自立为王，并派人前来大明呈表请命，很给咱这边面子，咱这边图的就是个面子嘛，很高兴，在其所上的两个备选国号里选择了“朝鲜”。朱元璋亲自批复：“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3]所谓的本其名，按中国的传统说法，公元前11世纪，商周交替之际，商的

[1]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9页。

[2] 费正清（美）：《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3]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3页。

重臣箕子出走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由此看来，李成桂实乃儒将，不只朝贡关系，连血缘与文化都要与大明混同，这叫亲上加亲。但是若从朝鲜那边论，不定把李成桂当朝鲜版的石敬瑭呢。不管怎么说吧，从此高丽改叫朝鲜，并且奉明朝为上国，自称“事大”。^[1] 所谓的事大，按理论，起源于中国先秦时代的王土王臣观念和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在朝鲜的传播。按实践，就是把咱当老大了。双方乃大与小、上与下、君与臣、父与子的关系。平素按时进贡，老大对他们厚往薄来。明初，老大的意思是，每三年贡一次就行了，朝鲜却希望每年进贡三次。结果朝鲜如愿，每年元旦（中国春节古称元旦）、皇帝寿辰和太子寿辰前进来贡三次，名称分别为正朝、圣节和千秋节。除此之外，还有临时派遣的谢恩使团、进贺使团、进慰使团、进香使团、告讣使团、押马使团、奏闻使团等。^[2] 小朝固然需要进贡，可是大清也折腾得不轻，除了接待、赏赐，还得时不时亲自跑到朝鲜宣谕去，端的是劳民伤财。但我们这老大一般不讲经济，只讲政治。政治上，朝鲜称臣纳贡，在王室继承、婚姻和其他一些重大事情上接受老大的授权，保持国内安定和对华和平，老大就不干涉小朝的内政。但是小朝一旦遭遇内忧外患，老大就需要出钱出力甚至出兵了。对朝鲜来讲，对外就可摆出“俺大是李刚”之类的精气神儿了。明朝万历时，小日本侵略朝鲜，中国政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日援朝去了，这一抗就是七年（1592—1598），中国士兵死伤无数，史书上也说得很模糊，数十万。只说明

[1] 费正清（美）：《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2] 费正清（美）：《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政府花去白银 2600 万两，充分说明咱搞政治不差钱。明朝灭亡后，朝鲜政府还搞反清复明呢，认为明朝是大中华，朝鲜乃小中华，清朝只能算夷狄之邦。心里不服，但又抵抗不过，只好拿一些儒家零碎来安慰自己：“胡人无百年之运”；“自古匈奴之人中华者，皆不能长久”云云。^[1] 私下称清朝皇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仍用崇祯年号，直到清末，甚至还有私人笔记书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2] 崇祯泉下有知，当深感欣慰，他老人家的一个年号当是中国史上最长的，比一个朝代还长，都超过二百五了。问题是朝鲜的反清复明计划一直实现不了，想联合郑经与日本共举大业，也没弄成。而且“胡朝”并没有一天天烂下去，相反，倒愈发灿烂起来了，还出现了康乾盛世。朝鲜没办法，只好自己说服自己，从华夷相对论里找台阶，称清朝虽然夷狄之身，但已“成为儒家文化的继承者”。^[3] 于是重新提出“事大之节，故当尽其诚”的思想。^[4] 一句话，它从了。

清初，朝鲜派来的正式使团每年四次：正朝使团、圣节使团、冬至使团和年贡使团。清定都北京后，四个使团都被整合为冬至使团，也叫岁币使团。再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临时使团，甚至辩诬使团都有。^[5] 双方迎来送往的挺热闹，但仅限于中朝之间。不知是由于地缘的关系，还是由于箕子这种隐士的遗传，总之，这个国家在

[1]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 10 册》，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4125 页。

[2] 蔡建：《晚清与大韩帝国的外交关系》，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 页。

[3] 费正清（美）：《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4 页。

[4] 蔡建：《晚清与大韩帝国的外交关系》，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 页。

[5] 费正清（美）：《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2 页。

几千年的历史中被人遗忘。除了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并且偶尔和日本交换使臣外，和其余国家概不交往，过着相对安静的小国寡民的日子，俨然“隐士的王国”。^[1]

问题是全球近代化来临之际，朝鲜的安静再也保持不下去了，何况中间还夹着个小日本。

按日本的传统说法，公元三世纪，日本神功皇后（日本版的花木兰加穆桂英，女扮男装，带孕出征）征服朝鲜，新罗、百济、高句丽先后应允每年向日本纳贡。

某种程度上，小日本乃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痛。说起来与中国也是同文同种呢，不就是秦始皇时期齐人徐市（徐福）带过去几千童男童女么？当然了，徐福去之前，日本也有自己的土著居民的。《山海经·海内北经》就开始称其为倭了。两汉时，中日开始正式相通，而且也是朝贡关系。但是日本这个种族不一般，贡着贡着，就想学老大的样儿。隋时，派小野妹子出使，书曰“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2]差点没把隋炀帝气死，小日本这是想与我大隋平起平坐哇！之后隋派使者前往教导他们，可是日本再派小野妹子出使，这次改成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3]再次把炀帝气晕。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现在的地位也不是白来的，整个历史上，谁是老大，它就学谁，直到自己变成老大。而中国呢，异质文明叩关之前，自己算是老大；被人叩到地上，还认为自己是老大。以至于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评论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奇怪的国家，它虽然

[1] 费正清（美）：《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0 页。

[2]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5 页。

[3] 同上，第 6 页。

是东方最优秀的民族，但是自古以来就不能顺应世界大势，而执行孤立政策或者奉行自以为是的中华主义，结果走上了一条孤立的道路。”^[1]

世界上好多民族国家搞过孤立主义，但唯有咱的孤立，白里透红，与众不同。蒙古人居中原后，遣使到日本，要求人家入贡，这很伤小日本的自尊，直接把使者斩了。元廷恼怒之余大兴舟师，二十余万兵船黑压压地开了过去，日本一看，俺的天神啊，这怎么抵抗？尽弃兵甲，倒地跪拜，祈盼神风。结果，神风还真的来了，元廷兵船被飓风扫荡得几尽全军覆没（二战时日本弄个神风特攻队，就是想再借一次神风，不知何故没借来）。终元一世，中日双方断绝往来，不通音讯。但是民间通商还是有的，中国政府把他们一概称作倭寇。朱元璋打下天下后，派人告知日本：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总之，不要让你们的倭寇前来骚扰我海滨。^[2]利益上，日本是想与中国通商问好的；可是面子上，中国又只接受朝贡的形式，这让日本很为难，咋也不是。有时候来朝贡，辞书中想拽拽，与明政府平起平坐，但是明政府会因此而却贡，说人家书辞傲慢不合礼节。殊不知傲慢的正是自己，不知礼节的也是自己。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明政府甚至修书责怪日本：“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并且表达了再这样就征服对方的意思。日本回书称了臣，可说话很不客气：“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尚且知足。陛下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乃常欲吞灭人国。臣闻天朝有攻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方。倘陛下选股肱，起精锐，来侵臣境，臣将扫境内以迎将军，岂肯望马尘而拜乎？顺之未必生，逆之未必死，

[1] 吉田茂（日）：《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93页。

[2]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页。

相逢于贺兰山下，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君亦不武；设臣胜君负，不免贻小邦之羞。自古和为上策，幸上国图之。”^[1]

我们常说，爷不是吓大的。但是看中日关系，日本绝对是吓大的。而且，被中国吓得半大不大之后，接着又被美国等西方列强吓，终于被吓成一流的亚洲强国，以至于一流的世界强国。

接着说这番回文，把朱元璋那老儿气死了，从此立下祖训，不庭之国十五，日本与焉。还是那句话，日本不愿装孙子，正常的外交又得不到，只能做倭寇了。其实说倭寇对中国民间商人也有些不公平。中日贸易乃双方民间所需，日本需要，中国何尝不需？所以倭寇中的大量人马，甚至头领，都是咱中国人，比如汪直。

不管怎么说，倭寇成为中国沿海最头疼的问题。

万历年间，日本大臣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胃口大涨，居然要求假道于朝鲜征明。朝鲜王接信大惊。错愕间，日本大兵就来了，时为1592年（万历二十年）。朝鲜当然不堪一击，前往明朝求援的使者络绎于道。明政府开会商量，大家的结论是唇亡齿寒，谁让咱是老大呢。于是，命副总兵祖承训带领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双方战于平壤城外，明军大溃，祖承训仅以身免。明廷改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旋又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双方再次战于平壤城外，李如松大胜。而且朝鲜这时候还出现一个著名的海军将领李舜臣。据说发明一种“龟船”，战斗力那是相当地强。于是日本服输了，军队一直撤到南海岸边。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日本使臣到达中国，双方同意和议，明政府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地采取了一个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封丰臣秀吉为日王。

[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0页。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丰臣秀吉在大阪接见中国使臣，戴冕，披蟒服，并且使德川家康等大将皆着明朝所赐章服。待中方使者捧读诏文，说什么“封尔为日本国王”时，丰臣秀吉这才明白清朝是让日本做它的藩属国，脸色大变，立脱冕服抛之地，取册书裂之，说：“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尔封？”^[1]双方战事再起，且互有胜负，直到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丰臣秀吉病死，战事才停。丰臣秀吉病中时，给家康的交待是：“外事未竣，而吾罹此病，吾死则难作，今以海内托卿。”给儿子秀赖的交待是：“今与明构兵，吾深悔之。彼闻吾死，或大举来报。国家自古未曾受外辱，及我而辱国，吾所深耻。”临终又睁开眼睛说：“勿使我十万兵成海外鬼！”言讫而逝。^[2]之后，明朝虽然没有乘人之危进攻日本本土，而是待日本从朝鲜撤军后，自己也撤了出来。但是对于日本这样一种富于耻感的民族，却把丰臣秀吉的临终遗言牢记心头。小日本报仇，百年不晚。

丰臣秀吉死后，家康打败秀赖，秀赖自杀，德川家的幕府开始。家康求明朝互市通商，明朝不搭理他。明灭后，郑成功父子甚至著名学者朱舜水都数次请兵于日本，希望借兵抗清恢复明室。日本认为，援而无功，日本徒结怨于清朝，不妥；援而有功，对我日本也没啥好处，于是拒绝。虽然拒绝了，但是日本还真没把自己当外人。中国的文化、哲学，甚至宗教，他们都学了。至于文字，他们把汉字称作真名（名就是字），把自己的字称作假名（挺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是山寨版）；汉字楷书的偏旁被他们发展成片假名（片者，偏也）；汉字草书被他们发展成平假名（平者，全也）。一句话，

[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4页。

[2] 同上，第25页。

蒙古人、满州人可以凭着叽里咕噜的蝌蚪般的满语蒙语入主中原，凭什么我们日本就不能凭着同样叽里咕噜的日语入主中原？何况日本与朝鲜一样，也一直认为自己乃是中华传人呢？

日本不把自己当外人，所以对逐鹿中原有想法也就不奇怪了。但是，虽有想法，捱不住近墨者黑，它从大清这里也没学到什么好，单一个闭关锁国就学得头头是道，甚至比大清的年头还要早，开始于1636年（这时候大清还没有入关呢），也是实行单口贸易制度，仅开放一个长崎。而且，这贸易还限对象，仅限于中国、荷兰、朝鲜、琉球等。除此之外，还限制任何国民出境，否则回国即处以死刑。且出洋贸易之船，每艘容量不得超过五百石。^[1]这小样儿，跟未来的大清一个版本。只不过也有不同，两次鸦片战争，没有吓着大清王朝，倒是先把小日本吓醒了。主动和西方各国签约，门户洞开，彻底开放，自由贸易，全面维新！一句话，人家国门打开比咱晚（鸦片战争之后，被美俄顺手打开了），可是人家的维新比咱早（人家1868年，咱1898年），程度比咱彻底（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及价值观），结果比咱好（人家成功了，咱流产了）。所以人家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一天天烂下去，直到烂得不能行，被革命党一声炮响踢爆。

日本维新的当口，咱搞的是洋务，也就是仅限于器物维新，并且沉浸于“同治中兴”的迷梦之中。而日本呢，彻底醒过来了，相对于清朝的颟顸，它却要下一盘很大的棋。维新伊始，明治天皇向各国颁布《开国诏谕》，确定的基调乃是“与万国对峙”。日本维新人士有把它理解为“与万国并立”的，有理解为“与万国对峙”的，

[1] 诺曼·赫伯特(加):《日本维新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1页。

更有理解为“海外万国皆是我皇国之公敌的”。^[1]天皇还发布《宸翰》，也就是亲笔信，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达此目的，发布了新政纲领“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文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与世界，大振皇基。^[2]

日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相形之下，中国这个老大越来越不堪了。而且，相对于中国的虚崛，中国的翻版——朝鲜更不堪，连表面上的虚崛都没有。1864年（同治三年），朝鲜国王李昇死，无子，十二岁的娃娃李熙以旁支入继大统，其父大院君李显应摄政。后者走顽固守旧之路，拒绝改革开放，宣布凡与日本交涉者，处死刑！是谓旧派，也可叫保守派、亲中派、事大党、旧党云云。在他眼里，搞洋务的、有限改革开放的大清都变成了修正主义，把反帝防修搞向了极致，成千上万地杀害天主教徒，光1866年，他就杀害2000名。^[3]杀顺手了，连法国的传教士都杀。法国政府当然不愿意，按他们的常识，政府必须保护国民的生命与利益，于是法国军舰来了……再后是美国军舰来了……由于诸多原因，法美暂且放手了，但是却让朝鲜骄傲起来了。大院君更是在各地建“斥和碑”。一句话，谁主和谁就是卖国贼。问题是，正如李鸿章所言：“法美皆志不在此。”^[4]但是，有人志在此，它就是小日本。

[1] 《大国崛起·日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2] 吉田茂（日）：《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3] 陈志让（加）：《乱世奸雄袁世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4]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卷》，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45页。

从地缘政治上来讲，朝鲜对中国重要，对日本当然同样重要。正如史家所言：“任何敌对势力掌握了朝鲜半岛，对于日本的安全无疑将会构成致命的威胁。”^[1]从历史上来讲，中国是朝鲜的老大，可日本并不甘心久居人下。正如学者所言：“自公元前一世纪以来，朝鲜的国际地位大体上不是由中国的霸权决定，就是由中日之间的竞争来决定。”^[2]日本开关之后维新之前，其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吉田松荫就指出：“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定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3]维新之后，日本国力稍一增强，征韩论就甚嚣尘上。典型代表乃佐田白茅。他给政府上书曰：“当天朝加兵之日，则遣使于清国，告其所以伐朝鲜之故；若清必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还曰：若日本失掉朝鲜，“则实失我唇，而我齿必寒”。^[4]

这封上书，透出诸多意味：第一，日本也自称天朝，跟大清一个德性；第二，大清在日本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眼里，小菜一碟。倒跟甲午开战前中国的主战派们一个意思，也认为日本是小菜一碟。看来民族主义真是双刃剑，既可给人智慧还可给人愚昧！第三，中日双方，都把朝鲜当作自己的唇齿了。这对朝鲜来讲，当不是什么幸事。

中国也不傻，以李鸿章为代表，既模糊地明白一些地缘政治常识，又本能地知道唇亡齿寒，更知道老大的面子不是小事。放弃，

[1] 高崇云：《中共与南北韩关系的研究》，正中书局 1989 年版，第 14 页。

[2] 摩根索（德）：《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3 页。

[3] 井上清（日）：《日本军国主义·第 2 册》，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7 页。

[4]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118 页。

有所不甘；但若真为了朝鲜往前冲，又怕自己做了火中取栗的孙猴，面对朝鲜的求告与外国的投诉，清政府架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这种尴尬，反映在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有关朝美冲突的奏对中：“查美国历次照会，及朝鲜咨覆礼部文件，大意皆以中国属国为辞。美国思欲借属国二字，令中国势压朝鲜，以遂其谋。朝鲜亦思借属国二字，请中国力制美国，以资庇护。该二国之隐衷，大率不外乎此。臣等揣时度势，悉心酌覆。朝鲜虽为中国属国，然其政教禁令，中国向来听其自为主持。……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蔽，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1]

中国犹豫矛盾中，日本却一直在行动中。关于征韩，日本上下是志在必得，但是用什么方法大家有争议。一派说，直接打过去得了；一派说，不如先跟大清外交一下。结果，外交先行了。1871年（同治十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日本虽然没有尽取西方在中国的特权，比如利益均沾与领事裁判权等，但至少与清政府平起平坐了，比如平等往来与互派使臣等，所以被美国学者马士恶心为“多少像是两个平等国家之间所缔结的”。^[2]其实跟日本平等本身，对清政府来讲就是一种侮辱，因为清政府眼里从来没有能与它平等的国家。但对于日本方面来讲，既然与清政府平起平坐了，那就可以开始交涉朝鲜事宜了。在此之前，法、俄、美等国都希望朝鲜随着清政府一体开放，但是清政府很拽地回曰：虽是俺属国，但其内政外交向来自主。这些国家就闭上了嘴。1873年，

[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文海出版社1971年影印本，第7745页。

[2] 马士（美国）：《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日本政府派副岛种臣为批准中日商约来华，并试探中国对朝鲜的态度，总理衙门的回答还是那样的拽。这就被日本钻了空子。按当时的国际法原则，既然内政外交向来自主，朝鲜就不是清朝属国，激动得日本的主战派马上就想向朝鲜开战，以至于正在美国活动的大久保利通及其使团不得不赶紧返回以压制主战派的蠢蠢欲动。虽然大久所代表的稳健派暂时稳定了局势，但是随后发生的主战派对大久保的暗杀未遂活动（直到 1878 年才遂）以及主战派的一系列叛乱活动，证明了日本征韩势力的嚣张。估计中国的总理衙门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很拽的一句回答，居然可引起日本国内政局的动荡。与此同时，朝鲜局势也在发生变化。同是 1873 年（同治十二年），李熙亲政，大院君去位，王妃闵氏及其亲信渐握重权。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闵氏集团一掌权，就做出改革开放的样子，并且希望与日本修好。这一修好，朝鲜就出个新派，也可叫开化派、亲日派、独立党、新党云云。更要命的是，除了想模仿日本维新，还想与中国脱离旧有藩属关系。日本密切关注着这一切变化。

1875 年（光绪元年），机会来了——一艘日本军舰驶进朝鲜西海岸的江华岛以获取淡水，遭到朝方大炮轰击。当日舰指挥官派出一艘悬有免战旗的小船前往时，再次遭遇炮击。看来，朝鲜跟当初它老大在鸦片战争中一个德行，不知道啥是白旗规则，于是遭遇日本报复性攻击。1876 年（光绪二年），双方签订《江华岛条约》，第一款特别规定“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1] 等于单方面承认了朝鲜的独立。除此之外，朝日双方互派使节，朝鲜对日本开放仁川与元山两个港口作为通商口岸。

[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136 页。

其他在亚洲有想法的列强一看日本打了头阵，眼圈儿都红了。与此同时，清国也不想日本在朝鲜独大。眼看着日本在朝鲜要占上风，心理不平衡啊。与此同时，还发现诸多不妙，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把琉球从中国手里抢走。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提出：琉球已失，下一步就是朝鲜了。于是清政府对朝政策转变中，首先想到一个以夷制夷，怂恿朝鲜与其他西方国家建交，用李鸿章的话来讲乃是“以毒攻毒，以敌制敌”。清政府遥控下，朝美、朝英、朝德相继建约。遗憾的是，以美国为代表，在条约里既不写朝为中国属国，也不写朝为独立自主之国。仅同意朝鲜事后向美国递交照会，额外声明它是中国属邦。

清政府没想到的是，朝鲜的大门一打开，改革开放的空气一进，首先不利的还是它这个曾经的老大。特别是朝鲜的开化派依托王妃闵族的势力逐渐活跃起来，并且聘用日本人教练新军（别技军）。终于激起了保守派发动的一场政变。

1882年（光绪八年），闵妃集团答应给驻守汉城的朝鲜旧军发放拖欠一年的饷米，不但发得量少——只发一个月，还质差——掺杂很多砂石糠粕。士兵被激怒，兵变骤起，并且被大院君所利用，成为针对闵妃集团与日本的一场变乱，史称“壬午兵变”。兵变中，新军的日籍教练被杀，日本使馆遭遇围攻与焚烧，使馆不少官员被毒打致死，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吓得一溜烟地跑回本国搬救兵去了。中国这边因李鸿章丁忧在家，暂由张树声代理北洋大臣。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电告张树声。张树声立即请示政府，政府一听，小日本能出，咱也出！朝鲜国王虽然没有请愿书，咱出兵的合法性没有，但咱是它的宗主国啊，老大想干啥就能干啥。更何况朝鲜官员——领选使金允植与同议官鱼允中此时恰在天津，也向清政府呼吁派兵，而他们背后的靠山是闵妃。出逃的闵妃通过他们以朝鲜国

王的名义请求清政府出兵，咱这边出兵的底气更壮了，其他就顾不上想了。谕曰：“朝鲜乱党突起滋事，既围日本使馆，兼劫朝鲜王宫，其意不但与日本为难；日本现在派兵前往，其情尚难测度。朝鲜久隶藩封，论朝廷示小之义，本应派兵前往保护。日本为中国有约之国，既在朝鲜受警，亦应一并护持，庶师出有名，兼可伐其隐谋，著张树声酌派水陆两军，迅赴事机。”^[1]

天上掉下个大臭弹，这就是中日朝事。砸着了一片人，同时也砸着了袁世凯。

3.3 雄赳赳气昂昂，泥菩萨它过河去了！

1882年（光绪八年），袁世凯本来还想回家参加一次科考呢。在这年春天致三哥世廉的信中，既祝“吾哥大人”院试（童子试）中夺标，还说自己“秋试在即，不愿奔走风尘也。弟不能博一举人，不能瞑目，近来以作文太多，且盼家信，因呕血，患从前喉症”云云。^[2]5月致二姐的信中，有要求家人给他捎来官照、监照的语句，并且强调“至要”，“下场非此不可”。^[3]“博举人”“捎监照”云云，倒是足证袁世凯已拥有监生功名，只是无法确证何时何途获得而已。

可是还没俟到秋间考试，军令先到了：政府着统领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之后又电令道员马建忠与丁汝昌同行）带军舰三艘、驻扎登州帮办山东防务之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带淮军六营，前往朝

[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2》，第750页。

[2]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33页。

[3] 同上，第40页。

鲜平乱。

8月8日，吴长庆到天津接受任务，令张謇筹划出兵事宜。张謇任务过大，人手又少（好多幕僚都要回家参加科考），遂提议让袁世凯帮忙。袁世凯一看有事做，就把科考的事儿推到后脑勺了。吴长庆给他一个前敌营务处，负责军需供应，勘探行军路线。

8月19日，庆军乘船东渡，袁世凯随军出征。在船上与人张灯夜话，豪气干云，引起了金允植的注意，两人有这么一段对话：

袁：我欲提劲旅数百，直入京城，何如？

金：未为不可，到仁川后观机酌行恐好。

金：何故头发半白？

袁：弟少孤，有志四方，游历天下，偶得失血之症，以致早白。

金：正当登画麟阁之年，已有潘毛彪斑之叹，发短心长，壮气不磨，正复早白，何伤。犹愿随时保啬，为国自爱。^[1]

8月22日，庆军到达朝鲜的南阳港。吴长庆希望乘敌不备，连夜登陆直击汉城。军中一些老营官有些贪懒怯敌，畏缩不前，不是说晕船，就是说天黑。袁世凯自告奋勇，两小时内即登陆成功。登陆时，小伙子光着脚在岸上跑了一里多路，两脚都磨出了血泡。登陆后又自任先锋，为大军开道60里。安营扎寨后，又回头迎接吴长庆大军。吴当众大加夸奖。

中国军队既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化也没有职业化（世袭化倒是有的）。这导致咱的军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存在。不只淮军，

[1]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18页。

所有的军队，都得靠烧杀抢掠来弥补经费之不足。庆军进了朝鲜地界，传统当然要发扬光大了，何况事起仓促，政府准备不足。一些士兵散入村家作弊，连抢带扔，满世界撒上了欢儿。袁世凯认为上国天兵，抢夺事小，却有失大体，影响咱大国形象，遂再次自告奋勇，担当整顿军纪工作。吴长庆正为此发愁呢，遂授他全权，并给令箭。之后袁世凯前来汇报工作，说有大事要稟明大帅：军中有人抢劫。吴长庆厉声问为什么不严办？袁世凯回答曰：我已请出令箭，正法七人，现有七个人头呈验。吴大帅一听，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你真不愧为将门之子。”^[1]之后，驻韩军队的纪律大有改善。

关于平乱，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等开会商议。最后定议，诱捕大院君，恢复国王政权。随后，清军进驻汉城南门外。8月26日，吴、马、丁三大头拜访大院君，说尽了好话，大院君没有多想答应回拜。8月27日，大院君来了，吴、马邀请其入帐笔谈，袁世凯在外头，挡住其护从卫队。吴、马在里头把大院君押下，送到咱的军舰上，一路顺风，直接把人押天津了（以后又软禁在了保定，生活优待，并且计划永不准其回国）。至于大院君的其他人马，中方给朝鲜国王要来一份请求剿灭乱党的手书，名正言顺地把他们全解决了。9月12日，朝鲜王迎接闵妃回宫，袁世凯抢先前往道贺。两口子特感激清军，更喜欢袁世凯。

这次平叛，年仅24岁的河南帅哥袁世凯表现突出，有勇有谋，不但赢得中方的高度赞扬，甚至赢得友邦好感，朝鲜国王两次接见袁世凯：第一次是设宴款待吴长庆等大佬，袁在受邀之列，并且得到了韩王的馈赠；第二次是由鱼允中陪同单独接见，双方谈什么不知道，但知道袁世凯这人有特点，容易招人待见。

[1]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9页。

10月，政府奖励有功人员。吴长庆给李鸿章提供的名单首列袁世凯，评价曰：“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1]已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给的评语是“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袁世凯得补用同知（五品），并赏戴花翎。^[2]

关于朝鲜后事，由于大院君一党跟中国后来的义和团似的，火拼中围攻过日本外交使馆，所以在马建忠的指导下，朝鲜和日本签订壬午条约，因签订地点在济物浦（仁川），史称《济物浦条约》，规定：朝鲜赔偿日本损失及军费50万元；日本驻兵朝鲜京城护卫使馆；朝鲜遣使前往日本谢罪。

朝日条约，让国内以翰林院侍读张佩纶为代表的爱国义士们深表受伤与愤怒，甚至海归人才马建忠都被他们的口水淹没，导致其在以后的仕途中长期郁郁不得志。关于朝鲜后事，张佩纶主要建议如下：第一，中国简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管理朝鲜外交；第二，中国选派教习，代购洋枪，为朝鲜训练军队，既可以防日诡谋还可以防止朝鲜怀有贰心；第三，日本却盟索费，且订明得以驻兵朝京，中国应一面拒绝朝鲜借款，以免其借中币填日欲；一面令吴长庆等对驻京日兵密谋牵制，嗣后议设通商大臣；第四，中国应速筹款，兴造快船，驻守朝鲜仁川以防日谋；第五，预筹辽防，以备缓急；第六，据朝鲜永兴湾，以防日俄。

面对朝鲜的危局，中国人都是难得的民族主义者。张氏六策，与日本后来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在本质上没啥区别。我甚至怀疑日本都是跟咱学的。

在爱国人士的叫唤下，中国政府与朝鲜强硬签约：第一，驻军

[1] 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一》，1913年版，第6页。

[2]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朝鲜；第二，从朝鲜方面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督权，并在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了清国租界；第三，声明朝鲜乃自己永远的藩封；第四，荐员帮助朝鲜外交（中国推荐的是德国前驻天津领事穆麟德和马建常。前者与德国公使不睦，所以投奔了李鸿章，后者曾任过驻日领事，乃马建忠之兄）；第五，另派道员陈树棠和唐廷枢到朝鲜，前者协助商务，后者协助矿务；第六，着袁世凯帮朝鲜编练新军，赠送铜铸开花大炮 10 门，英步枪来福枪 1000 支，并配齐弹药，端的是慷慨纳税人之慨。

咱就这么说吧，朝鲜从政治到军事，从经济到外交，甚至电信通讯事业，都由咱控制了。这一下，有些事就麻烦了：第一，朝鲜上上下下，稍具民族意识与国家尊严的人士都不愿意了，老大这是干嘛呢？原先恩恩爱爱的，现在怎么一副强奸犯的小样儿？第二，日本奸心正盛呢，这不上赶着让自己与日本冲突吗？问题是中国的爱国人士，既不知人，更不知己，他们认为中方在朝鲜方面取得了巨大胜利，甚至叫唤乘胜追击两鼓作气，顺势把琉球也从日本魔爪下收复回来！

为了防止日本对朝鲜的影响，袁世凯与闵氏一族结托。闵妃集团在事变解决后派人来中国谢恩。清政府对他们大加笼络，导致他们进一步倒向中国怀抱。日本当然也不含糊，也拼命地拉拢一些新派骨干人物。同样是事变后，朝鲜政府派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前往日本谢罪，又不好好给他们的出行提供方便与经费，导致他们只能搭乘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的船前往，区区 5000 元的旅费也由日本政府代为支付。日本方面给他们很高的礼遇与优待：天皇高规格接见；延长赔款时间，减轻朝鲜压力。除此之外，还给这帮年轻贵族上课，唤醒他们独立自强的民族意识。这帮人回国后，立志效仿日本，改革维新，与闵氏集团矛盾加深，双方进一步分化为保守与开化两派。

保守一方亲中，开化一方亲日。矛盾越来越尖锐，导致朝鲜又来一次事变。这次是开化党发动的。

开化党发动事变，有两个缘起：第一，闻听中国将要把顽固守旧的大院君放回，虽然温厚有加的朝鲜国王高宗李熙不说什么，但内心甚是惧怕父亲回来会导致政局紊乱。一句话，好事做到底，那个老混蛋长期软禁在你们中国，好吃好喝招待着就行，放回不是给我们添乱吗？这点倒跟中国宋时的高宗——赵构一个心态。岳飞就是不明白，要迎回二圣，处处跟主子添乱，才导致自己小命先没的。第二，中法冲突中，中方失利消息频传，这让朝鲜很失望。小样儿么你，琉球被人割了，越南也要被人割了，还保护我们呢，自己都快保护不了了。与其等着人家来割，不如我们自己先割。我们亲日吧。亲日可能还有希望；亲中，那是永远没戏了。一句话，朝鲜也是《让子弹飞》里的鹅城居民，谁赢跟谁，谁输抢谁。虽然抢不了中国，但是藐视中国总是可以的。而且，随着中法战事的发展，中国的驻朝情势也有所变化。

由于中法战事中清朝的失败，更由于害怕法国海军北上骚扰。1884年（光绪十年），李鸿章令吴长庆带三营军队撤回中国，驻防奉天。另外三营仍驻汉城，虽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但袁世凯总理营务处并会办朝鲜防务，相当于吴兆有的副手。而且，吴长庆过于偏爱，把自己经营三十载的坐营庆字副营，交由袁世凯亲带。这一来，庆军中的一些老将官不愿意了：袁世凯不就一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吗？论资排辈怎么也轮不上他啊。关键是，吴长庆非李鸿章的嫡系，李鸿章这当口把庆军一分为二，让庆军上下对李鸿章颇有看法，而且撤兵回营的吴长庆不久就去世了，直让人怀疑他是被李鸿章整得抑郁死的。虽然袁世凯在家书中经常提及“吴大叔”对他的恩情及自己的报答之心，并且在吴长庆去世后，除了奉送

一千两银子的奠仪外，还专门派本营副将带领军士护其灵柩回安徽老家。但是由于李鸿章比较看好袁世凯，庆军人就不乐意了，且上下传出风声，都是袁世凯在李鸿章面前使的坏云云。没办法，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吴兆宜治军平平，袁世凯作为副手，职责所重，导致他辞去了代朝鲜练兵事项，一心一意干自己的专职，而且干得很认真，大刀阔斧地搞改革，既弄得上级领导不好看，还影响了诸多人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氛围中，随吴长庆回国的名士张謇带领其他幕僚，给袁世凯一份长达三千字的公开信。信里把袁世凯骂了个狗血喷头：骂他对不起吴长庆，巴结李鸿章，“露才扬己，颇有令公（指吴长庆）难堪者”；骂他越来越狂，对自己的老师张謇本人的称呼，由老师、先生竟至某翁、某兄；骂他品行不端心术不正，禁止士兵嫖娼，自己却拥有官妓三位云云；最后，希望他痛改前非，则双方的交情自可恢复。^[1]张謇的名士之笔，把袁世凯骂个够戗。平心而论，袁世凯初生牛犊，中国官场上装孙子那套风格没有学会多少。但是张謇的传统文人劣根性也不是没有，不关注制度本身的优劣，鸡毛蒜皮、人事从属倒会被他们捉住大做文章。袁世凯读了之后，一言不发，一字不回。双方从此绝交 N 年。

庆军内部哄乱间，日方加紧行动，告诉朝鲜的开化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而且，为了表示诚意，你们的壬午赔款 50 万元，俺们只要 10 万，剩下的 40 万还给你们搞改革。高宗本就对背靠中国的事大党的飞扬跋扈不满，现在一看日本待自己比旧老大还要好，于是倒向了开化党。开化党骨干人物金玉均、朴泳孝等人一看时机成熟，遂于 12 月 4 日发动政变，杀闵族骨干数人，并让国王发出“日本公使来护朕”的手书。日使竹添进一郎拿着手书理直气

[1] 《张謇全集·第 6 卷》，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45 页。

壮地带兵入卫，国王改组新政府并且发布改革纲领。新政纲领除了进步改良的意思，还不忘针对清朝“废止朝贡虚礼”^[1]。也就是说，老大，俺不跟你玩朝贡了。是为甲申政变。被马士恶心为“东方式的普选”。^[2]

清方也不傻，知道朝鲜的开化党什么意思。所以袁世凯与吴兆有上书李熙，要求入宫护卫，李熙当然答曰不准了。于是袁世凯找了几个朝鲜官员，让他们以朝鲜政府代表的资格，写信请求中国出兵。同时，吴兆有、袁世凯写信问李鸿章，但是当时中朝之间不通电报，不待李鸿章指示前来，朝鲜局势就乱套了，所谓的将在外君命等不及授。袁世凯还致书日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也得不到回音。于是袁世凯说服吴兆有等将官，6日下午，他领兵1500人打进了朝鲜王宫。更为英明的是，袁世凯在此之前，还策反朝鲜新军左右两营（朝鲜新军此时分为前后左右四营），秘密召见两营营官，每营赏银六百两。袁世凯的队伍一到，这两营立马儿与清军并肩战斗在一起。日方居高临下，地利上占有很大优势，所以中韩联军死伤颇重，但队伍是袁世凯带的，战斗力就不一般了。日使见双方兵力悬殊，且袁军舍命死战，率军撤退到使馆，使馆受到攻击，再撤退到仁川（使馆失火，袁世凯说是日人自烧，日人说是韩人放火。日本侨民十几人被困，袁嘱人把他们护送到仁川，交给竹添）。新党损失惨重，金玉均等几个要人亡命日本。7日，袁世凯把逃亡在外的国王弄回宫中，要他答应以后还要亲中，算是干得干净利索。

可能是干得太好了，所以麻烦也来了。

[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20页。

[2] 马士（美国）：《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首先是袁世凯的强势与能干激起了吴兆宜等将领的不满。其实是早有不满，不过乘势而已，所以开始上书弹劾他了，说他贪污军饷。其次，他不经请示即挪用军饷，抚恤被亲日派杀害的朝鲜大臣家属（被杀朝鲜大臣都是事大党骨干，与袁交情也甚厚），并要求李鸿章给予报销。对自己军民都一毛不拔的李鸿章哪会同意这个，严厉批评袁世凯，说他“纯以银钱买结韩人之心，实属荒谬，所请责不准行”，并饬令吴兆宜责令袁世凯自己掏钱赔偿。堂叔袁保龄得知，也去信痛训，要求其悉数赔缴。^[1]但是这些都属人民内部矛盾。对袁世凯来讲，还有人民外部矛盾呢。这就是中日朝事。

关于朝事，12月15日，袁世凯上书李鸿章汇报经过，先说此次事变乃是朝方“背中国而投顺泰西”，^[2]后是提出建议：“此时为朝鲜计，或战或和，在中国不难即了。然泰西方盛，不数年必又有异谋，则中国尤难防御。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为代理，则此机不可失也。”^[3]

小伙子倒是野心勃勃，颇有日本人的扩张风范。但是李鸿章这个老头，考虑得就多了。虽然他认为袁世凯干得很漂亮，但是再继续与日本干下去，老头儿不是赌徒，也没那朝气，所以拒绝了袁世凯的建议。这让袁世凯很失望。

袁世凯不幸生在大清朝，若是放在日本，怎么着也会成为维新一杰呢。当然了，日本开始维新时，袁世凯才十岁。但是给他日本那样的平台，他将干得虎虎生风，而不是如此憋屈。所以王芸生先生把袁世凯的军事胜利称作“虎头”，把李鸿章的决策权称作“蛇

[1] 中国史学会：《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10页。

[2]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25页。

[3] 同上，第230页。

尾”。^[1]其实，李鸿章又何尝不想做成虎头般的事业，只是大清体制下，从来都是蛇尾控制虎头。即使他曾有虎头的资质，也早被政府与帝国体制给抖搂没了。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同理，弱国无强人。袁世凯再强，捱不住蛇头们压你。另一种意义上的强虎难压地头蛇吧。

关于中日之间。日方民间舆论激愤，但政府出于多种考虑，希望外交解决。而中国拨回政变，已属侥幸，更愿意见好就收。所以对于日本要求查办袁世凯的要求迅速答应，并派钦差大臣吴大澂前往查办。事实上是做给日本看的。吴大澂不但没有查办袁世凯，反而私底下给他伸大拇指，夸他干得好（两人后来还做了亲家，吴女嫁给了袁的长子克定）。但是为了给日本做样子，还是压了压袁世凯。因为此时的袁世凯，不但住在朝鲜王宫，与朝鲜国王一墙之隔，对其进行直接监视。而且要求朝鲜各部大臣每天向自己早请示晚汇报，俨然监国。所以清方的查办，就是把袁世凯从朝鲜王宫撤出，回归本营。然后中日双方坐到了谈判桌上。袁世凯本人却成了日本最大的假想敌，恨之人骨。而中方人事方面的鼓噪，也让袁世凯有些心灰意冷。虽然查办大臣罩着他，但吴兆宜等一帮老将，对他已是昨看昨不顺眼。恰在此时，袁世凯的嗣母听说自己亲爱的嗣儿在外面惹了事，吓得旧病复发，发函催其速回。于是袁世凯请假回籍，吴大澂不但准了，还让他上了自己的船。时为1885年（光绪十一年）1月31日。时任兵曹判书的金允植（朝鲜著名的汉学家）写下了《送慰廷归河南》：

名高人多嫉，功成众所忌，此事古同今，处世谅不易。曩值危

[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1页。

急日，人皆敛手避，黜者怀首鼠，懦夫常惴惴。事定反覓疵，利口交漸漬，遂將功為過，摧折丈夫志。君今浩然歸，俯仰無所愧，天日照孔昭，賢才岂中棄。相見知不遠，努力勉王事。^[1]

这文章虽然写得顺口溜似的，但作为朝鲜人，能写出这么顺溜的汉文，就算不错了，更不错的是他对中国人情事故的推断。这也正是袁世凯心灰意冷的主要原因吧。

袁世凯脱离朝鲜那个是非之地，回到了相对安静的后方。保龄听说后，拍着大腿夸侄儿：“此子狡狯，胜过老叔矣！”回家路上，袁世凯到旅顺拜访了保龄，叔父进一步教导他：“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怨天尤人，有何益耶。”关于袁吴矛盾，叔父授意曰：“汝在津万勿谈孝庭（吴兆有字）一字短处。此事关人福泽度量，非仅防是非也。”袁世凯受此教导，待到了天津，在李鸿章面前一字不提吴兆有。倒是李鸿章憋不住了，主动过问，袁世凯潇洒地回曰：“我若有错，谁都可以说。我若没有错，错就在说我的人，与我有何相干？”李鸿章眼睛一亮，人才啊：“胆略兼优，能持大体。”^[2]不得不承认，李鸿章后来重用袁世凯，与此不无关系。保龄死得过早，否则有这个老叔盯着，袁世凯后来也不会栽称帝那样大的跟头。

交待完袁世凯，接着交待朝鲜后事。朝日之间，朝鲜方面再次向日方赔偿损失并谢罪。中朝之间，朝方向中方派来了感谢使团。当然，感谢之外，使团还负有特殊使命——带了十万两银子给闵妃购买奢侈品，气得袁世凯大骂：“无仁之辈，理当暴卒。”^[3]至于中日

[1]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 年版，第 77 页。

[2]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 2005 年版，第 54—55 页。

[3] 陈志让（加）：《乱世奸雄袁世凯》，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2 页。

之间，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2月由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天津商谈。4月，签订中日《天津条约》。分赃如下：中日两国驻朝军队各自撤回本国；朝鲜练兵，中日两国皆不派教练官；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派兵，须先行文知照对方！众所周知，李鸿章谈判的这个结果，中国吃亏大了。本来朝鲜单独属于大清，现在，两个主子了。而且李鸿章以其特有的敏锐发觉，日本不是玩的。所以事后给政府汇报曰：“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相形之下，伊藤博文对中国的观感如下：“现当法事（中法战争）甫定之后，似乎奋发有为，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方人所说，中国又睡觉矣。”^[1]看来，中日双方都不缺聪明人，问题是伊相在日本，能混成开国大佬；而李相在中国，则只能混成卖国老贼。制度与人事不行，岂能靠一人之力智所挽？不只挽不得，连自己的清名都得陪葬进去。

《天津条约》规定，签字后四个月内，双方撤兵。中方从朝鲜撤兵后，只留商务委员陈树棠在朝鲜。李鸿章深知陈树棠招架不住朝鲜的复杂局势——朝鲜开化党骨干金玉均称之为“没有骨头的鼻涕虫”。^[2]这个时候的朝鲜，确实复杂：第一，朝鲜国王不傻，至此发现中日都不是好东西，遂选择另攀高枝——亲俄。更滑稽的是，给朝鲜政府出这主意的，乃是中国的外籍雇员——穆麟德。第二，英国不愿意朝鲜亲俄。英国认为，俄国任何南下战略，都直接影响它的远东利益。第三，日本一看朝鲜要亲俄，也慌了。日本知道，自己还没做好吞并朝鲜的备战工作，这之前若让俄国插上腿，它就

[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86页。

[2] 陈志让（加）：《乱世奸雄袁世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没戏了。两害相较取其轻，不如怂恿中国抓在手中不放，到时候自己再从中国手里夺过来也容易些。于是建议中方派“坐探国政大员”坐镇朝鲜，遇事与日本公使商议，联合控制朝鲜。第四，李鸿章也不傻，当然不愿意与日本共同控制。但是对于中方单独控制，还是乐意的。他的措施是：推荐美国人墨贤理代替穆麟德；释放大院君回国，以牵制朝鲜国王亲俄；派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一句话，朝鲜那个烂摊子，非袁世凯莫属！

李鸿章毕竟是一代大吏，识人的能力还是有的。与日方的谈判中，一则政府指示他力保袁世凯；二则是，日方在谈判中力持惩办袁世凯。其他条件，李鸿章倒是好说好商量，但就是袁世凯这条，却让老同志坚持上了，甚至不惜拿战争相唬：“若因此决裂，我惟有预备打仗耳。”^[1]唬得日方一愣一愣的：这老家伙，向来很明智的，何以突然二百五起来了？不管怎么说，还真把日本唬住了，最后放弃了惩办肇事营官的要求。李鸿章呢，答应日方以私人名义对袁世凯进行警告责备。老头儿明显是哄孙子呢。

关于护送大院君回国，李鸿章本来想派提督丁汝昌、总兵黄金志等人带海陆军护送。后来一想，一者，这样太招摇；二者，若让袁世凯伴随，凭他的机智，根本就不用派兵了。而且也是进一步考查袁世凯的机会。他把意思对袁保龄说了，袁保龄可不愿意让侄儿再次涉险受罪去。另外，他还希望侄儿再去应考呢。按他的认识，科举才是正道，其他太贬身价。无奈李鸿章几次要求，袁保龄抵挡不住，遂写信给呆在老家的袁世凯，让其到天津报到。袁世凯接信后立即动身，为了不耽误李鸿章规定的日期，日夜狂奔，居然累死

[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73页。

一头骡子。

李鸿章见了袁世凯，亲切地给他玩笑：“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世凯没有答应，希望还派丁汝昌等去。李鸿章再次玩笑：“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议诸员悉无所用，兵亦不需遣，只许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做导引足矣。”^[1]袁世凯没法再拒绝了。

袁世凯任务完成得尚可，基本上没引起什么大的政治波动。袁回来复命，李鸿章更满意了。让他赴朝代替陈树棠的主意更坚定了。

袁世凯赴朝鲜时，袁保龄就告诫侄儿，去海军历练，“成就一个大人物，以为报国显亲之地，不愿汝履虎尾以求名利也”。^[2]但是李鸿章早考虑好了，而且朝王亲自来信，点名要袁世凯赴任朝鲜。这一来李鸿章更有理了，他上奏说了诸多袁世凯的好话，然后要求政府派袁世凯接替陈树棠，并且给袁世凯报请一个知府，赏加三品衔。在袁世凯致二姐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七次辞却”，“中堂大怒，谓不以国家大局为计”之类的苦衷；更可以看到“赴朝鲜充四等公使，亦小钦差局面”，“太后留意，诸亲王、军机大臣、中堂推重”，“弟年未三十，名扬中外”之类的得意。^[3]总之，小伙子就这样上了李鸿章的贼船。这就是所谓的机遇与知遇吧。

1885年（光绪十一年）11月，袁世凯到朝鲜上任（月薪四百两，三年一任）。同时，中朝之间也通了电报，方便多了。但弱国无外交；同理，弱国无属国。就清政府那小样，自身都不保了，还想把朝鲜紧揽自己怀里，这注定袁世凯的差事不是个好差事。如果朝鲜的内

[1]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2] 同上，第23页。

[3]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56页。

政外交不插手，则你东来何故；若插手吧，朝鲜国王与闵妃还老大的不乐意。不说民族自尊，就是个人自尊也得有吧。袁世凯呢，弄着一个不明不白的身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人家都是驻朝公使，就咱，觉着咱是宗主国，不能与其他西方列强持平，至少名头不能一样，所以让李鸿章给出了这么一个名头，也不知唬人呢还是安慰自己呢。用马士的话来说，袁世凯在朝鲜的任务是：“就简单的一面说，就是确保朝鲜对中国的从属性，并打击朝鲜国王的一切要实现独立自主的努力，不问那些努力是打算把那位国王领上受俄国或者日本武装保护的道路还是打算使朝鲜甚至成为在美国策动下的一个主权国家。他积极劝喻朝鲜的腐朽政府采行有益的改革，但是始终不渝地坚持朝鲜对中国的从属地位。”^[1]

袁世凯就这样身在朝营心在汉，一门心思扑在清国的国家利益与外交面子上，再加上他遇事生风、不遇事还生风的虎气，闹得朝鲜上下很不舒服：原先大清那么牛，都没如此控制过我们，现在自己都不行了，却失心疯似的压制我们，啥意思呢？欲摆脱中国控制的愿望反而更加迫切了，导致袁世凯都想给它改立皇帝了——袁世凯想立大院君之孙李埈鎔，并使大院君重新摄政。更复杂的是，闻听朝鲜方面已经与俄国签订了密约，第二次蠢蠢欲动选择亲俄。袁世凯急坏了，训朝方交出文件来；同时电示李鸿章：“如有五百兵，必可废王，擒群小。”^[2]虽然李鸿章拒绝了袁世凯的建议，但是也想着法子唬朝鲜，在与朝鲜官员的笔谈中云：“中朝并未视韩与各外国同例，而韩竟欲自比于各外国，且欲借外国以制中朝，何其梦梦。

[1] 马士（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2]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24页。

试看中国虽与各国联和，究有何国敢于胁制中国耶？”^[1]

朝鲜欲独立，固然是做梦。可是中国欲做朝鲜的宗主国，又何尝不是梦中梦呢？

朝鲜政府有时候被袁世凯逼得哭鼻子。愈是这样，愈想独立。为表示自己的独立自主，1887年（光绪十三年），朝鲜决定往外国派出使臣。这对袁世凯是个难题：按国际规则，属国是无权派出使节的；可是按中国宗藩制，属国又向来内政外交自主；更主要的是，清政府遥控下，朝国与诸国签订的条约都有互派使节一端。美国的抗议下，中国政府想到的招是：朝鲜可以内政外交，但得事先向我大清请示。于是朝鲜政府就派人请示去了。清政府找不到什么理由拒绝，又想个招儿——当时的驻外使臣都是二等公使，你们的驻外使臣若带全权二字，岂不与我们平起平坐了？这样吧，你们的使臣不得带“全权”二字。朝鲜一听不愿意了：俺内政外交向来自主呢，不叫全权怎么行？与袁世凯商议：要不这样吧，我们的使臣出外报聘一下，任务完成后，让他们回来，别派参赞前往驻节。清政府同意了。但还是不放心，袁世凯与李鸿章商来量去，最后由李鸿章定下附带条件三端。第一，韩使到某国后，先谒见中国使臣，然后在中国使臣带领下赴该国外交部；第二，遇有朝会公宴酬酌之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第三，外交大事，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指示。^[2]问题是这种端口，有伤对方自尊。朝鲜虽然表面上同意了，但实际上并不通知使臣们，使臣们即使知道也不执行。袁世凯抗议，朝鲜政府不是不理就是模糊应付，还要求修改三端，双方拉来扯去，居然拉扯了五年之久，拉得伤肝动脾，外国不是看笑话，就是力挺

[1] 中国史学会：《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63页。

[2]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163页。

朝鲜。事实上，稍具良知的外国公使都看不惯中方在朝鲜的那副小样儿。袁世凯在朝鲜，人称袁总理。自 1882 年的中韩水陆商务章程就规定，中国北洋大臣所派驻韩商务人员与韩廷所派驻津商务人员是平行的，也就是说北洋大臣与朝鲜国王平行；同时规定，朝方遇有公会，中国总办委员为“宾中之王”，其席位应在朝鲜官主位之上。^[1]这样中国驻朝总办的位置就有些不上不下了，很尴尬的。1889 年，美国公使主持对朝赈灾会议，邀请袁世凯参加，小伙子回以“定乱救荒为上国驭属之特权，而泛舟输策亦友邦恤邻之善举，其事情似同，而事体办法则异”，拒绝与会。^[2]美国驻朝公使认为，事关慈善，你们中国还摆什么宗主国的小样儿；并通过其政府向清国总理衙门提出质询：袁世凯到底在朝鲜是干啥吃的？他的职衔与权限何在？总理衙门回曰：其职任虽不便显分二等三等公使等职，但其权利与尔各国公使相等。韩国不能慢待，他国也不能轻视。至于驻朝公使领事会议，自应由中国驻朝人员随时察度办理，是否参与会议，自行酌办。此本无一定体例，本衙门未便遥度，贵国似也不必过问云云。^[3]总署这样回答还是自相矛盾，既然把朝鲜当属国，袁世凯就是监国大臣，位在朝鲜政府之上，公使团会议当然不参加了；可是又要求与外国驻朝公使职权相当，那还怎么体现宗主国的上位？

总之，一面是朝鲜的阳奉阴违，一面是外国公使的排斥讪笑（真心支持袁世凯的也就英国，真想让朝鲜独立的是美国，日俄是各怀鬼胎），以至于连袁世凯这样的勇于任事者，都几次表示不想

[1]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 年版，第 138 页。

[2] 同上，第 287 页。

[3] 同上，第 287—288 页。

干了。虽然朝鲜政府也在他三年期满后就想赶他走，几次跟清政府请求另派“安详公平”或“公正明识”之员，但是李鸿章愣是不放。不时的写信安慰袁世凯，这里摘两段话：

韩事日就败坏，不易挽回，执事在彼三年，苦心调剂，随宜补就，非止一端，局外或不深知，鄙人岂不洞察？

目前情势，操纵两难。横览人才，亦无以易执事，非漫为勉留也。韩王之锢蔽，似以无可挽回，目前除却“持大端不苟小”六字别无办法。所望平心静气，愈加讲求交涉之宜，维持一分即补救一分，将来局面，或有变迁，或有十分稳当可代之人，自当时时留心，终不使执事久居危疑之地也。^[1]

老李也是有苦难言啊，中国自己都是大阿斗了，还强撑着去扶朝鲜那个小阿斗，当然咋也不是。至于合适的人选，九年之中他愣是没有选出一个来，哄哄弄弄中，让袁世凯干了三任九年。正应了咸丰皇帝那句话：我大清尚有人耶？确实没人了！

朝鲜固然还是原先的小弟，但小日本毕竟不是原先的小日本了。1887年（光绪十三年），就在袁世凯与李鸿章给朝鲜制造“三端”的当口，日本制定了五年装备计划。1890年，军备完成，开始着手舆论宣传工作。朝鲜方面，新党势力由于金玉均、朴泳孝亡命日本而衰落。但日本仍然扶植新党势力，并派遣少年军人潜伏朝鲜，等待时机。袁世凯企图给朝鲜另立新君，让大院君摄政，这让朝鲜国王心神不宁产生怨恨；沙俄还在拼命插腿中，命其朝鲜公使频频勾搭闵妃集团。最要命的是，袁世凯判断失误，认为日本无意

[1] 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224页。

与中国生衅。嗯，可能是日本对他太客气了，也可能中国传统，习惯轻视日本了。不只袁世凯，国内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没有把日本看在眼里。

1894年，日本做好一切准备了，朝鲜这边也有事了。袁世凯支持朝鲜派刺客赴日谋刺金玉均、朴泳孝，结果很滑稽：首先，金玉均被诱到上海，被刺而死，中国方面把金的尸体伙同刺客一并递交朝鲜，刺客不但受到中国方面的礼遇，且送回即被释放。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知道朝鲜乃中国的徒弟，有戮尸的陋习，这样会激发日本民众的情绪，且让主战派势力抬头。所以陆奥通过日驻朝使臣和日驻华使臣，向朝廷与中国政府要求，千万不要凌迟金尸。问题是中方与朝方都不在意日方的请求，不但戮金尸，还提拔重用刺客。其次，刺杀朴泳孝的刺客反被朴泳孝逮住，另一同伙逃奔朝鲜驻日使馆，驻日使馆拒绝交出，使臣下旗回国。日人果然大愤，激进者在东京组织了金玉均君的盛大葬礼和纪念会，并派代表访问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要求政府对清宣战，占领朝鲜，洗雪国耻。陆奥宗光回说：是否能发动战争，得咨询一下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回曰：“此时不管是谁，只要他能点燃战火，后事我可负全责。但可惜无法这样，真泄气，现在的政府在非战论者手中，因此要发动战场，恐怕不无困难。”^[1]看来，军部已做好战争准备，就等政府下决心了。

就在日本政府犹豫的时刻，又有一脚踢了过来——东学党起义了。

东学党，朝鲜政府视其为邪教，但其理念融合了儒释道等中学，以示与基督西学的区别，是谓东学。宗旨有明人伦、诛污吏、救民

[1] 蔡建：《晚清与大韩帝国的外交关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生、反西教；同时还有不杀人、不伤物、忠孝双全等，总之稀里糊涂不伦不类的。他们比义和团稍微聪明些，至少是反朝灭洋，没有扶朝灭洋；不管它西方文明还是东方封建，一块儿反了。当时的朝鲜国政一如老大哥清朝，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天下苦朝久矣，所以这起义是迟早的事儿。起义一爆发，袁世凯就向朝鲜政府提出，他愿代平叛乱。但是朝鲜政府有些害怕，请神容易送神难。后来发现自己实在压不下去了，于6月1日由闵妃外戚闵泳骏出面向袁世凯求援。袁世凯让朝鲜方面写个正式呈文，同时向李鸿章请示：第一，“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第二，“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自为不可却之举”；第三，日方派翻译前来，也请清政府出兵，并说“我政府必无他意”；第四，“日如多事，似不过籍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1]6月3日，朝方向袁世凯递交求援书。6月4日，清政府接到正式的求援书。同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志成率领淮、练军1500名，另由丁汝昌率军舰三艘，驶赴仁川掩护。老大哥就这样以八十岁老太申请参军的泥菩萨精神，过河去了。6月6日，中方按照当年分赃的结果知照日方中方已出兵，并且在照文中强调“派援兵勘定内乱，乃从来保护属邦之旧例”。^[2]日本第二天回复曰：“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国为中国之属邦”；另外电告：按照天津条约，我们也要出兵。^[3]中国一听日本也出兵，慌了，马上劝告：你们出兵不宜多，而且人家朝鲜也没请你们，你们就保护商馆得了，万不可入内地，免得咱们兵遇生衅。日本回复说：

[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24页。

[2] 同上，第28页。

[3] 同上，第29页。

按照先前的天津条约，我们出兵除行文知照贵国外，出兵多少及进退行止丝毫不受中国政府牵制。再说我们军令森严，与你们清军相遇，不致生事。^[1] 日本先期出兵一个旅团约 800 名，几天之后就达到 7000 多人，远远超出中方。看来，他们这回是下定决心要与中国开战了。

朝鲜呢？一看要引来日清两国部队，慌了。连哄带吓之下，东学党与政府签订休战条约，不起义了，自动解散，导致中方部队根本没与东学党照面。朝鲜大臣向国王上奏说：日本之所以出兵，乃是由于中国出兵；而中国出兵，乃是由于闵泳骏的独断，中国兵是他请来的，就请让他请袁世凯撤兵吧。6月13日，闵泳骏来找袁世凯，请求中国撤兵，以解除日本借口。袁世凯破口大骂，甚至朝闵泳骏脸上大吐口水。^[2] 看来，即使是亲华派，也很没意思的。不过对于大清政府来讲，东学党已歇菜，自己再进兵，“殊无趣味”。于是通知日本，中日同时撤兵好不？日本说你撤吧，俺呢，既来之，则安之，帮助朝鲜改革内政呢。李鸿章又想到了以夷制夷，先寻找上了俄国。俄国一出面，日本退了一步，中日合作，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否则俺还是不撤。问题是中国这个大阿斗这会儿又拽上了，向不干涉别国内政云云。袁世凯连电李鸿章要求增兵，被李拒绝。为了让朝鲜表示出自我改革的诚心，袁世凯苦劝闵妃告退，选拔有名望的老臣由朝鲜自己进行所谓的改革，以堵上日方的嘴。问题是闵妃这女人，跟慈禧太后一样的心思，宁愿国家沦陷，也不愿意自

[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29—30 页。

[2] 金在善：《袁世凯与十九世纪末的朝鲜》，《社会科学研究》1997（6），第 127 页。

己权力丢散。气得袁世凯又想给朝鲜发动一场政变了，但由于李鸿章不支持而放弃。李鸿章不希望给朝鲜添乱，更不希望中日之间发生战争，因为他太知己了，知道大清是个纸糊的房子，北洋海军是纸糊的灯笼，吓鬼可以，打日本则不行。为了让俄国多出些力，李鸿章甚至向俄国公使喀西尼许诺，俄国可以与中日两国共同承担朝鲜问题。可是俄国政府认为，我们“珍视李鸿章对我们的信任，然而我们认为不便直接干涉朝鲜的改革，因为在这建议的背后显然隐藏着一个愿望，即把我们卷入朝鲜纠纷”。^[1]一句话，俄国不愿意做火中取栗的孙猴，给李鸿章的答复是：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本撤兵，未便用兵力强勒，至于朝鲜内政，是否改革，俄也不愿预闻。

日本一见俄国只来友谊，不来强力，遂继续给中国加压，你不干涉，那我就干涉吧，并且增兵朝鲜，要求朝鲜国王声明俺是独立国不是中国属国。中方一看不妙，也不怕干涉内政了，向日方提出，咱先撤兵，再议朝鲜改革，好不好？与此同时，李鸿章向英国发出要求。英国看到自己在亚洲的劲敌俄国与中国嘀咕的，早就坐不住了，所以也热切地派人在中日之间周旋。日本当然不怕周旋，同时威胁中国政府，光叫唤撤兵撤兵，撤兵后朝鲜再出什么事变，你负得起责吗？

中国通过英国表示：俺不叫唤撤兵了，你说咋办吧。日本也通过英国表示：“即令中国政府为改革朝鲜内政，而准备选派委员，也须约定对于日本政府业已独立着手的事项，不容置喙。朝鲜形势所以演变到这样紧张的地步，全由于中国政府以阴险手段及因循方法使事情延宕不决而造成的。因此，中国政府对我国此次提议，非从本日起，于五日内以适当方法表明态度，则日本政府将不再与中国

[1] 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37页。

进行会商。同时在这期间内，中国如再增兵朝鲜，日本政府即认为这是一种威吓的措施。”^[1]

李鸿章一看，俺让步俺让步。这样吧，俺们承认，日本在朝鲜与中国权利平等；但“遇朝鲜有大典，日本不能与中国并行”，而且朝鲜改革只能劝告，不能强迫。日本说不行，我们不但要强迫它改革，遇有大典，我们日中两国还得平行！英方一看，俺也管不了了，撤吧，只向日方声明，上海是英国在华利益中心，希望中日开战时，日本不要在上海及其附近作战。

除此之外，李鸿章还求过德国与美国。德国说，英俄在朝皆有利益，让人家冲突起来多不好，所以我们就不掺和了。美国说，俺“严正中立”。^[2]

中方有些发毛了。更毛的是袁世凯，除了担心自己的安全还得应付日方外交上的刁难。比如聂士成军在牙山贴有“保护属邦”的字样，日方就要求袁世凯解释清楚。^[3]袁世凯当然解释不清楚，既说中朝关系由来已久，又说日朝条约规定朝鲜独立自由地球人都知道。6月29日，袁世凯连发三电，请求回国。初说“华人在此甚辱，凯在此甚难见人，应下旗回”，继说“倭近万余人，各处布置，待与华寻衅”；后说：闻听日本公使要按万国公法例，派兵把自己押出，那就丢人大了。李鸿章正在设法由俄国调停，回电令袁坚守岗位，“略忍耐”“勿怯退”云云。^[4]

[1] 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33—340页。

[2] 同上，第340页。

[3]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8页。

[4]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368—369页。

之后，袁世凯又发了几次电文，要求下旗回国，但政府依然不准。7月14日，袁生病躺倒了。有说他托辞有病撂挑子的。不过据他的家书，在朝鲜那样的局势下，袁世凯确实是真的病了：外面全是亲日派，恨不得逮住他咬上两口；日本大炮更是直接对准了袁世凯的公署；手下幕僚全跑了，柴米油盐也没了。16日，袁世凯给李鸿章的电文已是声泪俱下：“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1]建议他走后由自己的亲密副手唐绍仪代理朝事。

唐绍仪，中国朝鲜海关事务前帮办穆麟德（前驻天津德国领事）秘书。甲申政变当天，袁去找穆，来到穆宅，见一青年持枪，意气凛然地守在门口，当下心生爱慕；而唐绍仪呢，对袁也仰慕已久了，两个人从此结识且“互相爱慕”。^[2]待袁世凯成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时，首先选择唐绍仪做自己的亲密副手。这个时候袁世凯的惨状，唐绍仪都看不下去了，他给李鸿章发电，说袁世凯病得不轻，人都跑光了，自己一人既得忙公事又得照顾袁世凯，而且，这里缺医少药，袁要是有个好歹，可惜啊！^[3]李鸿章一听，同意袁回，但是清政府不同意。18日晚，李鸿章考虑到中日决裂在即，终于发电同意袁世凯撤回并由唐绍仪代理。问题是电报被日本人探知，准备在路上截杀。唐绍仪闻听，立即跑到英使馆找英国驻朝公使朱尔典求援。当日夜半，袁改装易服，从使馆后门出，唐持双刀双枪，乘双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登上朱尔典所准备好的英国军舰。袁世

[1]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372页。

[2] 吴长冀：《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页。

[3]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凯到江边时，与日本策划动手的时间仅差十几分钟。^[1] 我们一些学者，不是说袁“临阵脱逃”，^[2] 就是说他“仓皇逃归”。^[3] 也不想袁世凯不是战场上的将军，身为驻外使节，打仗非他职责所在，一旦决裂，自然是下旗归国。不说日本驻朝使者在壬午事变与甲申事变中都往自己国家逃奔了，只说咱们这边学者的意思，比日本鬼子还要痛恨袁世凯，恨不得让日本人杀了才解恨。

7月20日，日方向中方提交哀的美敦书，要求中方从朝鲜撤军，限三日内回复。

7月21日，袁世凯到达天津，向李鸿章汇报；并且声言中国绝不是日本的对手，建议撤兵至鸭绿江，把朝鲜丢给日本。问题是战与和这种问题，绝不是李鸿章所能掌控的。中法战争，他主和；中日战争，他还主和。问题是清廷高层，具体来讲是帝后两党把争权的私意搅和到了战与和里；同时，愤愤书生，也就是清议派们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不知道老大哥外骄内虚，更不知道小日本名小实大，硬实力软实力什么的，一概不知。他们大骂李二先生是汉奸，大力呼吁中国增兵朝鲜。与此同时，英国方面又给出个主意，说：你们中日两国分占朝鲜如何？一个占领北朝鲜，一个占领南朝鲜，还不用你们打架，多好啊。中国方面说，这办法还算公道，可以接受。但是日本不接受，且认为这建议来得太迟，宣布：中国既然不同意朝鲜改革，那朝鲜改革的事我们日本就承包了，中国若增兵朝鲜，就是对日本挑战。

7月23日，日兵冲进了朝鲜王宫，把闵妃囚禁到了日本使馆，

[1] 张华腾：《袁世凯与近代名流》，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

[2] 李宗一：《袁世凯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3页。

[3]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扶植大院君摄政。年届八旬的大院君当年被囚中国，放回后也没有在中国的支持下取得足够的政权，反而过着幽禁般的日子，这会儿正怨恨中国呢，就倒向了日本怀抱，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所有的商约，并“授权”日本驱逐中国军队。这样一来中国在道义上就很被动了。之前来消灭东党，那是由于朝鲜政府的邀请；现在，朝鲜政府宣布咱是敌人了，咋办？还有，日本宣布中国增兵就是对日本的挑衅，咋办？袁世凯的主意是“战无把握”，虽然早被李鸿章提拔为浙江温处道，并赏加二品衔，成为红色顶戴大员，可惜在大清那样的国情下，人微言轻。

这个时候，除了袁世凯和李鸿章，大清还有明白人。他就是被派上朝鲜的统领、时任太原镇总兵的聂士成。他一看中日出兵朝鲜快要演变成中日之间的战争了，遂建议中国实行战略大退却，从朝鲜班师。他致电李鸿章，分析说：日本蓄谋已久了，咱本来是去朝鲜帮人平乱，不是去与倭人争雄的，与之相战正好中了人家的奸计。老子云，不为人先。咱赶紧派船，把咱的兵撤回吧。问题是这样的明白人不多，光绪帝一意主战，且动不动搬出太后，说太后也谕不能示弱；帝师翁同龢一意主战；光绪身后的一干帝党，包括珍妃的老师、时任侍读学士的文廷式和珍妃的堂兄、时任礼部右侍郎志锐都一意主战，且把主和的李鸿章骂得狗血喷头。当然这些帝党主战背后也怀了私心，就是借耀武国外，轻视日本，让光绪出人头地“凭陵母后”，以夺得真正的亲政大权；还有些人不见得是帝党，但也一意主战，跟现在的愤青差不多，提出了诸多黑色幽默的荒诞主张：有人认为对付日本，可以速战速决，打它个稀里哗啦，从此一劳永逸；有人认为可以施魏围救赵之计，放日本主力在朝鲜，咱派奇兵，直捣小日本本土，打它个哭爹叫娘，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甚至有人发明了持久战，说日本人少国小资源缺乏，咱跟它战上个三五年，

保证把它打成孙子。总之，当时的气氛就是，谁主退却谁就卖国贼似的。连太后都被感染了，认为与小日本过两招，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遂放手让光绪一试锋芒。在清议派一片主战的叫嚣声中，半亲政的光绪与掌握实权的老太后顺应了民意民心继续增兵。既然有了朝鲜政府的授权，日本当然要开火——7月25日，运兵船“高升号”在牙山口外遭遇日本袭击沉没！8月1日，中国政府宣战，中日战争正式爆发。时为1894年（光绪二十六年），农历甲午，史称甲午战争！

战争爆发后，李鸿章要求袁世凯依然做他的“总理交涉朝鲜通商事宜”，奔赴东北帮助时任直隶按察使的周馥（这人后来也成了袁世凯的亲家，把自己六十岁以后才出生的小女儿嫁给了袁世凯八子袁克轸）筹措粮饷武器。袁世凯不愿干，也可能是身体不舒服，还可能心里不舒服。到了前线，他更不舒服了。在朝的卫汝贵、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四支陆军拥挤平壤城中，无所作为。当然，克扣私兵粮饷等作为，还是有的。卫汝贵带军向朝鲜开拔前就记得把饷银24万两扣下8万汇往自己家中。一般士兵每日仅得老米斤余，钱三十文，但能养命不能裹腹。枪炮药子多是假冒伪劣，内多和以蜡泥。丰升阿的军队更是以“不禁磕碰”出名，被百姓戏称为“鸭蛋兵”。这样的军队，能有什么战斗力呢？卫汝贵老婆写给老公的信，更被日本收获后，视为至宝，弄到自己的教材中，教育自家子弟了。信中云：“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1]意思很简单：“亲爱的老公，咱官不小了，早当上大统帅了。咱钱也不少了，够咱享福了。咱年

[1] 罗惇麌《中日兵事本末》，《清代野史·第一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66页。

龄也不小了，打仗的时候要放聪明些，别往前头冲，给我往后缩啊。”有这么贤慧的妻，卫大统帅当然不含糊。平壤之战一开，他与叶志超弃城狂奔三百里，一度逃得不知去向。当然，不几日就领兵从鸭绿江跑回中国大陆了，这点方向感还是有的。

对于平壤之战，马士如此评价：“中国将帅之中只有左宝贵一人曾经表示出一点个人的勇敢，却没有一个人表现过一点将才。有一位叶提督（叶志超）率同他来自牙山的军队，在第一天傍晚就想悬挂白旗。”^[1]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才怪呢。与此同时，中国北洋海军也是一败再败。日本鬼子就跟着进了中国本部，中国还是一败再败。导致袁世凯在写给弟弟袁世彤的家书中，说自己净与周馥“跟人蹭跑”了，“无谓之至，然也不敢启齿请归”。^[2]一句话，别说前线了，就是他这个搞后勤的，都快跑成田径运动员了，从九连城到凤凰厅，到辽阳，到新民厅，一直到山海关。这一切，估计又伤他的自尊，又会让他痛感国不富兵不强的后果。所以他建议曰：“事势至此，惟停战议后，徐图报复，较合算。”^[3]事实上，也不用他建议了。中方败了，且败得很惨，见好的时候，它不会收，见孬的时候，它还是知道收的。

聊可自慰的是，在前敌与淮军将领聂士成、宋庆和湘军统帅刘坤一等时常接触，大家一致看好他，认为他有知兵的本事。

政府先是派了些无名小卒前往日本求和。日本政府理也不理，给他们一个冷屁股，并点名要恭亲王或者李鸿章出面。恭亲王那么

[1] 马士（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2] 李宗一：《袁世凯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7页。

[3]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尊贵的血统与身份，当然不能亲自卖国，于是只有李鸿章出面了。鸿章也是破罐破摔了，中法战争时，清议派就叫他卖国贼秦桧了，并且以很大的智力优越感与道德优越感俯视李鸿章：“法国奸计妇孺皆知，唯独李中堂一无所知。”^[1]清议派说得也对，他们自己就是妇孺之见，不只对中外情事一无所知，对李鸿章的苦衷更是一无所知。李鸿章当然委屈了，我说不打吧，你们非要打；打又打不过，过后还得我擦屁股；我擦屁股也就罢了，你们转过头骂我卖国；有本事你们来啊。可惜没人给你讲这理。李鸿章签约回来后，诸多爱国人士叫嚣，杀李鸿章以谢天下。

李鸿章遭遇伤害，袁世凯也饶不过，诸多人把他骂作罪魁祸首！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呢？不说清朝时人，现在我们理清了没？理着理着，你都可能先摊上一个卖国贼的称号。中国外御不行，但是在发掘汉奸、卖国贼方面则从来不弱。这也是一种很奇怪的中国特色吧。

[1]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4页。

第四章

枪杆子里面出威权

甲午战争居然对中日双方来讲都是耻辱！

中国当然耻辱了。先是朝鲜没了。日本通过舆论把自己吹成正义之师和朝鲜人民的大救星，弄得中国很不好看，俨然朝鲜人民的大灾星。捎带着自己，还得割台湾、辽东半岛和澎湖列岛，赔款2亿两等等。对清朝这样的老大来讲，割地赔款还不算是最耻辱的，最耻辱的是，老大被小兄弟打了，而且还被别人看见了。这以后还咋在道上混呢？

日本居然也耻辱。好不容易打败大清国了，割了恁多肉肉，却因为国力不够，被人抢回去一块：这就是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虽然吐出了辽东，而且清朝又追加3000万两银子的赔偿。但是日本不干，把赔款用于扩军备战及国民教育，憋足了劲要报仇雪耻，甚至喊出了“卧薪尝胆”的口号。虽然日本国民直到今天还很有节俭的精神，但是不得不承认，清国赔偿它的2亿多两白银（条约里2亿两，赎辽费3000万两，威海卫守备费150万两，合计23150万两，相当于日元34725万日元），把日本也给吓着了。它的外务卿井上馨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1] 确实

[1] 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69页。

富裕，清政府当时的收入每年不过七千多万两，相当于三年不吃不喝，净给日本攒钱了。

相形之下，中国都没人卧薪尝胆呢。马关条约签订后，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电阻和议，帮办军务宋庆请整军再战。政府令两江总督刘坤一（时在榆关护军）与署直隶总督王文韶决和战。王文韶哪敢当这家啊，回的是可战，但前面加了好多“如果”，相当于法律中的“但书”，说了等于没说。刘坤一回的是：主客之形，彼劳我逸，咱打持久战吧。清政府一看，拉倒吧。更要命的是，关键时刻慈禧太后“偶感”，“不能见”人了，只剩光绪在朝上，与大臣哭鼻子。哭来哭去，哭出了一个批准和约的明发朱谕。^[1]由于是哭着说的，更是说给全国民众看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罪己诏。诏中诸多意思：

第一，事起仓猝，虽然不遗余力地调兵遣将，征拨军饷了，但是“将非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战，战无一胜”。一句话，承认自己的军队是乌合之众。

第二，“近日关内外事情更迫”。所谓关内外事迫，就是关外事关自家发祥地及陵寝重地，不是玩的；关内，日本从山东直接就打到京津了，更不是玩的。

第三，“二十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使徒御有惊，藐躬何堪自问？”用普通话说，就是自己的亲爸爸慈禧太后，过惯尊崇的日子了，哪受过这样的惊吓？我这孝子不能再吓她老人家了。

第四，“天心事惊，海啸成灾，沿海多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一句话，老天爷都不愿意了，降下天谴了。

[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34-335页。

第五，“宵旰旁皇，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兼权，而蟠然定计。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奏章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共谅也”。

一句话，两害相较取其轻，下定决心要收兵。有些话，说不出口，臣民心里有数，多多谅解啦。光绪有幸，天下臣民没有一个不谅他的，至少不会骂他汉奸卖国贼，因为李鸿章都替他担了。等到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签订了一个二十一条，马上背上了卖国贼的千古名号，至如今还没摘下来。他事后为什么要恢复帝制？还不是因为当了皇帝，他就不用自己亲自当卖国贼了？

第六，“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以收自强之效”。

可怜的皇帝，打来打去，认识依然没有发现根本性变化，还是把筹饷练兵当作自强之道了。不知是学费没交够还是咱这学生资质太差了，反正是屡教不改！

4.1 大清军队：从八旗到绿营，再到各色乡勇

练新军之前，大清的军队如果也分代的话。那么从八旗到绿营，再到湘淮，总计三代，只不过一代不如一代。

（一）八旗与绿营

入关前，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创立了八旗制度。八旗为：正黄、正白、正蓝、正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各旗编制：每300人设一佐领（牛录额真），五佐领（1500人）设一参领（甲喇额真），五参领（7500人）设一都统（固山额真），是为一旗。每一都统下设左右副都统（梅勒额真）。计下来，总兵

力是6万人。兵种为亲军、骁旗、前锋、护军、步军等。特种兵有神机营、健锐营、枪炮营、藤牌营等。

之后，增设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所以入关前清军已达到二十四旗，但习惯仍称八旗，靠此打了天下。入关之后，整个八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驻京师，称“禁旅”八旗，一部分驻防各地战略要地，称“驻防”八旗。兵额总数是225429人。^[1]

中国恁大的地盘与人口，八旗明显扛不住。于是以汉治汉，组织汉人武装，由于使用的是绿帜，故称绿营。刚开始搞了90万，后缩编为66万。^[2]按标、协、营、汛编组，分步、马、水师等兵种。

由于满人是以夷狄之身入关的，汉人把它当外人，它自己也把自己当外人，既想利用绿营兵力又担心绿营兵力造反。所以建制之初，两支兵种的待遇和地位就是不一样的。八旗是世袭特权，打下天下之后更是发展为光拿干薪不干活；绿营的兵饷不及八旗兵饷的三分之一，却只管干活。而且，制度里还特别规定，绿营军官可以克扣军饷，称之为丁名粮（虚粮）。当然，除了公家规定可以克扣的外，各级领导干部还可以八仙过海，私自克扣。

康熙年间平定三藩时，八旗兵就用实力向政府证明，自己就是吃干饭的。于是政府开始倚重绿营。可是乾隆中叶以后，绿营也向政府证明，自己也不想喝稀饭。这让政府很头疼。遇有战事，不得不临时招募乡勇团练，相当于现在的民兵吧。

鸦片战争时期，政府用过旗兵，用过绿营，甚至试图把东北打猎的猎户给请出一部分来，当然还有所谓的气功大师、浪里白条、猴子等，但是都打水漂了。太平天国时期，政府当然还是民兵的思

[1]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2] 同上，第85页。

路。结果有两支民兵崛起了。一支是曾国藩组建的湘军，一支是李鸿章组建的淮军。中国历史一直在证明，军队只要是国家的，它就没有多少战斗力；只要私家化，战斗力陡增。之前有岳飞的岳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现在有曾李的湘淮军。当然中国的国军与近代意义上的军队国家化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国军，从宋朝开始，就很流行如下规则：一是以文制武，地方各级统兵官均归地方最高文官统辖或节制；一是分权牵制，总督、巡抚、提督、总标在军政方面职责不明，谁都可以插一腿，谁也负不了全责；一是兵不常将，将不常兵，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临时调配，干完就走。军队造反是不容易了，但是军队战斗力也不行了。

1868年（同治七年）起，政府曾指派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用湘军制度改造绿营，并推行到全国，所以绿营又改称练军。但是甲午战争证明，重整过的练营也不行。

按曾国藩的描述，绿营兵的战斗力如下：“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1]

这样的兵要是有战斗力，那就是见鬼了。

（二）湘军和淮军

如果不是太平天国的成全，湘军与淮军也不会由一般的乡勇上升为清政府新兴的主要军事力量。

面对太平天国的声势，清政府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让大臣练兵的。1853年（咸丰三年），政府任命的督办团练大臣多达四十余位。

[1]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87页。

这其中，练出名堂的就是曾国藩及其湘军。原因如下：

首先是湘军的编制。依明朝戚继光成法，以营为单位，每营500人。营辖四哨，哨辖八队，有劈山炮、抬枪、小枪、刀矛诸队，合亲兵六队，共三十八队。队设什长、伙勇各1名，正勇12或者14名。数营设统领一员。水师每营380人，快蟹、长龙船各一，舢舨船八，有桨、橹、舵、头篙、炮手、船长等。此外，每营还设有长夫180名，担任运输任务，大大减轻了正兵的体力负担，增强了战斗力。

其次是它的征兵制，以募兵制代替了绿营的世兵制。而且主要招募湘乡人，特别是从至亲密友门生故旧中挑选。

再次是它的饷制。军饷不由户部拨而由自筹，自筹的主要途径之一是捐纳，也就是卖官；途径之二是厘金，它是为镇压太平天国而产生的，就是在各通商码头设卡抽厘。湘军杜绝绿营虚冒回扣等缺陷，给士兵高达平均6两的月银，较绿营多三倍。营官以上另有公费，每一营官饷银50两，公费150两，月收入可达200两之多。^[1]

这样一来，战斗力就出来了。高工资就不说了，只说它的私家化：

第一，选兵只选乡村愚夫，不选奸滑游民。

第二，选将只选黑社会资源，同学同乡师生亲友等。

第三，上下级将官之间也是知己知彼的关系。统领选营官，营官选哨官，依次而下。

第四，以儒家思想教导他们忠孝节义。其实，不教导，本能地都知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至少打仗时撂挑子就跑的当口，会想到身后都是自己的哥们爷们儿，临阵逃脱的念头会降低许多。

[1]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氏给自己的得意门生李鸿章一支小分队，李在此基础上从安徽老家淮河一带募兵，所以出现后来居上的淮军。淮军旗下出现诸多名将：张树声、周盛波、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李鹤章（李鸿章之弟）等。曾氏曾写信给李鸿章发过牢骚呢，说自己手下的一些湘军将领“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1]

站在我们旁观者的角度，曾氏发这些牢骚，明显在说明他的湘军在私家化方面不如李鸿章的淮军。

淮军的兵制、编制与饷制与湘军略同。只不过太平天国灭亡后，曾氏担心功高震主，以湘军暮气已深，丧失了战斗力为借口，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解散了。之后清政府就只能依靠淮军了。曾氏虽然给政府整顿过绿营，但是差强人意。

可以说，不管是湘军还是淮军，由于面对的太平军与他们是一样的黑社会性质，双方都是靠的血缘与人情，战斗力也就相当，打得不相上下。淮军跟现在的中国球队接受外援一样，聘请了西式洋枪队。事后李鸿章的淮军，在硬件方面，也使用上了洋枪洋炮。软件方面，19世纪70年代起，开始派遣留学生赴德、日学习军事。80年代，开始聘请德国军官教练陆军，设立北洋水师学堂、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并且有了自己的近代化海军——北洋舰队。但软件的核心，制度与人事方面还是黑社会性质。面对日本那样完全近代化的军队，当然不是人家的对手了。于是海陆两军，全在甲午战争中打了水漂。

[1] 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三) 麦高温眼里的大清军队

大清的军队到底是个什么德行，我们这里用西方人的文化瞳孔观照一下，具体来讲，是看看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之久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的描述。

镜头一：从外表上讲，中国士兵看上去十分滑稽可笑，他们显得并不威严，即使他们个头很大，人们在看他们时总免不了流露出一种半带鄙视和讥笑的神情。当官的没有教过他们如何使自己显得精明或表现出军人的气质。以西方的观点看，他们从没受过任何值得称道的训练。中国的士兵没有被要求站直、挺胸，以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英寸高度。他们不必去学走正步，这免去他们精神上的折磨。对这块土地上的士兵而言，这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他们原本对左腿和右腿的概念就混淆不清。^[1]

镜头二：士兵们不讲卫生，这实在是一件令人作呕的习惯；士兵们对水和肥皂从来都报以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看上去肮脏而邋遢，好像从来都是穿着军装睡的觉；在南方的一些省份，士兵是不穿鞋袜的。行军时，他们穿草鞋，不行军时，他们穿上天赐予的鞋——裸脚！为士兵配备军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府从来就没有在这事上伤过神，只是在前胸和后背上各显一个大而显的“勇”字而已。^[2]

镜头三：观看一队执行某种特殊任务的士兵行进，留意他们所配备的武器装备，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每个士兵都把枪扛在肩上，

[1] 麦高温（英）：《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时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5 页。

[2] 同上，第 35—36 页。

另外每人还配备了一把扇子。扇柄插在背后的衣服下，另一端伸出来，离耳朵很近，这样在行进中就不会给他带来不便。如果天热，他们就把扇子打开盖在头上，并且用辫子将扇柄缠住，以便扇子的位置固定。另一件与扇子同样重要的是竹烟枪。一想到烟枪，他们就恨不得把背上的长枪扔掉。为了不妨碍双手的自由活动，他们把烟枪水平地插在背后的腰带上。第三件重要的东西是雨伞。每个想体面一点的士兵都有一把雨伞。如果没有雨伞，作为军人的“勇”的品质就会受到质疑。中国人并不认为一个士兵被雨水淋湿会提高自己的尊严或是表示他的高效率。^[1]

镜头四：参军需要经过公开的考试，测试的内容是剑、盾与弓箭的运用能力。一个应试者拿着剑与盾与对手决斗。这种表演有时让我们觉得滑稽。在我们看来，它更像是江湖艺人的把戏，而不太像是士兵的功夫。但旁观者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这是一场精彩的武术表演，并不时对表演者矫健的身手报以一阵阵的喝彩。接下来是射箭。他必须射中大约五十码开外的目标。最后是力量测试。他抓住了最沉的足有一百磅重的那块石头。证明了自己的力量足以将在战场上遇到的任何一个敌人抓起来扛在背上。他因此而得以入伍了。^[2]

镜头五：沿途的店主总是害怕军人的到来，尤其是当这些军人要去与敌人殊死搏斗时。如果军人们驻扎的地方没有营房，他们通常就住在当地最大的寺庙里，没有人会认为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妥。军人们的到来对当地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由于军官克扣口粮，所以士兵们唯一的发泄方式就是向无辜的老百姓泄恨。

[1] 麦高温(英)：《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7页。

[2] 同上，第37—41页。

就连小鸡都会在凶神恶煞的士兵面前惊恐地张着嘴，伸直翅膀落荒而逃。看上去活蹦乱跳的小猪也失踪了。^[1]

镜头六：中国士兵所受的军事教育太差，因而素质也低。他们不够勇敢不是因为天性中某些遗传因素的欠缺，而是周围的环境使然。威海卫兵团在从义和团手中夺取天津的战役中显示了中国人的禀性。总有评论说中国人只需要领导，威海卫兵团短暂的历史就证实了这一点。^[2]

这外国人的文化瞳孔里，中国军队确实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他还算安慰了我们一下，那就是，中国人天性里并不缺少勇敢及成为好士兵的禀性，只不过缺少好领导罢了。八国联军进中国，曾雇用过中国兵团。其中的威海卫兵团是最出名的一支，他们在英国人的领导下，作战勇敢，受到联军一致好评。

一句话，好兵还是有的，就看你政府怎么练了。而且，看了这些镜头，我们后面才会明白，袁世凯练新军，是多么的潮哥！

4.2 众望所归袁世凯，新兵还得你来练

洋务运动起步时，知识分子中的清醒人士，比如郑观应就提到过中国军队模仿西法改革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这种“搬张桌子”都要流血的国度，政府不看到棺材盖，是不会主动改革的。而且即使改，也很扭捏：堂堂的大中华学习西方？羞死人啦！

甲午战争进行中，清政府就知道，不学习别人可能更丢人。原

[1] 麦高温（英）：《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时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43 页。

[2] 同上，第 45 页。

先打不过英国法国，现在居然连小日本都打不过了。于是，总理衙门把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参与黄海海战的德国陆军军官汉纳根招了过来，翁同龢与李鸿藻，两个帝师兼军机大臣不耻下问：小汉，你说我们大清咋办？

汉纳根提了诸多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全按西法，用西人编练新军十万。这回政府动作快了。1894年（光绪二十年）11月，清政府成立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等人为辅的“督办军务处”，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之后，政府又加上淮系著名的洋务官僚胡燏棻会办。

但是汉纳根的建议，清政府只部分接受。因为李鸿章与胡燏棻同意练新军，但不同意练十万之多，更不同意让西人控制。道理很简单：一是没恁多；二是这支新军若让外国人控制住，那可不是玩的；三是现在的军队，都掌握在汉人手里，汉人不是清朝的外人，但是西人则是完全的外人。想当年唐僧回纥兵，结果就吃了回纥的亏嘛；而且李鸿章当年的洋枪队首领华尔，就很不听指挥，闹出诸多乱子。政府一听，那还是咱自己练吧。那谁，胡燏棻，你来练如何？

之所以把练兵权交给胡，一是因为他与汉纳根争论过有关编练新军的问题，还算有头脑；二是他乃李鸿章的安徽老乡，一直追随李鸿章，在淮系以办洋务著称，还算开明；三是他上了一份万言书，谈兵事谈得头头是道，给政府开的新军规划是：北洋五万，南洋三万，广东、湖北二万，其余各省，每省一万。^[1]

1894年（光绪二十年）冬，胡燏棻的定武军开练，屯住马厂。因马厂营房不够用，改屯小站——天津东南七十里处的新农镇。胡

[1]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先是聘请汉纳根做教习，但汉纳根认为权力不够，“事多窒碍”，不干了。胡又改请另一位德国军官沙尔，根据德国陆军操典开始了训练。

这一切对于袁世凯来说，又是一次机遇。

袁世凯从小喜读兵书。甲午战前帮朝鲜编练新军，就弃淮军的旧操法不用，改用英德操法。

甲午战争期间，他是较早提出用西法编练新军的。看到清军不堪一击的情状后，他就迭电自己的拜把子兄弟、北洋系元老、李鸿章红人、时任津海关道的盛宣怀，说：“公如筹有款，宜速延名教习，募学徒千人，教兵官认真讲究西法，另改军制。为将来计，此军情决非老军务所能得手，枪炮全不知用，何能哉；倘为然，弟愿任监督，必有以报。”“寇练兵纯用西法，能习西式武器，用又内外协同，赏罚明，号令严，事权一，不惜费。我皆反之”。“各军皆不知枪炮”，放炮时，所配炮弹不足用十分钟；士兵用枪，只知托平乱打，连准星都不会瞄。虽然如此，当时在天津督办东征粮台的胡燏棻建议袁世凯亲自练兵时，袁世凯回说：“凯须饷有械精，熟练一枝，能操不溃之权，始敢措手，否则决不敢随人崩溃。”^[1]嗯，看来我们这位河南帅哥还真不是一般人物。随便练个破军，到时候在战场上净搞长跑运动了，他可不干。另外，他还亲自致电钦差大臣、军事统帅刘坤一，报告军情，谈自己的整军建议。所以，战争期间，袁世凯的知兵名声，就成为时人共识了。因为当时谈兵的人也不少，但大都是文人谈兵，谈得自己慷慨激昂，谈得主事者七窍生烟。现在拿我们河南籍著名清官、俺的蒋村老乡、时任广东巡抚马丕瑶的一个奏折——《广东巡抚马丕瑶奏强寇要盟权奸挟制筹策具陈折》来看

[1]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看：

第一，听说李鸿章签了中日和约，吓我一跳。“苟有心者，断不出此”！“人谓倭人恃李鸿章为内援，李鸿章恃倭人为外援，由今观之，诚不诬也”。

第二，地是不能割的，商是不能通的。否则，“十余年间，将合中外为一家”。所有这些条款，我们大清上下，皆知不可允。“倭人盖明知其不可，而故意要盟；李鸿章亦明知其不可，而代为挟制”。

第三，“此次电信到粤，粤人无不怒目裂眦，思食李鸿章、倭奴之肉”。

第四，伏愿我皇上大震天威，先拒绝和约，再次李鸿章发交刑狱治罪。倭人无消息可通，“则彼之气自夺，而我之气益奋”。一面诏刘坤一等严整军旅，收复地方；一面通饬沿海，切实守备，以遏寇氛。其各省民团义旅，一律准其助战，必有豪杰之士，应时而出。

第五，天津辽阳与皇都靠近，我皇上至性仁孝，怕吓着老太后，那么请恭皇太后西巡，避地山右，或驻跸长安，着各路统兵大员，大张挞伐。

第六，自古战势不在于外势之强弱，而判于一心之敬肆。但使我上下中外，共常存忧勤惕励之心，自可扫荡廓清之效，数月之后，事局必变，待倭人变计求和。^[1]

平心而论，马丕瑶确实是清官，在我们周边一带，马家的名声也不错。但是在外事方面，他确实一无所知。奏折里，把李鸿章列在了倭奴之前。他似乎不知道，每一条款，李鸿章都电请过皇家政府

[1] 张晓生：《中国近代战策辑要·下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3—1175页。

的。马恨不得剥李鸿章的皮，吃李鸿章的肉。为什么不剥皇帝的皮，吃皇太后的肉呢？

马丕瑶当时身为广东巡抚。一代大吏、一代文官、一代清官，沿边督抚，他都占了，所以他这奏折应该是个典型。至于一般言官，咱就不说了。只说李鸿章坐冷板凳时的牢骚——确切地说，李鸿章和议后做了总理衙门大臣，官衔还是一如既往的在最高处，只不过比起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旧衔来，相对而言有些冷。当时他客居贤良寺，本就客少，他更闭门杜客，于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头就发上了牢骚：

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借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顾台院现在，后来者依然踵其故步，盖非此不足以自见。制度如此，实亦无可如何之事也。^[1]

[1] 张晓生：《中国近代战策辑要·下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8页。

老头说得很好，可惜，只能坐着冷板凳跟自己人说说而已。

虽然老头对袁世凯奔走于自己的政敌李鸿藻与翁同龢门下很是不爽，但袁世凯毕竟接的是李鸿章的衣钵。那就是，他是做事的，不是要嘴皮子的。下面我们来看看袁世凯的战后策。

战争一结束，袁世凯就上书一代帝师、军机大臣李鸿藻。在书中，他自称小门生，给这个老长辈谈了诸多意思：

第一，日本未来还是咱的祸源，所以咱们得卧薪尝胆。“否则，三数年后，大局之危必有大甚于今日者。”

第二，“此次兵务，兵不患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前敌各军不下十万人，但是敢与日寇角者，除了宋庆、聂士成等带领的少数士兵，其他不是“望风而逃，即闻风先溃”。

第三，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裁冗兵，节糜费，退庸将，肃军政。挑名将名帅数人，给其足够的事权与薪水。延募西人，分配各营，进行军制改革。使将帅自身熟悉各种器械用法，及战阵指挥等。广设学堂，精选学徒，延西人著名兵家前来授课。数年后，从学生中选优秀者前往外国游历学习，归来给予兵权。军政可望起色。

第四，和局已定。嗣后饷源尤渐支绌。新募诸军自须依次淘汰。内地说不定会有“伏莽之起”，所以各省防练诸军尤须先行调回以资弹压。南方诸军，尤宜就近海口船载以归，免致沿途地方遭其骚扰。现在奉天农商荒歉，兵民杂处，宜生是非。“如能早遣一日，即为数万生灵之福。”

第五，此次赔款甚巨，我们还得开源节流，而养兵之费，向来繁巨。须派明练公正、真实知兵大员，负责整顿减汰。“务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奉直一带，计有精兵六七万人，分归二三名将

驻扎防卫，计可自守。

第六，去秋来，本生母（亲娘）右肢受风，加上小门生奔走军务，她时切系念，病每因之增加。前因军务繁紧，“未敢以私干请”，现和局已定，拟请北洋赏假归省，以遂乌私。^[1]

事实上，早在战争期间，袁世凯不断地给李鸿藻写信报告战事，李鸿藻已经看好他了。

可是我们一些学者，喜欢把袁世凯的这种行为称作“钻营巴结”。稍微不存偏见的人，读一下袁世凯这些信札，就会得出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于公于私，袁世凯都是一腔热忱，爱国忧民，甚至惦念老母的孝子心思，在字里行间都毕露无遗。况且，像李鸿藻这样的清流派领袖，一代帝师兼文章大家，都读不出小袁的孬种来，倒是我們现在的学者，比清流还清流？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奔走于另一位帝师兼军机大臣翁同龢门下。翁先是认为他“欠诚实”，后是认为他“不滑，可任也”。^[2]……咱就这么说吧，从李鸿藻到翁同龢，从王文韶到荣禄，从张之洞到刘坤一，这些大佬没有一个不看好他的。他们交相上奏，夸奖袁世凯是个人才。于是，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被奏调到北京，并得皇帝上谕，交吏部带领引见。光绪皇帝听他谈得头头是道，颇称许，遂派其到督办军务处工作，以备顾问，并命他奏陈挽救时局之策。

这样一来，袁世凯可就有事干了。他给皇帝写了一个一万二千言的《尊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请督办军务处代上。在条陈里提

[1] 张晓生：《中国近代战策辑要·下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5-1177页。

[2] 李宗一：《袁世凯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3页。

出了练兵十二条、储材九条、理财九条、交涉四条等建议。除此之外，荣禄还直接授意袁世凯制订练军计划。袁世凯动手拟定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和《募订洋员合同通稿》，上呈督办军务处。且请幕僚们译撰兵书，自称门生，呈递荣禄。

功夫不负有心人。12月，由李鸿藻提议、荣禄附议，恭王、庆王联同军机处保举袁世凯督练新军，说他“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1]有些史家喜欢说闲话，说袁世凯隔掉李鸿章，钻营巴结，才得的这差事。我觉得这里需要替袁世凯说几句。

第一，当年吴长庆谢幕之后，吴的一些幕僚，对于袁世凯得了李鸿章的赏识与抬举颇不以为然，认为他不忠于旧主。现在，李鸿章坐了冷板凳，袁世凯又受了清议派大首领李鸿藻的赏识，还有人不以为然。按他们的认识，袁世凯也跟着谢幕或者冷坐才是正理。这种要求于公于私都有些不近情理。吴长庆老了，终究要谢幕；李鸿章签订条约后的遭遇，本就是中国畸形的民族主义情结下的牺牲，凭什么让袁世凯陪着一同牺牲？袁世凯忠于公、忠于事就行了，何必忠于某一个人呢？事实上，袁世凯不但对得起吴长庆，就是李鸿章和谈被刺后，深表关切的是袁世凯，勇敢地奔赴天津前去探望的还是袁世凯。对于自己的旧主，保持旧情就行，何必陪葬呢？

第二，袁世凯那时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不是常识，或者说，帝国大一统江山下，练兵也是给政府练的。而且，帝国传统一直是以文将兵，重文轻武乃是几千年的传统。一般文人谁愿意干呢？当然，也不大会干。相形之下，袁世凯虽然勇于任事，且知兵的名声并不虚，他在朝鲜就借用英德操法给朝鲜练过新兵，而且从小就喜

[1]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0页。

读兵书。但是刚开始他也并不想干，很简单，在天朝那样的制度与人事环境下“断难有为”，所以他一度力辞不干，未得允许。^[1]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胡燏棻自己也认为不如袁世凯：第一，他当时身兼湘军粮台，忙得顾不过来；第二，跟德国军事顾问搞不好关系，麻烦不断；第三，盛宣怀为支持自己的拜把子兄弟，慨然出面，以其社会地位和经济能量做担保，为袁世凯贷款三百万元充练兵经费。这一切，都让胡燏棻惭愧。^[2]在督办军务处的调整下，胡燏棻被任命为督办津芦铁路，定武军交由袁世凯接统。12月8日，光绪为此发下上谕：“此次所练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积习，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3]

上谕发下后，各方反响热烈。刘坤一特致贺电，嘱托他“振刷精神，力图报称，以副中外之望”；拜把子盛宣怀发来贺电，“为国家贺”；社会名流、文章大家吴汝伦来信：西法练兵，中国转弱为强之兆，“草野下士，无任翘勤”。^[4]

端的是众望所归袁世凯。看意思大清能不能崛起，就看他的了。

上谕下发的当天，袁世凯就到达小站正式上任了。一颗将星，就这样在小站上空冉冉升起。可惜我们的史家都认定，此乃军阀的肇始。还有人更进一步，把曾国藩称作“近代中国军阀的鼻祖”。^[5]按他们的逻辑，岳飞更称得上是古代中国最大的军阀了。相形之下，

[1]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2]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鹿书社2005年版，第109页。

[3] 李宗一：《袁世凯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4页。

[4]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鹿书社2005年版，第110页。

[5] 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袁世凯的军队至少没叫袁家军，政府给他新起了个名字——新建陆军。

4.3 袁世凯：我练兵，你立正

袁世凯到任后，首先扩编军队，由原先的4500人增加到7300人。在他的操练下，中国的军队，终于要向近代化转型了！

（一）领导机构

袁世凯自任督办，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商务处，以及中军、文案等官职。

参谋商务处总办徐世昌；执法商务处总办王英楷；督操商务处总办梁华殿（后由帮办冯国璋代替）；提调陆建章；中军官张勋；文案阮忠枢、言敦源、田文烈等。

另附设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洋务局、军医局、教习处、侦探局（对敌时另设）等。

此外，还设有参谋职能、电讯联系及军乐队等。

（二）军队营制

营制分为左冀右冀（冀相当于旅），冀设统领二人。统领下设分统一人。分统训练步、马、炮、工各营（1899年增加辎重营）。营设统带（相当于营长）一人，帮统一人。左冀步兵二营，炮兵一营；右冀步兵三营，骑兵一营，共七营。营下设队，队下设哨，哨下设棚。队设领官一人，哨设哨官一人，棚设正副头目。

营制初具近代化特色：

第一，虽然还沿用淮军商务处、营、队、哨、棚等旧名称，终

取德国陆军制，有步、马、炮、工、辎各兵种了，一军分两翼，一冀辖两三营等；每营官兵 1128 人。

第二，军队中设炮兵、骑兵、步兵、德文四所随营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由士兵中考取。学期两年，学生毕业后，德文班派赴德国留学，其余的留下担任下级军官。袁世凯还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三分之一（200 两）作为奖学金。除此之外，还设讲武堂和学兵营。前者是培训在职的哨官，后者培训各棚正副头目与部分正兵。各学堂均聘请德国教官担任总教习。

第三，武器全部从外国购进。炮兵装备德国克虏伯厂的五十七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步兵装备奥国造曼利夏步枪；骑兵使用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配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除规定装备的武器外，士兵一律不准携带自己的私人武器。号衣鞋袜也一律着黑，不准参差不齐。服装袖口处有红色官阶号。

第四，通过中国驻德公使，延聘了十余名德国军官充任教习，并成立专门的教习处（后改洋务局）。教习处头目巴森斯，负责全军训练与演习。其下，操场稽查施壁士和伯罗恩，礼节兼军械稽查魏贝尔，炮兵教习祁开芬，骑兵教习兼稽查曼德，德文教习慕兴礼，号兵乐队教习高士达等。

（三）饷制

新建陆军的饷费由户部拨给，不用像湘淮军那样自筹。士兵饷银比较丰厚。以最低的步兵为例：中选待齐之前，每日口粮钱 100 文。募齐开差后，口粮钱每日 150 文，头目 200 文。有能粗通文意者，口粮照头目例。到营后，正头目月饷 5 两 5 钱，副头目 5 两；正兵 4 两 5 钱；伙夫 3 两 5 钱；长夫 3 两。炮队、马队，又比步队较高。洋员 13 人，月支总计 4000 两。翻译 13 人，月支总计 1000

两。饷银定期发给，从无拖欠，还没有私自克扣等现象。除此之外，还有请假、伤病给饷和阵亡赏恤的具体办法：在营三年，因事请假，给假三个月，并发三个月本饷；积劳成病及打仗受伤者，医局诊治给药，分等优赏，仍支原饷；在营病故者，给埋葬银十两；阵亡者，赏恤二年本饷。^[1]

嗯，袁世凯把军队搞得有些温暖的大家庭的气氛了。

(四) 不拘一格选人才

袁世凯的小站班底主要由这么三类人才组成：

第一，家兵家将。铁哥们儿徐世昌在北京是个坐冷板凳的翰林，从1886年中进士进入翰林院直到1897年，11年间愣是没有放差或者超擢的机会。此时正在家中为母丧丁忧，袁世凯把他临时弄来，做了参谋营务处，可拿一份高工资。表弟刘永庆，一直在朝鲜跟着表哥干了，这次做了粮饷局总办兼转运局总办。老部下吴长纯，担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二营统带。家佣儿子吴凤岭，从小与袁一块长大，袁投军时他就是跟班了，担任新建陆军马队第一营后队队官。雷震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在朝鲜做过袁的教习，担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三营后队队官。江朝宗，甲午战争时随袁世凯在东北转运粮饷军械，担任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在徐世昌之前）及学堂监督。除此之外，还有差弁、亲兵十数人，袁世凯也各尽所能，把他们安置到了各个岗位。

第二，北洋武备学堂学生。北洋武备学堂，乃李鸿章创办的国内规模最大的陆军武备学堂，教官全是从德国聘请，学生成绩自然不低。但由于淮军老将不信邪，所以这些毕业生在淮军部队里并未

[1]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受到重视与重用，相反，经常遭遇各种哂笑与轻慢。袁世凯把其中的佼佼者收拢过来，破格提拔，大胆使用。几个月不到，就抽调一百三十多名，充实到了各个岗位。后来出名的计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段芝贵、张怀芝、王英楷、李纯、王占元、田文烈等等。

第三，淮军旧将。一是袁世凯本人延纳，二是让李鸿章等大佬推荐。袁世凯延纳淮军旧将，著名的有张勋、姜桂题、倪嗣冲、王永清、龚友元、阮忠枢、言敦源、王怀庆等。

由于将弁全部是出于淮军行伍或者北洋武备学堂，甚至袁世凯的家兵家将也与淮军血肉相联，所以有些学者把新建陆军骂作“淮军余孽”。这就有些过分了，历史学家怎么能把史学搞成骂大街呢？

班底之外，普通兵的选拔也有了严格的格式：士兵年龄限在二十至二十五岁；力限平托一百斤以上；身限四尺八寸以上；步限每一时行二十里以外；取具邻右保结；报明家口住址；曾吸食洋烟者不收；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五官不全，手足软弱，体质多病及有目疾者不收。

（五）袁世凯人事方面的优点

第一，记忆力极好。对所有军官幕，僚甚至棚头弁目，都记得他们的名字，还识得他们的脾性。

第二，实干。凡是力所能及的事件，绝对事必躬亲，决不假手于人。这人个性又强，轻易不叫苦，所以累得昏头涨脑。

第三，不但自己不贪污军饷，还杜绝手下人冒领克扣。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前往参观，赞叹曰：“中国兵力之弱，其源于发饷之多克扣，此弊几乎通国皆然。但我观察袁公发饷的情形，叹服袁公之清廉，为人所不能及矣。袁公于发饷日，亲自督率委员按人发给，

无丝毫克扣之弊。”^[1]

第四，与士卒同甘共苦，以身作则。有次阅兵，天降大雨，手下人要为他撑伞，他拒绝曰：将士们都在雨中，我就不行吗？这种风度，放到现在，还很稀缺。

第五，遭人弹劾，不降反升。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4月，监察御使胡景桂参奏袁世凯“浪费国帑，诛戮无辜”。一个月之后，又有御使奏新建陆军“扣饷缺款”。这才干了几个月，就有人说自己的坏话了，气得袁世凯给徐世昌写信说：“两旬来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军事实无心详述。”^[2]其实胡参奏袁世凯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练兵的事，或者说，练兵的事仅仅是借口。因为自从甲午战后，康梁等维新派就在北京拉开了维新的架势，袁世凯不但参加了康梁的强会学，捐了五百金，还把康有为的万言书上给督办军务处，因荣禄不收而被退回。一句话，政府保守派们有些担心袁世凯走得过远，据说李鸿藻这样爱惜名誉的清流领袖都怕自己担了“滥保非人”的干系，正是在他的授意下，胡景桂才出手相奏的。

政府派已任兵部尚书的荣禄前往查办。荣禄带着自己的幕僚陈夔龙同行。不去还好，一去顿觉耳目一新，这军队整齐严肃，比上旧军强多了。如果大家前面看了麦高溫瞳孔里的中国军队，就会深刻理解荣禄的耳目一新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荣禄马上决定：“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问题是袁世凯确实有一条硬伤——其他方面子乌虚有，但滥杀菜贩则是有的：袁世凯新官到任之后，不许商贩进入军营交易。小站是老军营，之前一直有盛军驻扎（淮军周盛

[1]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2]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0页。

波、周盛传部，在小站驻扎二十年，甲午战争中全军溃散），商贩进入军营贸易有年，遂把袁世凯的军令当作了官样文章。袁世凯抓住一个菜贩杀了，从此军营肃然。兵丁违纪可军法从事，但是一个菜贩闯进了军营，自可有多种说法。所以袁世凯的事可轻可重，就看荣禄大人的意思了。陈夔龙起草的复奏稿云：“以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干严谴，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拟“请下部议”。荣禄说：一下部议，轻者也得撤职。新军刚建，难易生手，不如乞恩，让他认真操练，以励将来。于是，复奏改成了“查明均无实据，应请勿庸置议”，而且“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于将领中间为不可多得之员”。荣禄这么一夸，连光绪也跟着安慰起来了：“新建陆军督练洋操，为中国自强关键，必须办有成效，方可逐渐推广。袁世凯此次被参各款，虽经荣禄查明，尚无实据。惟此事关系重大，断不准徒视外观，有名无实，为外人所窃笑。袁世凯勇敢耐劳，于洋操情形亦尚熟悉，但恐任重志满，渐启矜张之习，总当存有则改之无则勉之之心，以付委任。”^[1]

由于荣禄的保护，袁世凯躲过一劫。但有意味的是，后来当袁世凯荣任山东巡抚时，胡景桂则是山东按察使，胡成了袁的直接下属。胡当然担心袁会报复了。没有想到的是，袁世凯不但没有给他小鞋穿，还让他兼任了武卫右军先锋营务处，表示重用之意。胡这才放下心来。年末岁考，袁给胡撰写的评语是：“该员诚朴亮直，能任劳怨。讲求刑名捕务，均能实事求是。”^[2]再后来到义和团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列的祸首名单中有胡景桂。袁世凯向德国驻烟台领事诉说胡是被冤枉的，敦请其向北京的各国公使陈情。结果，胡的

[1] 李宗一：《袁世凯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57页。

[2]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137页。



小站练兵时的袁世凯

这时的袁世凯只是个直隶省里的按察使，人们都说他在戊戌变法中没出兵帮光绪。按照袁自己的说法：“他们看我在小站练兵，手中有兵权，其实那时的兵权是虚的，小站7000兵只有枪没有子弹，练打靶时由天津弹炮局派专人送到小站，监督打靶，发多少子弹，回收多少弹壳。我驻在小站，聂士成的毅军在滦州，董福祥的甘军在武清，遥遥数百里间，处处牵制，焉能达到，即到亦焉能成事？”

名字被划掉，逃过大劫。看来袁真是宽容厚道。正如他在致徐世昌的信中所言：“此人甚明爽，的系好帮手，值此时局，尚闹意见，尚复成何人物。弟决不为此也。”^[1]可以说，袁世凯的这种化敌为友的人事方面的优点，确实给他开拓了良好的政治舞台空间。

（六）军纪森严，留下诸多政治遗产

募兵时，袁世凯就有《募兵告示》，宣传新军纪律：强奸民女者，斩；擅取民物者，斩；聚众斗哄为首者，斩；沿途逃亡者，斩；行路离伍者，斩；强买民物者，插耳箭。

入营后，等待士兵的是更详细的军纪：《行军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丁驻扎营内章程》《简明军纪廿条》《查拿逃兵法》等等。针对士兵大都不识字的特点，袁世凯还编了《劝兵歌》：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1]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9-20页。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帮忙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那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和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语，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一篇劝尔要紧歌，务必字字记的清。^[1]

不过，追根溯源的话，袁世凯可能受了曾国藩的影响。下面我们看看曾氏的《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篷。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

[1]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120页。

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部。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邀些地痞作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1]

不过，在袁世凯《劝兵歌》的基础上，徐世昌徐才子又给编了首简短的《练兵歌》，也叫《大帅练兵歌》，“大帅”即指袁世凯。歌中唱道：“朝廷欲将太平大局保，大帅统领遵旨练新操，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第二功课要靠官长教，第三行军莫把民骚扰，我等饷银皆是民脂膏，第四品行名誉要爱好，第五同军切莫相争吵……”^[2]

[1]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29—430页。

[2] 张社生：《绝版袁世凯》，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怎么样？听听这歌，怎么那么耳熟啊，怎么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么相像呢？

1927年，毛泽东的三大纪律诞生：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毛泽东的六项注意诞生：一、上门板；二、捆禾柴；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六项注意变成了八项，增加两项：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1]1935年，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成歌词，填进了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民歌《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歌谱中，形成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各部队对歌词有所修改。解放以后，总政治部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的训令，对歌词又做了两次修改。一次是1950年，一次是1957年，定型如下：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八项注意切莫忘记了。

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

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

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四若把东西损坏了，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

第五不准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

[1] 肖银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由来》，《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第21期，第29页。

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
 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
 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
 倘若把这规矩破坏了，革命纪律处罚决不饶。
 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相互监督切莫违反了。
 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
 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1]

歌词如此惊人地相似，歌谱干脆是同一个。由于小站练兵延的是德国教官，用的是德国操法，所以袁世凯练兵歌的歌谱，取自于普鲁士军歌《德皇威廉练兵曲》。没成想这歌谱在神州大地广泛流传，据有心人追究，如此流传了下来：

普鲁士军歌《德皇威廉练兵曲》→袁世凯军歌《大帅练兵歌》→张之洞军歌《大帅练兵歌》→张作霖军歌《大帅练兵歌》→冯玉祥军歌《大帅练兵歌》→鄂豫皖苏区民歌《土地革命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2]

这样一来，时空就被我们打通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追溯得更远一些，比如小流氓刘邦人关的“约法三章”。

这里说这么多是想说明，在军队搞政治思想工作并不是毛泽东首创。特别遥远的刘邦咱就不说了，只说毛与曾、袁等人，其中的关联是切割不掉的。尽管有些学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比如胡伟雄，

[1]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建》2001年第8期，第48页。

[2] 李诗源：《从〈大帅练兵〉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歌曲的由来》，光明日报2008年2月14日；张社生：《绝版袁世凯》，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只承认毛泽东“受过曾国藩思想的影响，但不能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爱民歌》之间有借鉴或模仿关系”云云。^[1]不过据我看来，袁世凯的《劝兵歌》源于曾国藩，而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源于曾国藩。因为毛泽东年轻时看好曾国藩，并且喜欢看曾胡治军语录。不管传统是否优良，他继承了，则是一定的。这就是历史！

（七）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对袁世凯及新建陆军的评价

1898年10月27日，我到小站拜访袁世凯将军并参观他的军队。我在他那里住了两天一夜，此间我不但观看了全军的演练，还得以检查了全部的武器装备。我还考察了仓库、服装及粮食供给，熟悉了每个团队的补给状况，仔细查看了全军的月收支……

这支军队有7400人——大多数是山东人。他们与湖南人据说是是中国最优秀的士兵。……阅兵场上士兵们异常灵活整齐，健美无比。……应我的请求将军指挥他们不断变换队形，随后又在附近的农村进行了实战演习，我觉得全体将士都熟谙其职。军队纪律严明。除了大炮和马克西姆机枪外，所有的装备都很精良。……

将军精力充沛，极富智慧，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还是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绝对忠于朝廷。他为祖国的前途深表忧虑，认为除非朝廷采取某些措施自保，否则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其土崩瓦解。……

如果所有的中国将领都像袁世凯那样，他们的军队及财政管理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袁世凯将军把军费全花在士兵身上。他亲自监督给士兵发饷，发放食物和衣服。

[1] 胡为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渊源于〈爱民歌〉吗》

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唯一一支完全合乎西方标准的真正的军队。……^[1]

贝思福的评价，既专业又到位。有这样的评价在，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1] 约·罗伯茨（英）：《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8页。

第五章

维新理念与人不同，怎么就成了假维新？

中日甲午战争的副产品很多：第一，它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部分民众产生了民族主义意识与国家意识。第二，它推动了中国的维新，让部分明智的士大夫在制度层面上发生反思，中国将走向何处去？第三，它刺激了西方国家的贪婪。一个小日本就能从中国身上啃下恁大一块肥肉来，何况我们这些西方强国呢？在吃中国这道菜的宴席上，德国是个迟到者，所以显得更迫切。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山东曹州发生巨野教案，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中国的史书喜欢说德国借口教案侵略中国云云。对于德国来讲，自己国民境外被杀，它再找借口，也不能推卸掉它保护国民的义务。于是，清政府赔钱道歉，并且把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当然了，后面就是借口了，强迫中国签订一个《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山东境内又是修铁路，又是划中立区的。特别是租借胶州湾，让其他国家都红了眼，于是，大家纷纷出手，掀起了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中国这个破船，实在经不起西方如此折腾了。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活，在康有为等激进的革新派的冲撞下，中国终于走向了维新之路。只不过，维新理念的不同，特别是利益的不同，导致了诸多冲突。

袁世凯当然也维新。当时的国内外环境，稍微有些良知、稍具清醒意识的士大夫都在发出改革变法的呼声。这呼声此起彼伏。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改革理念与方式。孙中山是彻底的维

第五章

维新理念与人不同，怎么就成了假维新？

中日甲午战争的副产品很多：第一，它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部分民众产生了民族主义意识与国家意识。第二，它推动了中国的维新，让部分明智的士大夫在制度层面上发生反思，中国将走向何处去？第三，它刺激了西方国家的贪婪。一个小日本就能从中国身上啃下恁大一块肥肉来，何况我们这些西方强国呢？在吃中国这道菜的宴席上，德国是个迟到者，所以显得更迫切。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山东曹州发生巨野教案，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中国的史书喜欢说德国借口教案侵略中国云云。对于德国来讲，自己国民境外被杀，它再找借口，也不能推卸掉它保护国民的义务。于是，清政府赔钱道歉，并且把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当然了，后面就是借口了，强迫中国签订一个《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山东境内又是修铁路，又是划中立区的。特别是租借胶州湾，让其他国家都红了眼，于是，大家纷纷出手，掀起了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中国这个破船，实在经不起西方如此折腾了。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活，在康有为等激进的革新派的冲撞下，中国终于走向了维新之路。只不过，维新理念的不同，特别是利益的不同，导致了诸多冲突。

袁世凯当然也维新。当时的国内外环境，稍微有些良知、稍具清醒意识的士大夫都在发出改革变法的呼声。这呼声此起彼伏。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改革理念与方式。孙中山是彻底的维

架慈禧太后的话，那么，绑架慈禧太后之前，他们首先绑架的是袁世凯。这是一种多么一厢情愿的绑架啊。

为了说明我的意思，这里有必要举一个例子——岳钟琪事件。明朝灭亡以后，明朝一个名叫吕留良的著名学者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收徒教书。后来干脆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内容当然有些反清啦，吕留良死后，有个湖南人曾静，派了个学生张熙，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找到吕的两个学生。四个人见面一拍即合，就谋划着怎么推翻清王朝。

推翻清王朝，无论是从民族角度来讲还是从反对清王朝专制来讲，或从我们纯粹的革命思维出发，都可称正义伟大的事业，至少比上康梁的维新不算逊色。而且他们跟康梁一样，知道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事，也把目光投向了军界。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因讨伐边境叛乱立了战功，正受雍正重用，就想利用岳钟琪反清。他们派张熙登门拜访，是不是像谭嗣同那样，大半夜摸去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张熙是这样劝说岳的：“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岳钟琪：“这话从哪儿说起？”张熙说：“将军姓岳，是南宋岳忠武王（就是岳飞）的后代，现在的清朝皇帝祖先是金人。岳王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正是替岳王报仇的好机会。”最后的结果是，岳钟琪从张熙嘴里套出全部情况，把他们一窝儿全告发了。

你说岳钟琪该不该告？

当然该告！凭白无故的，几个二杆子怎么就把人家圈进这种是非中去，干这种全家抄斩的事儿呢？而且这种事注定是弄不成的，与其等着你们事败后揭露人家参与密谋，不如人家先把你们提溜过去，否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兄弟我研究历史这么长时间了，真还没见过这么半吊子的策反者。岳飞死得再冤，也是南宋内政问题，

跟人家金人有何干系啊。再说了，即使与金人有干系，这些人也还弱智，这与人家岳钟琪何干？

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改变这事儿，本不是袁世凯的主意。你再认为自己正义，这正义也仅限于你们密谋者内部。袁世凯没有参与你们的百日维新，更没有参与你们的核心会议，凭什么赌命的时刻，把人先押出去了呢？哪有把人当了赌注，过后反怪人家的自保与急救措施不地道呢？

5.1 康有为来了，快跑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给大清以极大的刺激。当然这种刺激也可以称作教育。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时曾这样表达过：

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1]

[1]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60—461页。

毛泽东在多种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这种意思对大清同样适用。维新高潮时期，日本的维新之父伊藤博文访华，康有为前往拜访，讨要变法良策。伊藤曰：“贵国欲变法，要先除自尊自大陋习。世界不论何种人，皆生长天地间，岂彼贱我贵，可以自称中华而称他人皆夷狄乎？”康有为回答说：“此种议论，敝邦四五年以前人多持之，甲午以后，大梦为贵国警醒，已无复如此者矣。”^[1]

康有为虽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说出“感谢”二字，但是把对方当训导的意思，则是共通的。

在此之前，大清的教员很多，有英国，有法国。但是教育成效不是很好。被教育者素质太低，很迟钝，这是关键原因，也是内因。但是外因也不可忽视，这主要跟教育者的教育手段、教育作风相关。第一次鸦片战争，堪称天空中飞来一只小鸟，空气中甚至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所以被教育者没有感觉，该干嘛干嘛。第二次鸦片战争，可谓天空中飞来两只小鸟，在圆明园的上空拉下了一溜鸟粪，所以大家有了一点感觉，弄了个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斜刺里杀出一把东洋战刀，不但在天朝的脸上，甚至在天朝的心里割下了滴血的伤口。大家终于有了痛的感觉，不管是士人还是官员，甚至是皇帝与皇太后，都认为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活。但具体怎么变，怎么活，变活的性质、范围、路径、程度、节奏以及领导权等方面，他们并没有统一的意见。

事实上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就一直暗流涌动。只不过，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坚冰亘古久远，思想界始终无法产生余英时先生所谓的“哲学的突破”。这方面，我觉得林则徐最有代表性，值得解剖一下。正如蒋廷黻先生所言：

[1] 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1] 所谓的默而不言，就是既不给最高执政者诉说，也不在社会的公开层面上诉说，仅仅限于朋友之间的窃窃私语。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林则徐被贬后，在“效力赎罪”的祥符河工工地上，致友人戴纲孙的信中说：“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口门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果能亟筹船炮，速募水军，得敢死之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费虽若甚烦，实比陆路分屯、远途征调所省为多。若誓不与之水上交锋，是彼进可战，而退并不必守，诚有得无失者矣。譬如两人对弈，让人行两步，而我只行一步，其胜负尚待问乎？”说完后嘱对方“勿为异人道也”。^[2] 一年后，在致另一友人吴嘉宾的信中，林则徐再次谈到中西的差距，说对方“目无中华”，“所向无不披靡”，而我则“千疮百孔”，无处“可以解严”。说完后嘱付对方：“惟祈密之，切勿为外人道也。”^[3] 同年，赴贬谪之地伊犁的途中，在兰州致书姚春、王柏心，第三次谈到中西差距：“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

[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2]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0—3561页。

[3] 同上，第3568—3569页。

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矣。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说完后交待：“两位先生非亲军旅者”，我“亦正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1]

林则徐的这种作为，很让蒋廷黻先生看不上，严厉批评曰：

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2]

蒋廷黻先生不知道，中国的士大夫，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官员，从古至今，是不能公开言说外国制度与文化是超过中国的。否则就有被骂成汉奸的危险，比如琦善和耆英。当然他更不知道，就连他自己，都会因为这种批评而影响自己的清名，被牟安世先生骂作是“拾人牙慧”的“中国买办学者”。^[3]

[1]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6—3587页。

[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3] 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160页。

总之，在中国，做个真正的爱国者很不容易。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者是由于英法联军打到了北京，火烧圆明园，让咸丰皇帝与同治帝他娘，也就是大清后来的女主慈禧太后深感逃窜的狼狈及园子被烧的屈辱；二者咸丰他弟、恭亲王老六奕訢因留守北京，与鬼子打了很多交道，既受了惊吓与屈辱，还明白夷人就是比自己强。所以在慈禧太后及奕訢的支撑下，大清开始了洋务运动，林则徐所谓的学习夷人船坚炮利才提上了议事日程。洋务运动期间，冯桂芬、郭嵩焘、王韬等先行者就发现，中国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西方的器物；相反，制度与思想也应该拿来学习。问题是他们的思想既不成熟、系统，社会更不接纳他们。一句话，他们在中国这个停滞的老大帝国里稍走几步就太超前了；而后面黑压压的人群，被甩得太远，根本看不见先行者，即使看见了，也仅看见些模糊的背影与屁股，导致他们一肚子疑惑与不解。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大一统的社会，伴随而起的副产品，必是思想的大一统。所以，先行者更容易被社会视为异端，民众没有蜂涌上去踩你，就算不错的待遇了。

中法战争期间，在清流派的叫嚣下，中国开始出现所谓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或曰爱国主义精神。在此之前，中国人是没有这种精神的，或者曰，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精神。正如麦高温所言：“中国人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走出国门了，……他们生性狭隘，只愿意与自己有关的人打交道，以至于失去了对较大范围内的人的爱，他们完全没有爱国主义精神。”^[1]当然，清国百姓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们凭什么爱这个国家啊。是的，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纯粹的利益上，大清的百姓与他们的政府，从来就不是一个共同体。所以，中法战争期间，清流派的出现，当是中国的一个新生事物，他们维

[1] 麦高温（英）：《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时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 页。

护国家利益，更有井喷似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由于对世界大势的认识有限，对自身认识也有限，所以他们把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人事的原因，比如李鸿章的投降主义。

甲午战争之后，虽然还有一些人把中国的失败归之于李鸿章的投降，民间甚至传说李鸿章的侄子做了东洋的附马。但是，对于制度与思想的叩问，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思想潮流，以康有为为代表，中国思想界异军突起，高歌猛进。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广东南海人。祖父做过训导，乃八品学官，教育局工作的；叔祖父做过广西巡抚，封疆大吏；父亲做过候补知县，后备干部，不幸早死。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康有为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主旋律教育。据说五岁就会背唐诗百首；六岁时开始接受正规的私塾教育；七岁的时候就能写文章了。被家族中的叔伯父辈们誉为“此子终非池中物也”，^[1]邻人更是目之为神童。

少年时的康有为在与士人的交往中，动不动圣人长圣人短的，于是被乡民外号曰“圣人为”。康有为很高兴，“此后自视更高，对诸生有霸视之气”。^[2]

不过神童科考起步就不顺利，考了三次，16岁才考上一个秀才（监生）。就这秀才似乎还是打了折的，因为有人考证他这秀才不是考的，而是买的；还有人考证他是个荫监生，就是说，不是掏钱买的，而是因家庭原因得来的。清制，一是父亲官职达到一定级别，可以有一子不经过考试获得监生资格，叫作恩荫；二是父亲殉

[1] 何一民：《维新之梦：康有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2] 同上，第18页。

了国难，也就是做了现在所谓的烈士，可以有一子不经过考试获得监生资格，是为难荫。看样子，初始文凭跟袁世凯一个水准。

康有为于 19 岁时（1876 年）在广州第一次参加乡试，失败。三年之后（1879 年）再考，又失败。这年他去了一次香港：“览西人官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1]他服了，复阅《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并开始购地球图及西学之书。再过三年（1882 年），可能是不好意思了，他换了个地方，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当时广东人乡试可在两处参加。一在本籍广州，而成绩较优秀的秀才（监生和贡生），则可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问题是易地考试也不行，还是名落孙山。从北京南下的时候，他浏览了南京等名城，同时也浏览了上海等新城。在上海，他再次受刺激了，那就是上海的繁华，让他“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2]儒家土子就这样被西方文化勾引了过去。

1885 年（光绪十一年），康有为 28 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失败。这一年，中法战争结束。三年（1888 年）又过去了，康有为又在北京考场出现，失败。截止到这次，五考五败了。这一年，康有为在北京拜访世交、军机大臣兼工部尚书潘祖荫。老潘接见了这个世侄，但是对于他的改革建议一点也听不进去，送他一些盘缠（据说是 8 两银子），就把他打发走了。康有为认为老潘没有听懂自己的意思，又给老潘写信，但是老潘一字未回。这让康有为很失望。于是他又瞄上曾做过同治帝师、时为体仁阁大学士的理学大师徐桐。徐桐是晚清老顽固的形象代表之一，见了洋人以扇蔽面。

[1] 《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5 页。

[2] 同上，第 116 页。

自己的学生中，有谈西学者，拒绝让他们进入自己的府门（这一点倒是跟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大师陈寅恪有得一拼。只不过两人的境界，一个地下，一个天上）。所以康有为的求见，只能是自取其辱。康有为又采取写信的方式，徐桐干脆把信原封掷还。于是康有为又瞄上了曾纪泽。曾纪泽乃曾国藩长子，做过中国驻英、法、俄等国的公使，思想自然开明。收到康的信后，主动到南海会馆拜访了康。但效果了了。中国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构架，不但一个官僚不能有所作为，就是官民之间也不能良好地沟通。其后康有为又给光绪帝师、时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写信。老翁才不能放下架子见他一介布衣呢。总之，康有为的行为在京城引起了轰动，士大夫看不起他，认为他忒狂妄，弄不清自己是老几。康有为一怒之下，老子不跟你们玩了，老子直接给皇帝与皇太后上书。是谓第一次上书。这次上书，康有为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点建议。为了说服皇帝，他还拿日本做了对比，认为“日本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不敢待”。而中国的条件，比日本好多了：“以中国之方之大，物产之盛，人民之众，二帝三王所传，列圣所构，人心之固，加以皇太后、皇上仁明之德，何弱不振哉？”所以他像个算命先生一样断言中国“变法则治可立待也”。如果需要详细时间表的话，那么“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耻不难矣”。^[1]

按照清朝体制，专折奏事是高级官员的特权，局限于少数王公、四品京堂以上的廷臣及封疆大吏们。地位较低的官员只能呈请大吏、堂官代奏。康有为布衣上书，不在其位谋其政，或曰庶民干政。再加上他那内容，保持了他从小就被家庭环境养就的傲视群雄

[1] 何一民：《维新之梦：康有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之气，大清哪个官员敢替他上啊，所以到处吃闭门羹。当然，傻大胆还是有的，那就是国子监祭酒盛昱。当然他是设法找人代奏。他先找到了翁同龢。翁认为康有为太过二百五：“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1] 盛昱又找到都御使祁世长，祁世长同意代奏，与康有为相约到都察院。可是到了那一天，祁世长却说自己在去的车上流鼻血，没法去，所以打道回府了。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就这样流产了。但对康有为来讲，则是一次成功的行为炒作。仅上书本身，在天朝的历史上就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所谓的诸子蜂起处士横议，对知识分子来讲都是两千年之前的传奇了。从明朝开始，皇家就给读书人定下了规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谁敢关心国家大事，并给皇帝写信啊。

翌年（1889年），可能是光绪大婚的“恩科”吧，康有为又在北京考棚出现了，还是失败。

从1876年（光绪二年）至1889年（光绪十五年），十几年的时间，康有为六考六败（幸得心理素质好，否则早像洪秀全那样精神分裂运动上啦）。上书递不到皇帝手里，而且京师谣言一日甚似一日，说康有为马上要惹祸上身了，南海旅京同乡甚至要撵他走。失望之余，他一度萌生去国之志，赴美洲求学，或往巴西移民，想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在这人鬼世界里继续忽悠。不过，他另有想法了。他估量当时的形势：“非别制造兴国之才，不足以救国”；“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2]

1890年（光绪十六年），康有为举家迁往广州，在曾祖父康氏鹏（字云衢）留下的云衢书屋开始了讲学生涯。估计是上书皇帝的

[1] 何一民：《维新之梦：康有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2] 同上，第76页。

原因，广州学海堂的高才生程千秋慕名拜访了康有为，并且成了康有为的开门大弟子。过后程又把自己的同学梁启超忽悠过来。是时，康有为是个33岁高龄的老秀才，梁启超是个18岁的新科举人（1889年乡试中式）。据梁启超事后回忆：“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数百年之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竟夕不能寐。”一句话，小启超晕了，从此退出了学海堂，尽弃所学，师从康秀才，一切从头学起。用他自己的话说：“生平知有学自兹始。”^[1]

在程千秋与梁启超两位高足的帮助下，1891年（光绪十七年），康有为移居广兴里，正式挂牌创立书院，是谓哄传海内外的“万木草堂”。从万木草堂创办（1891年）到戊戌维新（1898），八年时间，称得上康氏学生或者门生的，大约千人，也算得上桃李满天下了。

康有为36岁时（1893年），家人逼迫他参加乡试，这次终于“中举”了。中举之后的康有为，继续在“万木草堂”教书。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携梁启超上京参加会试。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4月22日，康梁联系81位广东举人上街，向大清当时的信访办——督察院递交了请愿书。康有为之后，京官与在京的士子们掀起了上书热潮。康有为一看人气可用，遂联系更多的举人签名，最多达到一千多名，大家在督察院门口进行了现场演说。说到痛处，涕泪交流。台湾籍举人罗秀惠更是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一整天。康有为决定进一步扩大炒作，用了一天两夜的功夫，

[1] 何一民：《维新之梦：康有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写了 1.8 万字的请愿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一系列的富国养民之主张，意欲联合 18 省的 1300 名举人进行大集会。集会地点定为北京宣武门外达智胡同 12 号的松均庵，日期定为 5 月 1 日至 3 日。因为传说 5 月 8 日是马关条约盖玉玺的日子，所以预定抢在马关条约用宝前四天，即 5 月 4 日去都察院投递。5 月 1 日，举人们来得不少，人山人海。康有为发表了演讲，声言不变法国家必亡。演讲完毕后，请大家在请愿书上签名！5 月 2 日，举人们仅来了十几个。康有为本来以为，这天人会更多呢，没想到政府比他更会动作：第一，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连夜派人去给这些考生做工作去了，要大家小心功名前程，考榜马上就要发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听这层，立马老实了。第二，在这一天的一大早，慈禧太后在孙毓汶和李莲英的忽悠下，给马关条约盖上了玉玺。孙毓汶忽悠的是：日本不耐烦了，数日之内必破京师。我们都上有老下有小的，可不敢孤注一掷啊。李莲英指着地图告诉太后：台湾不过豆大一点儿地，割之无妨。老太后估计不懂比例尺啥的，就把自家的那粒豆豆赏给日本人了。士子们一听皇上和太后都批了，就泄气了。有些人干脆把自己的签名档要了回去。5 月 3 日，康有为自己都没来。据说有人提前告知他考试结果了，中了进士，排名第八。当时谣传说，谁再闹就取消谁的前程，所以康有为就不来了，不能影响前程嘛！总之 5 月 4 日的集体上书根本没弄成，流产了。

这一切成了历史书上康有为领导的著名的“公车上书”。所谓的公车，乃古代官车，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以“公车”为入京应试举人之代称。所谓的著名，是说历史评价与社会影响，特别是现在的历史书，往往对这段历史浓墨重彩，叫学生读得荡气回肠。至于影响，则是美国驻京公使田贝向康有为索去了这份上书，之后不胫而走，刻遍天下，连光绪皇帝都看到了。但仅就当

时的活动本身来讲，则有些虎头蛇尾，所谓的一千多人联合上书之事纯属鸟有，联合签名还差不多。参加松筠庵集会者虽有 1300 名举人，最后《公车上书记》附录的题名录里仅存 603 名；至于联合上书，仅是 81 名广东举人那次而已。这就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

但康有为还是有收获的。第一，他中进士了。由于离经叛道的思想及政治变革的忽悠加之个性上的张狂甚至追求功名的四处拜谒，导致康有为在帝国官员心目中早就是个臭名昭著四处招摇的老骗子了。所以这年的主考官、大学士徐桐专门跟副考官们通气说：批阅广东试卷时一定要仔细，考得最好的那个肯定是康有为，一定不能录取。结果当然如他所愿，广东考生中，写得最漂亮的试卷被考官们拿下了，但是最后眷录进士名单时，考官们集体傻了，里面居然还有一个康有为！什么原因呢？事情错就错在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身上，这学生与老师同场考试，那文章写得比老师漂亮多了，由于是糊名眷录改卷，所以被弃录者，正是梁启超！梁启超从此再不参加科举了，学生的前途就这样被老师的臭名声给牺牲了。但侥幸考上的老师并不幸运，在接下的殿试与朝考中，考官们严防死守上了。所以康有为最后仅得了一个六品小官：工部主事。第二，康有为好歹能以进士的身份兼工部主事的职位上书了。5月 29 日，康有为第三次上书，也就是把第二次上书改了改，“拒和”“迁都”不再提了，光说变法，提出了富国、强民、教士、练兵等主张。这次上书与前不同，由于康有为成了有身份的人，所以都察院没法拒绝，代递军机处，军机大臣翁同龢直接传到了光绪手里。据说光绪读后甚是满意，要求抄录三份供太后、各省督抚及自己阅看。据黄彰健先生所言，他疑心此乃康有为信口开河而已。^[1]但是不管怎么

[1]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4 页。

说，光绪从此倾心上了康有为。只不过皇门森严，官路漫长，他要见到康有为，或者康有为要见到皇帝，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距离第三次上书一个月之后，6月30日康有为第四次上书，正式提出“立科以励智学”，“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特别是后一条，他提出了五条具体措施：下诏求言；开门集议；辟馆顾问；设报达聪；开府辟土。问题是这次都察院不给代递了，说你是有衙门的人了，应该找你们工部堂官代递啊。于是康有为找上了工部尚书孙家鼐。但由于工部侍郎李文田的反对，孙家鼐也不好意思给他转奏。于是康有为再找都察院，都察院还是不收。最后袁世凯替他上递督办军务处，让荣禄给挡住了。这让急性子的康有为很失望。他不知道，帝国这条大破船，想侧个方向都很难，别说转航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耐心。英国传教士麦高温说过：“东方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拖沓风气，它对人的性格会产生微妙的影响，即使是那些精力旺盛的西方人，在这里呆不了多久，也会感到自己的脚步变缓，干起事来也有一种拖拖拉拉的倾向了。”^[1]

嗯，中华帝国就是条大破船，不拖拉就会散架。李鸿章曾经发过牢骚，说大清是破旧老房，自己就是个裱糊匠。不过酒桌上更会以安徽老表的底色显露风采：

鸿章隐窺朝廷之旨，惟在求好，偷安旦夕，……尝于席间对客曰：“苟延之局，何必认真。”客作色曰：“傅相安得为此言。”举酒笑曰：“谬耶？罚酒一钟。”^[2]

[1] 麦高温（英）：《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2] 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6—467页。

酒桌上，李鸿章想说两句真话，客人还不让，所以他只好自罚了。明白人都知道，大清这条破船，快速转向，肯定要散架；慢慢拖拉，也要散架。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康有为不管这些。常言说，急病遇上个慢郎中。可康有为一来，大清就是慢病遇上个急郎中了。

5.2 袁世凯腿短，没跑

康有为第四次上书期间，具体来讲是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的7月，袁世凯由河南老家来到了北京。一进北京，就结识了康梁二人。8月，袁世凯受到光绪皇帝的亲切接见。接见之后，袁被任用到督办军务处差委。这个时候，袁做了几件事，一是给光绪皇帝上自己的政改万言书；二是想把康有为的一份万言书递给负责督办军务处的荣禄，未遂；三是康有为的北京强学会开张，袁世凯捐款五百金，还发动别人捐款，为建立报馆、图书馆做准备，与康有为讨论开设书局之事。

这个时候，不只是袁世凯，天朝的有识之士都在活动。一者是《马关条约》的刺激；二者是公车上书的影响，官僚改革、士人组社与庶民间政的风尚与倾向风起云涌。从官僚方面来讲，聂士成、孙家鼎、张謇、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甚至李鸿章都受了改革思想的感染，他们知道，不改不行了；从太子党方面来讲，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等高干子弟也都倾心改革，他们也知道，不改不行了。

问题是，咋改呢？正如马士所言：“在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像

中国领土这样广袤，人口这样众多，而又同隶于一个政府之下的国家——没有一个拥有它的面积和人口十分之一的国家——曾经遭到这样—连串的侮辱，或这样多的受人歧视的证明。……可是我们更不妨说，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在纠正行政的公认弊端方面，或在组织由具有许多优良品质的坚强民族居住着的一个极其富庶的地区上的资源方面，表现过这样的无能。有一些爱国的中国人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但是，虽然有很多人认清局势中的事实，但是想得出办法的却寥寥无几；而且那寥寥可数的几个人，在国家陷入更深的屈辱以前，对于国家发挥不了任何作用。”^[1]

马士说得太客气。用我的普通话翻译一下，那就是：清政府挨揍还不够，爱国者还站不到政改的中心位置上去。因为中国真正的政改，启动于八国联军进中国之后，而不是甲午战后的现在。现在，康有为是霸王硬上弓，上列那些高干及高干子弟，也仅仅处于春江水冷鸭先知的状态。体制的限制和路径依赖的锁定，导致他们也顶多是推动一下康有为的活动。

这其中推动最有力者，乃帝师翁同龢。翁原先不搭理康有为，可是在看了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后，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不但主动登门拜访，还跟康有为说了些“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之类的心窝子话。帝师为什么突然改变态度呢？小儿没娘，说话长，咱简单些：第一，翁同龢原本是帝国的保守分子，对外国及洋人持敌视态度。问题是作为光绪帝师，作为帝党领军人物，不管是中法战争还是中日战争，他都是主战的核心人物。现在，发现帝国既不是法国的对手，更不是小日本的对手，他总得有所动作。第二，宫廷

[1] 马士（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政治斗争的需要。明知道天朝需要改革，那么谁抓住改革的主动权，谁就算抓住了政治的主动权。而且老翁不只争自己的主动权，他还得为自己的学生、可怜的光绪争些主动权。所以，他走近康有为，最简单的动机就是给自己的帝党阵营补充新鲜血液。事实上帝师一走近康有为，就与光绪合谋搞了些新政措施。但是各地督抚推说没法执行，且一执行，人心先就乱了云云。再加上慈禧太后出面干预了。所以光绪与翁同龢只得暂停。一句话，时机依然不到。

政改没法推动，那就推动其他吧。由于官场人士与高干子弟给康有为提供了强大的人脉、地脉及钱脉，所以他们首先组织了北京强学会，又名译书局、强学局或者强学书局。光绪亲信、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光绪帝师、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给它固定经费并给它拨出了一部印书机；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房屋作会址；其后复由直隶总督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两银子；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中的宋庆等军界精英，亦各捐数千银子；因签订《马关条约》而声誉受损、被贬到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也拿出了两千两银子，没想到康圣人缺少统战意识，认为李鸿章名声太臭，拒绝了这笔款子和这个老成的政治家；这个时候，袁世凯还没有接到小站的任命，在维新的官僚阵营里，还是无名小卒，但却与自己的好友徐世昌一道做了强学会会员，捐的是五百金。当然，江湖义气的他，还替康有为上书督办军务处了，只是荣禄没有接受而已。

北京强学会发展得太好了，连清议派领袖李鸿藻都参加了进来，而康有为呢，实际领导权掌握不住，顽固派还净给他制造飞短流长，于是在他的劝说下，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另往上海发展。上海强学会的宣言，虽由康有为起草，但却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经费主要由张之洞赞助；章程由张的幕僚梁鼎芬和康有为共同拟定，

规定：“入会诸君，原为讲求学问，圣门分科，听性所近。今为分门别类，皆以孔子经学为本”，“到局之后，倘别存意见，或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者，恐与局务有碍，即由提调董事诸友公议辞退”。^[1]看来，张之洞作为一个老成的洋务派大员，对于维新仅是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控制，免得康有为像脱缰的野驴那般，一路狂奔而去。比如张之洞曾要求康有为不要再提他的《孔子改制考》了，并且为此可以供他一切费用。但是康有为拒绝了，对梁鼎芬说：“孔子改制，大道也，岂能为一两江总督的供养而作为交易。”^[2]于是，康有为不但跟张之洞拧巴上了，还真一路狂奔上了。北京强学会期间，他令得意弟子梁启超主编《中外纪闻》。虽然影响还不够很大，但它是维新派的第一张报纸。上海强学会成立后，他又令梁启超主办《强学报》，居然不用清朝纪年而改用孔子纪年，按皇家法律，这是谋逆造反。张之洞大怒。就在这当口，老张听说北京强学会出事了，被老太后关了。于是他马上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两地的强学会全部烟消云散。康有为南下广州，又教上了他的书。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在华洋人也特别关注强学会。英美公使分别赠送书籍和地图册。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更是与强学会迎来送往，宴会聚谈。当然，说风凉话的也有，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法国公使施阿兰讨论说：“我不以为中国觉醒的时刻已经到来。在我看来，中国似乎更像一个从睡眠中醒来的渴睡者，不久即将重新进入梦乡。它的醒来不过是为了翻个身，从左胳膊转向右胳膊而已。”^[3]

[1] 《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2、393页。

[2] 何一民：《维新之梦：康有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3] 施阿兰（法）：《使华记（1893—1897）》，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82页。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期的袁世凯像。

李鸿章逝世后，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翌年改为实授）；袁世凯受命进驻天津，创建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后清政府筹办新政，成立“督办政务处”，袁世凯又兼任参予政务大臣、练兵大臣。他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即北洋军。

虽然施阿兰与赫德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中国彻底觉醒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是赫德这个老中国通更了解中国。中国确实还要继续睡，它好像一直缺觉似的。用旅德华人学者鸽子的话来讲：中国如同服了过量的安眠药，沉睡得太死。而西方像是服了过量的兴奋剂，躁动不安。^[1]

之后，康有为组织的其他学会再也没了强学会当初的脉气。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缩小可能存在的敌人，这才是干事的真经，也是统战的宗旨，可惜康圣人在狂人的路上奔得太猛，还没走向正轨，就老想出轨。他的学生梁启超与张之洞的亲信汪康年在上海继续合作，办《时务报》宣传维新，他还遥控人家，一定要用孔子纪年。但是梁启超的同仁们都反对，就连梁自己都认为创办《时务报》“乃八十老翁过危桥”，^[2]实在不能再出格了。康有为这才作罢。相形之下，袁世凯的改革主张就稳健多了

前面说过，小站练兵之前，袁世凯给皇帝上了份政改万言书，也就是所谓的《尊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万言书中，袁世凯首先论述了当时形势与变法的必要性：“窃维天下大势，递变而不穷者也。变局之来，惟变法以应，则事变乃消弭于无形。此次军兴失利，势诚岌岌，然果能中外一心，不忘仇耻，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不过十数年间，而富强可期，是亦更始之一大转机也。”“顾说者谓：我国声名文物，远驾他邦，何必舍已从人，轻更古制？不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应恪守我法，而富国强兵之道，彼已久著成效，势不得不参用各国新法，择善而从。试观三代之际，行井田，设封建，秦汉而后，农政钞法，兵律官制，迭经更易，降至今日，旧制

[1] 鸽子：《隐藏的宫廷档案》，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2] 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4页。

所存者，百难一举。以汉宋大儒名臣，亦不能强违时势，追复三代成规，盖因时制宜，人心运会，有必不能相沿者也。”之后的具体建议更是包罗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按骆宝善先生的评价：“从其全部内容来看，办法之设想，改革之主张，虽不无摭拾时贤所论之处，但其注意之广泛，对局势观察分析的深刻程度，比着时人的许多论著，乃至康有为著名的公车上书，都毫不逊色。”^[1]孔祥吉先生更是打抱不平地评价曰：“长期以来，不少论者由袁世凯后来的表现，推论其早期与康梁等人的交往，往往谓其伪装维新，将其参加强学会等活动，称之为投机行为，虚假地赞成变法，其实这种评价并不十分确切。”“袁世凯讲得非常明白痛切，他是衷心地赞成变法的，他不羡慕三代成规，而主张因时变通，并认为这是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这些论说与康有为当时的一些变法奏议比较起来并不逊色。”^[2]

小站练兵之时，繁忙的工作之余，袁世凯还坚持参加天津的维新活动。这个时候，他的基本政治态度就是改革。他说：“国政腐败，必须积极变法图强，方能有转机。”^[3]一句话，人家不是装的，人家是真心维新。可以说除了徐桐那样的老顽固，甲午战后主事的官僚们，没有一个不想着维新的。只不过对于一个嗜睡的恐龙，不加重些刺激，它是没反应的。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刺激又来了。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其他列强紧随其后，英国要租威海卫，俄国干脆派军舰占领旅顺、大连湾，法国要租广州湾……由此引发中国新一轮的民族危机，维

[1]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118页。

[2]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95页。

[3] 张华腾：《袁世凯与近代名流》，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新变法的声浪也随之高涨。这让在南方又是教书又是写书、又是办报又是移民的康有为再次激动起来，他放下手头的一切，重新北上了。第五次上书清帝，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在这次上书中，他还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

伴随着康有为上书的高潮，袁世凯也在用自己的门路影响当权人。这个时候，他已经被提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但仍没有直接向光绪皇帝上书言事的资格，只可上谢恩、接印等例行奏报的折子。所以他选择给翁同龢上书，这就是著名的《上翁同龢变法说帖》。为了说明袁世凯变法的诚意与变法的见识，有必要全文展示一下：

谨陈管见。窃维自古之天下，不能无非常之变。遇非常之变徒
譖譖焉蹙额疾首，诿为时数之适然，而日听其陵夷衰微，不肯破胶
固拘墟之成见，急起变法以应之，恐卒至于束手待毙，而不可就药
也。

今之时局，可谓极非常之变矣。德人以三巨舰闯入胶澳，据为
己有，设巡抚以镇之；又遣其亲王济师，是不但显无退志，恐彼亲
王到后，更不知有何变局。山东滨海要地，介居南北洋之中，使他
族逼处，则海道有隔绝之患，我之海军，势将永不克振。论者谓：
中国贫弱，不堪用武，亟宜阴嗾他国，兴师助我，当可驱逐德人；
抑或商准各国，开口通商，即公处胶澳。此恐未能嗾群雄之斗、饱

[1] 何一民：《维新之梦：康有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群夷之欲也。何者？俄、法向有密约，英、倭近复缔交。四国各有党援，势若分成两敌，以德之中立也。于是，彼四国者，莫不视其向背，以为轻重。夫彼方重之，即安得而背之？虽俄人与我关系较重，睦谊较敦，然亦唯利是视；又岂肯舍公法局外之例，爱我仇德，使德、英合谋，增树勍敌，以自治伊戚也哉。是诚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夫俄已俨然认东北数省入其版舆，英复隐然视大江南北在其掌握；倭窥浙、闽，法图滇、桂，鹰瞵虎耽，各奋得时则驾之志。德人既发难于先，诸国将效尤于后，沓来纷至，群起而与我为难。数年前，西人有瓜华之谣，并具图说，遍传五洲，以今日时势揆之，似此谣不为无因，此诚可危之甚也。且夫我之忍尤含垢，降心俯首以相从者，不为不至矣，而人初不之怜也。既力遏势禁之不能，复理谕情动之不可。若复蹈常习故，不知变计，拱手坐视，听客所为，彼亦公然不让，择肉而食，长蛇封豕，肆其贪残，吞噬之余，所存有几。窃恐海疆日蹙，而关税之征，盐漕之入，向所资以裕帑藏充度支者，一旦攘夺殆尽，而举不复为我所有。区区弹丸，何以立国。虽曰积薪厝火，尚未及燃，而切身之灾，固日忧其近矣。自甲午军兴之后，朝野士庶，凡识时务之辈，莫不争以变法为言。陈事者条说甚详，而饬下各行省遵办者，亦复指不胜屈。乃因仍迁就，迄未有实而见诸施行者。庙堂亦优容勋旧，不加督责，似此变法，终恐未有其期。然而事变迭乘，人不我待，痛切于剥肤，厄甚于倒悬，何可不幡然振厉，以图挽回补救于万一。易曰：穷则变。此其时矣。第于积重之秋，骤行变法之政，兹事体大，碎难毕举，而究其所最要者，如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实属瞬刻不容稍缓。诚就斯三者而实力变革，汰其宿弊，矫其积习，用以培养元气，护持根本，二三年间可望自立；纵不能抗拒群雄，保我全局，而划疆自守，政自我出，犹可多存数千里土地人民，以为异时徐图恢复之计。世凯

虽至愚蠢，亦略知忌讳，何敢妄肆狂瞽之舌，故作不祥之论？第念覆巢之下，讵有完卵，栋折榱崩，孰免倾压。情急势迫，敢不尽言。临颖涕泣，伏乞留意，幸甚。^[1]

怎么样？这帖子让人读得痛快淋漓，感动莫名。读完这说帖，你会恍然发现，河南帅哥袁世凯，果真是好人哇。孔祥吉先生给出的评语是：“袁氏说帖，要言不烦，纲目略备，声情并茂，感人颇深。”

翁同龢给出的批语则是：“论各国情形甚当，变法，空。”^[2]这个自然对头。因为袁世凯的变法主张早在上光绪万言条陈中一一言明，他这个说贴，无非是给当政的翁同龢提个醒而已。而且，袁世凯不厌其烦，你说空，我就再上。于是他第二次给翁同龢上说帖，重说变法：

续陈管见：窃闻德案已结，胶澳议租，扰攘顿息，大局幸甚。惟闻英人有利益均沾之说，南洋各口，未免可虑。或者俄英交相牵制，英未敢先发难端，尚可望其相安，然各国教士，布满内地，中国官民，多未悉洋务，稍有龃龉，动贻口实，借端寻衅，任意侵削，使不隐忍迁就，无以弭目前之祸，使徒遇事忍让，而夷情无厌，又不知伊于胡底，即或联与国，结强邻，冀得一时之安，而人终不能代我受祸。查五洲万国政治法度，率皆随时变革，与日俱新。我中国地大物博，足资富强，乃独蹈常习故，因循泄沓，不克自振，撰时度势，终难自存。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澌灭，

[1] 转引自孔祥吉：《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论述》，《历史研究》1995（3），第104—105页。

[2] 孔祥吉：《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论述》，《历史研究》1995（3），第105页。

近事之效，彰彰甚明。第于积重难返之秋，欲行改弦更张之事，疑信参半，殆不啻筑室而谋之道旁也。且上自庙堂，下逮各行省，欲于崇朝之间，尽革其深锢隐微之弊，亦知其难也。然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纵不能合朝野上下，一一舍其旧而新是图，而切要易行之端，要当及时而力求振作，似宜先遴饬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姑参仿西法，试行变革，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责其所为，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期以年限，专其责成，俟有成规，再迅饬各省循法推广。今之疆臣每曰用人为朝廷之责，理财为户部之责，练兵为将领之责，几若置身事外。抑知近年来政治事权多归疆臣，如疆臣不肯留心人才，秉公保荐，朝廷何得而用之？疆臣不肯清查税课，开源除弊，户部何得而理之？疆臣不肯筹饷造械，严刷陋习，将领何得而练之？该疆臣等身膺重寄，遇事诱卸，而事权又悉属其手，虽有良法美意，奉旨饬行，往往为其所持，无论庙堂如何优勤，如何筹划，而卒归于无济。倘能严饬各疆臣，破其锢蔽之习，认真变法，实事求是，不出十年，可冀自强，五洲各国，孰敢蔑视。即或勋旧疆臣，未便屏弃，固可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至天下事非才不理，断不宜值此累卵之危，使膺国家之繁剧，而托诸优游之岁月，以至误国误民，并误其身，得失利害，较然可见。夫各国之所以富强者，不过用变法之人，行变法之政。我之所以贫弱者，不过用守旧之人，求变法之治。人与治殊，才与事违，以此望治是欲南辕而北其辙也，必无幸矣。前陈管见，未尽欲言，故复续申其略。冒昧妄读，曷任悚惶，伏乞垂览。^[1]

[1] 转引自孔祥吉：《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论述》，《历史研究》1995（3），第106—107页。

袁世凯上翁同龢的这两个说帖，是孔祥吉先生从翁家后人翁万戈手里看到的。他说，本来自己就认为袁氏曾衷心地赞成变法，且认为袁对西法的了解并不在康之下，等看了这两个说帖，更坚定了以前对袁氏的判断，那就是，袁是真维新。

袁不但是真维新，而且他的维新比康稳健多了：康主张变法从中央开始，首在夺权；而袁建议从地方开始，旨在稳推。康后来对着荣禄都狂言要杀一二守旧大臣以推动变法，甚至不惜发动废掉太后的兵变；而袁认为守旧大臣未得屏蔽，要雍容富贵地把他们养起来，以减少人事上的阻力与秩序上的失控……这一切，导致我们不由得畅想：翁老师要是推荐袁世凯搞改革，历史将是什么样子呢？

但是翁老师为什么没有推荐或者重视袁世凯呢？

可以说，袁世凯的说帖根本没引起翁的重视，翁氏日记中甚至只字未提。之后，袁世凯更是亲自登门“深谈时局，慷慨自誓”，并且拿着那张震惊中国的瓜分时局图给翁老师看，希望自己的主张得到采纳，然而仍然没有结果，这让袁世凯失望至极。前引袁世凯致徐世昌“大局无法挽救只好往极坏处设想”的信件，就是此时从京发出的。

相形之下，倒是康有为的上书，惊得老翁一愣一愣的。康有为上书中，最出名的是第二次与第五次。第二次是动静大，弄成个历史事件：公车上书。第五次是胆子大，跟光绪说话也没个谱儿，竟敢拿徽钦二主与崇祯皇帝的下场吓唬皇上，据说读到传抄本的“莫不嗟悚”，康有为所在的工部堂官们也被吓着了，没人敢替他上奏。康有为气馁了，不想干了，又想起了自己移民巴西的计划，所以拜访了正坐冷板凳的李鸿章，李鸿章支持他的计划，但是认为这事须得巴西代表亲自来请求方可。看来老李还是比小康多些国际常识，

逗小康玩儿呢，你想往巴西移民，怎么就不想想人家巴西愿意吗？^[1]我们承认康有为爱国忧民的心思，更承认他的胆识与勇气，不过这个人有时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确实让人跟不上。

按康有为自述，他正准备南下回家的当口，有人来找他了，这个人就是当朝帝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翁同龢说，听说你要走，可不能走啊，我已向皇帝推荐你了！

老翁最后选择的是康而不是袁，为什么呢？

第一，袁世凯就是个练兵的直隶按察使，人微言轻。翁这样的老官僚，看他不起。

第二，康有为先是布衣学子，后是新科进士。虽然同样人微言轻，但是他会炒作，在帝国体制下制造的明星效应，一波高过一波，引得中外侧目。某方面来讲，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会哭的孩子只能饿着。

第三，中国传统，总是两极摇摆式的，不是过分守旧僵化，就是盲目跑步跃进，反正不会好好走路。用姜义华老先生的说辞，乃是启蒙中的理性缺位！

老翁一出面，就好说了。他授意一个名叫高燮的给事中给皇帝写折子，请求皇帝召见康有为这个人才。翁老师在旁表示支持，光绪就通知总理衙门做一下安排，但是为其叔父奕訢所拦：皇帝，这人不是四品以上的官员啊！于是来了个变通的办法：皇上想问康有为什么话，令总理衙门大臣中间相传。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大年初三，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

[1] 详情参见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史林》2007（5）。

理衙门，负责传话的大臣有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和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谈话的结果并不妙。荣禄听不下，半途而退。李鸿章认为康不过是一个“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其他人倒是与康有为聊得尽兴。但最中意的，可能只有帝师翁同龢一人了，他给皇帝汇报：康有为，人才啊。皇帝很高兴，想接见。但再次被恭亲王所阻：皇上还是先让他上变法条陈吧。写得好了，再见也不迟。于是康有为第六次上书，吁请中国效法明治天皇，大举维新，开制度局，起用新人，推行西法，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等等。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依然不改他一惯的圣人凶猛，提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提醒皇上祖宗之地都守不住了，还要守什么祖宗之法？光绪不看则已，一看受触动。认定，康有为正是他要找的人。规定，以后凡这个人上折，即日呈递，无许阻搁。于是康有为又上第七次书。除此之外，康有为还给皇上进呈了他所编写的《日本变法考》和《俄彼得变政记》等。与此同时，康有为与他的弟子在北京与沉闷的旧社会展开了肉搏战。他们组织了保国会，顽固派就造谣说他们保国家不保大清（其实人家也不完全是造谣，因为康有为在见到光绪之前，确实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企图）；他提议废除科举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们恨不得揭其皮，食其肉。由此可见，鲁迅所谓的搬张桌子都要流血之言不虚。理论上，科举本已沦落为对读书人的戕害，但是实践上你改一下，首先对你不满的偏偏是那些受害者。一句话，俺就愿意受害，受害之后才能受益，俺以自虐混饭，谁拦俺俺跟谁拼了。

近身肉搏中，拦着康有为与光绪亲密接触的那个人死了：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5月29日恭亲王走向死亡的这一天，光绪来病床前看望自己的叔父，年老的叔父告诉自己的侄儿：“闻广东举

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也。”^[1]

马士对光绪的评价是：“智力尚未成熟，知识也很浅陋。”^[2]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发展恰恰是恭亲王最不愿意看到的：光绪还真就轻信了广东小人。叔父前脚死，后脚康有为就连续进球了，因为最佳守门员奕訢没了。6月11日，康有为的百日狂赌就正式上演了。演着演着，随手拿光绪与袁世凯一道做了他的赌注！

5.3 杯具啊，就这样成了别人牌桌上的赌注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慈禧是支持变法的。变法前，娘俩还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共识的。变法前，光绪帝找庆亲王奕劻传话：“太后如果不给我事权，我宁愿退让此位，不能为亡国之君。”话传到老太后那边，她的回答是：“他不愿坐此位，我也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说：“太后何必与皇上动怒，圣体安康要紧，不如由皇上去办，等办不出模样时再说。”太后想想也是，于是让奕劻给皇帝传话曰：“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于是光绪兴冲冲地跑向颐和园面见太后，太后曰：“如果可以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3]

一句话，老太后不愁不傻的，变法如果能变出个富强的新中国，她哪里会不乐意呢？

问题是，不论是从康有为的个性来讲，还是从他的变法内容及措施来讲，激起不良后果，是一定的。所以老太后不时的给光绪把

[1] 王树增：《1901：一个帝国的背影》，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2] 马士（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3] 《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

把方向，或曰灭灭火。变法没几天，她就浇了一些冷水，把人事做了如下布局：第一，罢免翁同龢（另有说法，认为翁是光绪打发走的，嫌他阻碍新政），打发他回老家，其职由直隶总督王文韶接任。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任命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驻直隶正定府一带）、聂士成的武毅军（驻天津东北宁河县的芦台镇）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第二，凡任命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得到老太后的批准；第三，老太后秋天要携光绪帝到天津进行大阅兵，检阅北洋军队；第四，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崇礼署布军统领。这样一来，老太后党政军一把抓。完成这些动作后，她对光绪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1]说完便住颐和园里玩自己的去了，光绪只须隔一阵子跑过去，给太后请示汇报一下而已。

所以太后的降温，不但没让光绪清醒，反而让他更烧了。要命的是，康有为还一直在背后加火。6月16日，康有为前来进见皇帝，在朝房里，他碰见了因当上直隶总督而前来谢恩的荣禄大人。一个帝党新宠，一个后党臂膀，双方见面就擦上了火。

荣禄：“以子之槃槃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乎？”

康有为：“非变法不能救中国。”

荣禄：“我也知道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的成法，一旦能遽变乎？”

康有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2]

[1] 《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2页。

[2] 何一民：《维新之梦：康有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224页。

这就是咱的改革家，关键时刻玩二杆子。别说外人，就是自家兄弟康广仁都看不下，给友人写信曰：“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面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康有为当然也知道变法这事儿不好玩，但他为了报答光绪的知己之心，豁出去了。所以他这兄弟劝他：伯兄平时言教，要救地球呢，现在何必为区区中国而牺牲自己呢？^[1]这话说得很好玩，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只康有为自己，他的学生在他教导下，都是一副地球主义者面孔。他的高徒梁启超给康老师的信中就说过：“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2]看来，不是保中国而不保大清，而是中国大清都不保，保世界！当然了，不管保世界还是保一国，保的时候，要恪守底线，那就是：顶多拿自己当牺牲，不能拿别人当牺牲。而且康老兄最后牺牲的是光绪，而不是他自己，这一点，着实让我看不惯。光绪跟这样的二杆子玩，注定要被玩残！

接见过程中，光绪发了牢骚：“奈掣肘何？”一句话，帝国的实权不在我手中！康有为给他出主意说：皇帝既去不掉老臣，不妨提拔新人，破格使用。康有为所谓的新人，当然首先说的是自己。这方面他从来没有客气过！问题是接见结束后，光绪给军机处下达指令，要求他们给康有为安排一个官职，以方便变法，军机处给皇帝的回复是：赏六品，著康有为在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

康有为与弟子们失望至极。皇帝接见前是六品，接见后还是六

[1] 何一民：《维新之梦：康有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49页。

[2] 《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4—545页。

品？明显不符合传统与惯例么：“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1]老太后掌握的是二品以上的任命权，皇帝难道不能给个三品四品么？三品四品不归你批发吗？直到今天，我们也不明白，光绪为什么没给康有为稍高一些的官职。也许，光绪对康有为的看重，更多的是康有为事后的表扬与自我表扬？反正随着历史学者的深入研究，康有为喜欢忽悠的特性已逐渐展露在世人面前。一句话，光绪对康有为的赏识是有限的。光绪也许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借用康的名头，改自己的革；还有，夺自己的权。不管怎么说，康有为都不想干了，叫唤着要离京南下，但最后还是没走。一者，官虽小，但那是光绪给的；二者，既然是光绪给的，那就不是你说不干就不干的，这不是菜市场买菜，人家好歹是皇帝；三者，正因为是皇帝，而且发现皇帝也是忧国忧民的，所以再失望也得干。没办法，谁让咱也爱国爱民呢？他给皇帝写了一个谢恩折，托总理衙门转递。皇帝说，何必代递呢，以后有折可直接递来。同时要求康有为把他所有的著作呈上。这一来，康有为有主意了，面告李鸿章、廖寿恒、张荫桓等总理衙门大臣，俺要日夜编书，没时间去总理衙门上班。大臣们说行，那你就在家编书吧。于是康有为落个不行走的总理衙门大臣章京上行走。相当于秘书不干秘书，在家里蹲着干活。

虽然康有为在家里蹲着，但是光绪的维新措施还是一道道地发布了：政治上，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允许自由办报和组织学会；裁撤重叠闲散机构与冗员，废除满人寄生特权，允许自谋生计；设立邮政总局，裁撤驿站。经济上，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和商会，鼓励商办铁路和矿务，奖

[1] 《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3页。

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节省开支。文化教育上，开办京师大学堂，废八股，改试策论，选派留学生到日本；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奖励著作。军事上，裁减旧军，精练陆军；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社会上，废除女子缠足等。

一百天，仅光绪的新政上谕就下了一百多条，大家招架不住啊。当然，能招架住大家也懒得出手。用刘坤一的话来讲：“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不暇究其所以然。朝廷行政用人，更非封疆外吏所敢越俎，而其责成各督抚者，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1]

更要命的是，这些措施一下子伤害了许多人。比如京师大学堂的章程规定总教习专权，却没有管学大臣什么事，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治校、教授治校，却没有教育部长什么事，你问政府能同意吗？维新党们所上《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就不说了，国会两字怎么念，全国人民还不知道呢。只说裁撤重叠闲散机构与冗员，另开懋勤殿（康党在这方面一直动脑筋，提出了议院、议政局、议政处、制度局等诸多花样，以避同党嫌疑）。问题是大家都在官场混，谁也不傻，都知道康党这是踢开政府官员闹革命，绕开大清现有的政制体制，挤进权力的核心。不只被人理解为六部九卿皆将被废，就连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也都认为自己多余了，或者说以后只有执行的份儿了。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光绪先是一下子裁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衙门，裁掉总督与巡抚同在一处的湖北、广东和云南三省的巡抚以及东河总督；裁掉各省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再后来，因为礼部主事王照上折

[1] 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9页。

请求太后与皇帝一道去外国游历，吓得礼部堂官怀塔布与许应骙给他扣下了，光绪一恼，罢免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为首的六堂官；六品的礼部主事王照越级提拔，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这些人就都找老太后哭上了。在中国，干什么都不能端人家饭碗，中国人混个饭碗不容易，护饭碗跟狗护槽似的。一句话，大家都疯了，“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1] 太后批评光绪曰：“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循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光绪哭着回曰：“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2] 于是，维新党人们冉冉升起，光绪著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虽然只是办理文书的官员，但实权不可小看，所以被人看作是维新四贵。对光绪来讲，这些措施虽然也算新政，但却首先是组织措施。对老佛爷来讲，只能是中国两千年间宫廷内外一直流行的夺政。总之，你新政可以，但是你从组织上拆我的台，提你的人，这不是想架空我让我退居二线吗？按茅海建先生的说法，光绪擅自罢免六堂官并提议开设懋勤殿，从老佛爷的角度来看，“已是两次发动政变”。^[3] 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在这当口，谣言也出来了，说10月份的天津大阅兵，其实是老太后为了兵变，到时候荣禄就把皇帝扣了，另立新帝云云。稍微有些脑子的人，就知道这兵变纯是谣言。老太后脱裤子放屁啊，

[1] 何一民：《维新之梦：康有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2] 《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6页。

[3]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4页。

废个光绪还需要跑天津哇？在北京废，不更方便吗？某些权威史者，经过多番考证，基本否定了天津兵变说，认为这是康党的忽悠。姜鸣先生更是认为，康有为充满了宫廷政变的丰富想象力，“与精明干练、深谙政治运作方式的太后相比，他仿佛是个旧小说旧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1]也许我们更有理由怀疑，这谣言是维新党造的。因为康有为的二杆子作风愈来愈猛，把断发易服迁都改年号等主张都提出来了，已经涉嫌大逆不道十恶不赦了。关于迁都，更是儿戏一般。他要求光绪领着他们几个维新党人跑上海，就地组织新政府云云。变法搞到这般地步，不说个人权势，只说稳定方面，慈禧太后能歇心吗？

一者是太后不歇心，二者是旧党方面，有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诛康梁，说他们大逆不道。确实是大逆不道。康有为自己就是一张大嘴巴，也发现他的党徒们“笔墨不谨”。政变后，政府从康家抄出的信件，中有何树龄一封，云：“注意于大同国，勿注意大清国。……以大清国为开笔衬笔可耳（旁注：知其不可而为之耶？）。……大清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戚兄弟友生耳。”^[2]如果这还算私议、旁人无缘得知的话，那么康的另一个高徒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做教习的言论就被公开抓了现行，他在学生作业本上的批语，说什么读《扬州十日记》，发现本朝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还说本朝轻赋，也不过是大貉小貉而已。^[3]按黄彰健先生的考证，正是曾廉上书，促使了康有为由和平改革向武装夺权的演变。因为曾廉上书（一正折，一

[1] 姜鸣：《被调整的目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2]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3]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513页。

附片)杀伤力太大(主要是附片),光绪未及细看,就给了谭嗣同,让他辩驳。谭抽掉了其中的附片,只对正折做了反驳。但即使这样,也让康党乱了阵脚,除了请皇上诛掉曾廉之外,还动了武装政变除掉太后的心思。诛掉曾廉,为光绪所拦。自己下诏求言呢,刚有一个民间举人上书言事,我就杀掉人家,怎么服天下呢?^[1]光绪拦住了康党请诛曾廉的建议,但是却拦不住康党武装政变的心思。康认为,如果有八千人带兵围住颐和园,事情就OK了。帝国的北洋军队掌握在老东西的亲信荣禄大人那里,但是我们可以从下面忽悠啊。康先是动员维新同党、礼部主事王照前往游说荣禄下属、北洋三军之一、武毅军的统帅聂士成,被王照拒绝。林旭提名荣禄另一个下属、统领甘军的董福祥,谭嗣同认为不可。康有为提议拉拢荣禄最后一个下属、新建陆军统领袁世凯,谭嗣同也认为不可。但是实在没什么人可捞了,而且康有为认定袁世凯是可用之人,所以袁世凯就成了改革派最后的救命稻草。这对袁世凯来讲,真的是天大的不幸:你们赌博,却把人家小命先垫上了!

康有为在捞这根稻草时,还用了最弱智的方式,派自己的亲信弟子、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前去小站现场考察。徐仁禄到后,首先观察到袁世凯非常倾向自己的老师,甚至夸康有为“悲天悯地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于是徐仁禄用小孩才用的方式挑拨说:我的老师与其他同志们经常向皇上推荐您,可是荣禄说您跋扈,不可大用,不知您因何与荣不洽啊?袁对曰:啊,是这样的,原先翁同龢欲增我兵,荣禄说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翁说,曾左也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结果徐仁禄回去汇报说袁这

[1] 《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人已为我们康老师所动，可用。^[1]

说干就干，康有为马上代徐致靖拟了一个密保练兵大员疏，向光绪推荐袁世凯。同时让谭嗣同也递密折给光绪，请抚袁世凯，以备不测，召袁世凯进京，结以恩遇云云。这是康有为新政中最笨的一招——打草惊蛇。不动袁世凯还好，太后顶多叫停疯狂的新政；一动袁世凯，太后就会多心的。别说太后，傻瓜也会多心的。事实上，康党中的王照听说后也认为大事不好：“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为此徐致靖训了王照一通，曰：“尔受皇上大恩，不趁此图报，尚为身家计，于心安乎？”王照回曰：“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人之见解不能强同也。”^[2]看王照的意思，倒算有些自由主义的风采，人之见解不能强同。事后他敢忙补上一折，请皇上任命袁世凯到河南归德府打土匪去，“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3]可惜他动作迟了，而且光绪也没明白他的用意。

9月11日，皇帝命荣禄传知袁世凯来京觐见。当天下午，袁世凯接到消息，感觉事非寻常，立约好友徐世昌从小站赴天津商谈。第二天，徐世昌从小站赶往天津，两个人谈了两次。第三天，也就是9月13日，徐世昌赶往北京先期打探。9月14日袁带着随员前往北京，住进法华寺，徐世昌前来碰头。

9月14日，光绪前往颐和园请训，并在那里住了下来。这次请训的目的，主要是有关懋勤殿，可是太后不答，神色异常。

9月15日，感觉不妙的光绪在召见杨锐时，赐一道密诏：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

[1] 《戊戌政变·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160页。

[2] 同上，第359页。

[3] 同上，第332页。

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指将礼部六堂官革职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1]

这就是著名的衣带诏。也是真实版本，是杨锐儿子杨庆昶保存下来的：政变时杨锐遇难，密诏由其子杨庆昶保存，缝在门生黄尚毅衣领中，扶柩回籍。宣统元年（1909年），杨庆昶与黄尚毅缴于都察院，才为世人所知。事变后，康有为对外出示的密诏则是这个味儿的：“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2]

对比杨氏版本的密诏与康氏版本的密诏，具有很大的不同：赐给杨锐的手诏是令四章京筹商办法，根本没提康有为。而且光绪帝的意思是如果改革太快，惹老佛爷不高兴，自己皇位可能不保。所以责诸位筹商不拂圣意之良策，“密缮封奏”，“候朕熟思，再行办

[1]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530页。

[2] 同上，第538页。

理”。康有为公布的“密诏”中，光绪皇帝既要变法又不想得罪皇太后的犹豫心态被抹掉了，只剩下“今朕位几不保”，“设法相救”的紧急呼救了，并在受诏人名单之首突出地加上了一个“汝”字，专指康有为。这显然是康有为流亡海外之后，出于政治需要对密诏作了篡改。事实上，政变结束后不久，流亡日本的维新党人王照就指出，康所公布的光绪帝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伪作者也”。^[1]今天的学界差不多也确认了这一点。但我们难免奇怪，这至关紧要的密诏仅是发给维新新贵、军机四章京的，连康有为的名字都没有提到。而康有为公布的密诏由于突出一个“汝”字，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可信，梁启超在自己的《戊戌政变记中》又改成了“汝康有为”。总之，不但康自己公布的版本有着诸多差别，就连梁启超前后记载也有着差别。估计师生两个与时俱进，边进边改吧。反正这方面不能完全信他们师徒。

却说杨锐接到衣带诏后，惶恐莫名，揣了三天，一直没有端出来。

9月16日，光绪在颐和园接见袁世凯。期间猛不防问了一句：“苟副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这话问得好生奇怪，皇帝当面问臣子是否会忠于自己。袁世凯未加思考就回答上了：“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2]于是光绪谕内阁，开去袁的直隶按察使缺，以侍郎候补，仍专办练兵事务，并许以专折奏事之权。

面对天上纷纷降下的大肉馅饼，袁世凯很惶恐。四处拜访，问人家这是咋回事，并准备辞去侍郎职务。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王文

[1] 黄彭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544页。

[2]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韶告诉他：此乃特恩，辞也无益，反着痕迹。^[1]

康有为听说袁世凯被皇帝提了兵部侍郎之后，拍案叫绝，以为袁世凯必喜而图报，可以做李多祚，协助他这个张柬之，兵变废后了。我觉得康有为也太小看我们河南帅哥袁世凯了。人家原先是直隶按察使，未赴任的实缺，三品。现在变成了一个候补的侍郎，二品，同样不用赴任，但却从实缺弄成了候补，也就是预备干部。跟手里握的股票似的，理论上升值了，可却是在这种不是时候的时候，享受了一种不明不白的提拔。另外，专折奏事之权，意味着他以后可以隔过自己的顶头上司荣禄，直接给皇帝上奏了。也许，只有康有为这种头不挨天、脚不着地的工部小科长（秘书）和国务院小秘书（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才会把这种击鼓传下来的霉花当作天降喜事吧。塞翁得马，安知非祸？

前面说过这是康有为比较笨的一招——打草惊蛇。而且惊的蛇还不只一条。据有些学者考证，当袁世凯离津北上后，荣禄就感觉有变了，马上调动聂士成的武毅军进驻天津；董福祥军进驻长辛店；并且三次急电总理衙门，说英俄已经开战，兵舰游弋于天津，招袁世凯赶紧回防。但是按茅海建先生的考证，第一，荣禄没调董军；第二，英俄虽没有开战的打算，但中国这方面的谣言确实此起彼伏。因为英俄在远东是对手，军舰来回游弋也是正常之事。也就是说，荣禄多大程度上开始防袁，现在还是说不准的事儿。

9月17日早上，袁世凯入颐和园谢恩。光绪皇帝夸他练兵练得好，办学堂办得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了。

当天，杨崇伊前往颐和园上奏封事，请求太后训政。光绪感觉不妙，发了一明一密两份谕旨给康有为，明谕是：“工部主事康有

[1]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将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试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重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密谕由林旭带出示康：“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的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衷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1]

明谕可以有，但是这个密谕，有些学者认为也不可信。特别是“共建大业”云云，跟江湖哥们儿酒过三巡之后不经大脑拍着胸脯说话似的，一点不符合光绪的语气及身份。茅海建先生论证，这个密谕可能没有，顶多是皇帝的口诏；而且如果真有的话，也顶多是王照所说的那个版本：“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2] 所以前面所引的密谕版本，当是康有为自己编造的。对于老康，我们是不能相信的。就连茅海建这样一个考据高手都害怕康有为，说：“康有为的言论多有夸张自扬之处，须得处处小心。”^[3] 黄彰健先生也说康最懂得“文与而实不与”和“时措之宜”“与时俱进”等等^[4]。所以前面我说康有为来了，快跑，可不是吓唬大家的。康有为当时若是直接遵奉皇帝之命，跑上海办报去了，那么后面将不会发生那么多不幸。事实上变法正紧张的当口，光绪让康有为跑上海考察办报事宜，是有些怪。因此大家都推理上了：有人认为，这是光绪在杨锐的建议下，想用促康离京来缓和矛盾，作为继续变法的妥协；也有人认为，

[1] 何一民：《维新之梦：康有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265页。

[2]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4页。

[3] 同上，第21页。

[4]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自序。

光绪迫于慈禧压力，想以此表白自己与康并没有更深的联系；还有人认为，光绪对康在京过于招惹是非已有不满，想把他赶走，省得整天听他聒噪……

当天，康有为没有见到密诏，林旭来访，未遇。所以康只于晚间回家时看到了明谕。第二天，9月18日一大早，林旭就来了，不但让康看了光绪给康本人的密诏，还出示了另一份密诏：也就是杨锐带出的那份衣带诏。他揣了三天，终于端了出来。一干子维新人士诵读之下，只剩痛哭的份儿了。

不过从那份衣带诏里我们可以看出，光绪甚至未提康有为的名字。但是康有为不管，他要做历史上的张柬之。他派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去了。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的《谭嗣同传》，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很具有武侠色彩：

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



英俊的袁世凯

这张相片应该是袁最满意的，此照上的袁世凯威严又不失英俊，因此，当年袁拿着它到处送人。

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1]

梁启超如此这般的描述，你相信吗？老太后要废光绪，不就是一句话的事，还需要用兵吗？老太后虽然专权，但毕竟也很爱惜自己的名誉。光绪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大失误，她乐得在幕后遥控。袁世凯这样的人，官场上混这么长时间了，只有厚道之心，没有刻薄之迹，不只忠于上司，还忠于职事。你一个谭嗣同半夜前来说几句疯话，人家也就跟着发疯，说什么诛荣禄如诛一条狗？梁启超你是神童，但是也不能把世人全看成弱智！

下面我们再看看袁世凯《戊戌纪略》，也称《戊戌日记》中的描述。

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闻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谓有密语，请入内室，叙寒暄，……谭以相法，谓予有大将格局，继而忽言：“公初五请训耶？”告以现有英兵船游弋海上，拟具折明日请训，即回津。谭云：“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急询其故，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不能救。”予闻

[1] 《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失色，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谭云：“荣某近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予答以在津时常与荣相晤谈，察其词意，颇有忠义，毫无此项意思，必系谣言，断不足信。谭云：“公磊落人物，不知此人极其狡诈，外面与公甚好，心内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仅升一阶，实荣某抑之也。康先生曾迭在上前保公，上曰：‘闻诸慈圣，荣某常谓公跋扈不可用’等语。此言甚确，知之者亦甚多，我亦在上前迭次力保，均为荣某所格，上常谓袁世凯甚明白，但有人说他不可用耳。此次超升，甚费大力。公如真心救上，我有一策，与公商之。”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多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戒，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谭云：“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

历，如显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因谓：“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惊，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谭云：“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朱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予又谓：“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谭云：“可请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予谓：“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虑，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谭云：“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及出示朱谕，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彷彿上之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大概语意，一若四人请急变法，上设婉词以却之者。予因诘以“此非朱谕，且无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谭云：“朱谕存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予更知其挟制捏造，不足与辩，因答以：“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我无此胆量，决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谭再三催促，立即决议，以待入奏，几至声色俱厉，谭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予知其必不空回，因告以“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请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谭云：“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切。”予谓：“既有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待至下月

方可万全。”谭云：“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予谓：“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有我，你可放心。”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予谓：“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谭似信，起为揖，称予为奇男子。予又说：“以我二人素不相识，你夤夜突来，我随带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你为近臣，我有兵权，最易招疑，你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谭甚以为然。又诘以两宫不和，究由何起？谭云：“近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慈圣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相密谋，故意见更深。”予谓：“何不请上将必须变法详陈于慈圣之前，并事事情示，又不妨将六卿开复，以释意见。且变法宜顺舆情，未可操切，缓办亦可，停办亦可，亦何必如此亟亟，至激生大变？”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予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为赶办奏折，请其去。^[1]

两个版本的记载，你信哪个？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写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9日，^[2]距谭嗣同夜访11天，距谭嗣同等六君子菜市口就义1天。也可能正是六君子洒血菜市口让袁世凯产

[1] 《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下册》，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459页。

[2] 按黄彰健先生的推论，日记的写作时间并非如日记所注，当时宣统年间。详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609页。

生了动笔的念头。袁世凯信誓旦旦地保证过其真实性。梁启超的版本，当据谭嗣同转述，梁启超流亡日本后追记，且二十年后坦承他的《戊戌政变记》并非“信史”，因为“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矣”。有意味的是，后世国人与学者愣是不信这些邪，梁启超自己都说不真，我们偏要信；袁世凯口口声声保证真，我们偏不信。宁信梁启超的“感情”说，不信袁世凯的“真实”说。个中原因很简单，袁世凯称了个帝，就被世人认作大伪。世人的逻辑是，大伪之人必无小诚，所以，袁世凯即使说了真话，大家也不认的。现在经史学界多方求证，以下基本是共识了：一、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主要情节可靠，而梁启超有意隐瞒；二、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大多数的次要情节也可靠，仅在少数问题上有掩饰和美化。^[1]

学者的考据不再复述，单从情理上说，谭的行为就让人头大。相当于半夜来个阎王，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这且不说，只说一份密谕都不舍得给袁世凯看，只给人看了一份手抄件，人家凭什么信你呢？历史不能假设，若袁世凯真也跟着他们干了，那么结果只有这么几种可能：一、荣禄一方与袁世凯一方开战，混战 N 年，中国的军阀割据提前上演；二、维新派成功，大开杀戒；三、若按谭嗣同的设想，更吓人。前面说过，这个人的激进可能跟小时候遭遇后娘虐待有关。但是他的激进，也着实太那个了。给友人的书信中，畅想“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不如拿来“分卖”给英国俄国，省得他们争来争去的，咱中央还一直给这些地方倒贴钱。以上这些地盘“不下两千万方里”，

[1] 参见杨天石：《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5）。

如果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那么得的钱，除了偿还日本战争赔款，“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1]所以，大清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可能被他们卖得像日本那样变成一个小豆豆，从此走向富强之路。四、袁世凯成功，建立军政府国家。或者挟光绪以令诸侯，我们河南地盘上，又出个曹操！

9月18日，光绪由颐和园回宫。这天晚上，两头都在发生严重事故。一边是下定了兵变的决心，且绑架上了袁世凯；一边是太后也突然决定，明天要进城，当然她的进城，并不是回宫，而是回西苑。西苑又称三海，即今天的北海与中南海，位于皇宫西侧。太后撤帘后，主要住颐和园，按惯例，如有特殊理由（比如看病危的恭亲王、咸丰与光绪的生日以及咸丰的忌日等）才回西苑小住。回西苑的原因，与袁世凯无关。老太后下决定的那会儿（按茅海建先生的考证，当是晚七点至九点），袁世凯正接待谭嗣同呢（按茅海建先生的考证，谭当是傍晚去，夜半回的）。太后回宫的原因，与御史杨崇伊的奏折有关，杨托庆亲王奕劻递上去的，时间当是9月18日下午。杨崇伊在折子中重点讲了这么几点：第一，珍妃老师、那个已革侍读学士文廷式及康有为等与海外乱党孙中山都是穿一条裤子的。第二，康梁搞的什么南北强学会、大同学会，诱惑士心。两月以来，乱更成法，罢免旧臣老臣。传说皇上要给日本的那个伊藤事权呢。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呢。第三，不知何缘，康被引入内廷。杨崇伊这条指责，含蓄地指向之前的诸多坊言，太后当然也会听说。比如康氏兄弟经常出入内宫，污秽宫闱了；康有为曾进药水，上服后性情大变，急躁异常，并在宫中设

[1] 《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406页。

立礼拜堂啦等等。第四，皇太后，请您老人家即日起开始训政吧。^[1]慈禧知道光绪准备召见伊藤博文的事，而且有关重用伊藤的传说并非全是谣言，因为在此之前，已有一些官员上奏，认为中国没啥人才，旦夕也改不出啥成效。不如重用伊藤，既有利于我们改革，还有利于中日邦交，而且让这人帮咱跟其他国家外交，人家也当刮目相看云云。^[2]另外，在此之前，太后就听说了一个传闻，说康有为和总理衙门大臣主持外交的张荫桓已经跟日本人讲好了，由巡弋在大沽口外的日本军舰派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送上军舰。据说这个计划需要得到伊藤博文的首肯，据说伊藤博文向张荫桓提出的条件是，中国皇帝在接见他时须亲口向他提出这个要求。这个传闻看起来有些邪门，世界上哪有这样公开搞政变密谋的！但是老太后毕竟是道上混的，特明白防人之心不可以没有，害人之心更不可以没有。何况甲午战前朝鲜就发生过类似的事儿，清政府直接把人家朝鲜摄政王大院君逮到了中国。再说了，老太后好歹也是读过些历史的，当年张柬之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迎中宗复位的故事，她也不是不知道。

总之，这些事综合到一块儿，让太后心神不宁，于是临时决定进城。当然她就是临时监督一把，没想到最后会发展到那种地步。因为进城前她就安排好了回颐和园的行程，甚至把之后的中秋三天大戏都安排好了。9月19日下午，太后回到了西苑。路上慢悠悠的，两次休息，两次换船，三次换轿，中间还去万寿寺烧香一次。回宫后见到光绪，劈头盖脸地骂了这么几句：“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颤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

[1]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461页。

[2] 《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365页。

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1]从骂的话里可以发现，太后知道康有为图谋劫持她的传闻，只不过尚无证据罢了。骂过之后，太后即宣布训政。只不过，光绪待遇还是很高的，只能说亲政大权受到了一定的削弱，而不是事后袁世凯告密导致的那种靠边站与人身监禁。

9月20日上午11点，光绪按计划召见了辞官赋闲、前来中国旅游的日本维新之父伊藤博文。按维新党的意思，不但希望聘请伊藤博文做中国的客相，甚至希望联合日本、美国和英国建立合邦呢。还说什么别嫌合邦之名不好听，真弄成了，天下苍生之福呢。那么谁来与这些外人接洽呢？名震全球的重臣李鸿章。同时可派康有为做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云云。^[2]这些意思由康有为以两位御使杨深秀和宋伯鲁的名义分别上奏。维新派确实超前，这都是二战后才兴起的一体化意识，如果弄成了，什么欧盟，什么美洲国家组织，什么亚太，又都算个啥呢？

有学者认为，太后训政，跟伊藤博文关系特别大。怎么说呢？这事可大可小，就看你怎么考虑了。伊藤博文现在是赋闲的前日本首相、甲午中日战争时日方的当政者。在此之前，光绪除了召见内臣、接见外使之外，哪里接见过这等不伦不类的野花儿呢？而且光绪召见他，除了客气话，就说了一句“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爵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望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改革顺序、方法告之”。^[3]这句话呢，也可大可小：

[1]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近代稗海·1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1页。

[2]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5、170页。

[3] 汤志钧：《秉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说小了，是向伊藤博文咨询，叫他做顾问呢；说大了，伊藤博文甚至可以做咱的客卿。那么除了光绪接见，伊藤博文还跟中国哪些高层接触，或者提供了哪些咨询呢？按伊藤博文的日记，9月11日入天津，13日荣禄招待。14日入京，张荫桓来访。15日拜见总署王大臣，访问李鸿章。16日，李鸿章来访，总署王大臣来访。17日，张荫桓设晚宴招待。20日谒见光绪。23日庆王奕劻招待，24日李鸿章招待。27日，王大臣招待。^[1]按伊藤博文的随员泰森二郎所记，9月15日那次，以庆亲王奕劻为首，以崇礼、廖寿恒、张荫桓为辅的总署王大臣们问了诸多问题。当奕劻对于日本维新表达了不耻下问的意思后，廖曰：变法图强，谈何容易，窃见革新之道，以循轨辙为道。伊藤博文对此表示赞同，认为改革得分个轻重缓急，详加规划，顺序以进。庆王问伊藤博文：你们的新，维得咋样了？伊藤博文回曰：维新开国，确非一夕之间可以成功者。国事既定，方针既明的情况下，初期顽固守旧者，与维新者，大约是对半分。渐次执行，利益渐明，以开明导顽冥，就跟霜雪逢旭日一样。廖寿恒说：我国改革之必要，如燃眉然。如今年老顽固守旧者概行罢斥，引进新壮洋务人才，你以为如何？伊藤博文曰：以学术、识见、经验言之，皆老成练达之士，不能易之。有关国家利益得失之举，尤应慎重周详，切忌轻躁之行为。若是老成练达之人适于佐助改革方针之确立，而盛壮气锐之士则擅事务之协理。变法须细细考虑，而非猝然急救，否则，乱阶将起。^[2]不管是光绪接见还是这次招待，真正的核心人物都是奕劻，他会原封不动地向太后汇报的。我觉得，真正打动太后的，应该是伊藤博文的这番话。当然，被打动的不只太

[1] 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2] 同上，第15—16页。

后，据日方记录，这时候是括号：此时王大臣以下相顾而首肯。而老太后，恰恰是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第二天，发动的政变，当然我们还可以叫训政。根据事情的发展，我甚至可以推定：康有为约伊藤博文来给帝党做顾问呢，可实质上伊藤博文却给太后做了顾问。因为按照伊藤博文的意思，康党那种脱轨行为，早该有人出手叫停了！否则必将大乱。当然，政变之后，24日李鸿章招待的席间，伊藤博文的随员问康有为究犯何罪？李的回答是“无非煽惑人心，致干众怒”。^[1]伊藤博文回去之后，12月份的时候，宪政党设宴招待，伊藤博文在会上发表演讲，这才说了诸多实话：第一，中国的革新党，我早就料到他们不成，果不出数月。进锐速退，自然之理。第二，数几千年的文物制度，土风民俗，那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革动的。除非有英迈逸群之帝者出，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第三，以中国现在的情形，兵不备，政不修，府不威，不能保国，傻子都能看出来。能支撑到今天，实赖因循旧势仅维持政纲而已。而且也仅是维持目前，决不能长久。第四，中国现在连国内土匪都镇压不下，何能对外？这样一来，东亚局势就危急了。由此惹起各国之纠纷，诚恐不免波及于我。^[2]伊藤博文说得真准，比中国首相说得还准。更要命的是，伊藤博文也认准了，大清在列强面前做不到自立自保，搞得人家日本也不得安生，真不是个好邻居。打个比方，一个邻居，天天家里打架家外打架的，其他邻居怎么着也算倒霉！

接见伊藤博文的前期，也就是早朝时，光绪还召见了袁世凯。按袁世凯的日记，此时的他已认定康梁不是好人，“如任若辈所为，必至酿生大变，危及宗社，惟有在上前稍露词意，冀可补救”。所

[1] 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2] 同上，第23—24页。

以他给皇上进的言是：“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则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据说“上为动容，无答谕，请安，退下”。^[1]

如果光绪这次召见袁世凯就这么简单的话，至少不符合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因为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时允诺，为了打消袁世凯的怀疑，他保证初五请训时皇帝必面给袁世凯一道朱谕。谭嗣同再二百五，此处还是打不得诳语的。如果皇帝不按他所说的给袁世凯密诏，那么袁世凯凭什么相信谭嗣同呢？

有私人记载，光绪这次召见袁世凯时，真的给他“杀荣禄，除旧党，起兵勤王”的密诏了。这样的话，光绪的敌人就成了荣禄一个人了，似乎与太后无关，袁世凯执行时岂不更加犯难？按台湾学者黄彰健推论，光绪当然不会直接给袁世凯下诏让他干掉太后，他既没那个心也没那个胆。但是维新人士会拐着弯儿让袁世凯从中体会到这样的意思来。他们是这样策划的：由维新人士写一个奏折，就说圆明园虽然被烧了，但传说我高宗乾隆皇上修圆明园之初，尝于殿座之下存有黄金纹银各一窖，年久遂不知处。但幸得一些老苑户指点。如果我们按他们的指点，把地窖藏金挖掘出来的话，能派诸多用场呢。就让袁世凯派军队于初八动手干这个事吧。皇上最好在初五袁世凯请训的时候就面谕他。

按照维新派的策划，袁世凯得到皇帝的掘金朱谕，就会意会到

[1] 《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下册》，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459页。

这是对他劫持太后的暗示了。至于掘金者，维新派可以通过袁世凯让维新派的杀手毕永年带人混进掘金队里去。圆明园掘金是假，从圆明园杀向颐和园劫持老太后才是真。据孔祥吉考证，档案馆里还真有杨深秀这么一个附片，名叫《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正折是《拼瓦合以救瓦裂折》）。记档时间乃是八月初五。但没有提名让袁世凯来掘，也没说动手的时间。这个估计要由其他维新人士来配合了。黄彰健先生也认为光绪真的有密谕，而且密谕内容与杨深秀附片所说相近。^[1]

怎么解释呢？光绪也许真的有密谕，但是袁世凯为了保全自己与光绪，誓死也不认账了。没法认账。不过他真的给张之洞拍电报了。大致意思说：后天皇帝接见，我将向皇上推荐你来京主持新政。老谋深算的张之洞立刻回电：“我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千万！千万！”^[2]张之洞不愿来北京趟浑水是一定的，但是他这期间竟然有比维新派还大胆的举动，他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商定了一个合作计划：由日本方面派参谋给中国训练军队、兴办军事及民用企业；中国方面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等等。另据日本那边的学者研究，庚子年间老张居然也冒出趁乱称王称帝的念头来了。^[3]一句话，让老张混水摸鱼还是可以的，但是让他站到混水中由人摸他则是不可以的。

当天下午，袁回到天津。当晚去见荣禄，没谈几句，有客来，只得作罢。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两人再次见面。袁世凯和

[1]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597页。

[2] 王树增：《1901：一个帝国的背影》，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3] 参见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8）。

盘托出，荣禄大惊。他们不心疼维新党，但是心疼皇上。认定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可是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就是所谓的袁世凯告密。据袁的记载，他始终不相信皇帝有废后的心思，全是维新人士捣的鬼。如果说康有为事后死不认账的第一动机是为了保护光绪，那袁世凯何尝不是如此呢？

同一天，慈禧太后训了光绪一顿，据私人笔记，训话如下：“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不料汝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汝自五岁入宫，继立为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予何负于汝？而汝无福承受大业，听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汉大臣中虽一、二阿顺汝者，予自有法治之。”^[1]另据更详细的私人笔记，太后令庆王、端王、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皇上跪于案左，设竹杖于座前，训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皇帝不吭声，太后接着把怒气发泄到那一片王公大臣身上，曰：“皇帝无知，汝等何不力谏？以为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乎？我早已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易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查管束。我虽人在颐和园，而心时时在朝中也。我惟恐有奸人蛊惑，所以常嘱汝等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现幸我还康健，心不负汝等也。今春奕劻再四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亦可省心。我因想外人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日可知其不行矣。他是我拥立者。他若亡国，其罪在我，我

[1] 转引自房德邻：《戊戌政变之真相》，《清史研究》2000（2），第41页。

能不问乎？汝等不力诤，是汝等罪也。”刚毅这个马屁精抢先对曰：“屡次苦谏，多加谴责。”其余大臣，有言谏过者，有沉默者。于是太后重新骂上了光绪：“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似乎这时才缓过气来，回说：“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厉声曰：“难道祖宗不如西法，儿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皇上魂飞齿振，不知所对，于是太后复厉声问：“汝知之乎？抑同谋乎？”光绪稀里糊涂地回曰：“知道。”太后曰：“既知道，还不正法，反要放走。”光绪顺口答曰：“拿杀。”^[1]看训话内容也可以证明，荣禄那边还没有告密呢。因为太后只埋怨光绪脱离旧臣尽信小人。这顶多是个维新是否有术、用人是否有度的技术问题，图谋太后之类政治问题，慈禧还仅是当作传言，没有当真。也正因为如此，太后在随后的行动中，仅有以下两项：第一，宣布重新训政；第二，下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由此也可以看出，袁世凯根本没告密。因为太后既没有捉拿夜访袁世凯的谭嗣同，给二康的罪名也仅是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2]按茅海建先生的考证与推理，袁世凯训政之前没有告密，且太后本来预计 21 日回顾和园呢。但是在回顾和园之前，太后既听说了康有为根本没按谕旨离京赴上海办报，更风闻了康有为将有所发动的消息（康有为这个大嘴巴，还说弟子们笔墨不谨呢，事实上最不谨的恰是他本人，没有等到动手，他图谋太后的消息就传遍了京城）。于是她勒令光

[1] 《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46 页。

[2] 《清实录·第 57 册》，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598 页。

绪逮捕康有为，为光绪所拒绝。于是太后拿出杨的奏折，于是光绪请求太后训政，于是太后密诏崇礼捉拿康氏兄弟……。^[1]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方面即使盲目相信茅先生，也不会错到哪里去的。茅先生推崇台湾的黄彰健先生，而我推崇茅先生。

正式训政开始后的当天晚上，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出示训政之诏。一看老太后那边动手了，荣禄即将袁世凯招来，三人商议，想保全皇帝也不行了，而且再不揭密谭嗣同之事，自身不保。与其等着人家揭露，不如自己先裸。于是着杨崇伊于9月22日乘11时20分的专列离津回京。本来当天早晨有令停止京津火车，以便捕拿逃逸的康有为。但杨崇伊一介御史，竟然能打破禁令乘专列回京，肯定是有重要使命，那就是受荣禄之托向太后告密。粗略估算，太后应在当晚前后得到密报。据说，当天太后还单独审问光绪一次，应该是得到密报后，娘俩亲自对质上了。9月23日，慈禧太后才有了大动作：第一，在勤政殿举行训政典礼。所谓的典礼，更像审判厅。慈禧拿出了查抄的各种信件，其中有杨锐、林旭依据皇帝旨意催促康有为离京的信函。太后问是谁的主意，光绪说是杨锐的主意；又问围园弑母一事，光绪说不知道。太后大怒。囚禁光绪皇帝于瀛台，将近御各太监看押，另派太监二十名以随侍的名义监视皇上。光绪从此除了早朝被拉去做太后的木偶外，其余时间均不得自由出入。第二，密谕捉拿谭嗣同等军机四贵及张荫桓、徐致靖等人，先行革职，交由刑部衙门审讯。

袁世凯事后的补告，加重了政变的程度。9月25日，政府即谕内阁，皇帝久病不治，京外如有好医生，请内外臣工保荐。同时召荣禄进京，其直隶总督一职着袁世凯暂行署理。

[1]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2页。

9月26日，荣禄离津赴京。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荣禄行前，他与荣禄相约，誓死保皇上。一方面，两人对光绪还是比较同情的，认为是维新党人害了皇上；另一方面，如果不保全皇上，康梁乱党不会罢休，外国人也会乘机干涉。

问题是荣禄所谓的保全既是暂时的，也是有限的。

所谓的暂时表现在，他接到进京圣旨的当天，清廷发出上述光绪帝求医的上谕，这预示太后要废掉光绪帝了。而他进京后，光绪只是暂时没病了，可以随太后参加一些公务活动；之后，光绪就永远病了，老太后甚至给他找上了新的接班人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隽。

所谓的有限表现在，荣禄建议无需审讯就杀掉谭嗣同等人，他的建议被接受了。荣禄怕在审讯中牵涉到光绪帝，但是光绪已被老太后审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总之，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有负于我。其实，审审也许有好处。第一，杨锐若把真密诏拿出，光绪不只没有图谋太后的意思，就是变法，也仅是问大家如何能不惹太后不高兴而已。第二，省得康有为拿着篡改过的伪诏在外头忽悠了。既有辱改革家的名号，还让光绪背了黑锅。按黄彰健先生的说法是：如果康真心保皇，则应该宣布杨锐所奉真密诏；然却终未宣布，只宣布求救伪密诏，不是曲突徙薪而是火上加油。按王照的说法是：“太后与皇上之仇，遂终古不解。”^[1]第三，开不审而诛的先河，到了义和团时代，徐用仪、联元、立山、许景澄、袁昶等五个主和派也是不审即杀，制造出“庚子被祸五大臣”事件。第四，让外国人看得目瞪口呆，更加认定，中国政府真是野蛮政府，这么多高级官员，说杀就杀了，法律何在哉？

[1]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554页。

没有法律。9月28日，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康广仁同日弃市，是为“戊戌六君子”。9月29日，清廷公布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罪状，由原先的“结党营私、诱言乱政”升级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这应该是袁世凯补告后的结果！至于康梁的脑袋，也在谕旨中明码标价了：十万雪花银。活人奖十万，死尸也是十万！问题是康有为这会儿已逃到香港了。

六君子弃市的当天，荣禄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仍旧节制北洋各军；裕禄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帮办北洋军务。一周之后，裕禄到任，袁世凯就回小站练自己的兵去了，从此就被骂上了，说他用维新党人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至于康有为拿人家做赌注的事儿，倒没人在意。

“戊戌六君子”被处决的次日，从不写日记的袁世凯写了前面所述的《戊戌日记》。10月10日，又写了《自书戊戌纪略后》。^[1]除了为自己表白，揭露维新党人的密谋之外，还尽力弥缝帝后关系，把这一切说成全是维新党人作的乱，皇帝毫不知情。全文如下：

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削大难，功在社稷，亦天下之君也。况今上为皇太后命立，亦有君臣之义，且有母子之分，天下岂有无君无母之国哉！我皇上孝治天下二十余年，璇宫侍养，备极崇隆，薄海臣民，同深钦仰。为臣子者自当矢志忠贞，随时维持，不敢议及天子，累皇太后以不慈，更何敢议及慈圣，累皇上以不孝？乃谭嗣同等煽惑構乱，离间两宫，竟欲陷君子于不义，诬为天理所能容？

[1] 按黄彭健先生推论，这个也像是写于宣统年间，见黄彭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609页。

当其谋乱之时，国之危机有三：倘其凶谋果逞，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其危一；设予稍露圭角，该党必将害我，以其党代之，内有悍徒，外有劲旅，何堪设想？其危二；或者发泄后，荣相不即入枢廷，善为调和，保全上位，各国必将借口交讧，匪党挟以有辞，将至不可收拾，其危三。赖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幸得佑免三危。然祸机之来，间不容发，亦云险矣。予世受国朝重恩，幼受庭训，自通籍十七年来，只知以道事君，不敢稍涉欺罔，无论人之知与不知，愿力任劳怨，百折不回，其不忠不孝之言，向不敢出诸口，不料逢此捏机，几涉奇险。然区区此心，意在诛锄误君误国之徒。该党无礼于君，予为鹰鹯之逐，亦人臣之大义，皎皎此心，可质天日，且亦正所以保全皇上。倘该党等凶谋果逞，必将难保宗社，更何以保全皇上？此亦必然之势也。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自书记后，并交诸子密藏之，以征事实而质诸词。时在八月廿五日书于小站营次。^[1]

虽然事后的康梁死不承认这份升级的罪状，但历史是有缝隙的。杨天石先生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了谭嗣同好友、被康有为派作围园骨干的毕永年流亡日本后的《诡谋直纪》，交待了这一图谋。而且，康有为的准备是，报告光绪时只说执太后而废之，具体行动中则是执太后而杀之。^[2]

这里总结两句吧：第一，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总体上是可信的，倒是康梁有些话着实不能信。我们不能因为袁后来称过帝，就

[1]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122—123页。

[2] 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确证》，《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

认定他前面就没干过好事，甚至没有真话了。同理，我们不能因为康梁搞的是维新，就认为他们一切都对，一切都真。对这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狂人，我们还是需要警惕的。第二，康有为的围园密谋确实是孤注一掷。不但掷了光绪，还把袁世凯掷了出去。对于袁来讲，告不告，都算是欺君之罪了。事实上，事后还有人找过他的事。说他“既同谋又出首，首鼠两端”，只不过荣禄出面保护，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1]他这才得以安然过关。而他所谓的告，加重了政变的危害程度，一是太后对光绪由原先的训政，一变而为必欲废之而后快；二是成全了六君子。但是这一切，袁都是被动的，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还要追溯到康有为这里的。有外电评论为证：

英国观察者贝思福：“我很遗憾，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维新者办事没有章法，过分急于求成，因而造成了他们的救国事业的失败。”^[2]

英国公使窦纳乐：“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3]

英人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维新党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光绪可能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她之及时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4]

赫德私人信件：“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

[1] 《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页。

[2] 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1页。

[3] 《戊戌变法·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2页。

[4] 同上，第520页。

他们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1]

站在保守主义的角度，改良是对的，但是改良也是需要章法的。正如刘军宁先生所言：“现在是传统所达到的最新境界”，是先辈以自己积累的经验和智慧所投下的选票，“人们只有知道自己走过何处，知道自己现在身在哪里，才能知道最近的将来去往何处”。^[2]相形之下，康有为的改革就有些“三不知”的嫌疑了。既不知过去的路径，也不知现在的起点，更不知未来的方向。

[1] 马士（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5 页。

[2] 刘军宁：《保守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2—133 页。

第六章

当袁世凯遇上义和团

上帝也许并没诅咒我们，只是我们自己在制造人祸方面，太大大手笔了而已。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被打开，基督教一步一步东传，既与中国旧有的生活伦理冲突，还打破了现实的社会秩序。中国百姓不管是理智上还是情感上，皆不能接受，具体表现为民教冲突愈演愈烈。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笼统规定：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一体保护。美国在《中美望厦条约》中要求：除了传教士能在五口传教之外，还可以建立教堂。法国更是不含乎，在《中法黄埔条约》里进一步要求：法国可在五口建立教堂，倘有中国将其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这三个条约被西方传教士看作对华传教事业划时代的新标志。但是法国方面认为，仅准许西方人在五口给自己人传教、建教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国自雍正皇帝起就把天主教打作邪教，不准他的子民信了。于是他们通过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向道光皇帝申请中国内部驰禁天主教。道光批准了。法国再进一步，要求归还雍正年间被查抄封闭的天主堂旧址，道光也批准了，但是他的谕旨明确规定，虽然天主教不再是邪教，中国人可以信了，但是西方传教士还是只能在五口传教，不得进入内地。

虽然如此，西方教会还是很激动，纷纷派员来华，云集香港，讨论进军中国及划分传教区域等。于是出现了诸多问题：第一，归还旧址引起了诸多风波。因为牵涉到时间的变迁、主人的变换、房屋的修补及百姓的拆迁等问题。比如北京东、西、北三处教堂的归还。政府无能，在这方面当然偏袒洋人，导致百姓感觉吃亏受冤，敢怒不敢言，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当然了，传教士也憋火。法国传教士的坟地正福寺被周边中国居民毁得一塌糊涂，遂要求中国政府捆绑几位居民前往正福寺“叩首领罚”。中国老百姓给中国官员下跪，他们不认为是侮辱，给洋鬼子的坟下跪，天哪，那不伤自尊吗？大清国子民虽然在自己政府底下混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但是他们却没把洋人当人看，认为洋人鸡狗不如。所以双方自然种下仇恨的种子。第二，西方传教士很富有牺牲精神，虽然明文规定不得进入内地，但他们就跟地下党似的，让中国政府防不胜防。按领事裁判权，抓起来也得好好地归还对方。如若对方不是好好的，麻烦可能就大了。比如法国传教士马赖私自进入广西西林传教，被咱这边的知县抓住杀掉，成了法国与英国携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理由。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依然失败了，相继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传教自由进一步扩大，在领事与中国地方官给予验照的前提下，外国传教士可进入中国内地。中法条约里更是被法国方面有意加上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样。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法之间进一步明确了传教士置产办法：卖业者毋庸先报明地方官请示准办。更要命的是，传教士出于职业的本能，还向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发起了挑战，不让教民搞偶像崇拜、祭祖拜庙等。1862年（同治元年）政府在外国压力下，颁布圣旨，规定凡基督教徒均可免除迎神赛会等费。这一来更坏

了，迎神赛会求雨拜佛的费用历来是中国百姓均摊的。有些人入了洋教，就豁免了这一切。其他百姓岂能容忍？总之，从1844年到1911年的60年间，共发生教案1639起，中国政府被搞得焦头烂额。

那么教案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先讲讲，什么样的中国人才入教吧。中国人当时入教，大致可分作四种类型：第一类，真正的信教者。第二类，吃教者。就是太穷，信了教，可得几吊钱的救济、吃几个馍馍、租些便宜的地，并且免费瞧病之类。第三类是混教者。中国传统眼光里的二流子败家子之类，本就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徒。信教之后，有了精神支撑与物质靠山，从此耀武扬威鱼肉乡里。第四类，投教者。就是临时投机，遇上了官司、利益纠纷或者个人纠葛，临时入教，抱上教士这条粗腿好办事。

第一类第二类尚好，第三类第四类就坏菜了。而且，即使没有第三类第四类，仍会有民教冲突，只不过在数量与程度上会有区别。因为导致民教冲突的因素太多了。

第一，利益之争。比如旧教址的归还、庙产及个人私产的捐献、教会地产的买卖与租借等，都牵涉到利益的分配。

第二，公平之争。传教士来到中国，发现中国的官员等级制度就是好，所以他们很快就中国化了，也分成若干等级以方便与中国官员平起平坐地打交道。具体来讲，主教与督、抚平级；副主教与司、道平级；神父和牧师与知府、知县平级。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司法制度比丛林法则还要野蛮，所以传教士一直认定他们的教民应当享受比他的非教民同胞更高一等的司法。在传教士的支撑下，中国人一为教民，好像就不是中国人了。比如教民与平民争讼，到堂，平民长跪，教民则不跪；居乡，平民有差徭，教民则无差徭，平民有厘税、杂派、酬神、演剧等费，教民则一概全无。中国人也是个

很奇怪的物种，自己给当官的下跪可以，可是别人不给当官的下跪就不可以了。他不是考虑你不跪我也不跪，而是，凭什么我跪你不跪？总之，不是与别人比好，而是要求别人与自己一块儿差。

第三，文化之争。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反对祭祀祖先，对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三纲五常都不遵守，乡民们当然看不惯，认为教民“无父无君”。更关键的是，中国民间社会结构是宗法制度，民间社会组织是乡绅治理。中国的乡绅熟读儒家经典，信守儒家规范，出则为官，入则为绅，子弟读书为士，在民间的威望很高，好多社会纠纷、人事矛盾，甚至一些官司都是他们打理的。至于乡村庙会、祭祀、红白喜事等更是由他们操持。一句话，他们是社会公共事业的权威。现在来了洋鬼子，出了教民，乡绅的权威一再遭受抵制与冲撞，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反洋教思想，应该就是由他们导引的。中国一般乡民，大字都不认识三个的。所以，诸多反洋教揭帖也是出自士绅之手。正因为文化在他们之手，文化是他们的身家饭碗，所以对洋教文化的敌视也最严重。面对异质文化的浸淫，除了少数有良知的理性的清醒者，一般的文化阶层，表现出的都是本能的敌意。甚至可以这样说，受传统文化教育愈深，敌意愈严重。

第四，文化之争的背后，还有一个文化的隔膜。中国人瞧不懂西方的宗教精神，但是给其添油加醋则很老练，于是教会的诸多行为在中国人眼里就妖魔化了：比如“拐骗男女幼童，取其精髓制造丸药”；比如“童子割肾，妇女切乳，剜眼取胎，婴孩同煮”；比如“哄入伊教，吃了迷药，与伊同睡，采阴补阳”；比如“子淫其母，兄淫其妹，父奸其女，翁奸其媳”。更有甚者，有的反洋教揭帖宣传洋鬼配以中国人的眼睛，可以在一百斤铅中煎出八斤白银来。鲁迅在自己的《论照相之类》曾说他小时候听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说，

洋鬼子挖了中国人的心肝，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着宝贝的地方，火芯儿就弯曲下去了。于是洋人就发财了，洋人为什么那么有钱呢？就是这样搞来的。^[1]

在这么一种氛围中，各地教案层出不穷。外国传教士干预教案的审判，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时候案前案后免不了仰仗洋人的势力欺侮非教民。当然，非教民也会找教民出气。因为教民在地广人多的中国就像汪洋大海里的几滴水珠，一不小心就被蒸发了。据载，义和团兴起时，山东天主教徒有 47221 人（传教士 85 人），新教徒有 14776 人（传教士 180 人），^[2] 而清末的山东人口，按户部统计大约是 3000 多万。^[3] 这样算下来，民教比例乃 500：1。所以，非教民逮个机会欺负一下教民也不是很难的事。总之，多种因素导致民教之间的仇视一日更甚一日。一些地方官动不动因教案而倒霉，西方的游戏规则不懂，中西之间的条约不懂，就连自家的案子也从来是乱判的，所以一遇教案，总掌握不好平衡，四处不落好，心底里自然也恨洋教。领事裁判权及与中国官员平级的制度下，外国教士居然跟外交官似的，也具有了类似外交豁免权的特权。教民呢，跟在其后耀武扬威。原先吧，不管啥民，只要是大清子民，在官老爷面前都得把头磕得嘣嘣响。老爷让他们抬头，他们绝不敢低头；老爷叫他们低头，他们绝不敢抬头。现在可好，他们不但不跪了，有些人还咆哮公堂，直接跟官老爷论理论法呢。官爷的威风何在？所以，面对洋教，不只是民怨沸腾，连官怨都沸腾呢。所以地

[1]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12 页。

[2] 周锡瑞（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6 页。

[3]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5 页，表四。

方官背地里支持村民与洋教斗，也不算稀罕。这样一来，传教士对地方官也不满意，常向总理衙门告状，搞得总理衙门招架不住，遂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颁发了一个《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把传教士的中国式品秩用条文固定下来，确认他们遇有教案，可转请公使或者领事，同总理衙门或地方官交涉办理，也可直接与地方官商办。传教士的特权更加合法化与明确化了。

纵观整个中国教案史，我们就会发现，义和团运动就是个特大教案。按美国学者柯文的说法，在20世纪前半期的西方，“人们普遍认为义和团是黄祸的化身”。^[1]

6.1 没有维新告密，袁世凯照样要冉冉升起

世人都喜欢说维新告密染红了袁世凯的红顶子，可是平心而论，没有维新这档子事，袁世凯照样要冉冉升起。一者是由于他个人的出色；二者是由于荣禄对他的赏识。袁世凯若没有个斤两，荣禄能掂他出来？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荣禄做了兵部尚书，参与督办军务处，袁世凯受了光绪接见，得到赏识，奉旨到军务处差委，袁世凯与荣禄这才相识。为什么从吴长庆到吴大澂，从盛宣怀到李鸿章，从张謇到荣禄，一路上遇到的各位前辈，甚至光绪本人，都很赏识袁世凯呢？也许有人会说，袁世凯会巴结、善钻营。这里我只想说的是：袁世凯也没啥特殊本领，他就是个做事的。因为在中国，不做事、不会做事的人太多了，才显出他的与众不同来。我管这叫鸡立鹤群。而中国特色的不少地方，再混账，也总得揽进几

[1] 柯文（美）：《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自序。

个做事的人，其他领导与人物才能安稳地坐享福禄。

慈禧太后她老公咸丰皇帝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大清尚有人耶？大清当然有人，只不过，都让他的那个体制给毁得没人样了。稍微想做点事的，也背负着几世之谤呢，到如今在还陷在道德批判与社会舆论的口水坑里爬不出来。比如李鸿章，比如咱们的主人公袁世凯。没办法，谁让你选择做事呢？选择做事，就相当于选择了地狱，你不下谁下？

变法期间，太后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任命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为“北洋三军”。所谓的北洋军阀，当以此为起点。当然啦，北洋这个词鸦片战争之前就出现了，而且更多的是一种地域概念：以上海吴淞口为界，往南由浙及闽粤，为南洋；往北通山东、直隶及关东，为北洋。1860年（咸丰十一年）总理衙门开设，通揽洋务以及外交。又设立南洋大臣与北洋大臣：南洋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掌管上海与长江各口以及闽粤浙三省；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专管北方各省。实际发展过程中，由于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致使北洋大臣地位不断提高，职权不断提升，势力远远超过本来地位与之对等的南洋大臣。就是总理衙门，也因大部分的外交任务转移到李鸿章一个人身上而势力稍减。但是李鸿章掌控下的淮军、练军，却谈不上北洋军阀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应该是袁世凯小站班底的专称。因为整个民国前期，政治舞台主要就是他们的活动空间。北洋练兵的时候，南洋也练了。两江总督张之洞编练的是自强军（一称南洋新军），兵额2860人，也是按德式操练。之后，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刘坤一接任两江总督，但自强军并没有扩建，营队与数量都不及北洋。一者是由于湖广总督与两江总督屡次调换，二者由于操练主事者个人的因素，所以南洋在政治和军

事上都没有形成北洋那样的集团势力。

从袁世凯这方面来说，督办军务处被裁撤，荣禄从此成为他的直属上司。在天津谒见新上司期间，致小站代他主事的徐世昌的信中，他说荣禄“相待甚好，可谓有知己之感”。除此之外，还可以发现袁世凯这种做事的人，对官场应酬及人浮于事的反感。信中说，由于光绪与太后要去天津阅兵，时间已不足两月，但是“诸公互相推诿，办事人多，每有此弊也”。还有，“在此惟奔走应酬，实属无谓，几乎不暇搦管”。^[1]

政变之后，荣禄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仍旧节制北洋各军。裕禄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帮办北洋军务。再之后，政府又发布上谕，进一步明确荣禄的军权与地位：“现当时事艰难，以练兵为第一要务，是以特简荣禄为钦差大臣，所有提督宋庆所部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悉归荣禄节制，以一事权。”^[2]细心一点的话，会发现北洋在此谕旨中由三军变成四军了，多了宋庆一部——毅军。

也许，袁世凯更能领会与贯彻这份上谕的精神——以一事权。他给荣禄建议：驻直隶的毅、甘、武毅、新建陆军，四军互不统属，不能联络一气，不如合编为武卫军，由荣禄统领。并由荣禄另募万人做亲兵。荣禄不傻，自然接受。于是，上奏清廷得到批准，把北洋四军整编扩建为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中军招募八旗旗丁1万人，组成后驻扎北京南郊南苑（今北京大兴），由荣禄兼领，相当于他的亲军了。前军是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驻扎天津附近的芦台（今天津宁河），兼顾大沽、北塘，扼守北洋门户，

[1]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2—13页。

[2]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兵额 1.6 万人。军队受德国洋员训练，军队装备也好，只是军纪不咋地。后军为甘肃提督董福祥统率的甘军，多数为回民，兵额大约 1.1 万人，驻扎蓟州（今天津蓟县），并担任通州一带防务。左军为四川提督宋庆统率的毅军，兵额也是大约 1.2 万人，驻扎山海关内外。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编为右军，原兵额只有 7000 人，被荣禄允准可以再扩编 3000 人，也达到 1 万人的标准，驻防天津小站。虽然改名为武卫右军了，但由于其他各军还是旧军编制，所以一些文书中仍称其为新建陆军，以示与其他各军的区别。五军共约官兵 6 万余人。

武卫军的编成，有两大亮点。第一，军队的统率，由过去督抚或者某个个人筹饷练兵并指挥军队的传统方式，改为由中央派员筹饷练兵并直接指挥。也就是说，军队由某种意义上的地方军，变成了中央军。二是对于原先的落后编制与装备进行了改造，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新军的气象。当然了，这种新是有限度的。前面说过，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秋天，英国海军少将贝思福访问中国，参观了武卫军，在他看来，按照西方标准，袁世凯的部队是大清帝国唯一装备齐全的军队。此外，他在中国军队中发现许多管理很差的事例，多数情况是粮饷不足，除少数例外，全部缺乏纪律与训练。甚至装备较好的部队也往往因训练不足而失去价值。贝思福在士兵行列中数到十四种不同类型的枪，其型式之繁杂，几乎是从连发的温特斯特枪和毛瑟枪直到前膛装子的抬枪都有。而且连这种杂凑的枪也很少能实弹射击。因为，除袁世凯的士兵以外，军队极少甚或不做射击演习。^[1]

其实不用举证，你就应该能猜到，无论是从官兵素质、装备，

[1]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4—135 页。

还是军容军貌军纪军风来讲，袁世凯这支都是武卫军中的翘楚了。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若没有政变，光凭练军的成效，袁世凯就可以冉冉升起的。政变前，政府本有天津阅操之安排；政变后，阅操即停止。否则袁世凯的军队一亮相，太后更会对他刮目相看呢。政府谕旨中，说天气太寒了，皇帝还要侍奉躬慈呢。不管什么借口吧，天津阅操对袁世凯来讲，应该只能是好事，而不会是坏事。现在，精心准备了几个月，全都白搭了。政府可能也觉得过意不去，所以给他们发了奖金。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著赏银六千两；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著赏银四千两；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著赏银三千两。^[1]10月份，袁世凯上《严杜后患请旨分饬遵行折》，大致意思是说，中国的疆域海口防范不严。并且举例说，自己署理直隶总督任内，英兵五十多人，携带炮位、枪械，由塘沽登岸，搭乘火车到天津，还想附车进北京。英国之后，俄、德军械也相继运进。袁世凯认为，塘沽防营不拦不问，车站人员任意售票给他们，太不像话了。要求政府饬有关管理人员加以整顿，并分派懂洋务的人员前往各疆口，按公法条约与外人交涉，不能任他们自便。^[2]

三个月后，太后特别召见袁世凯，准许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把个小袁感激得“傍上苑又趋跄”，^[3]两腿都伸不直了。除此之外，太后还赏他福字荷包、银钱、银锞、食物等项，恩宠明显见涨中。召见之后，袁世凯上《钦遵懿旨敬呈管见折》，对当下时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外国虎视眈眈，中国当自强。自强首在练兵，练兵首在筹饷云云。我们可以发现，政变之后，中国

[1] 《袁世凯奏议·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版，第8页。

[2] 同上，第9—10页。

[3] 同上，第12页。

的大吏们，步子更迈不开，胆子更小了。袁世凯刚刚摆脱与维新派的干系，自然不敢提任何与新政有关的字眼。至于其他与新政本就没有干系的官员更是绝口不提新政了，上下一片萧条。所以袁世凯也就只能三句话不离本行了：兵和钱！兵呢，袁世凯会练；银子呢，袁世凯可不会练。所以他给太后出了几条来钱的主意：增盐价；核钱漕；清厘税；征契税。如果说后三项算是反贪防腐的话，那么前一项则是典型的拔羊毛了。按袁世凯的意思，中国四万万民众，每人每月食盐不过半斤，若斤盐加价五六文，民众每年花在盐上的成本不过增加二三十文，感觉不到负担，但是政府却可每年收入一千余万金。^[1]看来这就是“大国刮民”的好处。正折之外，袁世凯另附一个《请饬慎守国权片》，跟前引《严杜后患请旨分饬遵行折》是一个意思，无非国权不振后患无穷之类的老生常谈。不过我无意谴责袁世凯，政变刚过，太后让他谈政见，他能谈些什么呢？至于拔毛或者老生常谈，本就是政府的执政伦理与行政常态——按照美国学者韩书瑞的说法，中国的皇帝在国内巡游一下，看起来更“像一次侵略”，就差说更像日本鬼子进中国了。^[2]嗯，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4月，荣禄保奏下，袁世凯因办事认真、练兵三年卓有成效而交部优叙。政府著荣禄通知他，如果手下有得力将员请择优酌保。于是我们看到的情形是，他首先保的是他的哥们儿徐世昌。当然，老徐既是他的哥们儿，更是难得的人才，以翰林院之资参与军务，不说其他，袁世凯的练兵歌都是他操刀给弄

[1] 《袁世凯奏议·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版，第16页。

[2] 韩书瑞（美）：《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的。现在丁忧守制恰好期满，所以袁世凯请求政府留徐世昌在军中继续帮办营务。有意思的是，袁世凯还举了几个例子，翰林院检讨某某某和翰林院编修某某某也被借调外用了，但是资俸没扣。要求政府援引成例，也免扣徐世昌在翰林院的资俸。估计袁世凯觉得老徐家穷，所以想给哥们儿弄双份工资呢。没想到政府同意老徐留办营务，拿双份工资却给拒了：“所请免扣资俸，著不准行。”^[1]看到这样的官员奏折与政府批语，确实好玩。官员讲义气，政府讲小气。

同月，袁世凯还反掉两个贪官庸吏。一个是补用都司张国栋，一个是哨兵千总杨正国。前者出口购马，于沿途经过地方，需索饭钱，迹近骚扰；后者纪律废弛，不知振作，袁世凯请旨要求将他们一并革职。政府同意了。

5月，袁世凯上《时局艰危亟宜讲求练兵折》。说中国文明之邦，传统是以德治国，加以承平日久，故军政渐弛，以至于“我以数十万众，不能当日本一旅之师……夫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不如法，与不练同”。他说，自己弱冠从军，对土操洋操均有考究。洋操特好，土操着实没劲。但是洋操不好练，难度大。所以仰恳皇太后、皇上饬下统兵大臣，参仿各国戎政，详拟兵法、操法、军规、器械，立定划一章程，请旨颁发各直省军营，一体遵照，认真训练，既不得有名无实，尤不可稍参成见。随时简派大员，抽查校阅，严定殿最，以资惩劝。并厚集饷项，在东北各省，增练四五万人，合原有之军，共以十万人为率，国家安全才有希望。政府一听，“著将该军平日训练情形，详细陈奏，并将各种操法绘图贴说进呈备览”。^[2]

[1] 《袁世凯奏议·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版，第22页。

[2] 同上，第29页。

这样一来，袁世凯又得编兵书了。事实上，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袁世凯已编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全书20余万字，乃是小站练兵条令的集结总汇。前面我们列举的营制、军纪包括袁世凯的劝兵歌等，皆出于这本兵书。由于编撰于变法期间，所以算得上新政的一部分。现在，遵上谕指示，又要编兵书了。袁世凯亲自挂帅领衔，召集手下文官武将，组成一个写作班子：袁世凯的哥们儿、新建陆军大参谋长徐世昌负责审阅与修改；袁世凯最赏识的江南才子、袁世凯的军中幕僚，人称“小诸葛”的言敦源主稿。其他主笔还有：曾在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读过四年、后被派到德国、在著名的克虏伯炮厂学过军事的段祺瑞；同样出身北洋武备学堂、第一个以武备学生身份考中秀才、亲历甲午中日战争、在北线摩天岭给聂士成做主要参谋从而让摩天岭成为日军数月无法克服的一道防线的冯国璋以及北洋武备学堂毕业、长期督办清军炮兵学堂的王士珍。这三位人称“北洋三杰”，且有标号：王龙、段虎、冯狗。强将手下无弱兵，费时三个月之后，编出了《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也是20余万字，364目，分装24册，内容包括：训练、练兵、攻守、驻扎、电讯、电雷、测绘诸说和步兵、炮兵、骑兵、工程兵诸操法。是一部近代陆军兵法全书。其操典全据德国章程，理论阐述则大都出于创意，被现在的军事史权威研究部门誉为“理论与实际并重，西法与中法结合”的著作。两本兵书，合计40余万字。被骆宝善先生称为“奠定了近代中国西法编练陆军的兵法基础”，“西法练兵的扛鼎之作”。^[1]

编兵书的过程中，具体来讲是6月份，袁世凯升为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看来，谁也拦不住袁世凯的冉冉升起了。

[1]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133、130页。

6.2 镇压义和团，袁世凯费力不讨好

就在袁世凯冉冉升起的当口，直鲁大地上诞生了一支宗教力量，名为义和团。义和团乃白莲教之一种，而白莲教发展到晚清，已有四百年的历史渊源了。如果要寻找一个典型代表的话，我觉得 18 世纪山东的王伦足堪胜任。王伦相信什么千年王国、末世论，更相信自己就是那无生老母指定的救世主。当然，光这些信仰不足以打动人民群众，还得搞些小法术。比如预言风雨灾祸，给人治病驱魔什么的。王伦甚至练过“不吃饭”术：每日只喝清水，其他啥也不吃。练得十天不用吃饭为“小功”，练得八十一天不吃饭，就是“大功”了。^[1] 因此被人称作“清水教”。王伦起义后，其战略与战术都借助咒语，比如：“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着；求天助，求地地灵；枪炮不过火，何人敢挡我。”^[2] 王伦攻打临清城时就上演这一套，没想到临清守军更邪，危急时刻采取了一个老兵的建议：“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这个建议甚好，攻城者们面对妓女之阴这样原始而又古老的武器，所谓的闭枪闭炮竟然不灵了。守城者跟科学大发现似的，兴奋得把老弱妓女都叫了来，弄上城头城垛，让她们或坐或站，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还有人鼓励她们向城垛外撒尿，扔出带有经血的污物等。叛乱者目瞪口呆，惊慌失措，服劲，后撤。^[3]

清水教不堪，义和团更不堪。

直鲁大地的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按直隶吴桥县令劳乃宣的考

[1] 韩书瑞（美）：《山东叛乱：1774 年王伦起义》，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9 页。

[2] 同上，第 71—72 页。

[3] 同上，第 110—111 页。

证，义和拳，邪教也，八卦白莲之支与流。由于山东巡抚毓贤想把他们改造成为官府所用的团练，所以改叫义和团。山东义和团的主体由鲁西南以曹州府为中心的大刀会、直鲁边界以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和鲁西北以朱红灯、心诚和尚为代表的神拳等三大部分构成。如果说梅花拳还练些真正的武术的话，那么大刀会与神拳就有些邪了。大刀会又名金钟罩、铁布衫、无影鞭，搞的是刀枪不入。要做到刀枪不入，需要经过烧香、念咒与吞符等一系列仪式。至于神拳，更邪了，诸多仪式免了，连香都不烧，直接念咒降神附体。公允地说，义和团团员们从小到大所读过的科普著作，顶多是《封神榜》+《聊斋志异》+《西游记》。事实上，这些科普著作还不是他们亲自读的，因为他们大都不识字，所以只能是通过社戏、民间讲古等得知的。一句话，贫瘠的土地上连脑袋都是贫瘠的。所以他们那法术也没什么新花样：遁地啦，刀枪不入啦，闭住枪炮啦，呼风唤雨啦，飞檐走壁啦，意念灭火啦。比如直隶义和团的大哥大之一张德成就喜欢玩悟空那一套。悟空会分身术，经常丢下躯壳就跑十万八千里。张德成也会，据他自己说，能跑到洋人的阵地上偷大炮零件，让人家的大炮哑掉。悟空让自己的师傅蹲地上，然后在师父身边画个圈圈，各路妖魔鬼怪自然走进不得。这一手张德成更会。他带一批人在镇外绕行三圈，用杖画地，自言一圈是土城，一圈是铁城，一圈是铜城。有了这三圈，洋人来了，无法穿过。看他的样子，应该比悟空本事还要大些。至于手持红灯的那些女“义员”们，更是有赛过铁扇公主的：扇子一扇，就把自己扇到天上啦，变作了星星，能在空中放火，烧洋人的房屋。当然义和团也不缺饥饿后遗症之类的幻想：一个馒头会生诸多馒头啦，一个沙锅永远吃不完啦。打仗时，除了自身，还能请出诸多神仙级嘉宾来，一诈唬就都来了：“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

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如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兵……”如果法术不灵，借口可随时找，要么是你心不诚，比如身上带了洋银，要么是其他晦气冲撞了我们，比如女人。总之，跟王伦那一套八九不离十。

问题是，不管是靠真正的拳脚还是靠所谓的法术，面对现代化的武器，都属乱弹琴。与其说它面临了全新的敌人——帝国主义势力，不如说它面临了全新的文明——现代西方文明。用中国百姓最愚昧最传统最落后的文化瞳孔去观照现代西方文明，那可真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义和团除了对于西方及西方文明这样全新的对手与文明蒙昧以外，对于自己的政府这样古老的传统敌人，居然也懵懂转向，提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口号——扶清灭洋。扶清干嘛？灭洋又干嘛？

更滑稽的是，清政府面对义和团，也拎不清了。正常的政治改革，政府一直启不动，可是面临西方势力的高压与西方文明的渗透，政府又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对策。戊戌变法失败了，上层的政改努力泡汤，政府转而动员上了义和团这种最底层最愚昧的力量。按常识与惯例，政府绝不应该这么干的。为什么最后偏偏就干上了呢？道理很简单。慈禧太后正在家里下一盘很大的棋（当然，由于体制的缺陷，她也难免做近臣的棋子）：自从戊戌政变后，太后就让光绪生了病，并且让这病越来越严重，所以光绪若意外死亡或者突然死亡，应该无人怀疑与反对的。但是境外别有用心者先就不干了，英国公使窦纳乐以半官方的身份通知总理衙门：“我坚信，假如光绪皇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

果。”^[1]列强高压下，西医被派进中国皇宫给光绪皇帝看病，并宣布病无大碍。于是太后只好收手。但是，谋害不成，废掉总成吧？没想到大家还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公开发电：“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李鸿章传话：“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为害曷可胜言”。朝廷中一些官员更是说：如果废帝，则“南省耗接之下，必有造反之意”。^[2]这让老太太很不爽，太伤自尊咧！

就在老太后最郁闷的时刻，义和团起来了。当然，政府对于这种民间力量，既是犹豫的也是矛盾的。又想利用，又怕引火烧身。这种犹豫与矛盾，导致了地方官员的为难。山东巡抚毓贤就是典型的例子。按照常识与惯例，对义和团不外是格杀勿论。可是现在，政府又想利用他们。何况自从中法战争前后，在清流派的叫嚣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清政府的各级官员多少有了那么一点爱国意识与民族主义意识。进一步说，除了公愤，中国官员与西方还有很多的私怨。于是，喊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受到了部分官员的扶持。中央有载漪、刚毅等守旧大臣，地方有毓贤这样的封疆大吏。或者说，毓贤就是跟着上面走的。

政府与义和团的这种暧昧关系，很让西方不满。特别是山东这个重灾区，让西方直接对山东巡抚不满起来。他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撤掉毓贤，换上袁世凯。在他们眼里，袁世凯是个能干的人，山东的秩序也有赖于他才能恢复。

对于山东，袁世凯早有关注。5月底，他曾奉荣禄的命令前往德州一带演习行军阵法。在德州驻扎期间，他多次给荣禄去信，对

[1] 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2] 同上，第15页。

山东巡抚毓贤的做法表示不满。在致徐世昌的信中，他说：“今日之时局，诚所走一步说一步也，断难向好处设想。”看见山东巡抚毓贤的公文，居然是饬各营禁习洋操，专练刀矛棍棒，可把袁世凯气死了，说：“可惜以国家难措之饷，供此班糊涂人任意掷费，不甚愤懑。东抚（山东巡抚）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1]另一封致徐世昌的信中，袁世凯对自己所练新兵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说德州地方官均甚帮忙，“且甚佩服本军纪律，居民无不歌颂，一路至今，民兵交涉竟无一件事”，“平日训练之效，于今见之”，“士卒之气大可一战，惜不能耳”。当然他所说的战争对象乃是在山东的德人。信末，再次指出东省巡抚毓贤，“事皆不办，惟翻汉仙（毓贤前任张汝梅）所为，残暴非常，终日打骂，虽县役毛贼亦辄提来鞭责，大吏固如是耶”。看来，大清的省长就是这么种东西了。也许正因为如此，袁世凯才在信中曰“总之大局无复望矣”。^[2]

虽然无望，但事总是要做的。7月，他上《强敌构衅侵权亟宜防范折》。在这个折子中，他可没有例行公事老生常谈，而是结结实实地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德人窥伺山东，蓄志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今又与英人分界造路，德之工匠员司将纷至踏来。该省民性刚强，仇视龃龉，德人即由胶澳借口遣兵，侵权自治。长此以往，不但骚动民心，尤损我国体。如按各国交际通例办理，德兵入我内地，戕我居民，即为衅自彼开，立应兴兵击逐。惟现值时艰方殷，朝廷郑重邦交，顾全大局，自不

[1]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5页。

[2] 同上，第16页。

得不曲予优容。然敌情无厌，后患伊于胡底。东省居南北要冲，海程陆路悉出于此，倘滋他族逼处，我之漕运饷源势必梗阻，利害所关殊非浅鲜。现筹防范之策，似莫若先自经理，不资以可借之口，不予以可乘之隙，当可渐就相安，借保我自有之权。

具体怎么办呢？臣有四策：

一曰，慎选守令。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原其故，固由教民之强横，亦由地方官未能持平办理。近闻东省官吏，非视洋人如仇，即畏之如虎。其仇者固足倡民生事，而畏者尤足府怨激变。查良民、教民本属一体，既为长官，即有约束惩治之权，判案但循律例，原不必分良教为两歧。倘有教士、洋人干预词讼，自可据理驳斥，其教士之甚不安分者，亦可查照条约，列其实迹证据，详请上司照会该管领事官，查明驱逐。如该领事查办未能公允，亦可转详大吏咨请总理衙门办理，果属理直情实，该国使员亦何得任意偏袒。纵使终难妥结，而教士迭被查讯，拖累良苦，亦必备知敛迹。乃畏事官吏，顾惜禄位，不耐烦琐，遇有教案，但欲责惩良民，敷衍了事，冀可偷保目前之安。而教民之气焰益张，良民之激怒愈甚，一旦变生仓猝，势同决川。民间多一教案，公家即多一亏损，是良民之欲报复乎教民者，反足以贻累于公家，而挑衅于强敌。星星之火，终至燎原，未始不由与办理不善有以酿成之。拟请饬山东抚臣，查各州县教民之多寡，情形之难易，酌量轻重，不拘常格，慎选牧令，须求谙练约章明达时务者，分别补署，以期遇案持平，不激不随。久之民教自可相安矣。

一曰，讲求约章。内地官吏，大半不谙约章，退事无所依据，故办事难期允当。拟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选派明练员司，将各

国条约公法，并办理内地交涉各成案，凡关涉教案交际为内地官吏所须知者，均简选成书，发交疆臣多加刊印，分颁各守令，奉为准则，遇事援照妥办，毋得任意出入。并发给在省候补人员与吏治各书同事讲习，或酌定奖励，按月课试，以征其才具之优劣，识见之浅深，遇事差委，亦可收得人之效。

一曰，分驻巡兵。德兵出胶澳登岸时，有就近出入之人，一遇拦阻辄为口实。拟请饬山东抚臣选择该省营兵内素有纪律者，分驻附近胶州各邑，及勘查铁路经过各处，并遴派统统将往来梭查，每处或百人，或数十人为率，自亦无需过多。遇有洋人出入经过，即派兵弁护送照料。并扼要屯驻数千人，以作各处之援应。德人见我巡兵周密，重兵扼扎，既不得借口遣兵，尤不敢任意寻衅。是于保护之中隐寓钤制之术，先事预防，裨益良多。

一曰，遴员驻胶。查胶州距山东省会约近千里，抚臣以相距既远，情形或未能周悉，防范亦恐难及时。似应由抚臣速调请练洋务大员驻扎胶州，专办交涉事件。并与胶澳德员订明章程，凡有德人由该处前往内地，均须知会驻员验明执照，分饬沿途妥为照料。遇事亦可就近会商，并随时刺探德兵意向动静，以便预作准备，无形之功用，实亦非细。^[1]

这个折子是密折，也就是说，袁世凯仅是说给最高执政者听的。所以他说得痛快淋漓，且无一不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折子，让政府动了心思。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12月6日，清政府将毓贤调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仍旧节制武卫右军。袁世凯这下升到最高层了，封疆大吏。政府召他赴任前进京请训，蒙太后召见两次。也

[1] 《袁世凯奏议·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版，第31—33页。

许他没想到，他折子中所谓的“慎选守令”，却是自己被“慎选”了。

袁世凯上任时路经德州，接见了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吴桥县令劳乃宣，并电促直隶总督裕禄向朝廷上奏，请剿办义和团。12月26日，他到达济南接印视事，第二天，即颁布《查禁义和拳匪告示》。云：“本署抚部钦承恩命，建军以来统率重兵，弹压镇抚，……倘再目无法纪，恃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焚。”如果说这算吓唬的话，后面就是奖励了：凡献首、自新和具有解散之功者，都会受到本抚奖励。^[1]

问题是，他还没有开始干呢，政府的指责已经提前下来了：

军机处字寄，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有人奏，山东民教不和，亟应持平办理一折，所奏语多中肯。其推原民教情形，亦确切近日情事。著袁世凯严饬各属，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惑。总之，操纵之妙在乎平时，地方官果为众情所服，遇事自不难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其所陈慎重兵端，整顿吏治，尤为扼要之论，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等因。钦此。^[2]

这一切弄得袁世凯很莫名其妙。怎么12月26日接印当天（十一月二十四日）就有人奏我干得不好？

三天之后，也就是12月29日，政府又发来密谕。曰：

拳民聚众滋事，自无宽纵酿祸之理。惟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

[1] 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5页。

[2]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4页。

散为第一要义。如果寻击官兵，始终抗拒，不得已而示以兵威，亦应详察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著袁世凯相机设法，慎之又慎，……毋轻听谣传，任令营员贪功喜事，稍涉操切，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1]

这个谕旨更吓人了。

1900年1月3日，又有御使熙麟上奏，话说得更歹毒了：自袁世凯做了山东巡抚，东省人民因该侍郎乃袁世敦之弟，人心即甚惶惑。乃该侍郎初到署任，即有必将义和团匪类尽行剿绝之言。其所部将弁营勇，恃其声望，更是传播主剿之说，以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举有灭此朝食之势。于是讹言四起，人心更加惶惑……东省全境，不属于团，则属于教，属于团，已难猝办，属于教，何计挽回？山东一省，将不复为国家有矣。^[2]

这里需要解释几句，袁世敦，袁世凯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现在山东做补用知府，前受山东巡抚毓贤指派，前往平原县镇压义和团。从地方官的角度，镇压义和团本是保护治安、维持秩序的，在御使笔下，却能变成动乱搅拌剂，不镇压还好，一镇压全乱套。这哪是正常人的思维呢？正是由于这御使的奏折，政府再次给袁世凯施压：“复有人奏，东省民心未定，宜徐筹开解镇抚之方，并虑及该署抚一意主剿，致滋事端等语。山东民教不和，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谅该署抚必能体察情形，分别办理，断不至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有负委任。”^[3]

[1]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页。

[2] 同上。

[3] 同上，第47页。



山东巡抚时期的袁世凯

袁世凯这时年方40岁，正值壮年。过去五年，他吃住在军营，用心血带出一支王牌军队。在经受过八国联军的打击后，清国最精锐的武卫军前、后、左、中四军基本被击溃，只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丝毫没有受损。慈禧不得不正视他。

气死袁世凯了。1900年1月6日，在致徐世昌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新官上任的具体情形：第一，接印之后，即开始办理匪案。先以解散晓谕为主，次再缉其匪首，以清祸根；如其抗拒不散，再派兵弹压；倘来格斗，再相机击歼，已可谓格外慎重。第二，正派人驰往办理间，即奉廷寄抄示京官奏请，戒弟以意气用事，徒恃兵力等语。此奏即在廿四日接印之期，似未免太早。东省事从何办起，只好暂作停顿。第三，查义和拳实系匪类，以仇教为名而阴逞不轨。初起时专掠教民，尚有良民附和之者。近则掠及良善，绑票勒赎，专以抢掠为生计。良民有集团协捕者。现平民已知其为匪，有业者各归农田，只剩数十悍匪，随处纠合无赖少年，或百余人或十人，任意抢掠，直掠至距省30里（计抢500余家，杀英人一名，焚教堂多处，如何得了）。地方官懔遵京官之奏，均不敢派兵剿除，胥役又不能捕，未知闹到何时始能了事。前任一味纵容，并出示讽煽。匪民自谓奉官所允，又为法所不禁。兵吏均不敢逼前，安得不猖獗也。第四，此处公牍每日不过一百五六十件，尚不甚忙。而前任公事积有两千五六百件，内有三四月尚未批者，又有请示正法案数起久未批者，并题本数十件未办者。此为大吏，时事可知矣。从来未闻有此懒人，何亦升任封圻耶。第五，东省民教不和，大半由于地方官办理未能持平。前任自己怕洋人而煽动百姓与人闹事，未免太左。^[1]

看看这信，就知道袁世凯是真想干事。问题是光想干事是不行的。

1900年1月11日，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一道谕旨，命令各地督抚严饬地方官要把会同匪区别开来，不能把入会的人一概视

[1]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9—20页。

为匪徒，此后办理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1]这道谕旨让外国人感深疑惑，这个清政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我们也搞不清。老太后的心思倒是不难猜，但是老太后自己都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又怎么猜呢？

1900年1月16日，在致徐世昌的另一封信中，袁世凯说：“近日匪徒日见平静，凡抢掠人者实无良民，现已窜往宣、东交界处滋扰，人数亦不甚多，两省悍寇均在其内。然仍未用兵，只饬令严缉有案之匪首而已。请转告东省京友，弟他无所长，惟不贪赃、不枉法、不害民、不欺上四句尚可自信，到任不过十数日，何至有许多劣迹被人一再参劾也。自必有居心倾排者在其内。如能将弟援出苦海或放归田里，讵非大幸事，又何足计较，但行其在我而已。”^[2]

再看看这信，更知道袁世凯的苦衷了。

单就义和团方面，如果正常情况下，从清政府的角度，光看信本身，也可断定袁世凯是对的，更是能干的。问题是，此时的清政府要的就是错，而且你越能干，它越压你。与此同时，袁世凯的那个异母哥哥袁世敦也倒霉了。据平原县令蒋楷所撰《平原拳匪纪事》，朱红灯流窜到了平原县，当时自己和袁世敦乃是前往寻找朱红灯执行巡抚毓贤“议抚”之议的。奈何朱红灯节节胜利正打得爽呢，直接递过来了战书。袁世敦的两哨骑兵抵挡不住（按毓贤的棍棒操法，当然抵挡不住），纷纷倒下，气得袁世敦血性发作，大叫：“今日不活矣！捕一土匪，而挫辱至此，复何面目见人乎？”^[3]众人

[1]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6页。

[2]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20—21页。

[3] 《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页。

感奋，适有援队前来，两队合击，又把朱红灯打了个稀里哗啦。结果呢，袁世敦被劾“纵勇扰民”，革职。袁世凯在致徐世昌的这封信中，也替哥哥喊冤了。说匪先将官兵打败，追击二里许，伤兵三名，袁世敦才回击的，误伤平民裴姓之人。不管怎么说，袁世敦的政治生涯从此结束，并且对自己的弟弟袁世凯也有了看法，认为他没有帮自己说话。袁世凯能说上什么话呢？

上面风向转了。这风向，跟老太后的心病相关。老太后本就退而求其次了，只想废帝。但是废帝大家也反对。老太后呢，做国家领导人时间长了，养出了职业性格，那就是：你们愈反对，我愈要干。跟荣禄对谈后，她接受了荣禄的建议，那就是“择宗社近支子，建立大阿哥”，“育之宫中，徐纂大统”。^[1]于是太后立即给光绪选定接班人——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

戊戌改革时，老太太一口一个祖制。事实上，在晚清这样的衰世，最应该恢复的祖制是满洲人打天下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算不得中国的国会，更算不得西方的议会，但好歹是贵族精英的集合体。晚清找不着多少贵族精英了，但是即使贵族笨蛋合到一块儿，应该也比老太太一个人的智商与情商高些。总之，老太太选国家领导人，就跟乡间老太选自家哪头母猪应该被配种似的，透着轻率与随意。当然了，人家的家事嘛，我们外人也不好说啥。只不过，老太后连家规都违反了。雍正创造了秘密立储制，哪有这样公开选定接班人的？而且，考证两千年历史，凡是公开选定为接班人的往往没有好下场，于公于私都不是好事。但是老太后不管了。反正她这垂帘，已经违反家规半个世纪了，也不在乎再来违反一次。

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召见了皇亲贵族和军机大臣，宣

[1] 《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8页。

布自己选定的革命接班人乃是端王载漪之子溥儏，并宣谕，仪式定于新年春节举行。会上有两个人表现不错，一个是大学士徐桐，给光绪起的封号为昏德公，他自己可谓是徐混蛋了。一个是军机大臣孙家鼐，请太后勿行废立之事，言若行此事，恐南方有变，选择新帝之意，常在太后心中，当俟诸万岁后方可举行。太后闻之，甚为不乐，谓孙曰：“这是我们一家人会议，兼召汉大臣，不过是为体面。此事我已告知皇帝，帝亦无言。”^[1]

一句话把孙军机噎死了，俺的家事，与尔何干？

问题是有人不干。估计是西风东渐的情况下，有国家意识了。所以立储诏书下发后，上海电报总办经元善联合上海绅商市民一千二百余人发过来一炮，电奏谏阻。虽然他本人遭到通缉，乘英轮南逃澳门，家产被抄，但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全国各地响应，通电，布告，反对！与此同时，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的“保皇会”，以“救我变法爱民之圣主”为名，组织迅速扩大到五大洲近二百埠，他们的抗议电报更是如雪片般飞来，要求慈禧“速行归政”，并“决意起兵勤王”。太后心想，你们反对我不怕，问问国际友人吧。命令李鸿章运动各国公使进宫朝贺。之前，具体来讲是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12月13日，太后甚至亲自邀请各国公使夫人进宫宴饮，做足了姿态，并且赠给她们贵重的礼品。没想到各国公使遭遇不到中国男人的那种枕头风，或者说，他们的女人也不会学着中国女人的小样儿，在跟男人睡觉时摆出买卖与交易的姿式来。总之，外国公使不干。不干也就罢了，还说风凉话：“乃贵国事，吾国何得干预？惟以后不认中国有新皇帝耳！”^[2]

[1] 《景善日记》，《清代野史·第一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90页。

[2] 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太后恼死了。

太后恼，载漪更恼。以新皇帝他爹的姿态在家里大摆宴席迎候各位贺客，但是最希望看到的贺客——外国驻京公使们一个没来。虽说端郡王在爱新觉罗家以智商低下而闻名，但是没有智商不说明没有自尊，或者说智商愈低自尊心愈是畸形。洋人们绝没有想到，对于大清家事的不支持，居然成就了大清家里的首号反帝爱国英雄——“自是载漪之痛恨外人，几于不共戴天之势”——凡是敌人反对的，就是我要拥护的。于是，载漪从此跟义和团穿一条裤子，民族英雄就这样诞生了。

老太后也往民族英雄那个方向去了。做寡妇四十年了，谁敢对她说半个不字呢？本来预定庚子年正月初一，也就是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1 月 31 日让光绪皇帝行让位礼，让溥儕登基，改元“保庆”。但是国内反对，国外晾菜，连亲信的庆亲王奕劻与荣禄也以此谏止，搞得太后也不敢立行废立了，只在这一天将溥儕接入宫中，行了礼，做了大阿哥。

唉，气死太后了。听说直隶山东出了神功群众，专给洋人颜色看。莫不成，希望在民间，失政求诸野？老太后的心遂向东飘去！

如果说康有为“望在上者一无可望”是正确的，那么更正确的应该是“望在下者亦一无可望”。从古至今，中国的群众运动大都是运动群众，所以义和团给太后与载漪做炮灰的历史命运在此注定。

袁世凯当然不知道太后与载漪的心思，他是按常识与逻辑来的。义和团当然要镇压。不镇压，自己不就成吃干饭的了？

虽然上面的风向有变化，但是 1900 年的春天，袁世凯还是把山东的义和团给镇下去了：不是销声匿迹；就是转战到直隶了，也可以叫祸水外流吧。其他不说，只说直隶的义和团，连发展团众都

成了绑架式的了，揭帖云：“各省爱国志士，睹西人无法无天之行为，已决于四月十五日集合，屠戮西人，焚毁其居，其不与我同心一致者，男盗女娼。阅此告示，而不为传播者，亦如之。完了。”^[1]看这揭帖，不与之同心，不给其传播，就是男盗女娼。我宁愿做男盗女娼，也不做这样的爱国志士。你以为这种爱国志士能给你打出一个幸福自由的天下吗？马克思曾经说：“中国革命的代表才真是奇特哩。除了换朝代以外，他们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所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有当权者的惊惶还要更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立。”他甚至把这种中国式革命称作“天灾”。文章的末尾，他总结说：“太平军大概就是中国人脑子里所幻想的那种现身的魔王吧。但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的魔王。这类魔王是停滞的社会生活之产物。”^[2]

咱能指望这种产物吗？

6.3 八国联军进中国，袁世凯的机会来了

直隶总督裕禄也知道义和团不是好东西。他说：“义和拳实系邪匪，并非义民”，义和团“党羽甚众，借闹教为名，煽惑倡乱。若再由州县敷衍姑息，必致养痈成患”，认为“非稍用兵力，不能震慑解散也”。^[3]政府指示他剿抚并用，手下留情。当然，不要求他手下留情，义和团也是不好镇压的。众所周知，除了袁世凯的新建陆

[1] 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10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140页。

[3] 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

军，中国其他部队还是那个德行。所以官民双方的战斗力，也差不了多少。何况义和团还玩刀枪不入的法术呢？关键是，袁世凯那边的山东拳民，也都蜂涌进了直隶，于是直隶义和团大发展。由于政府的暧昧态度及部分地方官员暗地里的怂恿，义和团就跟红卫兵似的，搞起了大串连。一方有事，八方赴援。三五成群地走在路上，官衙商民，莫敢过问。敢于对义和团说不者，就跟大右派似的，一旦被义和团围住，不是被刀矛刺个体无完肤，就是自己在家绝食以待自毙。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5月，义和团占领涿州，并且由此开始了更极端的行为——攻打涿州和北京之间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及电报设施。在铁路沿线工作的法国与比利时的工程师也受到了攻击并且被杀戮，这让外国人深受刺激。当然，清政府也有些打摆子。于是聂士成被政府派去镇压义和团兼护卫铁路，双方结结实实地交锋过几次，老聂更是被义和团恨死了。5月底6月初的时候，太后打摆子最厉害，下发了诸多自相矛盾的谕旨，一会儿要求镇压，一会儿又要求招抚。6月4日，太后派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力主支持义和团的刚毅惟恐赵舒翘的汇报结果不利，也赶往涿州。赵舒翔回考察已明显看出义和团所谓“神功”全是假的，但刚毅却力言神功“可恃”。赵是老官僚了，江湖上混得久，知道刚毅的意思，更知道刚毅背后站着一个载漪，载漪背后站着一个慈禧。于是表示刚毅所言并非无见，便先回京报告，留刚毅在涿州与义和团商议合作之事。而刚毅与义和团商议的合作，就是把聂士成手下的两员虎将从涿州调走，放任义和团恶性发展。赵当然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不敢完全谎报，面对太后时，含糊其辞汇报一番，但在刚毅与载漪等人的影响下，慈禧最终下决心招抚义和团与洋人对抗。于是义和团蜂涌进了京津二城。6月13日，北京的义和团就开始大规模焚烧教堂了。6月15

日开始围攻使馆。6月16日到6月19日太后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对外和战问题。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两派吵得一塌糊涂。如果说主战方是假民族主义，那么主和方则是真爱国主义。载漪为了从背后踹老太后一脚，炮制了一份西方列强勒令老太后归政的假照会，派遣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半夜三更送到荣禄手里。荣禄也老糊涂了，绕屋行，彷徨终夜，早上送给太后。于是，6月17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当大家吵得不可开交、载漪大骂立山是汉奸时，老太后突然念起了文件：“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一、代收各省钱粮；一、代掌天下兵权……”老太后没念第四条，她不好意思，第四条是：勒令皇太后归政。老太后更老糊涂了，起码的国际游戏规则及外交常识也缺失了，也不想想这最后通牒是从何处来的，它根本没有经过中外任何外交人员之手。按照荣禄的说法，它是那个江苏粮道派儿子送来的。而按罗嘉杰的说法，他是通过关系弄到手的。什么关系？当然是载漪的关系啦。难道西方给中国政府送公文，也跟中国人送礼似的，需要偷偷摸摸的不成？总之，老太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沦为了载漪的工具，被这个假照会激将得像个巾帼英雄似的，念完后大声说：“今日衅自彼开，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叩头曰：臣等愿效死力。有的干脆哭上了。载漪一帮复乘机主战，语调高昂，刺激得太后更有气度，复高声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1]已具外交

[1] 《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49页。

常识的主和派虽然认为这个照会荒诞不经，但已完全处于下风了。

不过，政府收到了不在现场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发来的电报，建议立即剿灭义和团，乱民不但不可保国，外兵深入，大局溃烂，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6月18日，慈禧第三次召集御前会议。载漪等请攻使馆。内阁学者联元认为，攻打使馆，无视国际游戏规则，恐将来洋兵杀入京城，必致鸡犬不留。太后虽然对外暂缓宣战，但是对内却下诏表扬义和团为义民，拨给内帑银十万两。6月19日大沽口沦陷的消息传来，太后马上召开了第四次御前会议。这次她就不打算给大家讨论的机会，准备直接宣战了。她说，列强没有要求她归政前，她还有惩办义和团的意思，今洋人已索取大沽炮台，干涉我内政如此，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可忍的结果，太后命令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许景澄前往使馆给外国人送照会，限洋人24小时内离开北京，由政府派兵护送到天津。6月20日一大早，西太后召开枢臣会议。荣禄做了最后的努力，泣请太后开战可以，但勿攻使馆。并强调若如端王等所主张，则国庙社稷，实为危险。即杀死使臣数人，亦不足以显扬国威，徒费气力，毫无益处。可惜老寡妇听不进。认为自己卧薪尝胆四十年有余，也应该去外面遛遛了。并且批评荣禄：以老成谋国，中外都尊为大臣呢，此次却力主保护使馆，实在荒谬。你要除这话之外，再没有别的好主意，可即退出，不必在此多话！荣禄乃叩头退出。在此之前，带病工作的荣禄已N次上禀，要求政府赶紧剿办义和团，以清乱萌，以杜外人借口，恰是真正的老成谋国，奈何不合老太后的心思，说得再多也没用，还招老太后烦。而且，自己都要被爱国志士们打成奸臣了。N天前，手下将领董福祥就参劾他这个上司，说荣禄是奸臣，从中作梗，否则他五天之内即可把所有外国使馆消灭干净。一句话，唯一能在老太后之前说话的荣相，也说不上话了。

6月21日，老太后的宣战诏书出笼了：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距三十年来，特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梟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肆兵监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抗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詐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仪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滅彼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勤。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绝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

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1]

这个诏书是由军机章京连文冲写的，使用的是离骚体，文采很好，姿态很骚。不过仔细看看这诏书，就会发现诸多奇怪：第一，诏书中根本没提所谓的照会四条。敢情老太后也知道它来路不正，没法提及。第二，老太后气势汹汹地向人宣战呢，却没提人家国名，只说了几个“彼等”！彼等都有谁呢？老太后不知道，看到诏书的大臣也不知道，驻扎奉天（沈阳）的盛京将军增祺甚至向朝廷请示说：“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何？传闻未得其详。应悬明示，以便相机应敌。”也就是说，盛京将军不知该把枪口朝向哪个国家。这里我们可以帮太后与她的守疆大吏们统计出两组数字，一组是进中国的八国：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一组是事后与中国签订《辛丑条约》的十一国：除了第一组中的八国，另加西班牙、荷兰和比利时。老太后有能耐，她把所有外国合到一块儿，一锅炖了，凡是洋人，统统是她的敌人。

此外，老太后还有一大能耐，在诏书里看不到，只能在实际行动里看到，那就是，老太后这宣战诏书没有通过自己的驻外公使送到任何一个国家去。她就是自己玩的。众所周知，按当时的国际法，宣战是当事国必须履行的义务之一，也是战争的法律程序之一。而且，宣战要有几项基本内容：宣战原因，宣战对象；什么时候开始与宣战对象进入战争状态等等。问题是我们的最高领导根本不管这一套，她这宣战诏书顶多是宣给国内臣民看的，相当于内部动员令：政府实在忍受不了了哇，臣民们给我冲啊！有赏啊！

不可忍的情况下，先把徐用仪、联元、立山、许景澄、袁昶等

[1]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2—163页。

五个主和派当汉奸杀了，史称“庚子被祸五大臣”。

与此同时，庄王载勋贴出告示曰：“募能杀洋人者，杀一男夷赏银五十两，女夷四十两，稚夷二十两。”^[1]这个王八蛋，男夷女夷不均价不说，孩子在他们眼里居然不及大人一半。关于围攻使馆，这群王八蛋的想法更是下流至极：“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易，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星明概，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2]一句话，我们就是为了换皇帝，最后还得和，和不就是割地赔款吗？为了换皇帝，什么血本俺们都不在乎。

西方也不傻，知道老太后在胡折腾。当时的西方报纸社论曰：“中国与各大强国同时在作战，它是由西太后和她的奸党的选择而作战的。他们万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为他们能够安全地抗拒列强……不管发生任何事件，这批奸党若不自动离去，就必须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寻出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之上。现时必须对中国人民明白指出，挑起目前战争的是西太后，我们不是对中国作战，而是对那个篡夺政权的北京政府作战。”马士评价曰：“地狱里有怒鬼，但是比不上一位妇人受着藐视的时候怒气之盛。”^[3]这种怒气让中国走向了“挑衅国际法”并“蔑视全世界”的末日疯狂中，其直接后果就是八国联军进中国，人家进得有理有据，其正当性来源于两大根据：“第一个是根据国际法。国际法保护外交使团和驻外使馆，同时也保护侨居他国的外国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

[1] 《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

[2] 《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3] 马士（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234页。

全。中国破坏了使馆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毁坏外国财产，使外国人失去生命，理应受到制裁并进行赔偿。这是一些有着严格规定的法规，自 1840 年以来，欧洲列强常常把它们强加给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与这一规范国际行为的世界性法规相比，列强干涉中国的第二个根据并没有崇高威严，也没有那样明确的规定，但对于参与帝国和殖民地活动的人来说，其重要性丝毫不比国际法小。这一根据就是传播文明的使命感，就是所谓“白人的责任”。按照这一理念，西方文明的代表者们有责任去教育其他地区中那些文明程度不够的居民，并且改变他们的野蛮状态。英国在中国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类似文明使命的活动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把这一活动组织成了一项教育工程，在这一工程中，他们教育中国如何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义和团起义不仅使这一工程突然中止，而且表现出中国人天生具有的那种不断再生的和潜在的野蛮和残暴。”^[1]

下面，我们看看西方是如何应对的吧：

5月20日，各国公使召开了公使团会议。会上大家还很乐观。会后给总理衙门提交了联合照会，说：五天之内不给满意答复，我们将自己派兵前来维持治安与秩序。中方在最后一天回复说，我们一定严厉镇压义和团。

5月26日，公使团再次召开会议。照会总理衙门，质问中方将采取哪些明确而有效的措施。如果没有满意的答复，他们立即派兵前来。

5月27日，庆亲王奕劻接见外国公使代表，表示：义和团既是

[1] 何伟亚（美）：《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252页。

你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保护使馆与教堂。而他作为驻京清军指挥官，也愿意亲自承担对所有外国人的保护。公使们相信了他，决定再观察一天。

5月28日，义和团焚毁丰台车站的消息和京津路轨均被拆除的谣言震惊了外国公使。他们立即举行会议，西方民主史上，罕见地一致通过，同意不失时机地调卫队前来保护使馆。戊戌维新失败之后，也就是1898年9月，西方曾争取到了每国30员海军卫队保护使馆的特权，日久无事，又都减少了。现在，经过一番争执，5月31日，中国政府终于同意，每国派兵不超过30人。于是，第一批运进336名，第二批运进80名。与此同时，沿海集结二十多艘战舰。6月初，义和团开始拆除京津路轨。6月10日，英国公使紧急求援，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2000名联军士兵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已走不到北京了。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向中国内陆挺进。

6月21日，中国政府宣战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招抚义和团。被主子当作炮灰用了，这是多大的荣幸啊。义和团群情振奋，爽歪了。天津的义和团甚至连聂士成都看不起了，见了聂士成那是挥刀相向，喊着要杀他，吓得聂士成下马绕道而行。至于其他官吏，义和团更是对他们呼一喝二的，不是喝令他们下轿，步行到大师兄处向神拈香，就是喝令他们下轿免冠，站立道旁，恭候义和团过去。^[1]

8月12日，八国联军越过通州向北京进发。

8月14日，慈禧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已无一人应召。晚间在宫中只有三位军机大臣：王文韶、刚毅和赵舒翘，慈禧一脸凄怆，要求三人随她母子同行。

[1] 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

8月15日，太后西巡了。

老太后诱敌深入，她成功了——把八国联军引向了北京。那么我们的袁世凯在干什么呢？用李鸿章的话来讲，那是“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

（一）有教案，就严肃处理。并且派出军队，切实保护教堂教士。在其护卫下，山东全省没有一个洋人遇害。就是中国教民，袁世凯也切实保护。刚开始，政府强迫教民退教，并要求他们写下永不习教的保证书，袁世凯也执行了。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地方属吏太过严酷（不让百姓信教，本就干涉信仰自由嘛）。袁世凯一看不妙，马上停止退教措施。不管洋人土人，教会教徒，一概保护。

（二）政府不让剿灭义和团，那就查禁瓦解。但是若匪来找官兵的事，则放炮痛击。谁不放炮痛击，一概正法。义和团歌曰：杀了袁天王，我们好吃饭。并且在巡抚衙门墙壁上画一头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趴在洋人屁股后面。袁世凯当然不与他们一般见识。

（三）3月，政府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由于武卫右军远远不够用，于是他奏请将山东原有的三十四营勇队拆并，留下二十营1500人，改称武卫右军先锋队，重加训练，并且换上新式毛瑟枪。以后又把其余十多营部署在全省各要地。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然对付不了洋枪洋炮的新式军队，结果当然很惨。

（四）5月，政府想把义和团改为官办团练，让袁世凯考虑是否可行。他考虑的结果当然是不可行：义和团聚众游行，抢劫财物，不得谓之保护身家；烧杀掳掠，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1]总而言之，义和团不是好东西，没法收为官用。

[1]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5页。

(五) 6月, 政府招袁世凯北上勤王。袁回曰: 京师为天下根本, 我应该去的。但是东省也很重要啊, 我一走就乱套了。有人认为这是袁世凯虚伪。我觉得, 他还是实在了。因为他知道, 他的部队不是八国联军的对手。而且, 他一走, 山东肯定要乱。但是又不得不有所表示, 于是派孙金彪带领三千人马北上。政府一听说东省也重要, 遂同意袁不再派兵, 于是, 袁赶紧撤回孙金彪。但是政府却又要他们奔赴天津。袁世凯不愿意了, 天这么热, 光叫我兵来回跑呢? 遂不奉朝命。政府再命, 袁世凯改派夏辛酉率兵北上。7月14日, 天津沦陷。夏辛酉去了也不顶用, 净在路上逗留观望了。北京危急, 太后又命袁世凯北上勤王。袁世凯依然按兵不动。手下张勋请缨, 愿独树一旗, 作马革裹尸之计, 以报君父大仇。对于这么一个憨蛋, 袁世凯光口头奖励, 说他是个好同志, 就是不批他上前线。对于义和团, 他撵着他们上前线, 政府正式招抚义和团后, 山东义和团蠢蠢欲动, 袁世凯对他们的要求是: 天津前线更需要你们, 快上前线去扶清灭洋; 谁不上, 光在山东捣乱, 谁就是假义和团, 别怪我不客气。

(六)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广总督李鸿章都知道太后是在玩火, 对于北京的谕旨, 均不奉诏, 并且与西方各国策划出一个互不侵犯、互保安全的东南互保同盟。袁世凯也加入了。事后袁世凯跟属僚说: “此次变乱, 各督抚中如无我辈四人擗柱, 国事尚可问乎?”^[1]

(七) 8月, 政府不但把李鸿章由两广总督调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还让他做议和全权代表。袁世凯早就认定, “和议将开, 筹办善后, 自以抚恤被扰教民为第一要义”。于是主动命令州县官吏

[1] 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二》, 1913年版, 第22页。

亲赴各乡调研，将团民财产查封变价，以作抚恤之用。地方官不好好查，袁世凯就说，将来所需抚恤款项，由地方官自行筹备或自行垫赔。看来他还是有先见之明的，知道最后就是这么个结局。

(八) 12月，八国联军打到了直隶南部，与直隶邻近的山东各县纷纷告警。袁世凯认为，山东的义和团已剿灭殆尽，八国联军没有借口前来侵犯。同时他给德国驻京公使穆默等人打招呼，要求八国联军不要进入山东地界。由于没有及时得到穆默等人的回复，袁世凯遂让各县打造山东界牌，到处竖立。甭说，还真管用，八国联军一看到山东界牌或者墙壁上书有“此山东境”字样，便立马儿掉头，不加进犯。这一切，让山东绅民齐声感颂。

(九) 由于袁世凯的保教措施，导致义和团的首发地——山东居然成了洋人的避难地。不但在境洋人得到了妥当的保护，就是外省洋人也纷纷前往，得到了袁世凯的周密护卫。这一切，让袁世凯在洋人眼里闪闪发亮：中国官员也有讲游戏规则的嘛！

(十) 当然，主子对袁世凯也有怨言，为啥不上京勤王呢？好说，袁世凯一看太后逃到了山西，就上折说，山西太穷了，没吃的没喝的。我这里有十万两，派人星夜兼程给太后送去。并且表示，仍当随时赶筹巨款，源源接济，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是第一个把接济款送到太后处的，之后更是源源不断。太后出逃的时候，一无所有。袁世凯的这些作为，让太后感到了满足与慰藉。我们可以说他是投机，也可以说他是忠诚，当然也可以说他厚道。当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时，袁世凯既派张勋带兵前往护驾，又派姜桂题去河南护驾，他的心细与周到，博得了老太后的欢心。

一句话，八国联军进中国，让老太后蒙尘，狼狈不堪，却让袁世凯发光，意气飞扬。

当然，袁世凯也有倒霉事。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6月辛丑

条约谈判正急之时，跟随其在济南居住的生母刘氏去世。按常规，袁世凯当然要申请离职丁忧回籍营丧的。但是朝廷正自身难保中，当然不会批准，所以下了夺情之谕，说：俟大局稳定，再行赏假。令其在署穿孝百日，仍照常视事。只在公文行式上由别的官员代印。袁世凯这样的孝子，当然老大的不乐意，但是不管是在京谈判的李鸿章、奕劻，还是山东的士绅，纷纷请袁体念时艰，听从朝命。李鸿章与奕劻的来电里，更是有“扶柩归葬，有令兄等肩承，幸勿拘执”等语。^[1]一句话，您已经出嗣叔父了，所以对于生母的丧仪自可降服。想当年其生父袁保中去世，其堂叔父保恒、保龄也是以同样理由不准他回籍奔丧的，袁世凯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移孝作忠了。

就在袁世凯百日大孝过后不久，好事又来了——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去世。有人说，李鸿章临死前举荐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继承人，并且说了一句：“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关于李是否说过这句话，至今还在争论中。但是，李鸿章是否说过这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没有李的举荐，直隶总督也是袁的。另有一则野史传说，李氏暮年染病之际，有人劝他保奏直督人选，他回的是：继任有人在，我不想保举了。也就是说，李氏也知道，自己保举不保举，直督都是袁世凯的了。而且，在李鸿章辞世前，他曾请过十天的病假，老头为签约而大量咯血的事儿政府不是不知道，诸多大吏也注意到了李没有多少时日了。所以，对于李的后事，政府当早有考虑。事实上，11月7日下午，是李鸿章的政治副手、《辛丑条约》的助理谈判、直隶布政使周馥把丧报打到从西安回銮刚刚走到河南荥阳的太后手中的。这个丧报，既不是

[1]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140页。

李氏的遗折，也无李氏保荐袁世凯任直督的任何话语。太后当即根据周馥电奏明发上谕：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到任前由周馥护理。

所以，无论李氏是否乐意，袁世凯都是他当然的继承人了。更何况接任后的他，也网罗了李鸿章的主要班底，骨干人物有杨士骧、杨士琦、孙宝琦、赵秉钧、陈璧、胡惟德、朱家宝、吴重熹、齐耀林等淮系官僚。李氏捐馆，袁的挽联云：

公真旷代伟人，旋转乾坤，岂止勋名追郭令；
我是再传弟子，感恩知己，愿宏志业继萧规。

上联所谓的郭令，乃是中唐名将郭子仪，别名郭令公，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兴唐朝大业中居首功。袁世凯以此联比喻李氏乃清朝“同光中兴”的柱石。

下联，袁氏就自认再传弟子了，而且向长辈表态，革命尚未成功，我就萧规曹随吧——汉初名相曹参继承萧何开创的局面。

这联还不算夸张，比喻也算贴切。

之后，天津李鸿章祠堂建成，袁又再次撰联：

受知早岁，代将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阳，敢诩临淮壁垒；
世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上联所谓的汾阳，还是郭子仪，郭祖籍山西汾阳，安史之乱爆发后，任朔方节度使，率军平乱后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袁再次自认是李氏的衣钵传人。下联，拿诸葛来比李氏，有些过了。按鲁迅的说法，诸葛多智而近妖。且守着个弱智阿斗，想出祁山就出



1902年5月14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左二）、户部右侍郎、练兵大臣铁良（左一）等在保定与中英军事官员合影。

祁山，想出几次就出几次，端的爽歪了。李氏被中国的人事缠了一辈子，啥事也干不成，怎么能与诸葛那妖比呢？不通。

更不通的是范文澜先生，对着李袁之间的师承关系破口大骂：“卖国衣钵传授有人，老贼死了等于不死。”^[1]堂堂的历史学，怎么搞成村妇骂街了呢？这仇恨都从哪儿来的呢？叫人看得莫名其妙！

[1]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398 页。

第七章 北洋新政谁能敌？

1901年11月21日，袁世凯离开济南，北上赴任。由于八国联军依然占领着天津，他只好暂到保定履任视事。

11月28日，慈禧太后以袁世凯“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划”之功加其太子少保衔（从此人称袁宫保，据其女儿袁静雪回忆，袁世凯最喜欢人们称呼他袁宫保了）。看来，对于袁世凯参与东南互保，政府不但不怪罪，反而认定为功。只可惜我们有些人连这个弯都扭不过来。老太后违反国际公法，发动义和团攻击洋人洋货、教堂使馆，本就是荒唐至极的事。但是我们过去却多情地一以贯之地把它定性为反帝爱国运动。于是乎袁世凯的东南互保就只能是反动透顶的汉奸卖国贼行动了。从国际方面来讲，除非你是希特勒，国际一时制裁不了你，否则这种严重违反国际公法的事当然要受到惩处。从中国方面来讲，没有东南互保，中国是否还姓爱新觉罗且不说，就连中国是否能独立存在都是一大疑问呢。因为帝国主义不但策划李鸿章与革命党联手，搞两广自立，^[1]还策划张之洞自立。幸亏一个东南互保，让帝国主义少安毋躁，让大清苟延残喘。

1901年10月，太后开始由西安返京，于12月下旬进入直隶境内。袁世凯做了精心的迎驾准备，把保定行宫布置得富丽堂皇，并

[1] 参见董丛林：《李鸿章对“两广独立”的态度与庚子政局》，《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

先期赶到省界恭候。太后连日接见，并且在保定行宫呆了三天。之后，袁亲自护送太后上京。太后非常喜欢，赏其黄马褂、紫禁城内骑马等。

当然这一切对袁世凯来说都是小事。他还有诸多大事要干呢，那就是在太后的领导下，搞所谓的新政建设。

太后干嘛要搞新政，估计是想通了（当然是半通不通，是为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八国联军进中国，直接导致了太后西巡。西巡路上，平日里养尊处优的老太后可是遭了罪了。1900年8月18日，太后西巡的第三天，遭遇怀来知县吴永，一召见就哭上了：“予与皇帝连日历行数百里，竟不见一百姓，官吏竟绝迹无覩，今至尔怀来县，尔尚衣冠来此迎驾，可称我之忠臣，我不料大局坏到如此，我今见尔，犹不失地方官礼数，难道本朝江山，尚犹安全无恙耶？”^[1]直哭得吴永也陪着她一块儿哭。这人一遭罪一大哭，可能就清醒了。之后的路上，老太后发了诸多罪己诏，当然啦，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理解为辩护诏甚至替死鬼诏。1900年8月20日，太后西巡的第五天下发谕旨——当然都是以光绪那个傀儡皇帝的名义发的，先是表明天朝是个好天朝，“忠厚开基，厚泽深仁”后是说现在走到这个地步，自己也“负罪实甚”——算是勇敢地承担一点领导责任。再就是大骂君臣了：“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忱，无泄沓偷安之习，何至一旦败坏若此！尔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俱在，试念平日之受恩遇者若何？其自许忠义者安在？今见国家阽危若此，其将何以为心乎？”^[2]大臣们谁敢回嘴啊。1900年8月22日，太后西巡的第七天下发谕旨，先是自我批评一番，接着对有奏事之权者提出要求：以后于朕躬之过误，政治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大家一定要

[1] 《义和团·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5页。

[2]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88—489页。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要隐瞒啊！^[1] 阳谋啊阳谋。大臣们当然不傻，帝国的体制，有一说二，有二说一，就是不能直说。大家仰着脖子看太后打雷，三个多月过去了，愣是没一个进言的。1901年1月29日，太后自行下发了变法诏书，云：“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算是表明了变法的态度。接着表明要向西法学习，接受这次经验教训：“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当然还要表明康有为的变法不叫变法，乃是乱法也。最后要求：“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兵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2] 大家这才有些恍惚：难不成太后这次改革真的有诚意？

这次可以有。1901年2月14日，老太后接受了议和大纲十二条，颁布上谕，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出的，但我们看到的分明是老太后的媚态。这天恰好还是西方的情人节，这上谕读来就更有风情了：“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友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

[1]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91页。

[2]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4—915页。

交集。”^[1]混到这个份儿上，确实有些惭愧。惭愧的结果，当然就是改革了。你琢磨一下，中国的执政者只要主动改革了，其前提必是惭愧得不行了。只要能半死不活地往前挪，他肯定不改革。不管怎么说吧，太后终于做了康有为的政治继承人。

官吏们摸到太后有些真想改革的诚意，这才蠢蠢欲动。袁世凯的意思是，咱们督抚联合起来会奏，既可壮大声势，还可法不责众。一旦太后认为咱们胆子太大，步子过快，顶多是批评咱们一声儿，不至于像康梁或者庚子被祸五大臣那样，给整成反党反革命，死拉死拉的。督抚们一听，大都同意，但是谁管主稿呢？刘坤一与张之洞两大腕儿互相推让起来，一推就是仨月。推让间，政府不耐烦了，于1901年4月21日下谕，设督办政务处，作为新政总枢。命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等人担任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和张之洞遥为参预（后增补瞿鸿禨为政务大臣，袁世凯为参预大臣）。同时，朝廷认为变法上谕所限定的两个月复奏的期限已过，各省督抚大臣尚未上奏，故此谕特意催促大家动作快点，勿再迁延观望。一些督抚们嗅出了太后的意思，开始主张单衔上奏，唯刘坤一与张之洞仍主张联衔。又酝酿三个月，终于7月份完成所谓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了全面的新政方案，涉及经济、教育、军事、官制各方面。措施共分三大类二十七条：兴学育才四条，整顿中法十二条，采用西法十一条。按张之洞的设计，他认为中国也应该设上议院，并公举官吏什么的。但刘坤一反对，认为搞得太新，有些吓人，改革就可能进行不下去。张之洞也同意这点，因为他之前摸底的时候，有人告诉他，最好不要提什么西法，免得太后听了心烦。可是张之洞认为，不学西法学啥呢？当然，不学西法精华可以——学也学不来，不如先学

[1]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45—946页。

西法皮毛——能学个西法皮毛就不错了，但是设议院与公举官吏不妨成为我们将来的目标嘛。与此同时，原先在庆军营做幕僚、袁世凯曾经的老师张謇已混为实业界与教育界的领袖人物，清政府授其为“三品衔商部头等顾问官”，他也参与了新政方案的设计，认为：第一必须变法，第二必须缓变。看来，大家都吸取了康有为的教训。当然，没有康有为的教训，张謇也可能还是这么个意思，毕竟做过庆军幕僚，又以状元身份下的海，理论与实践俱有，不会像康那样把车开到250码的。张謇打了个比方，考虑到人民的风俗与士大夫的性情，日行百里阻于五十，何如日行二三十里者之不至于阻犹可达也？这比方打得非常好，就是欲速则不达嘛。但是尔也不能慢得赛乌龟。因为时至今日，我们的民间人士还发明一个毫米推进的改革术语。有些人士说了，毫米推进，我们同意。但是请问，毫米推进的时间单位若何？是一年推进一毫米，还是十年推进一毫米？

这话得问太后。太后阴沉不言，大家只好摸着前行了。就这么着，伴随着改革的春风，从1901（光绪二十七年）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袁世凯直督六年（1902年6月改为实任），于公举办了一系列新政（1903年袁世凯上奏，始用新政之名的）；于私，北洋势力进一步坐大。可以说，太后倚重的老人，一个个年老色衰，或者走向了人生的彼端——李鸿章死于1901年，刘坤一死于1902年，荣禄死于1903年，张之洞死于1909年。这就让袁世凯在晚清的政局中独占鳌头，新政成绩更是无人能敌。

7.1 继续巩固枪杆子

（一）义和团之乱后，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一枝独秀

武卫军成立后，参与两次大事。一次是镇压义和团，一次是抵

抗八国联军。当然，由于五军各有自己的防地与分统，所以它们的机遇与命运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说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义和团运动前期，驻防芦台的直隶提督聂士成亲率武卫前军在京津一线及其附近镇压义和团。可是后期，太后招抚义和团并向西方列强宣战，聂士成又与义和团并肩战斗在一起共同抵抗八国联军。但是义和团对聂士成的宿仇久久不散，而且载漪等顽固派也乘机拿捏聂士成。这让聂士成很郁闷。天津保卫战中，聂在前线浴血奋战，义和团在后方居然把他全家人给劫走了，其中包括聂重病在身的八十多岁老母。聂带兵去追，义和团又狂喊聂军门反矣，聂只好撤回。与此同时，朝廷不是把他镇压义和团的行为定性为“浪战邀功”，就是弹劾他通洋。聂士成只好以死明志，故意着鲜艳的朝衣把自己暴露在联军炮火之下，终于中弹身亡。武卫前军消失，余部被编入马玉昆统领的武卫左军。

其次是董福祥的武卫后军。武卫后军自始自终与义和团并肩奋战。先是在京津沿线与义和团共同阻击西摩尔联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是被政府召回北京，围攻使馆与教堂。董军是武卫军中最牛逼的军队——不聘用外国教习，全靠董这个武夫的敢打敢冲在支撑。问题是这么一支不要命的部队，打了两个月都没有打下没有任何防备力量的使馆区与教堂。有人认为，这是总指挥荣禄从中作梗所致。还有人认为，董虽然身为武夫，但也不算太傻，也知道围攻使馆后果不妙，所以自始就没准备攻下，只是佯攻，做样子给政府看而已。不管怎么说，最后联军还是把董作为最恶劣的罪犯之一，不断要求处以死刑的。由于其乃回部将领，政府恐怕激起叛乱，不敢处以死罪，革职禁锢在家了事。革职后董亲率亲兵两营回甘肃原籍固原，所部武卫后军由其他部属分别接管，后经裁并又改称甘军。

再次是荣禄亲统的武卫中军。武卫中军的表现也很奇妙：第一，

它基本上是以保护使馆为己任的；第二，它基本上是把义和团当敌人的。这一切，让刚毅很不悦，说：“不知仲华（荣禄字）是何居心，荣性沉毅，虽櫻众谤，犹以维护使馆自任。”^[1]看来荣禄深刻明白，与外国人玩不是这么玩的。打仗可以，但是不能攻人家的使馆与教堂。只可惜他的军纪与董福祥的后军一样差劲，战斗力也不怎么样。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武卫中军大半溃败。战后，荣禄收编残部，一部移交直隶总督李鸿章，一部拨归晋鲁等省。

第四是武卫左军。第一任总统是宋庆，第二任总统是马玉昆（1902年接任）。编成后原驻山海关。义和团起事后，奉命内调入卫京师。津沽形势紧张时，马玉昆统率左军一部赴津参战。抵津后，又奉命代宋庆为武卫左军总统，配合义和团战斗在天津前线。待聂士成阵亡后，武卫前军也交马玉昆统领。虽然打得不弱，但终归不是联军对手。天津很快陷落，马玉昆率军退回北京。太后西巡时，马玉昆奉命保驾，屯兵雁门关、太原等地，兼管西安行在至北京的驿站。后将部队拨交太后新宠、山西巡抚岑春煊节制。

最后是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义和团之乱中，武卫右军不但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成为战后武卫军各支中保存最完整的一支，而且还扩编了一个武卫右军先锋队。更关键的是，山东境内的义和团不是被他镇住就是被他撵走，弄得山东省内风清月明的。不但得到了绅民的欢心，还得到了洋人的一致首肯。这一切，都成为袁世凯继续玩弄枪杆子的资本。

（二）编练北洋常备军

义和团之乱后，政府还是那根筋儿——编练新军！而且这根筋

[1] 《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儿比甲午战后还要发热。普天同喊的声势下，袁世凯以自己的武卫右军为基础，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至1904年（光绪三十年）间，在保定进行了编练北洋常备军的工作。

为提高士兵素质，袁世凯制订了《募练新军章程》十一条，附《募兵格式》八条，总计十九条。募兵格式规定：年龄限于20至25岁；力大平举百斤以上；身高四尺八寸以上；每小时能行二十里以外；报明三代人口、住址和箕斗数目；吸食大烟、素不安分、犯有事案、五官不全、体质软弱及有目疾、暗疾者均不收。募练新军章程规定：兵员须由庄长、首事、地保公举；入营以后，头目每月饷银5两，正兵4两5钱，月扣头目1两5钱、正兵1两，每六个月派人发给家属；地方官应妥为保护军属，军属遇有诉讼案，按秀才例优待；每兵可免差役三十亩……这样的规定，让中国的军队第一次具有了人性化的管理意味。

为了把兵练好，正式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袁世凯又起草了军制改革建议，制订《北洋练兵营制饷章》二十条。《饷章》是借鉴各国兵制制订的，军内除成立粮饷局、军械局、军医局和军乐队等后勤机构之外，还把军队设为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等层次结构，具体程序是，服现役的为常备军，当差三年，支给全饷。常备军员满三年后回籍加入续备军，月支饷银1两，平时在家各就各业，每年10月操练一次，以一个月为度，操练时发给全饷。在续备军服务三年后加入后备军，月饷为续备军之半，每隔一年操练一次，在后备军服务四年后停止月饷，完全恢复平民身份。遇有战事，得征调续备兵、后备兵入伍。

为便于统一管理，建好军队，袁世凯还成立一个军政司。自任督办，另设参议官1至2名协理。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各处设总办1名，帮办1名。各处下面设股，设提调1名，委员2至

4名。兵备处总办刘永庆（后改王士珍继任）、参谋处总办段祺瑞、教练处总办冯国璋。

为了避免满洲亲贵的猜忌，袁世凯建议政府成立练兵处，并极力推举奕劻总理其事，政府接受了。1903年12月，清政府以军政司为蓝本，在兵部之外另成立练兵处，奕劻为总理练兵事务大臣，袁世凯任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袁把自己的军政司改为了督练处。练兵处的一切章程营制，还得袁世凯来制订。在《北洋练兵营制饷章》的基础上，袁世凯另编订《陆军营制饷章》，就立军、督练、设官、募兵、军令、训练、校阅、奖惩、恤赏、薪饷、营舍、军制等，作出了现代化规范。虽然清政府没有一一实现，但它毕竟是袁世凯为中国军队现代化作出的一份贡献。其重要措施有：统一官制、统一饷章、统一武器规格、统一营制与操法等等。

1904年至1905年，日俄双方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权益，在中国土地上打开了。清政府厚着脸皮表示中立，但是内心的煎熬则是众所周知的，要求北洋护卫奉、直边要。袁世凯回奏说，钱不够，兵也不够。于是在政府的授意下，进一步扩编军队。最后的结果是，在北洋常备军左右两镇的基础上，扩展为北洋常备军六镇（相当于师）。除了京旗常备军由满洲亲贵铁良控制，实权不在袁世凯手中之外，其他五镇，全由袁世凯操纵。

之后，袁世凯进一步运作，将北洋常备军改称为北洋陆军，重新编制：原京旗常备军改称北洋陆军第一镇，由凤山任统制，驻京北；原北洋常备军第一镇改为北洋陆军第二镇，由王英楷任统制，驻永平及山海关附近；原北洋常备军第三镇改称为北洋陆军第三镇，统制曹锟，驻保定；原北洋常备军第二镇改称北洋陆军第四镇，统制吴凤岭，驻马厂；原北洋常备军第五镇改称为北洋陆军第五镇，统制吴长纯，驻山东；原北洋常备军第四镇改称为北洋陆军第六镇，

统制王士珍，驻南苑。

每镇官兵定额是 12512 名，但实际都未满额（实额总计大约是 6.8 万人）。即使按虚额算，北洋六镇总兵额也就 7 万人。也就是说，在袁世凯新建陆军 7000 人的基础上，北洋军增加了 10 倍之多。

清政府本来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 36 镇，可惜直到武昌起义前夕，它也没有完成，只编成 14 个镇和 18 个混成协（相当于旅），总计 17 万余人。北洋新军约占其三分之一。相形之下，南方新军由于乃各省督抚自行筹饷督练，饷缺械少，零星分散，操法不一，事权不统，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集团，加以被革命党人潜伏，政府对之忠诚极表狐疑，所以比上北洋六镇各方面差矣！

如果同旧军作比的话，袁世凯的新军更属翘楚了。当时的旧军分三类：满八旗、绿营和巡防营。满八旗共 25 镇，号称 25 万，实际仅有 18 万。而且，除了神机营、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三营等使用新式武器外，其余都还在使用老祖宗的刀矛弓箭。一句话，废物一堆而已。绿营由于战斗力不行，一直处于裁撤中，但是到 1905 年仍有 44 万余人，也是废物一堆。1906 年，政府命各省绿营一律改编为巡防营。巡防营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 1901 年以后从绿营中抽选精壮陆续编练而成的。其他来源于防军与练军。练军前面讲过，乃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政府利用湘军营制操法对于部分绿营精壮的编练改良。至于防军，乃是李鸿章镇压捻军胜利后驻防各省的湘淮军之称。一句话，巡防营乃是绿营二代，半新不旧，虽用新式武器，练洋操，但由各省督抚提镇统率，仍有传统的私家性质。战斗力，那就看谁领导了。张作霖、张勋、陆荣廷所带部队就都属巡防营。统一全国的力量没有，但是独霸地方、危害地方的力量则大大地有。

如此一对比，一般人会说，袁世凯掌握了巨大的资本。但是在

大清那样的体制下，这样的资本，也是必得经过特殊的转换才能形成袁世凯手中的力量。第一，形式上，袁世凯的军队毕竟属国家所有了；第二，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下，政府想撵他回家，他就只能回家。如果不是革命党起事，袁世凯也就终老洹水了。而且，最终能不能终老，还要看政府的意思。一句话，帝国体制下，没有一个位高权重的军事官员是安全的。所有的安全，既是暂时的，更是有限的。我们不能高估袁世凯所拥有的这些资本。

（三）建立各类军事学堂，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

围绕新军的编练工作，袁世凯还做了诸多相关建设工作，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

从武卫右军学堂中挑选 55 名学员，赴日本陆军学堂深造，培养高级将才；之后，又陆续派出留日学生近百名。

在保定建立行营将弁学堂，由冯国璋督办。主要抽调直隶淮练各军营哨官弁为学员。此外，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也选送官弁前来进修，所以也称各省将弁学堂。该学堂共办 3 期，每期 8 个月，共培养学员 545 人。

本想在保定设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分大中小三等。但因风气初开，根底尚浅，只好先开陆军小学，另设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后改称陆军速成学堂），附属其中的还有师范学堂、军械学堂、经理学堂、参谋学堂、武备学堂、测绘学堂等各种长短不一的培训班。

设军医、马医、经理、军械等四所专门学校。

设北洋陆军师范学堂，给各省陆军小学培养教员。

设宪兵学堂，培养中国最早的宪兵团。

设陆军讲武堂，轮训军官。附设学兵营轮训士兵。

设立军官学堂（后改名为陆军大学堂）。

怎么说呢？袁世凯开设的各类学堂，种类之多，规模之全，举国罕有，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沙场大阅兵

为了对内对外示威，政府曾举办过四次秋操：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河间秋操、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彰德秋操、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太湖秋操、1911年（宣统三年）永平秋操。这其中，太湖秋操时因光绪与太后相继死去及革命党的安庆起义而草草收兵；永平秋操已做好准备，因武昌起义的发生而“著即停办”。所以真正闹出动静的就是河间秋操与彰德秋操。不用说，两次秋操的总指挥只能是袁世凯。河间秋操，动员官兵46000余人，马5800余匹，车1500余辆，战线长20余里。各国前来观操者33人，各省各处观操者200余人。河间秋操，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向中外展示自己的新军。中就不说了，重要的是外，特别是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写了多篇通讯，对袁世凯大加赞扬，引起外国瞩目。彰德秋操，计动员官兵33900余名，中外观操人员共487人，其中包括西方各国军官26人，记者42人。按李宗一先生的说法，阅兵过后，袁世凯大宴两军将佐与中外观操人员，所以“事后有人认为中外对这次秋操的溢美之词，多半是由袁世凯盛筵款待所邀买的”。^[1]不得不承认，我们一些学者特可爱，对待袁世凯抱了革命与阶级的偏见，所以情绪特别扭。自己不愿意承认袁练军的成效，待西方承认了，又怀疑这是袁世凯请人吃饭的结果。殊不知，第一，西方人很不耐中国的饭食，喜欢吃中国菜的洋人，直到如今还没有多少；第二，西方人不是拿几顿饭就能买通的，他们不是中国的灶

[1] 李宗一：《袁世凯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97页。

王爷，随便两根儿粘牙的芝麻糖就可以打发的；第三，袁世凯请人吃饭的饭店，至今还在，就是我们安阳百年老饭店聚宾楼。我接待外地朋友，经常请他们去。菜单子上就注明，当年袁世凯秋操，在这里大宴宾客四十余日。都是什么菜呢？安阳特色小菜——三不粘、皮渣、炸血膏等等。袁世凯大宴宾客，不过如此小店小菜而已。

7.2 其他新政建设

（一）创办巡警

袁世凯直隶总督上任时，首先遇到一个难题。当时直隶总督衙门在保定，而北洋大臣的衙门在天津，但八国联军在天津仍保留着一个“都统衙门”，负责天津至大沽口海河两岸的民政税收等事宜。袁世凯到保定接印视事，派唐绍仪与联军交涉：都统衙门不撤，他就不到天津上任。与此同时，他在保定仿照西法编练巡警作为新政要务之一。1902年5月，袁托日本公使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同时派赵秉钧与三浦一起参照东西成法，拟订警务章程，在保定设立了巡警局，以赵秉钧为总办。赵秉钧还创办了巡警学堂，迅速组织起一支500人的巡警队，分布保定城厢内外，维护治安。不久，清政府命各省以直隶警务为模范，仿行照办。

创办巡警之后，袁世凯最帅的一手是接收天津。由于英美两国特别看好袁世凯，所以与唐绍仪交涉之后，答应于1902年8月25日正式撤销都统衙门。但是对于袁世凯来说，如何接收则是一个难题。众所周知，《辛丑条约》规定“天津二十华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然而，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中国军队如不能在天津驻扎，相当于北京门户洞开，政府没有安全感啊。对此，袁世凯早就准备好了。他从自己的军队中选拔3000名士兵，进行短期的警察

训练，使之熟谙警察的职能，然后脱下军装，换上警察制服，称之为“中国警察”。8月份，当天津都统衙门宣布撤销，袁世凯命令地方官员率领这3000名警察长驱直入——你不让驻军，我驻警总行吧。实际它也就表面上是警察，实质上还是咱的军队，或者说军事、治安二位一体了。这一手，惊得西方人目瞪口呆，对袁世凯更加佩服了，用我们河南话来讲：这小子，真中！

入驻天津后，袁世凯以1500名留津，称南段巡警；以1500名分布在西沽、塘沽、山海关、秦皇岛、北塘等处，称北段巡警。与此同时，在天津设立巡警学堂，聘请洋员充当教员，培养现代警员。并把保定巡警学堂归并天津，改称北洋巡警学堂。之后又增添河巡、马巡、暗巡和消防队，并在全省推广。

（二）反贪肃政

中国自古及今，一个贪官污吏问题就治不了。而朝代之初与朝代之末，在贪污方面只有量的区别，没有质的区别。晚清官场当然也不例外。幸亏当时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办报自由，所以报上居然发表《论中国国民对于官场感情最恶的原因》这样的文章，云：“不怕有三五个交谈，但是一提到官场一层，你就去听吧，没有说好话的。这种现象大概得属我们中国为尊了。现在小民视官长如仇敌，……中国作官的确是国民的公敌。”^[1]

袁世凯当然熟知中国官场。他认为，吏治最大的问题就是陋规。陋规也叫常例，或者规礼，相当于现在所谓的灰色收入。其实熟谙中国官场的人都知道，此乃官场常态。其他不说，只说咱民族英雄、外号“林青天”的林则徐，陋规也是一分不少拿的。1846年（光

[1] 侯宜杰：《清末的言论结社集会自由》，载《史学集刊》2009（5），第58页。

绪二十六年），也是清官的张集馨做陕西督粮道，林则徐做陕西巡抚。时陕西大旱，张集馨遂向林则徐建议，停征军粮，林则徐同意了。但是，“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道署遂“大不支”。^[1]一句话，为了给林则徐他们送陋规，张集馨的道署竟然支撑不下去了。另据吴思先生考证，粮道给林则徐送的陋规比给陕西省内任何领导的都要多，每季 1300 两，一年 5200 两，此外还有三节两寿的表礼、水礼、门包和杂费。因为陕西巡抚每年都要对省下官员进行年终密考，这对官员的前程影响巨大。所以粮道给巡抚陋规，甚至超出了给陕甘总督之数。^[2]袁世凯首先拿这个开刀，不知效果若何。只知他的措施是：令道府州县各将每年应得属员规费据实开报，按其向来所得之多寡，明定等级，酌给公费，多者月给 1000 两，少者 100 两、50 两，任何人不得私相授受。倘若再借端敛派或有馈献，严参治罪。之后，袁世凯又实行津贴办法，每年补贴本省贫困州、县银各 5 万两。不管啥名目吧，这相当于在中央政府下发的养廉银之外，另设一层地方政府发送的养廉银。两者效果当然一样，发多少，也堵不住上级官员的贪欲与下级官员的媚欲。一句话，灶王爷还是要吃芝麻糖的，而俗众还是要灶王爷给他开小灶的。袁世凯动机虽然不错，但成效值得怀疑。

其次，袁世凯设立官吏考验处。除道府大员由他亲自考问外，其余概归该处考验，然后据此委任差缺。考验科目分五项：一、阅历，如曾办何事，有无成绩等等；二、批判，如公牍文字，以看其学识；三、律例，如新旧法律，各国宪法等；四、行止，如举动静躁，

[1]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84 页。

[2]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05—106 页。

是否吸食鸦片等；五、口才，考其对答是否详明，有无条理等。这个措施的动机应该来自袁世凯的切身体验，官场摸爬滚打这么长时间了，帝国体制下养庸官劣吏的现实，他自然知道不少。如前所述，他接任山东巡抚后曾对毓贤的昏庸无能深表惊诧。大吏如此，遑论小吏？这个措施实行下去，当然会对吏治的改进推动不少。

第三是设立调查处。调查分平时与临时两项。前者主要是比较官吏政绩，采访舆论；后者包括朝廷特委总督查办的奏参要案、总督指交事件、各官互相禀讦事件、绅民控告官吏事件等，对象仅即道、府以下人员，供袁世凯考察举劾属员时参考。不得不承认，袁世凯这项措施也没有超越多少，但应该是体制内最大幅度的“舞蹈”了。

第四是开官智，培养新政人才。具体措施有：（1）为地方官吏开设课吏馆，后改为直隶政法学堂，专招候补人员学习，附设幕僚学堂，专教幕僚。政法学堂每年招收 120 人（后增加山东等五省举贡 100 人），分预科（半年），正科（一年半）等。正科讲义主要由日本教员讲授，课程有：大津律例、大清会典、交涉约章、政治学、宪法、行政学、刑法、民法、商法、国际公约、国际私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裁判所构成法、应用经济、财政学、警察学、监狱学、统计学、中外通商史、日语等。毕业后分优劣委派差缺。（2）命未赴任的州县实缺官员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其行政司法官属学校实业等，回国后再赴新任。（3）委派归国留学生到新政机构中工作。从这项政改措施中，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比康梁的高超之处。那就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三）大兴实业

第一，开办银元局、官银号等金融机构。庚子之乱时，北洋机

器局造币厂毁于战火，天津银根吃紧，商民交困。1902年，袁世凯委任周学熙创办银元局，鼓铸银元、铜元，拟以铜元代替制钱，银元代替银两，实行币制改革。其后又创办天津官银号（后改称直隶省银行），发行银两票、银元票、铜钱票等。这一切对于整顿扭转天津的金融市场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设工艺局，奖办实业。1903年，袁世凯委任周学熙在天津创设直隶工艺总局，作为领导管理实业的官方机构。局章申明，它以奖掖全省民绅举办实业为宗旨，并为此创办了：高等工业学堂（初名工艺学堂）、劝工陈列所（原名考工厂）、教育品制造所、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种植园、官纸厂等。劝业会厂和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厂附设有夜课补习所、仪器讲演会、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等。工业学堂培养工业人才，设化学、机器、化学制造、图绘等科，聘外籍人员授课。劝工陈列所搜采中外产品，分类陈列，以供工商民众参观浏览。教育品制造所陈列中外各种教育仪器、书籍、标本、模型、图标，以备各校考览采摘。实习工厂为工业学堂学生实习之处，兼培养技术工人。为了推动直隶工商实业之发展，工艺局专门发布《劝兴工艺文》，号召绅民大设公司，政府将以各种方式资助奖掖。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曾经爆发过义和团运动、保守落后的直隶地区从此有了一番新面貌，实业成为绅民奔走相告、趋之若鹜的时尚词汇与流行产业。民众不但脑子一新，实业也举办不少，直隶由此进入自己的工业化时代。

第三，督修京张铁路。我们都知道，京张铁路乃中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自行筹资、独立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总工程师乃留美幼童出身的詹天佑，而对于这条铁路的申请者与督修者袁世凯，倒是有意无意中给忽略了：铁路是袁世凯申请下来的，路局是袁世凯设立的，资金筹措是袁世凯搞的，委任詹天佑为工程师兼会办路

务，也是袁世凯的主意。所用钢铁、枕木、机器、车辆等材料免纳厘税是袁世凯奏请的。……京张铁路 1905 年 6 月动工，1906 年 2 月丰台至南口段通车，1909 年 10 月全线通车。成功来之不易。可以说，袁世凯上疏请清政府修筑京张铁路时，洋人就全围过来了，谁都知道这是只小肥羊。围抢的结果是：除非中国人自己修，否则给任何一国，其他国家都不干。袁世凯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这样他就可以上疏请求自修铁路了。政府批准了，哗，洋人全笑了——清政府拨款只有 7291860 两，不及洋人预算的一半，工期只有六年！詹天佑上任伊始，就宣布了自己的原则——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哗，洋人再次全笑了——宁肯多花些钱，差一点儿、慢一点儿，十二年、十八年能修成就算不错了！笑声中，詹天佑干起来了。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得知此事后，马上会同此刻颇为落寞的英国工程师金达赶赴铁路沿线观察情形，随后在其私人信件中讥讽道：“中国只有一位工程师，一个姓詹的广东人，他已经被任命为这条铁路的总工程师。他从来没有独自做过任何一件工程，他在外国人监工下所修筑的北方几条铁路都必须彻底返工。我们在南口遇到了他和他的随从人员，詹骑着一头骡子，他的两个助手骑着驴，苦力们携带着经纬仪和水平仪。没有打算勘察测量。这些人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大批装着货物的大车免税通过厘卡到张家口出售赚取大利。”^[1]但詹天佑就是詹天佑，就在这么一种哄笑声中，帅呆呆地完成举世罕见的京张铁路——工期提前两年，政府那些可怜的拨款，他愣是没花完，省下 288898 两来。詹天佑创下的奇迹，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还有组织上的，六年工程，庞大拨款，没有一起贪污

[1] 骆惠敏（澳）：《清末明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73 页。

案发生！这一切，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的骄傲，但是在骄傲的同时，请记住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我们的主人公袁世凯。没有他的工作与扶持，就没有詹天佑与京张铁路的成功。

第四，发展农副业。在保定上任伊始，袁世凯就创立了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农业机器，聘请日本人楠原正三指导种植。其附设之农业学堂，教授蚕桑种植和糖酒制造。保定郊区 200 余万株桑秧和小站四百余顷稻田亦归该局经营。此外，该局曾开展农产品评会、试办农会、劝导种树等活动。

（四）发展教育

第一，奏请废除科举考试。

废科举之事，康梁变法时就提到了，阻力很大，后因政变中止。义和团之乱后，太后倡新政，废科举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请假回籍安葬生母。之后，绕道拜见了张之洞，就废除科举、分科递减达成了共识，并相约明年春天会奏。1903 年新年刚过，袁就致电张，商议起草会奏草稿，并邀张之洞这个倡导中体西用的“当代文学之宗”起草折稿。不管从哪方面来讲，这个折稿都应该由张主写：按年龄，两人差了一代。按文凭，张小小少年即中了乡试解元，也就是举人第一名，二十来岁即中了会试探花，也就是进士第三名。他是科场得意者，而袁是失意者。让得意者首倡废科举，力道大不同。按资格，张除了是当代文学之宗，还是清流领袖、洋务元老、督抚大佬（刘坤一死去，他就是唯一的龙头老大了）等等。不知道张怎么考虑的，反正他力辞主稿之事，转让袁世凯。十多天后，袁的折稿就出来了。张看过后大加赞扬，并让袁联络各省领衔上奏。1903 年 3 月 10 日，袁世凯的《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由袁领衔，两江总督张之洞、山东巡

抚周馥、四川总督锡良等联衔，指出：致治必赖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科举一日不除，学校即一日不能兴。具体建议是：科举考试取中之额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由于废除科举，相当于断了一般读书人的生路。所以袁世凯在奏折中还有很多厚道建议：（1）旧日贡举生中三十岁以下者，仍可令入学堂。（2）三十至五十岁可入仕学、师范速成。（3）其五十至六十岁，以及三十岁以上不能入速成科者，应为宽筹出路。（4）六十岁以上者，酌给职衔，俾免向隅。（5）经生、宿儒不能改习新学，可为各学堂经书词章之师，等等。除此之外，还有更厚道的建议，就是把新式学堂与旧科举功名挂钩，以满足大家的社会心理需要（就跟我们现在一样，高考弄个省第一名，还叫状元）。具体分有五级：第一级，通儒院毕业，给翰林身份，按三等分别授以较优越的京、外官职。第二级，大学堂及相应学校毕业，给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各部主事等官，升学可入通儒院。第三级，大学堂预科、各省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给举人出身，授官知州、知县、内阁中书等，或相同级别的官职。升学可入大学堂分科。第四级，中学堂、中等实业学堂、初级师范、初级简易师范毕业，给拔贡、优贡等贡生身份，除中学毕业者外，其他可授州县学官等。升学可入第三级的学堂。第五级，高等小学堂毕业，给廪生等生员身份，升学可入第四级学堂。

袁世凯可真是苦心，愣是给新式学堂着上了科举身份的外衣。一千年了，中国人读书就是得身份做官员。现在一下子让他们只读书不做官，真是要人命啊。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为了给大家一颗顺心丸，袁世凯才这么左缝右补的。没想到还是有人不乐意，奏折遇到的最有势力的反对者，乃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王文韶。好事搁浅。

1904年1月，管学大臣奏陈科举、学堂利弊得失，清廷谕令从1906年起，科举分三科减尽。1905年，王文韶的军机大臣罢直，袁世凯瞅准时机，再次领衔，牵头诸多大佬上奏，认为现在情形，时不我待，就是立即停止科举遍设学堂，人才亦必数十年后才能兴盛。他的意思是，别分三科减尽了，立马儿全消停了，赶紧推广西式学校吧。政府立允。谕令：1906年的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全部叫停！万恶的科举制从此被废除。它是袁世凯的大手笔，更是袁世凯的骄傲。这个连学政岁科都未能通过的童生，这个靠捐纳买来等同秀才文凭的监生，最后写下了一张漂亮的废科举的试卷！

第二，大力举办各式学校。

(1) 组建教育行政领导机构。1902年在省城设立学校司，督办全省教育。下设专门教育、普通教育、编译三处。次年遵照学务大臣奏定章程，改学校司为学务处。学务处设立了研究所，研究学校编制、教授方法；派遣学员下去查办考核绅民办学情况；通令各地成立劝学所、宣讲处、阅报所，进行引导宣传；通令各地州县自筹资金，分期分批组织士绅赴日本考察教育，了解各类学校的编制、组织、管理等方法，以利于切实效仿并组成自己的办学机构。

(2) 筹措办学经费。经过庚子之乱后，帝国上下处处差钱。当然，就是没有经过庚子之乱，帝国还是差钱，所以办学经费乃是第一要务。为此，袁世凯尽力设法筹拨公款，并劝导地方出资，自己还亲自带头捐款两万元。对于其他捐学者，袁世凯均奏报请奖，给予鼓励。

(3) 培养师资。为了培养师资，袁世凯多方延揽通晓西学的教师，并聘请美国人丁家立担任高等学堂西学堂总教习，令其在天津大学堂学生中选拔优等生，充当府设中学堂教师。同时设立师范学堂，分半年、一、二、三年毕业四斋，后改为三年制。此外，还选

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归国后充入师资队伍。

袁世凯的教育改革颇见成效，官绅合力把新式教育搞得热火朝天。截止到 1906 年上半年，袁世凯奏报开办的学堂有：北洋大学堂 1 所，高等学堂 1 所，北洋医学堂 1 所，高等工业学堂 1 所，高等农业学堂 1 所，初等工农业学堂及工艺总局附设艺徒学堂 21 所，优级师范学堂 1 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 89 所，中学堂 27 所，高等小学堂 182 所，初等小学堂 4162 所，女师范学堂 1 所，女学堂 40 所，吏胥学堂 18 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 1 所。注册入学人数共 8.6 万人，连同武备、巡警学堂，总数不下 10 万人。据学部 1907 年统计，直隶办有：专门学堂 12 所，实业学堂 20 所，优级师范学堂 3 所，初级师范学堂 90 所，师范传习所 5 所，中学堂 30 所，小学堂 7391 所，女子学堂 121 所，蒙养所 2 所，总计 8723 所，学生 16.4 万人，位居全国第二。而直隶学务资产位居全国第一。

总之，袁世凯这个科举教育的失败者，在搞新式教育方面，乃是不遗余力的，成效也是大大的。

（五）试行地方自治与司法独立

晚清新政中，还有两个小亮点，一个是试行地方自治，一个是在试行司法独立。政府把试点都选在了袁世凯统治下的天津府和天津县。

袁世凯奉命试搞地方自治是在 1905 年 8 月。他随即命令天津府设立自治局。自治局的第一步工作是宣讲，也就是让绅民了解什么叫自治，自治有什么好处。又设自治研究所，令所属各县选送绅董入内学习。自治局的第二步工作是，1906 年 11 月，在天津县试办议事会与董事会，组织了有各界代表在内的自治期成会，讨论通

过了试办章程。第三步，1907年4月开始划分选区，开展选举的宣传活动，接着进行了初选与复选。8月，天津县议事会宣告成立。袁世凯派代表在议事会上替自己发表演说：“今日天津议事会成立之日，可以为天津贺，并可为直隶全省贺；不但为直隶一省贺，可为我中国前途贺。”^[1]袁世凯这话倒不是吹的。到现在，中国刚刚开始村长直选的试行工作。随后，他奏请以天津县自治为模范，全省自治，计划三年完成。除此之外，他还饬令分期分批组织各州县士绅赴日本考察地方自治。结果，不只是直隶以天津县的自治为模范，而是全国各地都以天津县为模范。

至于司法独立的试搞，始于1906年。1907年成立了天津府高等审判厅、天津县地方审判厅和四处乡谳局。

另外需要补充一下的是，天津的模范，除了袁世凯的缘故，还有其他缘故，那就是都统衙门的示范作用。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为恢复城市秩序成立了临时政府，计由英俄日德法意各委派一名委员组成。下设巡捕局、卫生局、库务司、司法部、公共工程局以及总秘书处和汉文秘书。各机构为首者，除了巡捕局局长是一名英国军官外，其他都具有专门的资格和能力，有的还是久居天津、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的外国人，甚至是能讲一口汉语的中国通。他们把西方的城市自治完全挪移到了天津。

第一是划区管辖。整个辖区划分为五个行政区。中心区为城厢区，其他新扩四区各委任区长1名，职责是保证本区的安全和平和维护秩序等，对委员会负有直接责任。没有财政权，但拥有一定限度的刑事和民事审判权。

第二是成立巡捕局，下辖华洋巡捕队，分段管理。巡捕的任务

[1]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是维护城内外治安，制定交通规则，维护街道秩序，管理城区街道的环境卫生，组建消防队控制城区的火灾。巡捕初次站岗执勤时，天津人民还老大的不乐意，认为是监视百姓。

第三是司法方面，临时政府设有法庭并任命了法官，所有刑事案件均由法庭审判。

第四是城市税收制度。最初每国垫款 5000 英镑开始运行，之后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城市税收制度。根据临时政府制定的税收章程，主要开征入市税（即厘金）、码头捐、所得税、执照税等。临时政府对各项捐税收入和政府支出有详细和明确的记录，实施严格的管理。从记录中可以看出，税收制度建立后，临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许多公共工程得以实施，许多新的生活习惯在强制转化中：

（1）城墙拆除后沿城墙基址修筑了 4 条马路，还修筑了城北门至运河边的道路以及英租界到海光寺的道路。

（2）与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签订协议，建设有轨电车。批准民间自来水公司建设申请，只对供水系统的设置、供水水源、消防用水的供给以及水价的限制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在 1902 年向袁世凯办理政权移交时，临时政府委员会把自己与电车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签订的协议，均作为要求清政府必须接受和执行的条件。袁世凯接收政权后，与两家公司重新谈判和签订协议。1903 年，济安自来水公司建成供水。1906 年，第一条电车轨道通车运行。

（3）城市照明的出现。天津最早的路灯于 1880 年代出现在英租界，老城区的路灯照明则是 1900 年以后出现的。1900 年 11 月，临时政府委员会做出决议，要求城区马路两侧每隔 100 步要安装一盏路灯（油灯），安装和维修费用由沿路房主承担。翌年 2 月，临时政府决定城市照明由政府负责，筹划由政府安装路灯。

(4) 老城区还出现了最早的电报局和城市电话系统。

(5) 老城区人口已经超过 20 万，对城市环境影响最大的是生活污水、垃圾以及人们随处便溺的习惯。

按日本人描述，当时的北京“踞于路而曝臀者，旦相望也”。按陈独秀回忆，1897 年他在南京参加科举考试，屋里没有厕所，男人们又不习惯用便盆，也都是外面地干活。陈独秀说他蹲外面拉不出来，难为情。但是有那促狭鬼，远远发现有年轻的妇女姗姗而来，他便扯下裤子，蹲下去解大便，好像急于献宝似的，虽然他并无大手可解。对于中国都市人民的这种生活风情，八国联军当然不能容忍。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开始以招标的方式建造公共厕所。很快，老城区建造了多处公共厕所，并设有清洁夫按时清扫。临时政府专门发布告谕，要求人们必须到厕所出恭，在厕所以外便溺要受重罚。当然中国人民不讲公德，八国联军也有以缺德方式对之的。天津一个少年郎大便于路，美国大兵罚他双手捧走！

临时政府还要求所有粪厂迁至郊外，制定了《洁净地方章程》，规定居民每天必须将垃圾倾倒到划定的垃圾场，然后由政府统一处理。住户每天要将自家门前地段清扫干净。并明文规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这是天津最早的城市卫生立法。临时政府卫生局还组织专人清理河边、城内堆放的垃圾，雇用清洁夫打扫街道。

发生变化的还有城市排水系统。临时政府没有采用政府投资修建下水道系统，而是利用民间集资或投资的方式。他们制定强制性措施，要求各街区的士绅出面组织居民修建和清理下水道，费用由士绅们承担。工程设计要经过临时政府公共工程局审批，如果验收工程质量高，临时政府将承担部分工程费用。有的私人公司也开始参与城市排水系统的投资与建设，以占用政府土地为条件，承担相应的排水系统建设。

(6) 健康防疫制。1902年6月，天津发生一次流行鼠疫，促使了城市防疫制度的建立。鼠疫最初是从塘沽传入的，并在城北区蔓延。临时政府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疫措施：在塘沽设置了港口检疫隔离站；在市区建立了医疗站；还对感染者的隔离、病亡者的埋葬以及环境消毒等制定了强制性法令。如病人要及时送医院隔离、冰镇并用石灰涂身；焚毁病家衣物；一周内封闭患者住房，用石灰水涂封门，胡同禁行，邻居不得进入，与病人同居者不得外出；为防止因感染者死亡造成疫情扩散，临时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死亡报告制度，如藏匿死尸不报，要处以带枷游街、罚苦工等严厉处罚；病故者要领取许可证才能掩埋，并由政府专门雇用苦力抬运和掩埋尸体；临时政府还专门发布告谕，制定卫生章程，要求居民必须饮用开水、蔬菜水果必须煮熟食用，保持身体清洁，染病必须及时报告，同时还免费提供石灰用于厕所等消毒，要求制造汽水的水铺必须使用开水，对违反者严厉惩罚等等。

(7) 其他章程：建立消防队、制定交通法规、建立公共墓地等，并计划在老城区进行人口普查。不仅组织了专门的机构，拟定了人口调查表，还开始为城区街道正式命名，编制住宅门牌号码等等，为人口普查做各项准备。只是由于政权很快移交，这次人口普查未能完成。

(8) 文明交接：1902年8月15日交接天津。临时政府委员会当场向直隶总督递交了下述各项文件：委员会会议记录副本一份；临时政府执政期间财政收入和支出清册；抵押款项；尚未完工的各项工程项目清册以及必需的工程；全部财政结余款；尚在执行中的司法判决清册以及临时政府签订的各项合同。按照袁世凯事后给清政府的报告，从都统衙门共接收各类款项银185000两，洋银4万余元。据我方某些资料，一说都统衙门横征暴敛白银375万两，一

说 275 万两。不管多少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用手续贼清楚，多文明啊，相信这一切既给袁世凯的模范省做了一定的铺垫，还给他做了难得的示范。当年康有为为什么从一个小夫子变成一个狂热的维新派，还不是因为在殖民地香港与租界地上海遭遇了西方文明的刺激！

7.3 做官难，做个名官更难

（一）上下都得打点

在大清那样的体制与中国这样的人事环境下做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袁世凯当然也不例外。有些方面，他做得很好。

首先，下人不好蒙他。为了调查下情，他派人下去调研，总是先派一个人办，接着再派另一个人到同一个地点办同一件事。这两人都对他直接负责，但彼此之间互相不知。如果两人所查结果互不相同，袁世凯就照同样的办法另外再派两人分头去查，然后再前后左右互相对照。对查报实在的给以奖励，对谎报不实的给予处罚。他后来常对子女们说：“做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够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按袁静雪的说法，其父对于自己的这一手感到很得意。^[1]这套方法确实很好，只可惜后来慢慢大意，在帝制的算盘上，竟然让自己的儿子给算计了。也许老头根本没防儿子吧。

其次，一定程度上的克己奉公。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从未任人唯亲。有亲戚从家乡来，他只是供给吃住，绝对不给予任何职务。直隶总督兼任盐政，当时一个地方盐运使每年都可获利几

[1]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安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 215—216 页。

十万，何况直隶总督总揽北方盐政，但是他一律不沾。天津一些新办实业拉他入股，他也一概拒绝。但是，上至慈禧太后，下至皇亲太监，哪处都得打点，钱却是需要花的。

据袁世凯女儿袁静雪回忆，太后从西安回京后，因宫内陈设多毁，召见袁世凯时请他筹款置办物品，袁世凯很头疼，没钱。但是羊毛出在驴身上，他把主意打到了直隶那些藩、臬、司、道等下属官员身上，给他们开会说，借他们的私人钱先垫用一下，以后归还。没想到众官员不但不借，还一起哭穷。袁世凯一言不发，过后派人与天津的几个大钱庄票号接洽，说有大宗公款存入，可给利息多少？对方回说最高只能到八厘。这人一面假称听说别的票号利钱比你家要多一些，一面仍然同票号里的人继续磋商。票号里的人为了取信于他，索性把账簿拿了出来，并将某官署或某官人的存款数字以及利息多少，一一指给他看。这人就把相关信息一一记清回复袁世凯。过后袁世凯又把这些人请来，和他们说经过，气愤道：“这些票号掌柜实在太可恶，他们竟敢冒用诸公的名义来招摇撞骗，为了惩诫他们，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的存款暂时借用了。”^[1]官员们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袁世凯这种行为，也叫打黑吧？只不过打过之后，把钱供奉给太后了，大黑吃小黑！

袁世凯平时维护的重要关系有庆亲王奕劻。奕劻，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孙。1884年（光绪十年），慈禧太后罢斥恭亲王奕訢，奕劻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外交，并进封庆郡王。次年设立海军衙门，受命会同醇亲王奕譞办理海军事务。1894年封庆亲王。1901年，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后，仍任总理大臣。1903年，

[1]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安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216—217页。

荣禄病死，奕劻入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旋又管理财政处、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奕劻无钱不要，无贿不收，与其子载振、大臣那桐卖官鬻爵，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当然啦，奕劻如此贪鄙，乃是作为满州亲贵的他深知：大清的反贪是怎么也反不到他自己身上的。1903年，当荣禄一病不起，京中传言奕劻有望代之入主军机的时候，袁世凯就派得力干将杨士琦上京，送给奕劻10万两银票。杨士琦还告诉奕劻：这些是小意思啦，不过是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以后还要特别报效。之后，奕劻果真入值军机，于是袁继续投资，月月年年节节日日，都有孝敬。甚至奕劻家的红白喜事，生日满月什么的，所需开支都由袁世凯供奉。于是两个人就成了亲密战友。

别怪袁世凯贿赂，天朝潜规则在那儿放着呢，不守不行。除了太后与亲贵这些大头，底下的小鬼也得伺候着。特别是内廷里的太监，上至李莲英，下至马宾廷，但凡能在太后面前说上话的，他都折节下交。甚至无名太监，袁世凯也都顾着，每次入觐，身上总带着数额不等的银票，随时审情度势投送门包。这样，上上下下都欢心，他这官才能做得省心。否则不定哪里出个绊子，自己就先栽了。

其实，就是袁世凯自己也对官场潜规则烦不胜烦。1902年6月9日，袁世凯的署理直督兼北洋大臣被改为实授，此是好事。但是在11日袁世凯致徐世昌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稳坐督抚第一把交椅的大吏，是如何的身心疲惫：“受恩愈重，图报愈难，清夜扪心，莫知所措。且以去年自遭大故（指母丧），精力甚差。值多事之秋，居多事之地，竭蹶不遑，光阴恨短，日计不足，月计亦未必有余。明知才力不逮，而受恩深重，何敢预计利钝，惟有鞠躬尽瘁耳。”也许这些话还不算什么，那么下面就是真正的烦恼了：“日内具折谢恩，并循例吁恳陛见，亦颇欲瞻仰天颜，面陈近事。惟周公

交卸，藩、臬均非老手，省垣事务冗杂，恐署任两司一时难知头绪，且罗敷土案，凶手尚未获完，仍未议结，未便久悬。此次入觐，与寻常因公人都不同，必须拜客酬应，计须半月二十日始可出京。前因迭次入京，未多拜客酬应，已为都下众论所不容，如再不理，恐又惹出许多是非，添出许多烦恼。谓酌量情形能否婉陈于相国或请旨缓来，又或批饬不拘常例，遇有公事，随时来京，但能避开实授人觐一层，月内仍可藉公赴都，不过三五日即可出京，当免去许多扰攘。现有下月交还天津之说，须赶将津、保各事分别安置，实不啻一刻千金，如在京奔走半月，恐误事不少也。请酌量试陈为叩。”^[1]袁世凯给好友掏心窝子的这封信透漏了诸多信息：袁世凯是个干事的人，特别是诸多公事等着他干呢，但是交接打点这些事既费钱还费时，你不干还不行。所以他让徐世昌替他想法子，看如何摆脱他实授入觐的常例。清朝外官，对京中大僚的馈赠，除了节寿时的大礼外，另有别敬、炭敬、冰敬、瓜敬等等。袁世凯这里说的就是别敬——外官出京赴任，或者新官上京请训，要打点一圈不得不打点的京官。袁世凯信中没说自己别敬具体要花多少钱，但是我们可以拿别人的别敬作为旁证。据素有清名的清朝大吏张集馨载：他任陕西粮道出京留别，共费一万七千两；^[2]任四川臬司出京留别，共费一万五千两。^[3]按张的说法，自己任陕西粮道时，别敬一出，“就道盘川无几矣”。他老丈人，也就是黄夫人之父因病来京，想借他两千两银子，他只给人家三百金，惹得老丈人不高兴。从张集馨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大清做官，不是人干的。何况袁世凯这样的

[1]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27页。

[2]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8页。

[3] 同上，第90页。

明星官员呢？

（二）贵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付不了自己的二哥世敦

1902年6月，政府实授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面还有成堆的中央级职衔。9月，太后赏袁的生母刘氏一品封典，并赏银3000两，给假40天，令其回籍葬母。这个时候的袁世凯，风光极了。但是风光的袁世凯，遇上他那个嫡母二哥，就灰头土脸了。道理很简单：在外你是国家大员，在家你是妾生小三。不只你在我面前抖不起来，就你那亲娘刘氏，葬仪也得按家规来。而袁家所谓的家规，乃是中国传统家规。

第一，长门为尊。长门在族内享有特权：供奉先祖权、族中重大事件的决策督办权、财产优先占有权、对违家规者的惩戒权、死后入祖茔主穴权等。袁家自“九”字辈到“克”字辈，长门依次是袁九芝、袁耀东、袁树三、袁保中、袁世敦、袁克定。前面说过，袁世敦身为长门，却并非长子。因为保中先娶的妾刘氏，后娶的妻郭氏。刘氏先生长子世昌，郭氏后生二子世敦。但由于后者乃嫡妻，所以世敦遂成世字辈长门。这一来，至少在家族里，老四袁世凯在世敦面前就矮了大半截。

第二，妻妾有别。袁氏家族是从“保”字辈开始纳妾的，到“世”字辈纳妾成风。集大成者乃袁世凯本人，一妻九妾。袁氏家庭中，妻妾差别很大，娶妻时用红围彩轿，从中门庭院拜堂，器乐鼓噪，大宴亲朋，风光无限；娶妾时用兰素轿，从偏门入庭拜堂，无鼓乐奏趣，仅有少数亲朋宴贺。平日里妻为主妇，妾无权参管家事，妻有管妾之权。妻妾有别，导致其所生孩子也有别，正妻生的孩子高人一等，庶出的孩子低人一头。

中国有个特殊的现象，孩子混得越好，对娘亲的感恩与孝顺心

理越严重，袁世凯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极端不孝顺之人，大都是那些混得一钱不值的人。由于生父与嗣父死得都早，所以他有四个娘要孝顺，一个是自己的娘亲刘氏，一个是嗣母牛氏，另两个是嗣父之妾王氏、陈氏。前面说过，袁世凯在外求学时，给二姐的信中，处处多见给嗣母的问候，从饮食起居到精神情绪，简直是不厌其烦，絮絮叨叨。赴朝鲜任事后，还是如此。1885年他请假回到河南，由于牛氏居于陈寨，刘氏住在项城袁寨，他就两边来回地跑，想着法子哄两位老娘开心。1891年，接到嗣母牛氏病重电报，他立即从朝鲜赶回。之后，嗣母病逝，袁世凯哀恸非常，当即电请开缺，要在家守制。可是李鸿章认为，朝鲜离不开袁世凯，只给他奏请赏假百日，处理完丧事立即回朝。估计是深感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袁世凯在1892年回任时，带着娘亲刘氏到了朝鲜自己亲自侍奉，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才派人送回。1901年，他任山东巡抚不久，又把娘亲接到了济南。正值义和团事起，义和团扬言要杀他全家，他在娘亲面前只字不提，以免娘亲受到惊吓。每日里在娘亲面前请安问好，谈笑取乐，跟没事人似的。典型的报喜不报忧。袁世凯的孝顺，的确令人感动。1902年，刘氏一病不起，袁世凯亲尝汤药，不离左右。娘亲一死，他再一次哀恸欲绝，一再电请开缺，初得旨：赏假百日在署治丧。又接旨：俟大局定后再行赏假。乱局稍定后，袁世凯让胞兄世廉先行扶柩回籍。然后是辛丑条约的签订、两宫还都、袁世凯督直。1902年8月，实授直督两个月后的袁世凯再次上疏，要求回家葬母。9月，太后赐假40天，封刘氏为一品夫人，建坊题褒，复奉旨赏内帑3000两，并饬河南巡抚张人骏致祭。袁于9月25日率官兵离任还乡。10月上旬到达原籍项城袁寨。由于其母身为庶妻，所以按封建礼俗，庶妻死后不能入祖坟正穴，也不能同嫡妻夹棺并葬，只能殡在茔外。如今的袁世凯，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但在葬母的事情上，却不得屈就长门世敦，几次与其磋商，能否额外抬举一下，那兄长就是不肯让步，甚至不着孝衣反穿上了红袍。这激起了袁世凯的反弹。他要大操大办，让身位妾妇出身的娘亲最后风光一下——在袁寨东北 15 里处选择了洪家洼新墓地，占有耕地 120 亩：坟园 40 亩，新建四合院瓦房十数间，由看坟人常年看守；主坟 40 亩；茔门前占地 40 亩，竖牌坊、立 14 块石碑，石人石马排列两厢。办事地点设了三处：一在故居袁寨，具体办理殓殡事宜；一在袁张营大帅府，大摆灵堂，接待达官贵人追悼吊祭；一在洪家洼墓地，专门办理安葬祭祀事宜。吊祭者络绎不绝，观礼者人山人海。袁家开宴夜以继日，一次就开 200 多桌，据说井水都为之而干涸，附近的河南老乡可算是开了眼。他们激动地说：感谢朝廷，感谢太后，感谢袁宫保，几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排场，就连孝子袁世凯坐在八人抬方桌上接待客人的场景都让他们深感开眼！^[1]

（三）立宪立宪，倒先把自己立一边去了

随着新政的展开，立宪也成为局中先进人物的共识。认为不设议院，不立宪，则新政也是旧政。1903 年，立宪舆论渐成气候。张謇此年去日本观光一圈，回来马上变成了铁杆立宪派。1904 年，张謇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魏光焘起草《请立宪奏稿》。当张謇向张之洞请示时，张之洞说，这事太大，你还是先问问袁世凯的态度吧。前面说过，由于张謇的那一场名骂，袁张已经绝交二十年矣。但是为了共举立宪大业，张謇还是给袁世凯写了信。信中首

[1] 金亮、南方：《袁氏家族·珍闻轶事》（内部资料），周口市滨河印刷厂 [2005] 004 号，第 143 页。

先指出袁世凯“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其次指出立宪的重要性；最后激将袁世凯：“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必不在诸人下也。”^[1]袁世凯看了这信很欢喜，只是没有摸清太后的意图，还不敢贸然行动，于是回信给张謇说“尚须缓以俟时”。^[2]1904年，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完胜，中国人民震惊了。震惊之余，他们摸出了一块大石头：立宪！日本这样一个小可怜，立宪没几年，先是打败了庞大的封建中国，后是打败了更庞大的专制俄国。看来，立宪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与此同时，张謇再次给袁世凯写信曰：“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袁世凯终于下定了决心，给张謇回信，并对两人任务做了分工：你做学说，倡导国民。鄙人不敏，愿做前驱。^[3]说干就干，他马上联系两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周馥电请政府立宪，以十二年为期。老太后在后宫，也看到了立宪派的小册子《日本宪法义解》，遂表态曰：你们都说立宪好，那咱就派几个代表往立宪各国考察考察吧。

1905年的夏天，清政府发出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谕旨。袁世凯表示支持，从直隶拨银十万两赞助。出发时由于革命党拿着“咸鸭蛋”给五大臣壮行了，导致太后都流了泪，“慨然于办事之难”，但是晚清立宪还是拉开了序幕。受伤的徐世昌与绍英由尚其亨和李盛铎替补，五大臣于1905

[1] 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三》，1913年版，第18页。

[2] 《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65页。

[3] 张华腾：《袁世凯与近代名流》，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年的年底分两批秘密出发了。1906的夏天，历时半年、周游十四个国家的五大臣考察归来，袁世凯立即与五大臣会商，由五大臣会衔上奏《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要求政府立颁明诏，以定立宪国事。太后有所犹豫，召袁世凯进京商议。袁世凯对太后表白：官可不做，但宪法不能不立，为立宪，自己要以死力争，否则国事不堪设想。具体建议是：变法须先组织内阁，组织内阁须先从官制入手。太后同意了。当然，太后同意立宪，也不是袁世凯一人忽悠的结果。一则是五大臣汇报曰，外国的月亮确实比中国的圆，圆就圆在人家都立宪；二则，光绪皇帝的姐夫、太后的侄女婿、五大臣之一载泽单独上了一个密折。说立宪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具体说来，至少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当然了，虽然有利，也不能立得那么快，要慢些来，稳定第一嘛。他给太后出的主意是：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太后对立宪并无成见，她的四个基本原则是：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可薙；四曰典礼不可废。现在又听说立宪还可以预备，挺好的，遂于9月1日颁发《宣示预备立宪谕》，表明政府预备立宪了，但由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咱要慢慢来。与此同时，政府内定了四大方针：一是十年或者十年之后才行立宪；二是立宪大体要效法日本；三是废现制之督抚，这些督抚权力太大了，还都被汉人掌了去，让新设督抚的权限相当于日本的府县知事，其财政、军事权悉收归中央；四是中央政府组织，略与现在的日本相当。

清政府宣示“仿行宪政”的次日即发布改革官制的上谕，著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铁良、戴鸿慈及袁世凯等十四位王公大

臣（袁世凯乃最后一名）共同拟制厘定中央官制的方案，奕劻、孙家鼐、瞿鸿禨负责最后核定。9月6日，设立编制馆。袁世凯推荐其亲信孙宝琦、杨士琦为编制馆提调，张一麐、金邦平为起草员，实际上控制了改革方案的制定工作。最后拿出了一个废除军机处及内阁、设立责任内阁和资政院的具有近代气息的政改方案。袁世凯的方案是比较先进，但是学者们总喜欢拿袁的私心说事，说袁更担心的是，太后越来越老了，万一太后玩完了，光绪重新执政，逮不着康梁，只能逮着自己出气了。所以，早一日建立责任内阁，奕劻任正总理，自己任副总理，把君虚置起来，自己就多一些安全。我觉得，这种诛心论大可不必。帝国体制下，任何大臣都没有安全感，所以所谓的私心也就是自保，有什么可非议的？何况这种于国于家都有利的双赢之事？

9月底，御史陈田参奏奕劻、袁世凯“贪横专贪”，指出奕劻接受山东巡抚杨士骥贿赂银十万两，系经袁世凯之手，因此奕劻甘当袁世凯的傀儡云云。

10月，彰德秋操举行，中外交赞袁世凯。常言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同为阅兵大臣的满洲亲贵铁良看到北洋的威风，心里反而不安生了，排袁心理陡涨。在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建议下，11月6日，政府发布厘定中央官制的上谕。袁的提案基本上被太后否决，袁世凯失望至极。政治方面，政府保留了军机处与原内阁，没有成立袁世凯提议的责任内阁，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副总理就没戏了。军事方面，北洋新军的统率权收归陆军部，奕劻管理部务，铁良任尚书，寿勋、荫昌任左右侍郎，王英楷署右侍郎。下设承政、参议二厅和军衡、军乘、军计、军实、军制、军需、军学、军医、军法、军牧等十司，也没袁世凯什么戏了。至于其他各部，也就是裁撤几个，合并几个，换几个新名字而已。

清政府这是卸磨杀驴，袁世凯也觉出了风险。当然，在此之前，他就有所注意了：在山东任巡抚时，奏请旗籍道员荫昌“佐赞军务”；署理直隶总督时，挑选三千八旗子弟兵加以新军训练，并保奏旗籍道员铁良为京旗练兵冀长；政府成立练兵处时，他推荐奕劻任练兵大臣，自己退而居其次。现在，自己马上变光杆司令了，太不安全了。于是他派杨士琦到北京活动。但是政府强调专职专责，杨士琦活动无效。11月18日，袁世凯上奏说：一直以来都抱了以身许国、鞠躬尽瘁的心思，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才识不逾中人，气体本甚羸弱，近岁叠膺艰巨，精力益逊于前。我这人也没啥好的，就是愚忠罢了，蒙圣主优容，信用不疑，自当力任怨劳，义无所避。但是俺私底下也忧思，大厦非一木所能支，巨川赖同舟之共济，大家都想给政府贡献力量呢。若重寄常加于臣身，则疑谤腾于众口，使臣因此获贪权之名，臣心何以自明，使旁观因此启猜嫌之渐，政界亦云非幸。昔曾国藩尝奏称，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等语。臣区区之愚，窃亦虑此。此则非止为臣一身计，兼为大局计而不得不沥陈于君父之前者也。现值改定官制，明诏所布，首以专责。而臣兼职太多——确实太多，计有参预政务大臣、会办练兵事务大臣、办理京旅练兵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督办京汉铁路大臣和会议商约大臣等——所以还是请政府把这些兼职开去吧。^[1]政府马上批准了。附片中，袁世凯还提出，要将陆军六镇中的一、三、五、六移交陆军部，自己只保留二、四镇的指挥权。^[2]政府也马上照办了。于是袁世凯抑郁了，生病了。

[1] 《袁世凯奏议·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版，第1418页。

[2] 同上，第1419页。

(四) 丁未政潮：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袁世凯正抑郁间，奕劻之子、新任农工商部尚书与新任军机大臣徐世昌前往东三省查办事件，路过天津，袁世凯派道员段芝贵随行。1907年1月，一行人返回，袁世凯在中州会馆接待。看戏时，载振喜欢上了一位戏子杨翠喜，段芝贵拿出一万二千两银子将杨女赎出，奉献给载振；同时又拿十万两银子作为寿礼奉献奕劻。随后，政府准备将东三省改为行省，袁世凯自己想当东三省总督，太后不同意。于是袁世凯示意奕劻，奕劻遂提出一个方案：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分任三省巡抚。太后批准了，下谕曰：盛京将军改称东三省总督，由徐世昌担任。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赏给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谕旨一下，舆论哗然。

就在这关口，北京又来一位不速之客。这客就是刚刚调补为四川总督的岑春煊。

岑春煊（1861—1933），原名云霑，同治末年改名春泽，后又改为春煊，字云阶。广西西林县人。壮族，高干子弟，其父乃云贵总督岑毓英。少时，岑春煊无恶不作，混了个京城三恶少之一的名头。正如长他两岁的袁世凯俗称袁老四一样，岑春煊俗称“岑三”或者“癞三”。父亲庇荫下，先是捐官，后是中举，政界之路一帆风顺。维新时乃康梁一派，与康梁关系密切（礼部尚书李端棻是岑春煊的业师，其堂妹李蕙仙又被李嫁给了梁启超，民国时岑春煊干脆与康有为成了儿女亲家），并在维新党的支撑下做了广东布政使。义和团之乱时任甘肃按察使（由于与维新党亲密，太后恶之，在荣禄的保护下，才迁任到荒凉的甘肃）。清政府先后多次连续诏令各省勤王之师兼程北上。除此之外，还特向袁世凯、马玉良、李秉衡、鹿

传霖、张春发、刘永福等发出专门指令。当然也有个别官员主动统兵北上。袁世凯咱前面说过，基本上是不奉诏。江苏巡抚鹿传霖最有意思，听说老家（直隶定兴西江村）大扰，族之长幼均被屠，在抚署内大哭，誓与拳匪不两立。借勤王之名力请开缺，克日帅羸卒北行。至河上，闻乡里无恙，遂逍遥不进。闻者皆窃笑。唯独岑春煊义无反顾，行动神速。甘肃是6月26日接到6月20日清廷著各省分兵驰援京师的上谕的，岑春煊不顾陕甘总督魏光焘的阻拦，当天即率省马队二旗先行，又不待马队齐集，先率支队数十人，自兰州取道草地沙漠，忍受种种困苦，昼夜疾驰，成为第一支到达京师的勤王军。8月19日，岑春煊受命督办“前路粮台”。尽管岑春煊未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但他除做好本职工作外，还与李莲英搞好关系，以叔侄相称，并且时刻准备为太后服务。据时人笔记载：春煊勤扈从，一夕宿破庙，春煊缳刀立庙门外彻夜。太后梦中忽惊呼，春煊则朗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1]从此成了太后的贴心人，一路扈从到西安。抵达山西太原后即被升为陕西巡抚，后历任山西巡抚，署理四川、两广总督等。据说岑春煊任两广总督四年期间，前后参革之员达1400余人，以至于被现在的一些史者称之为反贪斗士。实际上晚清那个官场，没一个官员是不贪的，只要真反，官场上会一个不剩。所以岑春煊成为晚清官场上有名的“三屠”之一：岑是官屠——专打黑恶官员，打得人人自危；张之洞是财屠——搞了诸多洋务，花钱如流水，效果却不咋地（另有一说是土屠——废除科举制，让士人们没了生计。但我觉得这个不确，因为废科举的折子由袁主写，更由袁领衔的）；袁世凯是民屠——把山东的大师兄二师兄全部赶尽杀绝。清末官场还流传有郑孝胥的一句评论：袁世凯不

[1] 《清代野史·第一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85页。

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岑春煊不学无术，端方是有学有术。其实，在官场上混，没些小术能行么？只能说术有高低罢了。

光绪维新，袁岑是同道；太后新政，袁岑有共识——两个人乃是太后的新政旗手，一个治理直隶成为模范省，一个治理广东让南中国出现了奇迹，合称“南岑北袁”。只可惜，两个人阴差阳错，在清政府内部的争权夺利中没有结成一个堡垒——岑春煊天天唱红打黑，其背后的靠山是清议派的代表军机大臣瞿鸿禨。袁世凯干练能为，多次向瞿示好，先示意想做他的门生，瞿不接受；后致意想与他换帖，瞿还不接受。1906年中央官制改革，袁的意思是，奕劻做责任内阁总理，他与瞿分任副总理，共同组阁。瞿不但不愿与袁共同组阁，还直接向太后明示，一组阁，太后就没权了。于是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制流产。所以袁最终的靠山乃是清末最贪婪最昏庸的军机处领班庆亲王奕劻。一派自认自己是清派，对方是浊派，所以清浊两派争权夺利，最终导致了1907年的丁未政潮。

1906年9月，奕、袁合谋，将岑春煊从两广总督任上排挤到云贵总督任上，两广总督一职却由袁的姻亲周馥接任。岑春煊再无术也知道从富庶的两广到荒凉的云贵跟发配似的，于是一腔愤懑。而奕劻与袁世凯还想用天朝流行的办法——查账，政治问题经济解决，这更让岑春煊愤懑。他不但不到云南赴任，且以看病为名逗留上海，寻机报复。1907年3月3日，朝廷又任命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在瞿鸿禨的指引下，他借入川赴任之名，中途由武汉下船，即电请入觐，且不待复电就乘车北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进北京，太后一连三日召见。岑春煊对着太后痛哭流涕，直斥奕劻乃昏庸小人，贪污败国，并且向西太后表示，自己不愿任职地方，愿在京给太后做一只看家恶犬，专门监视、防备奕劻等人胡作非为。老太后很感动，说：“汝言过重。我母子西巡时，若不得汝照料，恐将饿死，

焉有今日？我久已将汝当亲人看待，近年汝在外间所办之事，他人办不了，故未能叫汝来京。”^[1]

岑春煊自己的回忆可能有所夸大，但意思可能大致不差。所以他4月29日闻到北京，5月3日，即被授为邮传部尚书，而其还未到部就任，就将袁世凯的人——邮传部侍郎朱宝奎参劾革职。当然也参奕劻了，只不过奕劻树大根深，一时撼不动而已。袁世凯密切关注着岑的动向并且和两江总督端方商议对策。5月7日，在瞿的导演下，御史赵启霖（与瞿是同乡同党）以“杨翠喜案”上奏。太后览奏大怒，立撤段芝贵，命程德全暂时署理黑龙江巡抚；命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切实查明；把奕劻叫来怒斥：“如是欺蔽朝廷，不如用麻绳缢死我母子为佳！”^[2]奕劻吓得浑身发抖，载振急走天津问计于袁世凯。袁世凯还算老练，告诉载振，先把杨翠喜那个肉弹送回天津，消灭实据，然后再设法转圜。载振依计而行，袁世凯随后安排。等载沣与孙家鼐派人到天津调查时，杨翠喜已是天津盐商王益孙的使女且有字据为证。于是赵启霖以诬蔑亲贵重臣被革职。载振为平息物议，自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赵启霖的同党，同为御使的江春霖和赵炳麟（三人合称台谏三霖）纷纷上折为赵启霖辩护，太后不理。于是此案不了了之。说实话，政治争权以经济问题与生活作风问题作为利器，乃是天朝的传统，但是，这种传统也有它自身的问题，那就是：经济问题与生活作风问题，人人都有，查不查都是糊涂账，最后还得看领导的意思。

杨翠喜案结束后，奕劻与袁世凯当然要报复。他们先让两广总

[1] 岑春煊：《东斋漫笔》，《近代稗海·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页。

[2]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9页。

督周馥奏报广东匪乱蔓延，非岑不能平定，继而由奕劻提出岑重任两广总督。太后不知虚实，上了奕劻的圈套，改任岑为两广总督。岑春煊在邮传部位上不足 25 天便被排挤出北京。岑春煊临行前，又密参奕劻，太后听了又动心了，想把奕劻免掉。一天，趁奕劻病休在家，太后单独召见瞿鸿禨，询问谁可做奕劻的接班人。谁知瞿回家就吹枕头风（可见吹枕头风并不是女人的专利，中国的男人吹得也挺欢），把这消息告诉了夫人，夫人呢，告诉了他老公的门生汪康年的夫人，汪康年的夫人再告其老公，他老公再往外传，终于传到了《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那里，于是《泰晤士报》就把它当消息发了。驻京英国公使阅报大惊，让自己的夫人参加太后宴饮时得便给问问。太后听后大惊，这事儿自己只跟瞿鸿禨说过，这军机大臣嘴上怎么没个把门的？与此同时，袁世凯这边找到了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让他出面参劾。恽参的是：瞿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随结外援，分布党羽！这手出得够重的。你们那边参我们经济问题与生活作风问题，我们参你们政治问题。所谓的暗通报馆，就是瞿暗通汪康年。汪乃瞿的门生，还是个维新党，在北京办《京报》，杨翠喜案发生后，汪康年的《京报》连续发表时评恶心奕劻父子。所谓的授意言官，就是让御使赵启霖出面弹劾。所谓的阴结外援，就是与英国的《泰晤士报》勾结；所谓的分布党羽，是指瞿鸿禨托法部保荐其亲家余肇康为法部参丞……桩桩直指太后的心理。6月 17 日，太后下令将瞿鸿禨开缺，将余肇康革职。当然啦，这一切不全是袁党打击的结果，瞿自己也有得罪太后处，除了恽毓鼎参奏的这些外，他还曾多次密请太后赦免康梁，为当年的维新变法平反，这让太后很不高兴。还有，袁党乘机揭露，瞿还想让太后归政光绪呢。总之，瞿鸿禨就这样玩儿完了。

把政敌弄走了，自己也不好意思。6月 19 日，奕劻自请开去

军机大臣之职，太后没有同意。但是同日任命醇亲王载沣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明显要给奕劻培训接班人啦。

7月7日，御使赵炳麟上《请销党见折》，两个意思：第一，提醒政府不要开明末党援之习，且恐酿唐末藩镇之忧，饬请中央各部院及直隶总督袁世凯将康熙爷时期的禁朋党谕竖于衙门前，使之触目惊心；第二，恽毓鼎所参瞿鸿禨之事，与事实不符。第一个意思，太后照领了，第二个意思，太后没有搭理。

7月25日，袁世凯上折密陈管见十条。关于明党派一条，他提出党有公私之别，公党利国，私党病国。瞿鸿禨搞的那种党乃是私党云云。^[1]

袁世凯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对。中国人确实不知道啥叫公党。梁启超曾直接断言曰：“政党者，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者也；朋党者，以个人之目的而结合者也。”^[2]日本宪政元老尾崎行雄也感叹曰：“东洋素有朋党的观念，而无公党的观念。政党是以议论国事和行其所见为唯一目的的人民团体。但是政党一移植到东洋，则立即沾染了朋党的性质，并非为追求国家利益而唯追求私利或个人利益是务。”^[3]我估计，东洋这个朋党毛病，是从咱们大唐中土取的经。袁世凯也深知私党不好，所以才不计前嫌，一直向瞿鸿禨示好，总之，只要能做事，咱们不妨手拉手。但是瞿鸿禨不但不伸手，还一直给人伸脚，所以，双方就这样干上了。既这样干上了，就分不出是非与善恶了。只能说成与败。事情发展到这一刻，瞿鸿禨

[1]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2] 转引自廖大伟：《辛亥革命与民初政治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页。

[3] 诺曼·赫伯特（加）：《日本维新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74页。

先翻了船。

瞿翻了船，袁世凯仍然担心，因为帝国体制下一切没个谱儿，全看领导的情绪，领导想让谁重新上船，都是分分秒秒的事。所以他们继续打击瞿的同党岑春煊。岑春煊虽然去做两广总督了（因病在上海，未到任呢），但是，第一，他的名声依旧在；第二，太后面前依然没有失宠；第三，保不准那天，他就又上北京来了；第四，双方已斗到有你无我、有我没你的情份上了，不把岑春煊彻底干翻，袁这边没法安心。于是他们顺着瞿鸿禨倒霉的思路，先是奏“岑春煊曾入保国会，乃康梁死党”。这个倒是真的，但是太后不以为意。后是有个叫蔡乃煌的，寻觅到一家照相馆，把岑春煊与康有为各自的照片合为一张，献于袁世凯。袁大喜，献于奕劻。奕劻密呈太后，太后看了一惊。与此同时，御使陈庆桂也接连参劾岑春煊，说他把政府通缉的要犯倚为心腹云云。什么要犯呢？太后于 1904 年下令赦免了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人之外戊戌案内外各员，但是岑春煊在自己的幕府中延揽的人才大都是戊戌人员与庚子勤王的保皇党人员，并且放手让他们与康梁频繁联系与游走，一度还想把康有为的弟子兼女婿麦仲华延入自己幕中。就连他自己庚子年间第一个先跑到京师勤王，都被人怀疑乃是康有为保皇党的一个棋子，有企图推翻太后扶光绪上马的嫌疑。只不过最后他选择的是“戴后”而不是“扶帝”罢了。

8月10日，恽毓鼎与蔡乃煌合作的奏折呈上，说岑春煊不奉朝旨，逗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留之寓中，密谋推翻朝局。不管这一切是否真的，但是岑春煊与他们脱不开干系则是可以认定的。^[1] 太后终于被打动。8月12日，岑春煊被开缺。丁

[1] 详见桑兵：《庚子勤王前后的岑春煊与保皇会》，《近代史研究》2009（6）。

未政潮，袁派胜出。

但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袁世凯也没沾啥便宜。第一，与陆军部尚书铁良过招，试图夺取陆军部兵权与业已交回的北洋陆军四镇兵权，失败；第二，更多的人上来参奏奕劻，却把主要炮火集中到袁世凯身上。先是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参奏奕劻贪污受贿，袁世凯虎步京师，袁世凯言之，庆王奕劻行之，让袁世凯党羽掌握了重权，袁世凯快成曹操了。接着是御使成昌参奏，说袁世凯门生故吏遍天下，非国家之福啊。

8月24日，太后召袁世凯入京陛见。30日，袁世凯到京。太后赏假、赐食、召见。9月4日，下令免去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调任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同时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的还有湖广总督张之洞。这叫明升暗降。看来，太后不只对袁世凯不信任了，对同为汉人大吏的张之洞也有疑惧之心了。没办法，末世统治者，看谁都像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闲了得翻翻他们。

10月26日，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再次上奏，云：政府再不整顿朝纲，只怕之后，人们只知有奕劻袁世凯，不知有我皇太后皇上。奏折上后，遭遇朝旨申饬。估计太后的意思是：够了！

11月，直隶提督也参劾上了袁世凯。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太后够了，袁世凯的政敌们没够！

（五）继续立宪，却把自己立家里去了

就在袁世凯进京这一年，中国的立宪舆论达到了高潮。国内有张謇等名绅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要求政府速开国会，行宪政。国外有康梁等人组织的政闻社，提出四大纲：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等。袁世凯在这种氛围下，也

很踊跃。7月28日，身处丁未政潮中的他奏请政府赶紧立宪，列陈十事：（1）昭大信，皇帝新诣太庙，昭告立宪；（2）举人才；（3）振国事；（4）融满汉；（5）行赏罚；（6）明党派；（7）建政府，采内阁会议制度；（8）中央设资政院，省设谘议局，州县设议事会；（9）地方自治；（10）普及教育。这算是个很全面的立宪纲领了。

9月5月，做了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的袁世凯更加热心立宪了。9月6日，太后召见袁世凯，难过地说：内乱外患，日急一日，究竟如何是好？有云立宪即可安靖者，有云立宪必有大乱者，真无法可施。袁世凯的回答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立宪，即使无益，可免后悔。^[1]之后，袁世凯又奏请设立责任内阁。但是政府最后批准的乃是先设资政院。9月20日，清廷宣布成立资政院，为以后建立议院打基础。五天后，正副都御使陆宝忠、伊克坦等人奏请改都察院为国会，以立下议院基础，下议院议员由都察院官员简充，并由各省督抚保荐二三人组成。三四年后再将资政院、国会改为上下议院。袁世凯表示同意，但御使们联名上奏反对，所以议院名议流产。

1908年初，预备立宪公会要求政府公布立宪年限，袁世凯随即奏请，双方互相呼应中。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拉拢过来一个人才，他就是后来的称帝战友杨度。杨度（1874—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1903年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因被政府怀疑为康梁分子，未录取，旋出走日本，做了东京中国留学生会会长，既与康梁等立宪党人接触，还与孙黄等革命党人接触。至于学业，上的是日本的宏文院速成师范。速到什么程度呢？当月上，当月毕业。这是当时的潮流派头吧。戊戌变法中，张之洞发出了到日本留学去的号召。1901

[1]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年，张之洞、刘坤一提交《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折》，建议以后凡进涉外部门的大清公务员，必得是海归才行。1903年，政府颁布张之洞制订的《奏定游学日本章程》，规定只要在日本获得学历证书，就可以在中国获得相应的举人与进士头衔。1905年，张之洞与袁世凯联手，把中国的科举之路彻底堵上。同年，光绪首次主持归国留学生考试，14名留日毕业生被分别授予举人、进士出身，并赏给翰林院检讨与内阁中书等官职。于是，清国留学生蜂涌挤向日本。有需方，就有供方，日本为了接收中国的留学生，忙不迭地草建诸多野鸡大学。杨度这还不算最夸张，据说还有几天即毕业的。大家在日本吃喝嫖赌，学习一些皮毛理论，就都成了政治家，不是立宪党就是革命党。按雪珥的说法，都是半吊子，却俨然成为日后民族复兴的脊梁。^[1] 杨度还好，与康梁孙黄都不合。1908年春抵京后被袁世凯与张之洞联合奏保，以四品京堂入宪政编查馆行走。之后，又被袁世凯举荐为太后与亲贵们的宪政讲解员，引起朝野注意。

在奕劻与袁世凯的合作下，政府终在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规定，从1908年算起，预备立宪期九年。

关于君权，精神如下：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敬；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经君上诏令批准者不能施行；君上有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君上有高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议院不得干预；君上有统帅海陆军、调遣常备军、制定常备兵额及一切军事权，议院不得干预；君上有宣战、讲和、订立条约、派遣使臣、认受使臣等所有外事之权，议

[1] 雪珥（澳）：《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院不得干预；君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君上有赏爵及恩赦之权；君上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以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之；君上有命令权，惟已定之法律，不得以命令更改或废止；议院闭会时，遇紧急事，得以诏令代行之，至次年会期，再交国会妥议；皇室经费，由君上制定常额，由国库提支，议会不得置议；皇室大典，由君上督率皇族大臣与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

关于民权，精神如下：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自由；臣民非按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害；臣民按照法律规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臣民规定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臣民皆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仔细考量这些内容，要是能真正实现也算不错。

1908年9月15日（农历八月二十，那时的中国传统是按农历过生日），袁世凯五十大寿。太后赏赐很多，京内外官员贺者盈门。载振也送了寿品，并在一副对联上留下“如弟”之落款。御使江春霖得知，上奏，一下子列出袁世凯十二条罪状（当年嘉庆给和珅列出的是二十条），第一条就是：奕劻为袁世凯祝寿，落款不称王而书名字；载振自称“如弟”，有干禁例，系交通权贵。第一条如此开场，后面的咱就不必说了吧。据另一霖——御使赵炳麟吹嘘说，光绪见奏折痛哭流涕，但是因惧怕老太后而留中不发。这就有些胡扯了。哎，对中国的这些御使，不能当真的。

也许是上帝的恶作剧，1908年11月14日，光绪死去了；15日，太后也死去了。有太后这个权威在，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也许能稳步推进下去。即使仅剩下光绪在，虽然比不上太后老辣，但毕竟在帝

海中沉浮三十多年了，应该也不嫩了，但是他也陪着太后走了。野史对此众说纷纭：一曰，袁世凯见太后病危，怕光绪跟自己算账，所以买通李莲英先一日把光绪毒死了。一曰，太后自知不起，又听说光绪为太后的病危而幸灾乐祸，所以提前先把光绪毒死了，免得自己死后遭他清算；一曰，太后先死的，秘不发丧，袁世凯、李莲英、奕劻合谋，把光绪害死之后，颠倒帝后死亡日期。一曰：光绪临死前，写了一个“斩”字，“袁”字刚写了一半就不行了。或者：光绪交给隆裕一个纸片，并私对皇后说，杀我的是袁世凯。或者：光绪临死前亲自朱笔写下了必杀袁世凯的手谕，放到了砚台盒内，后来隆裕皇后发现……

怎么说呢？野史终归是野史，不能尽信的，特别是那些纯粹靠低劣想象力杜撰出来的说法。而且，就是康梁的亲说亲为也不能相信。按雪珥的评价，康有为这个人的政治品格相当“三鹿”，而且“无论政治上争权还是经济上的夺利，均开创中国近代史不择手段的先河”。^[1]总之，康梁在外面野狐禅，神圣化光绪，妖魔化太后与袁世凯。国内野史作者同步呼应，说什么光绪恨袁世凯入骨，天天在瀛台日书其姓名，粉碎之。逃到西安后，画乌龟，背上填写项城姓名，做箭靶，粘之壁间，以小竹弓射之，既复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飞。几以为常课。真的野狐禅极了。若真有其事，光绪且不成了神经病？而且自始至终没有弄清谁才是自己真正的敌人。可以说，光绪与袁世凯都是康有为权谋下的牺牲。光绪要恨，首先应该恨康有为，其次恨他大姨妈。还有，光绪若果真如此装神弄鬼的，首先容不得他的就是太后本人。袁世凯是告密了，但是告密之

[1] 雪珥（澳）：《国运 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9、198 页。

后是太后采取的行动啊。这不明摆着不服太后吗？更关键的是，光绪恨袁世凯，就等于恨太后，太后临死前选择接班人的时候，怎么着也不会选上光绪亲弟载沣他儿子，这不是上赶着要人家为兄弟报仇吗？还有，太后选择溥仪的时候，还征询了袁世凯的意见，袁一力赞成，并且派自己在农工商部任职的长子袁克定将此事密告英国公使朱尔典，朱的回复是：目前似无较此为佳的安排。于是袁世凯又把朱尔典的回复转告载沣。但是袁世凯的示好并没有感动这位年仅二十多岁的摄政王。相反，他对于袁世凯的势力愤嫉已久，特别是皇亲贵族们都在背后怂恿他。与此同时，海内外好汉也纷纷出手了。海外的康有为一听说光绪死了，立即发出讨袁檄文并上书摄政王载沣，认为先帝若死得可疑，袁世凯就是贼；即使先帝死得不可疑，袁世凯还可疑！这个康有为，还是一如既往地往袁世凯身上扣屎盆子。给摄政王上书时康有为曾试图把自己当年的围园密谋稍作透露，毕竟光绪是载沣的同父异母哥嘛。但梁启超坚决反对这种透露，他认为，载沣虽然是光绪亲弟弟，但其摄政地位却是西太后给予的。围园密谋一透露，你让人家往哪边站？往哪边站都不对嘛。还不如把屎盆子都扣在袁世凯头上呢，就说围园密谋都是他造的谣，目的是为了自保。更重要的是，没有围园密谋，戊戌案才能平反，党禁才有希望开放。为此他要求老师跟自己统一口径：“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故弟子写信入都，皆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悉由贼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师谓何如？望此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为叩！”^[1] 梁启超这份统一口径的信，虽然首尾缺失了，但中间关键部分则保留下来了，被人收录到《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中。

[1] 杨天石：《康有为“戊戌密谋”补正》，《文汇报》1986年4月8日。

国丧期间，载沣与隆裕对袁世凯有所冷淡，但是并没有什么动作。12月2日，溥仪登基，定1909年为宣统元年。19日，新朝恩泽颁下：奕劻加世袭亲王罔替；张之洞与袁世凯同时赏加太子太保衔。海内，巴望袁世凯早日出事的各路政敌就不愿意了。御使江春霖首先上奏，说奕劻与袁世凯不该得到新宠，摄政王素有贤声，得退小人用君子啊。赵炳麟紧随其后，上奏曰：袁世凯不能当军机大臣。第一个理由是，袁世凯不是好人。第二个理由是，袁世凯一出军机，他的党羽自然解散。……由御使们开道，后面的亲王权贵们也就纷纷露面了，善耆和载泽一块儿向载沣进密言：还是赶快去袁吧，否则势力养成，再去就去不得了。于是载沣拟订一道将袁世凯革职、拿交法部治罪的谕旨，并征求奕劻与张之洞的意见。奕劻当然坚决反对，说：杀袁世凯不难，但是北洋军起来造反怎办？张之洞虽然与袁世凯斗法，但底线还是有的，那就是——大家都是帝国朝廷手下的小卒，虽然你天天拱来拱去的，可是主子不让你拱，你就不能拱了。说叫你出界，就得出界；说叫你淹死，就得淹死。所以他说的是：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杀大臣。这个头不可开，而且我不是为袁考虑，而是为朝廷考虑。于是载沣只好使出了软的一招，于1909年1月2日下发上谕，说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勒令“开缺回籍养疴”。^[1]

谕旨下发之前，奕劻递过来话，说是有危险，叫袁世凯躲躲。惶恐之下，袁克定给老爹出了个笨得不能再笨的主意，逃奔天津，住进了法租界利顺德饭店，原计划由天津逃往日本。袁的老部下、现任直隶总督杨士骧得到消息以后，自己为避嫌没有出面，却派他的儿子两次到利顺德饭店说明利害，劝袁世凯回京。袁接受了杨士

[1] 李宗一：《袁世凯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41页。

骧的建议，回了京。待回家养病的谕旨一发才长出一口气。3日，面见摄政王谢恩辞行。6日离京，人走茶凉，送行者中只有好友杨度与学部侍郎严修。袁世凯感动地说：二君厚爱，可是我担心你们因此被祸。严修回的是：聚久别速，且忍无言？杨度回的是：别当有说，祸不足惧。^[1]患难见真情，这俩人才是真爷们儿。严修大家都知道，字范孙，中国近代赫赫有名的大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办人，人称南开校父。杨度大家更知道，由于力撑袁世凯称帝，在中国成了臭名昭著的人，但那是政治理念的问题，与人品无关！

[1] 李宗一：《袁世凯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42页。

第八章

躲进洹上成一统，管它风声雨声子弹声

都认为袁世凯势大，除不得。可是中央让他回老家，他还不是乖乖回了？北洋军造反了，还是他属员造反了？门儿都没有。

袁世凯一回家，自己倒是省心了，但政府还得继续运作啊。载沣找来那个弹劾袁世凯最起劲的御使赵炳麟：袁老大下台了，下面就看你们反袁党的了，你倒说说看，以后的日子咋办？赵回的是：宣布袁世凯罪状；独任张之洞为相；起用岑春煊统帅禁卫军；召立宪派康有为、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以及赵启霖等人入京教皇帝读书并兼任摄政王顾问；实行立宪，大赦党人，示以天下为公。

这建议高明到哪里去了呢？

第一，张之洞为相比袁世凯为相要高明吗？谁不知道张之洞是个金枪不倒的政治油子？政治方面“左右逢源，最后变成一个靠不住的人”。雪珥对他的评价是“洋务票友”，^[1]搞了诸多面子工程与豆腐渣工程，比上袁世凯的新政成绩，简直不成体统。

第二，岑春煊统帅禁卫军比袁世凯统帅北洋军要高明吗？论能力，论品德，论新政，岑春煊倒是不弱，但正如单田芳的评书所云：就看跟谁比了。与袁世凯相比，岑还是差了一截子；货真价实的官二代，有个做云贵总督的爹，年少时在北京，混了个“京城三恶少”

[1] 雪珥（澳）：《国运 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3、42 页。

之一的名头。袁世凯要与他拚爹，是拚不过的。但是比政绩，后者却是没得比的。更关键的是，禁卫军相当于皇家亲兵，政府会给岑春煊这种外人吗？严格来讲岑春煊是外人。但是清政府的禁卫军，第一给满人，最次也是给蒙古人，轮不上其他外人的。

第三，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做帝师，还比较靠谱儿，即使梁启超，也靠谱儿。最不靠谱儿的，就是康有为了。谁做帝师都行，千万不能让康有为做。前面说过了，人品上，这人很“三鹿”，不择手段。性格上，这人很不着调，好事都能让他做成坏事。他是个投机主义者，为掌权，无所不用其极。1911年武昌起义后，康有为曾企图发动一场政变，联络满蒙亲贵，搞掉袁世凯，他的学生梁启超不但没有听从他的计划，反而狠狠批评老师一顿：“吾师论事论学，凡既标一说，则一切与己说反对者，辄思抹杀之，论理学所谓隐匿证据是也。似此最易失其平。”^[1]一句话，康有为有了权，要比袁世凯专制多了。第四，实行立宪，可以（事实上是假立宪）；大赦党人，也可以（清政府大赦党人、开党禁是在武昌起义发生之后）；但是天下为公，不可以。从秦始皇到现今，两千年了，中国还没出现过一个天下为公的朝代呢。也许，民国初年的走向共和勉强可算？只可惜后来都拐向了。

赵炳麟的建议是否高明就不说了，只说这建议招致了张之洞的反对。张之洞既与岑春煊有矛盾，还与康有为是死敌，而且他认为奕劻老成持重，在镇安皇室方面无人替代。于是载沣仅对袁党某些人物做了微调，徐世昌由东三省总督调为邮传部尚书；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勒令退休；同时发布上谕，要将立宪进行到底！

[1] 杨天石：《康有为的联满倒袁计划》，《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6），第66页。

袁世凯呢，回到了老家，妻妾成群，儿孙环绕，小日子倒也挺滋润的。

8.1 垂钓洹水，自得其乐

袁世凯在豫北的汲县、辉县、浚县和彰德（安阳）都购有房产田地。罢官离京后，他没有回项城老家，而是带着第五、第七两个姨太太到辉县住下了。家里的其他人也都受了惊吓，除了北京锡拉胡同的住宅留有一些人看家以外，大部分人都逃到了天津，借住到了梁宝生家里，袁静雪说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据袁静雪说，袁世凯在辉县，最初真是“闭门思过”，后来才渐渐活动起来。所谓的活动，就是观赏辉县西北五里处著名的风景胜地百泉与苏门；并且与徐世昌发起捐资，重建百泉、苏门等遗址；除此之外，他还打算重建书社，搜求古书，印刷典籍，以备硕学名流前来浏览观摩。

几个月之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把彰德北关外洹上村的住宅大致修好了，于是袁世凯让人把所有家眷接来一同搬入，真正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时为1908年5月。

袁世凯为什么不回项城老家呢？第一，祖籍房舍已给亲族；第二，与世敦不合，兄弟俩因袁世凯葬母事件彻底绝交，终身不相过问啦。

为什么靠近洹上村呢？中国的阴谋论者习惯认为，这地方地理上方便袁世凯遥控机枢和再度出山。吓，阴谋论者该不会认为，后来的辛亥革命都是他设计出来的吧？如此这般的话，国父就不是孙中山，而是袁世凯啦。

洹上村，因面临洹河（又名安阳河）而得名。洹水源出林州市

西北的林虑山，至彰德境内的善应山袱流涌出，由西向东，注入卫水，恰从洹上村前流过。这村子前临洹水，右拥太行山，原是绅商何炳银的别墅，总面积二百余亩。袁世凯认为环境与风水不错，遂买了下来重新修建。据袁静雪回忆，其父袁世凯的日子过得美滋滋的，试列举几个镜头：

镜头一：这别墅原有的房子并不很多，袁克定之前监工修建的，只是袁家必须居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工程是在袁世凯搬进去以后才陆续完成。首先在住宅外面修了高大的院墙，院墙周围还修筑了几个炮楼。当时的地方当局派两营马队（马一营、马二营）驻守护卫，看起来仿佛是一个寨子似的。在这个寨子里，修建了一些“群房”，部分男佣人的家眷就住在里面。此外，还开辟了菜园、瓜园、果木园、桑园等各种园子，也饲养了猪、羊、鸡、鸭之类的家畜家禽，以备全家上下日常食用。

镜头二：袁世凯还整修了一座花园，取名“养寿园”。他雇人在养寿园里叠石为山，栽种了很多花草和桃、杏、枣等果木树；还把洹水引进园里开发了一个大水池，池里种植了一些荷、菱之类，养殖了很多活鱼。袁喜欢吃的熏鱼，乃是二姨太的拿手菜，她常常用池里的鱼做给他吃。每年秋天，袁世凯还会带着儿女们在水池内养蟹，每个人都用高粱米和芝麻来喂养自己的螃蟹，等到秋深蟹肥的时候，大家都兴高采烈地捕来吃。池内还修有一座水心亭，必须坐船才能到达亭上。每年夏季或月圆的时候，袁世凯常和全家人划船过去，在那里吃饭赏月。有的时候独自和袁静雪的生母，也就是三姨太太金氏荡舟赏月。三姨太会弹七弦琴，这个时候，袁世凯对着皎洁的月光，听着悠扬的琴声，十分高兴。有时候他俩一边赏月一边下围棋。

镜头三：袁家当时人口很多：一妻九妾，总计十个老婆为他生



1907 年的袁世凯

被解职的袁世凯回到河南安阳的洹上村，表面上好像过起了赋闲垂钓的生活，实际上内心更多的是遗憾和无奈。

据与袁世凯相从甚密的卫辉人士王锡彤回忆袁 1908 年 10 月初到卫辉时：“袁公方五十一岁，须发近白，俨然六七十岁，惟二目炯炯，精光射人”，与一年以前的袁世凯相去甚远。图为 1907 年天津发行的明信片上的袁世凯像。

了 17 个儿子、15 个女儿。17 个儿子又为袁世凯生了 22 个孙子、25 个孙女，儿孙总和达 97 人。为了筹措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用品，袁世凯早就在彰德置买了不少旧地，因此粮食是不成问题的。那时候，园里又饲养了家畜、家禽、活物，因此副食也不成问题。园子里产的瓜果等还可以卖到市上换回钱来。他甚至从南方请来了一些蚕娘和纺纱娘（这些人也都住在外面的群房里），让她们养蚕和缫丝。缫出来的丝就送到他在彰德所办的纺纱厂里织成绸缎出售。他时常带着家里人去看她们喂蚕、缫丝。同时也让各房自己喂蚕，自己缫丝，所得的丝价就归各房自己支配。家里还用了一个姓葛的采买，每天总要进城采办一次。每隔两三个月，还要专程到天津、上海购买些彰德买不到的吃、穿、用的东西。葛在去天津、上海之前，总是逐一向各房问明需要买些什么，这时各房就开列清单，交他办理。所有需用的款项，都由账房支付。

镜头四：袁世凯每天起床后，就和老三世廉（当时因病由徐州道解职后前来彰德居住，后来病重身死，老五世辅又搬来同住）下棋谈心。有时他就独自到花园内钓鱼。他曾照有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渔舟上静坐垂钓的照片，以表示他超然世外。遇到亲戚来看望他的时候，他也常和他们下棋来消磨时光。他有时还把河南坠子和“柳子戏”的艺人叫来演唱。过年的时候，总有他的一些北洋老部下来给他拜年；同时，住在项城老家里的老六世彤等人，也来洹上和他共度佳节。他还叫人传北京京剧界的名角，如谭鑫培、王瑶卿、王惠芳、杨小朵、德珺如等来唱堂会。在他的生日和正妻于氏整寿的时候，就有这种堂会戏。

镜头五：做官的时候很少做诗，现在闲下来了，有时也和前来访问的友人们互相唱和。他曾把这些唱和诗句编为《圭德唱和诗集》（圭德是洹水上的桥名）。据袁静雪回忆，能记起来的有这么

几首：

之一：次王介艇丈游养寿园韵

乍赋归来句，林栖旧雨存。
卅年醒尘梦，半亩壁荒园。
鹏倦青云路，鱼浮绿水源。
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

之二：和江都史济道女史月下游养寿园诗

曾来此地作劳人，满目林泉气势新。
墙外太行横若障，门前洹水喜为邻。
风烟万里苍茫绕，波浪千层激荡频。
寄语长安诸旧侣，素衣蚤浣帝京尘。

之三：登楼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之四：晚阴看月

棹艇榜明月，逃蟾沉水底。
搔头欲问天，月阴烟云里。

之五：自题渔舟二首

(其一)

身世萧然百不愁，烟蓑雨笠一渔舟。
钓丝终日牵红蓼，好友同盟只白鸥。
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

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

(其二)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来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1]

诗才谈不上，但是绝句还是有的。比如我最喜欢他的“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放在中国官场与人际关系上，端的是意味深长。当然啦，诗言志。有些诗句会流露出他不甘终老园林的雄心壮志。还是那句话，袁世凯是做事的，不是休闲者。不给他机会，估计他就这样了。但是给他机会，他就不这样了。

8.2 一二三四五，在家数老虎

前面，我们净扯国家大事了，现在，也该扯扯油盐酱醋了——袁世凯和他的一妻九妾。

(一) 一妻于氏

于氏，河南陈州人氏，大户人家出身。1876年嫁与袁世凯，婚后感情尚可，生长子克定。但是为人做事太小气，特别是一句玩笑让袁老四对她彻底丧失了感情与兴趣——当时袁世凯看于夫人天天系根红缎子裤腰带，就跟她玩笑说：看你打扮的样子，像个马班子。不料这位不解风情的傻娘们回曰：我不是马班子，我有姥姥家！所

[1]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安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218—222页。

谓的有姥姥家，就是有娘家、明媒正娶的意思。看《红楼梦》我们也能发现，只有正妻的娘家才算娘家，妾之娘家啥也不算，且无缘登门，来了也给你白眼，不轰出去就算不错了。于氏说者无心，袁世凯听者有意，傻娘们这不是讥讽我娘亲乃是小妾出身么？从此把她打入冷宫，再也没有同房之乐与夫妻之情了。

袁世凯致二姐的家书，对于氏偶有提到，字里行间，对于氏透露出诸多不耐烦。1888年7月致二姐的信中说：“继母此时不可呶呶时向弟索物，瓜期即至，亏空甚多，实在苦不堪言，均俟弟补缺后必可偿债。伊嫁一苦官，亦伊之命不好，将谁怨乎？此时要镀金首饰，不如将来打真金首饰数付，酬谢其事亲之劳，乞谕知之。弟在此处所穿所吃，可询王弁便知，实未尝自厚其身，但能省一钱，必呈乞堂上一笑。至首饰，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无用之物也。”^[1]

1888年的袁世凯，在朝鲜做他的总理交涉通商大臣。1885年上任时是以知府分发的，说是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赏加三品衔。一句话，袁世凯是个挂衔三品的驻外使臣，没钱，且欠了一屁股债，得等回来补缺后才能有钱，因为国内实缺才有陋规啊潜规则之类的，在外头只有工资，没有灰色收入。《让子弹飞》大家都看过了吧，马邦德跟张牧之交待：上任就有钱，上任就有钱。总之，在中国做官，不上任怎么有钱呢？信中所谓的继母，乃是于氏。因克定小名继儿，故谓继母。于氏想弄镀金首饰呢，不管袁世凯有钱没钱，估计都不想给她多花的。男人烦一个女人，有钱也是没钱，没钱更是没钱了。

1890年5月致二姐的家书中再次提到于氏：“继母计此时将抵陈，此间细情想已沥陈。惟其性情甚劣，倘能真行其道，则幸甚。如再无理取闹，可令其回南头，待弟回陈再做安置。处不明白人，

[1]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66-67页。

真亦无法。值此慈躬方宜静养，安能听其时常生事。且现今局面尤须谨慎，切不可准其出外玩看。前已时常切训，特恐其一离此，或不能记者。”^[1]

袁世凯总理朝鲜之时，于氏两次赴朝，一次是1889年带着克定前往，一次是1893年，但是每次呆的时间都不长。信中提到的这次，应是第一次。此时的袁世凯，刚刚奉旨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并赏加二品衔。信中，他对于氏的情绪更恶劣了。按他的说法，于氏快成问题女人了，无理取闹，时常生事，袁世凯甚至担心她影响自己娘亲的身心健康。当然了，一个已失去丈夫欢心的旧式女人，既没有管家的权限，还眼睁睁看着丈夫与妾们打成一片，唯独不理自己，不成问题女人才怪呢。

以后随着袁世凯地位的提升，她的问题也越来越大，抑郁啊，简直就成了袁家的一个牌位。袁世凯隔个三天五日，会去她房里坐一会儿，见面说一句“太太你好”，于氏回曰“大人你好”，双方两国元首般亲切友好打几声招呼，袁世凯就退出了。

袁世凯出山做总统后，外国公使与夫人前来庆贺阳历新年，于夫人也上场接待。一个男老外，冒冒失失要跟于夫人行握手礼，吓得于夫人嗯了一声，身子一偏，竟把双手藏到了背后。总统夫人的贞节算是保住了，却吓着了这外国公使，僵那儿不知作何反应，最后领着太太匆忙退出。也不知回去后是否想明白，总统夫人为啥那副小样儿。至此之后，于氏再需要出场的时候，袁世凯安排袁克文等子女陪同：千万不能让你们的娘再丢人啦，人家问话你们就替她说——算是彻底变成牌位了！

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于氏在一旁大哭：你一辈子对不起我，

[1]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71页。

弄了这么多姨太太，又养了这么多孩子，死了都丢给我，叫我怎么办呢？于是克文领着众多的姨太太所生子女跪在于氏面前请求赐死。克定一看情形不妙，马上出来赔礼说好话。

其实于氏这么哭坟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中国女人哭坟时的套路是固定的：你这个挨千刀的，你这个狠心的，你这个负义的，你怎么舍得扔下我和孩子不管呢？天哪，我们以后还咋过啊？

于氏只生了一个袁克定，所以哭的时候不得不有所变通嘛。但在克文们听来，自己和弟弟妹妹们只有殉葬才是出路了。

（二）头妾沈氏

沈氏，袁世凯最宠爱的大姨太，籍贯江苏，学历上海名妓。当时袁世凯正处于落魄中。科举不成、捐官被骗，尚未到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想在上海谋事，但始终没有成就。据袁静雪回忆，那时候袁世凯一个人住在旅馆里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沈氏，俩人情好日密。沈氏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他盘费，劝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备酒送行，席间对他说明，在他去了以后，自己立刻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面对这样有情有义的女人，袁世凯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随吴长庆赴朝鲜时，就把她接了去，做了袁的大姨太。^[1]

大姨太是这样来的，在家里的位置自然非同一般。袁世凯给她诸多尊荣与权限。怎么说呢？于氏挂空牌，沈氏则是以副代正。袁世凯的几十个儿女对原配夫人于氏叫“娘”，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叫“妈”，对其他姨太太的称呼就在“妈”字前面冠以数目字；只有对从未生过孩子的大姨太却规定叫“亲妈”。至于妻妾们自己之间的

[1]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安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211页。

称呼，规定就简单了，所有的妾称于氏为“太太”；于氏称所有的妾为姨太并在前面冠以数目字；但是未生孩子的姨太太，却只能称姑娘，前面冠以本姓；当然，大姨太沈氏不在此限，因为袁世凯把次子，也就是三姨太所生的克文过继给她为子了。可谓是破格提拔，或曰评聘分开——职称本是讲师，但是袁世凯聘她做副教授。

按克文的说法，大姨太本是农家女，被拐卖到妓院的，至死不从，幸遇袁世凯，为她的烈女精神所打动，遂赎出为妾。能不能信克文呢？不能信，他给他妈编思想品德故事呢！

(三) 二三四妾

二三四妾得一块儿说，因为她们是袁世凯团购过来的。可以说，袁世凯的二三四妾也是中朝人民友谊的见证。据克文所著《洹上私乘》，三位朝鲜小妾分别姓白、金、季，都是望族出身。按传统的记载，她们分别姓李、金、吴，穷苦人家女儿。这里我们还是不能信克文，按传统来吧。

关于她们的来源，兹有袁世凯 1886 年 5 月致时任朝鲜外督办的金允植一信为证：“天渐和暖，房屋添多，一老妪不能分力奉侍，须即买一丑婢为驱策之用，乃伤人寻觅物色，而久无能得。或曰：须朝鲜两班吩咐，甚易购求。再三思维，惟有恳阁下始终其事，或饬下人代买丑婢。年稍大者方能备差，如有十五六岁者尤合用。再，广州名卉，何时可至？盼甚。园有名花，室有佳婢，抱膝把盏，消此长春，度不负千金春宵，亦不惹世俗烦恼，再加以细雨微风，莺歌燕语，横笛短箫，敲棋拂琴，种种好音，当比外督办快活奚啻千百倍也。”^[1]

[1]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 2005 年版，第 73 页。

这信读来煞是有趣，袁世凯追求风流快活的另一面毕露无遗。不过我们回归正题，在里面搜求一下有关三妾的信息吧：第一，她们虽是由朝方官员代为购求的，但却是出于私谊；第二，袁世凯虽然说的是购求丑婢，但是所谓的“抱膝把盏”，分明是婢妾不分，或者以婢代妾了；第三，袁世凯这种行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当时的规则，官员嫖娼不行，但是纳妾则是可以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纳妾，首先对不起孟圣人。

按袁克文的《洹上私乘》，袁的三位小妾都是“三韩望族”，其生母金氏更是“世有贵显”。袁克文这样说，自然有情可原。作为袁世凯次子，平时在长兄克定面前受欺负不说，其母更为其父小妾之一（三姨太），情何以堪？所以把姥姥家弄成韩国贵族，也算是种自我安慰吧！

没想到有些野史比袁克文还要多情，说金氏乃闵妃妹妹，皇室绝代佳人，不只袁世凯相中了，就连日本公使也相中了，双方争风吃醋呢，最后争到了袁世凯手里。金氏过门的时候，带了两个陪嫁的姑娘，一个叫李氏，一个叫吴氏。而当金氏过门后，袁世凯竟把她们三人一起收为姨太太了；并且按照她们年龄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金氏为三姨太，吴氏为四姨太。这样一来，金氏大为伤心，她原认为嫁给袁世凯是做正室的，不料过门后，非但自己不是正室，连她的两个陪嫁女也被袁世凯收为姨太太了。于是整日郁闷中。袁世凯看在眼里，思在心头，自感内疚之余，遇事也就迁就金氏，经常到金氏房里坐坐，以示亲近。但金氏总板着面孔，呆呆坐在那里，一旦袁世凯说到高兴处，她也只是陪之一笑完事；逢年过节或过生日时，金氏总是暗地里流眼泪；平时虽不大与人争长短，但是个性古怪，不高兴时，一语不合也会闹起气来。据其女袁静雪回忆，有一次她和袁世凯在洹上的水心亭下棋，把棋盘棋子都扔到

水里去了。

金氏到底出身若何？还是 1890 年 5 月袁世凯那封致二姐的家书可显露端倪。袁在信中跟二姐说：“弟有用婢，未告纳。去冬十月有娠，后因漏胎两次，疑为不娠，近形迹已大露，据医生及老妈云，的是有娠，在其左，或卜男，计六七月可解生。十三年来，未立继丁，老亲时为盼，今果生男，可又慰慈怀，乞稟告慈听。”^[1]

这信中所谓的用婢就是金氏，她这次所生的孩子就是克文。依袁世凯的脾气，若金氏出身金贵，他早跟他娘嚷嚷开了，还会这么低调，仅以用婢添丁告慰慈亲吗？

那么金氏为什么郁郁寡欢呢？小女人是美人应该不错。正因为是美人，所以才遭罪，估计原因都在大姨太沈氏那边。沈氏在袁的后宫，那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对于新进的年轻姨太，醋意当然大大的，常常是非打即骂。三个小三中，又只有三姨太敢于顶撞她，所以对她下手最狠。有一次，大姨太把三姨太绑桌腿上毒打，致使三姨太左腿落下终生伤痛，临死前还对此恨恨不已。

二妾生 6 个子女；三妾生 5 个子女；四妾生 4 个子女。四姨太死得最早，袁世凯直督时，她因产女得了月子病，误吃西药送命。

袁世凯死后，三姨太吞金自杀，虽然救活了，但已损伤食道，留下咯血的毛病，几个月后就死了。

（四）五妾

五妾杨氏，天津人，小女子原是别人为讨好袁世凯特意买来奉献的。此女虽谈不上绝代佳人之类，但也是有姿色的，且有管理家务的才能，处事果断干练，所以代替沈氏，成了袁家的王熙凤。她

[1]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 2005 年版，第 72 页。

特别善于操持袁世凯的日常生活，诸如该吃什么、该穿什么、该换什么服装、该添什么东西等，都是由她经管。她不但管理整个家务，连少爷、小姐们都由她管教。对丫头、仆女、佣人的管教，自也不在话下。哪个少爷、小姐若不听从她的指挥，她随时可以告到袁世凯那里。据说袁世凯宠爱五姨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特别喜欢她那双小“金莲”，她的脚缠得特别小。看来给名人做妾不容易，做个名妾更不容易！

袁世凯为便于管理女人们，给自己宠爱的大姨太、五姨太分工如下：大姨太负责管理二、三、四3个姨太太，五姨太负责管理六、八、九3个姨太太（七姨太早亡）。如果说大姨太经常虐待三姨太的话，那么五姨太经常虐待的就是九姨太了。总之，女人在什么时候都不缺敌人，何况是自己老公的女人！

五姨太生有6个儿女。

（五）六妾

六姨太叶氏，也是妓女出身，有关她的戏说似乎更具有中国特色。说的是袁世凯任直督时，派二子克文前往南京办事。克文嘛，风流倜傥小名士，游玩时结识叶氏，一见倾心，便订了嫁娶之约。分别时，她赠他一张照片作纪念。袁克文返回后，按照袁家的家规，儿女远道归来，都要向父母叩头“请安”。当他正向袁世凯叩头时，不料那张照片却从口袋里滑落出来，掉在了地上。袁世凯看到后，便指着连声问道：是什么？是什么？袁家是传统大家庭，家规森严，儿女们是不准私订婚约的，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加门当户对，何况对方是妓女来头。所以掉在地上的那张照片，克文是不敢如实交待的。情急之下顺口胡扯曰：“儿在南方替父亲物色了个漂亮姑娘，特带回这张照片，请父亲过目。”袁世凯接过照片一

看，当即喜容满面，连声说好。事后很快派人带了银钱前往南京迎接。而叶氏呢，只知自己已和二少爷订了嫁娶之约，一听说袁家来人接亲了，喜上眉梢，即收拾行装欣然北上。及至到了洞房夜，才发现走对了家门上错了床，新郎不只辈分提高了一个档次，连年龄都翻了一番。

叶氏生有5个子女。

(六) 七妾

七妾张氏，河南人（一说邵氏，山东人），大姨太太买来的婢女，后被收为姨太太。一生没有子女。按照袁家的规矩，她只能被称为“姑娘”，而不能算做姨太太。可是因为袁世凯的喜爱，她也“破格”了，享受的是姨太太的待遇。1909年（宣统元年）袁世凯罢官，她正在病中，仓皇跟随袁世凯南归，受到惊吓，病情加重，到汲县不久，即辞世，年仅20岁。另有一说，病死只是袁府对外的掩饰，实情是她与花匠谈情，事发，被袁世凯勒令服毒谢罪。不管怎么说，袁世凯仍以姨太太之礼葬之。

(七) 八妾

八妾郭氏，浙江人。与母同在天津为妓，被人赎出当礼物送给袁世凯。克文给这位庶母也编了个烈女版故事。说这位庶母虽然女承母业，但是心不甘情不愿，待母亲死后，以身殉之，却被人救下。克文得知后告知大姨太沈氏，两个人遂决定赎到自己家里来。看来袁世凯果然英雄，把自己家都弄成青楼烈女回收站了！

其实克文原不必如此曲笔回护，旧社会的妓女至少琴棋书画德艺双馨。正如东郭先生所言：“昔日妓女挟弹吹唱，传呼行觞的社交仪注行为，大体上犹如今日歌星、影星。社会一般总投以艳羡的

眼光。今天很多家庭愿意子女学习演、唱事业，就是向古以来所谓笑贫不笑娼的遗留。”^[1]更何况我们读者都是有品位的，识得出好歹来。为什么我在这一妻九妾中只对妓女出身者标示学历，原因即在此。古代女人不读书不识字，唯有进了妓院，才算沾了书院，好歹算是有了张文凭，也叫高人一等了。把她们绘成烈女，没的埋汰人家呢。

郭氏生有 3 个子女。

(八) 九妾

九妾刘氏，袁世凯年龄最小的姨太太。她原是五姨太太杨氏的小丫头，成年后被袁世凯宠幸，喜欢吃斋念佛，性格率直，却经常受自己主子五姨太的虐待。生有 2 个子女。

袁世凯死后，已有身孕的九姨太也要殉夫，被拦下。

(九) 袁世凯雨露公平

虽然妻妾之间有尊卑之别、主次之分和先来后到之序，但是袁世凯对她们，至少在雨露方面是公平的，也就是 9 妾轮流值宿（原配于氏提前办了内退），每人每次值宿一周。轮到哪个值宿时，就由哪个姨太太的丫头、女佣人将其用具搬到袁世凯的卧室，期满调换。但是，无论哪个姨太太值宿，第二天早晨都照例让五姨太在他身边伺候。轮到五姨太值宿时，当然她就唱连台戏了。有人认为，袁世凯指定五姨太常年在他身边伺候，足以证明他对五姨太是多么宠爱。事实上这跟宠爱关系就不大了。只能说，袁世凯家里，需要一个 MBA 管理者，五姨太足堪胜任而已。

[1] 东郭先生：《妓家风月》，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 页。

还是那句话，给名人做妾容易吗？

8.3 让子弹飞一会儿

（一）革命党与立宪党的龟兔赛跑

袁世凯在家数老虎的当口，家外，革命党与立宪党的龟兔赛跑也日益见分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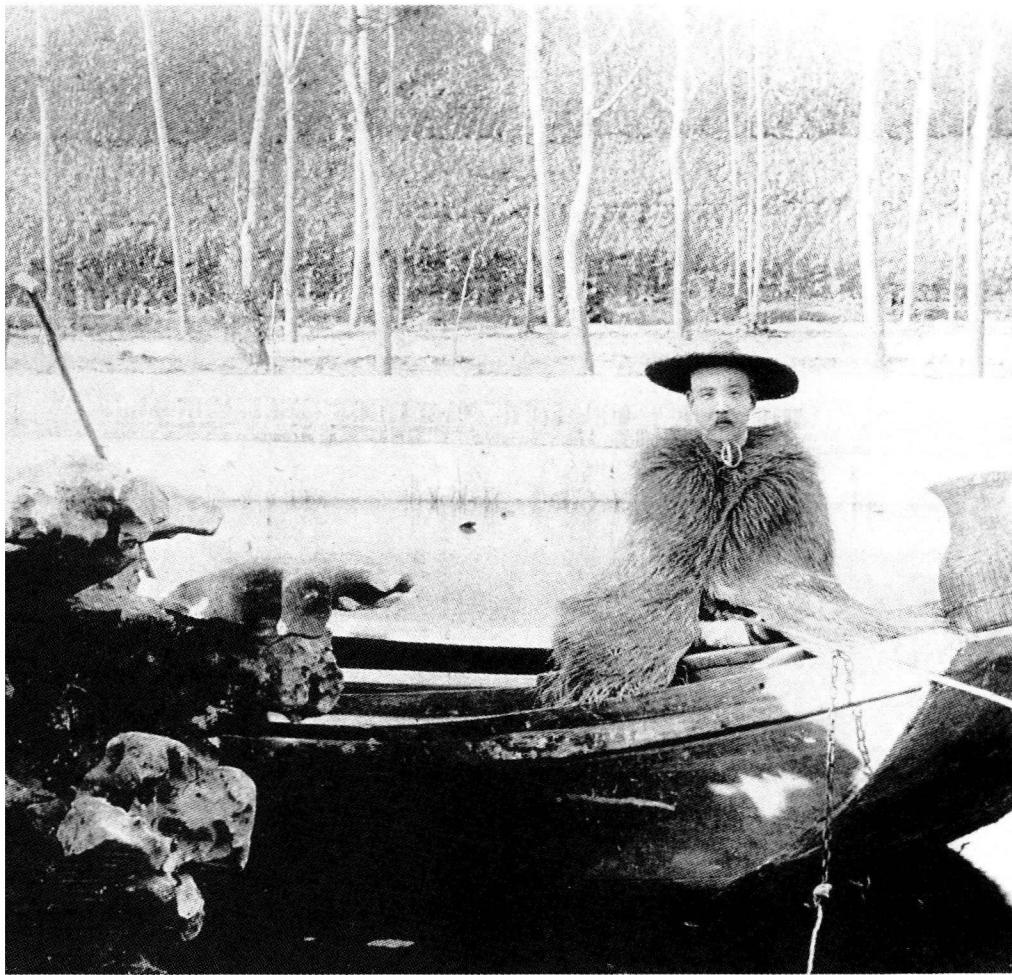
用学术语言来讲，“清王朝主导的政治改革，总是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其迈行的步履及真实意图，总是迟缓于民众心理所期待的节拍”。^[1]用我的话来讲，晚清的立宪与革命，乃是新版的龟兔赛跑。只不过立宪这只乌龟，经常停下来；革命这只兔子，半路上不睡觉。岂止是不睡觉，两只小眼瞪得晶亮，深怕政府真的立宪，那么革命的正当性就丧失了。没想到政府还真成全了他们，政府就是不真的立宪，爱咋咋。

事实上对于清政府来讲，一开始就真的立宪也太难为他们了。按照梁启超的设想，应该先行开明专制，再行君主立宪。无它，没有自治习惯与团体公益观念的种族是玩不好共和的。他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2]他还说：“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长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3]神哉，启超，这后一段真是说到俺心窝子里去了。

[1] 廖大伟：《辛亥革命与民初政治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 页。

[2] 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73 页。

[3] 张树：《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2 卷·上册》，三联书店 1960 年版，第 166 页。



《蓑笠垂钓图》

这张著名的《蓑笠垂钓图》是在养寿园的汇流池里拍的。这时的袁世凯真的是“垂钓洹水，自得其乐”吗？有诗为证：“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端的是意味深长！

问题是，革命派在舆论上越来越占上风。没办法，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麻木不仁者太多，所以急进浮躁者也就不少，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国民性格调色板。革命小将邹容叫曰：“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呼地，破嗓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乎！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至于革命老将们，孙中山、黄兴、章炳麟等于1906年共同拟制了指导各地举行反清起义的文件——《革命方略》，明确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思路，那就是组织国民军，推翻清王朝，建立军政府。至于建国程序，分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也就是行政权归于军政府，大约需要三年。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地方自治，地方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产生，人民、地方议会与军政府三足鼎立，这个时间大约需要六年。第三期为宪法之治，解除约法，颁布宪法，军政府解兵权与行政权。大总统与国会议员由人民公举，一切依宪法行事。关于政治架构，他嫌西方的三权分立不够扎实，提出了一个五权分立！相当于别家的小板凳都是三条腿，咱是五条，愣是比别人多出两条来！

从1906年到1908年，革命党起事如下：萍浏之役、潮州黄岗之役、惠州之役、安庆之役、钦廉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及申河口之役，总计七次，可谓是屡仆屡起。在这种情形下，太后与光绪联袂而走，端的是不妙。更不妙的是，太后临终前选择了一个虚龄三岁的接班人溥仪——光绪弟弟载沣的儿子，简直是拿国事当儿戏——当然人家更愿意说这是家戏。

不管什么戏吧，反正快谢幕了。一边是革命党起义不断，1909年又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一边是立宪派呼声不断，在革命党的影响下，立宪派也激进起来了，认为预备立宪九年时间太长，应该只争朝夕。1909年各省咨议局成立，立宪派有了合法的活动阵地，十六省议员代表在上海开会，决定进京请愿。1910年1月各省代表

进京，上书要求，一年内召开国会。政府拿出国情特殊论加以拒绝，请愿失败。各省代表继续奔走，在京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6月，代表团进行第二次请愿，清廷这次不提国情了，改提灾情了——各地受灾，财政困难云云。10月，资政院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代表团第三次上书请愿，要求1911年（宣统三年）召开国会。与此同时，各省立宪派发动签名及游行示威，向当地督抚请愿。资政院通过了提前设立议院的决议并上奏，十七省督抚联衔电奏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国会。清廷做了让步，宣布：当下立即组织内阁，1913年（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此后不得再行渎请。一部分立宪派满意了，停止了活动，但是还有好多立宪派不满意，继续活动。东三省的代表到达北京，政府将他们押解回籍，并镇压其他各省的请愿活动，第四次请愿流产。

1911年5月18日，政府成立了责任内阁。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度支（度支大臣镇国公载泽）、学部（学部大臣唐景崇）、陆军（陆军大臣荫昌）、法部（法部大臣绍昌）、海军（海军大臣载洵）、邮传（邮传大臣盛宣怀）、理藩（理藩大臣寿耆）、农工商（农工商大臣溥伦）等十个部。

立宪党人一看名单，傻眼了。皇家明摆着是逗你玩嘛：十三位阁员，汉四满八蒙一。满八中，皇族又占了五个。分明是皇族内阁嘛。于是立宪党人联合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上书：名为内阁，实为军机；名为立宪，实为专制；皇族内阁不符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组内阁。清廷认为不值得回应。7月，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再次呈请另组责任内阁。清廷回答：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过问。清廷这样回答是习惯的傲慢所致，事实上它的苦衷如下：改革不是一日之功，改革一启动，首先启动的却是整个社会的冒进心理；愈

是深水区改革，愈是需要中央权威，皇族内阁是不错，可它只是个过渡性内阁，两年之后，也就是 1913 年，国会就要召开了，为啥不能等等呢？

等不及……每到历史的转折口，被动员初醒的民众，虽然睡眼朦胧，但总是迫不及待地要跑步进入！还是那句话，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麻木，一面是跃进。正常的走路就是不会！

（二）大清上空飘荡着另一个幽灵：经济民族主义

除了革命派与立宪派的龟兔赛跑，这个时候大清国的上空，还有一个经济民族主义的幽灵在飘荡，具体说来，它就是最终充当了辛亥革命急先锋的保路运动。

鸦片战争以来，由于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的抗拒，铁路事业的发展一直处于扭捏状态。一是认为铁路不好，既毁风水，还影响生态；二是自己不会修，让外国人修，既有碍面子还影响咱心态。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明白铁路的好处了，但自己没钱没技术，不得不依靠外人外债。作为回报，就把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购料权拱手让给外国公司。外国公司从中获取的各种回扣、经纪费、余利，为数很巨大。更为严重的是，中方大都是以全路产业作为抵押，如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外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中国铁路利权流失严重。

正是由于这一点，1898 年，清廷成立了矿务铁路总局，发布了《矿务铁路章程》，认为矿路分三种办法，官办、商办、官商合办，但总归不如商办。

看意思，政府知道官办不行，要为民营保驾护航了，而且对于那些独立资本在 50 万以上的路矿，如果民间资本过半，政府会照赈捐之例给予优奖，也就是给予一定级别的官衔和相应的政治待

遇。

1903年，商部取代矿务铁路总局统筹全国铁路建设，政府明确规定对民营铁路公司不再下派监督总办等角色。同时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允许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兴修铁路干线与支线，商办铁路公司遂络绎地建立起来。1906年，航运、铁路、电报、邮政等统归邮传部专管，其中的重头戏，就是铁路建设。到1910年，中国民间成立了17家铁路商办公司。与此同时，政府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还收回了一些铁路路权，尽管收回的时候经济上吃了很大的亏。比如粤汉路权，本已转让给了美国的华美合兴公司，但是中国政府找到人家违约的一些小把柄，愣是把路权收了回来——合兴公司在粤汉铁路的全部资产是300万美元，我们又加了375万美元，用675万美元的高价收购了回来。^[1]之后，其他地区也都掀起了赎回路权的运动，民间商办走向高潮。

问题是中国的民营资本也不争气。澳籍华人雪珥对此评价曰：“面对铁路这一资金、技术、管理饥渴型行业，民营资本不仅先天疲软，而且其腐败与内讧，因比国有企业缺少监督和制约而变本加厉。17家民营铁路公司，家家都是乌烟瘴气、丑闻迭出，爱国主义成为恶棍们做无本生意的最好工具。”^[2]

清政府再傻，也能发现这个商办铁路问题也不少：

第一是资金严重不足。中国是个传统农业大国，长期的国贫民敝，单靠民间根本筹不够修筑铁路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这不是清政

[1] 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

[2] 雪珥（澳）：《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

府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是任何后现代国家必然面临的共同问题。事实上，俄、德、日、墨西哥等国家在铁路事业上也都有过商办转国有的过程，道理如前所述，光资金上民间就玩不转。据 1909 年邮传部报表，川汉、西潼、洛潼、江西、安徽合计估算修路资金应为 7200 万两，而实际到位仅为 1310 万两，占应集资金的 16.6%。^[1]而且，在已经筹措到的资金中，也主要是面向民间强迫分摊的租股、土药股、盐茶股等。其中最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按它的筹资速度，修成川汉铁路大约需要一百年，可谓是后路未修前路已坏，而且前款不够路工之用，后款不够股东之息。

第二是技术薄弱，管理混乱。在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情绪的笼罩下，筑路这种高科技、高投入的活计，被搞成了全民大炼钢铁。没有统筹，没有衔接，大家各自为政，有些铁路干脆修成了死路与僻路，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到 1911 年止，17 家大型民营铁路公司筹集了 7422 万元资本，只占预算资本总额 19576 万元的 37.9%；而且同所筹集到的资本相比，筑路成绩更不理想，共筑路 568.2 公里。^[2]还有些公司，铁路没建多少，资金倒是亏损不少。比如川汉铁路公司，经理施典章挪用资金炒股，亏空 300 万元。

无奈之余，政府只好在 1908 年下了最后通牒，限期无法竣工的商办铁路一律由政府接管，并注销该公司。与此同时，清廷任命张之洞为督办粤汉铁路大臣，并兼办鄂境川汉铁路。张之洞呢，早在收回粤汉铁路时就主张官办了，而且所谓的官办也是必借外债的。跟英国谈的时候，德国来了；跟德国谈的时候，英国拉着法国来了；跟英法德谈的时候，美日又来了……1909 年，张之洞死了。

[1] 麦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 3 册》，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1159 页。

[2] 同上，第 1150 页。

不管死活吧，只要跟外国人谈，就足以引起经济民族主义者的强大怒火了。在中国，什么事儿沾上爱国的唾沫，那就所向无敌了。监督路政维护路权的杂志办起来了，铁路协会成立起来了，请愿代表绝食来了——湖北留日学生张伯烈等请愿代表在邮传部尚书徐世昌的私宅哀哭痛骂，跪坐请愿，绝食达 7 昼夜……新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斥责他们为“徒托空言，与事实毫无补救”。^[1]于是大家转而大骂盛宣怀，不是说我们空言吗？爱国我们可能是空言，但是骂你则是实实在在的。与此同时，来自外国的压力更大，因为他们可不是徒托空言，三言两语不合，战舰就开来了，而且来了一艘来两艘，来了两艘来三艘，可不是玩的。咱嘴上说来一艘干一艘，可真等人来了，咱就只剩下说热爱和平的份儿了。只不过政府这次没有想到，经济民族主义也可以玩出火星来。所以它在这时候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反正不管怎么着都是犯错误——于 1911 年 5 月 9 日，也就是皇族内阁公布的第二天下谕：干路均为国有，定为政策（支路仍可由民间酌行商办）；此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的铁路干路，全部由国家收回；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5 月 20 日，盛宣怀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主要内容是：

一、清政府向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借款 1000 万英镑，年利息为五厘。用于建造 1800 华里的铁路以及车辆设备，铁路须在 3 年内完工，贷款须在 40 年内还清。二、受贷款方以两省的百货厘金、盐厘金等合计 520 万两作为抵押。此项贷款本利，如能按期偿还，则贷款方不得干预各省之厘捐。三、铁路建造与管理的全部权力归

[1] 赵润生：《保路运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 页。

中方所有，并由中方自行选派三名洋人总工程师，外国银行对所聘总工程师有否决权，但须说明否决理由。总工程师听命于中方督办大臣。其委任、辞退有关人员须经中方总办同意，如有分歧，中国邮传部具有最终裁决权。四、所用铁轨，须是中国汉阳铁工厂自行制造，价格由邮传部比较他路欧美产品价格而定。所需从外国购入的原材料与产品，须通过招标方式进行，定购材料及支取费用，须由中方督办大臣或总办核准签字。进货时须由中方所聘者验看后才能进货。如中国的原料或产品与各国原料或产品相比，质同价低，或价同质高，则应优先购买中国原料或产品，以鼓励中国工艺。

平心而论，商业之父盛宣怀签的这合同，在晚清与民国，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与之前张之洞签订的草约，之后袁世凯政府签订的善后大借款相比，它是最优厚的一个合同了，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中方的利权。

首先看利率。年利息 5%，属于低利率。清末中国国内钱庄的平均利息为 12.5% 至 14.8%。

其次看贷款抵押。贷款须有抵押，此乃经济学常识。而且与中国以往的铁路借款合同相比，不是以铁路管理权或铁路所有权作为抵押，而是以百货杂类与盐厘捐为抵押，风险降低许多。

第三，筑路不是磨豆腐，所以雇用洋专家乃是必须的，而且该合同在用人权上，严格限制了洋人总工程师的数量和职权范围，一句话，接受中方领导。

第四，优先使用中国工业产品与原材料，对所采用的外国产品与原材料，中国拥有核准权。

第五，没有任何经济利益之外的政治附加条件。一句话，这是一个纯粹商业性的合同。

按盛宣怀估计，铁路三年内接通，十年之内中国还本。而且，

新颁布的铁路国有政策，不会与民争利，只要商民愿意，可以附股，与国家同受利益。

问题是有些商民不愿意。之所以说有些商民不愿意，原因很简单，另有商民愿意。只不过革命主义与民族主义视角下被我们有意无意的忽略而已。云南、贵州、广西这些边远省份，不但支持铁路国有，甚至希望政府尽快执行。不愿意的是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份，后者中，湖南、湖北与广东反对的声浪相对温和一些，激烈的是四川士绅。为什么呢？跟爱国无关，只跟利益相关。我们看看政府对各地的补偿措施就明白了——按政府拟定的办法，湖北湖南补偿最优，广东次之，四川最下。清政府之所以这样区别对待，乃是因为各省股票亏损情况不同，导致其实际价值不同。湖南、湖北股票亏损较少，清政府对其所采取的办法是以国家保利股票，按两省商办铁路公司股票的票面价额来换取商民手中持有的铁路股票。广东亏损较多，其真实价值不及票面价额的五成，清政府的办法是，从优发给六成的国家保利股票，其余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这样广东还能占些便宜。对四川，政府就不客气了，仅仅换回实际上用于铁路建设的股款，而并不换回全部股款。四川铁路公司总共募集了1400万两的股款。据估算，其中的一半，即大约700万两，可以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而其余的另一半，即700万两中几乎有一半是由于该公司的一位经理施典章，在从事上海的墨西哥橡胶股票投机时亏空净尽，所以政府只同意发给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至于被施典章挪用亏空的300万两，政府则概不负责。盛宣怀甚至很具有宪政常识地指出：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的亏损！多好的铁路部长啊，可惜被川民骂做了卖国奴。

这个时候的川汉铁路公司内，分为温和派与激进派。温和派的

意思是，商办本就不行，政府又明确宣布不准强行收取租股了，以后更不行了。虽然不行了，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川省人民办路用款照数拨还现银。为了达到全额退款的目的，不妨站到道德制高点上：“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一句话，打着爱国的旗号，多挣回俩股钱。激进派的意思是，铁路国有，就是与民争利。与民争利也就罢了，居然还要借外债。借外债也就罢了，居然还要有抵押、用洋人、购洋货，太不要脸了！

温和派知道自己缺的是钱，政府拿钱来，啥都好说；激进派站在爱国的制高点上，知道这回机会来了。

1911年6月17日，成都各团体在四川铁路公司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与会者5000多人集体痛哭，连维持秩序的八个警察也被感染上了爱国细菌，丢了警棍，伏在桌子旁跟着号哭。大家大骂邮传部卖国，大骂盛宣怀卖国奴，并当场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分任正副会长。半个月之后，会员达到10万多人。

当时的川督由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署理，到任前由布政使王人文护理（赵尔丰8月3日到任）。可以说，不论是护理王人文，还是署理赵尔丰，都屡次请求政府听从民意，但是摄政王载沣的意思是，铁路国有，缓办急办无所谓，关键是政策下来了就得执行，政府不能如此出尔反尔，那还有什么威信？王人文和赵尔丰呢，见政府听不进，对于四川的保路运动，跟袁世凯之前的各任山东巡抚对待义和团似的，也弹压，但弹压的成分，盖不住宽容的成分。否则四川保路运动也不至于发展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

8月24日，川路召开全体股东大会，成立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大会宣布25日起全川罢市罢课。26日又宣布从此不完捐税不纳丁粮。不交税不纳粮，实质上已经出轨，形同历史上的农民

造反了。政府一看王人文与赵尔丰不好好干，遂严旨催迫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一部分鄂军入川镇压。一看端方要入川，赵尔丰终于变成了赵屠夫，于9月7日诱捕了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罗纶等人。群众潮水般涌向总督署，要求释放蒲、罗诸人，赵尔丰下令开枪，“成都血案”发生！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保路运动的背后，另有一支力量在推波助澜。这支力量，就是革命党人。可以说，保路运动一开始，革命党人就采取“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的策略，参加到了运动当中，保路给他们一个爱国的名头，保路同志会更给他们一件合法的外衣。5月，革命党人在成都开会，制订出自己的策略：一、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者同盟会；二、领导民众，拥戴蒲、罗诸人，暴动于省城之中；三、同盟会会员分赴各地，组织民军共同革命，各以数百或数千人，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四、搞好统战工作，吸引哥老会与各地民团进入保路同志会。

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9月8日，革命党就打响了第一枪。

9月28日，革命党人建立荣县军政府，给大家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与道路，随后四川各州县相继独立，建立军政府。清廷手忙脚乱地从粤、鄂、湘、黔、滇、陕等六省调集大批军队入川助剿，其中尤以湖北兵力最多、枪械最精，计有湖北第16协第31标、第32标1营约2000余人，毛瑟枪2000余枝，另有军需辎重若干，湖北就空了！

清政府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布一个错误的干路国有政策。第一，铁路国有化是必须的。但是发布得太早了，应该等到商办烂得不能行，把民众的股票吃干搞净，引起

民愤，政府再收回也不迟。那时候，不但没有阻力，民众可能反而感恩戴德。第二，铁路国有化，完全可以区别对待。边远省份愿意国有，立即国有。两湖与川粤不愿意国有，就应先由它商办。第三，盛宣怀坚决不补四川 300 万元的亏空，从商人角度来讲，是算盘打得精；从政客角度讲，是宪政思想太超前，不乱花纳税人一分钱；可是从大局角度讲，不就 300 万吗，政府填了这个窟窿不就得了？天平的一头是江山，一头是 300 万，不用说，咱得选江山。可惜清政府死活没有想到，四川的几张铁路股票，就把它的江山卖了。第四，民国成立后，政府照样执行铁路国有，商民不但喊不出路亡国亡的口号来反对了，甚至大大降低要求，只要股本有着就行。问题是民国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收购商办股本，只好走分年摊还之路，商民吃亏大了，但大家都认了。第五，孙中山先生在 1912 年时就计划通过向外国贷款 60 亿元，在 10 年内，在中国兴筑 20 万里铁路，并给洋人以全部筑路权与经营权，40 年后再收回。

（三）让子弹飞会儿

乱世用能臣。清政府的末日之局谁能主？当然还是袁世凯了。

1910 年的 11 月，因外交上的困厄，唐绍仪就天天在军机大臣面前运动起用袁世凯。

1911 年 4 月，由于日俄加紧侵略，东三省告急，以奕闥为首的满汉大员十余人同声请求起用袁世凯，力保袁世凯出任东三省总督。

1911 年 5 月，皇族内阁出笼后，遭遇舆论攻击，内阁协理那桐请求辞职，并且公开声称袁世凯的才干胜过自己十倍，如果政府特用，必可宏济艰难。徐世昌虽不敢提自己兄弟名字，但也委婉地提醒政府，要不拘一格用人才。即使载沣六弟、海军大臣载洵，也认

为有起用袁世凯的必要。境外列强更是看好袁世凯，认为当下时局非袁世凯莫属。可惜载沣与隆裕太后这一对近视眼，还没有看见棺材盖子。

1911年6月25日，袁世凯那位曾经的老师、立宪领袖张謇由湖北进京，中途在彰德下车看望了袁世凯。袁世凯享受家庭生活两年多了，虽大约知道外面形势不好，但是却摸不准张謇的来意：鸡给黄鼠狼拜年，这是咋的了？于是袁世凯就跟张謇扯治理淮河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后来发现张謇不是这个意思，众望所归，大家都对清廷失去了最后的信任，希望袁老四出山呢，于是袁世凯才交了心：“有朝一天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1]张謇非常满意，回去时笑着对同行的人说：“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两个人于此算是结下了政治同盟。按刘厚生所言：謇与凯的一夕之谈，决定了清廷命运。^[2]

张謇来之前，也就是6月22日，袁世凯曾写信给端方，既批评了保路运动：“无理取闹，亦足见人民程度之太低”，又说自己身体不行了。几天后端方也来到了彰德，双方密谈。端方这个人不可小觑，乃是满人里难得的开明人士，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公认的有学有术之士。双方密谈的结果，既达成了政治共识，还结成了儿女亲家。端方来时，还随带了盛宣怀的一封信，信中表达祈盼袁世凯东山再起，无人能匹敌的心愿。袁世凯回的是：失民心，老眼昏花，连回信都没法写，请求原谅云云。有史者认为袁世凯此乃

[1]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81—182页。

[2] 同上，第182页。

做作，可是你让人家袁世凯怎么回呢？回说我一顿饭吃五十个包子、三十个馒头、两只鸡、一只鸭，精神抖擞，老当益壮，一直准备着出山呢？中国式客气，哪个不是人家夸咱年轻有为，咱就得回以老了不中用咧？

不只清政府想不到，就是袁世凯张謇等人估计都想不到，4个月之后，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敲下了清政府棺材板上的丧钉。当然了，革命党人也想不到。当时的湖北革命党一直在努力，并且重点在新军中活动，为此先后组织了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文学社和共进会等领导机构，文学社的领导人蒋翊武和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杨振武（合称三武）决定联合举事。

举事需要经费，革命同志自己缴纳的会费远远不够。于是出现了诸多稀奇古怪的筹金法子：

第一是盗。听说广济县一庙里有金佛，焦达峰变卖其母的膳养田前往踩点，最后去了六个人，盗是盗到手了，可惜在路上遇到捕快，以为被对方发现，遂弃于田中。第二是下迷药兼绑架。湖南邹永成来汉，说他婶母住在武昌八卦井，多金银首饰，如能以术取之，当为革命之用。大家一听都说好，遂从军队里找个军医配迷药，由邹永成购好酒，置药其中。诡称将有远行，特来与婶母话别。两人喝酒在内，孙武、邓玉麟门外等候，久之，闻邹婶言笑自若。邹永成出来对两人说：“药不灵，碍事。”偷鸡不成蚀把米，白浪费一瓶好酒。邹永成心有不甘，最后将其婶母幼子安众骗至汉口，放言要其婶母赎回，终于勒得800元。第三是感化夏布贩子。浏阳商人刘贤构，贩夏布至汉口，在客栈与焦达峰相识。焦达峰向刘贤构宣传革命，刘深受感动，加入共进会，并把夏布全数交给孙武充作革命经费。第四是卖祖产。张振武跑回竹山，劝父亲再将城内几处房产（共一百多间）卖掉。之前为他留日求学和在武昌办学，其父已经

两次为其卖地产了。这次，把房产也全都卖了。第五是动员富户捐款。但缓不济急，或者说远远不够。最后共进会会长刘公弄来一大笔钱。刘公家为襄阳巨富，1910年他回家养病，其姑表兄陶德琨（刘公的父亲刘子敬是陶德琨的姑父）新自美国留学回来，刘公与陶德琨几经商议，由陶德琨出面向其姑丈刘子敬进言。陶知其姑丈名利心重，因说：“要发大财必先做大官，做了大官不难发大财，美国就是典型例子，表弟刘公为日本留学生，正好捐一道台。”^[1]

不知道姜文拍子弹飞的时候是否受过这段子影响，只知道刘子敬一下子拿出二万两银票，刘公带到省城武昌，以一万两交共进会；以一万两托陶德琨保管。

钱终于够买军火了。“三武”于1911年制订了起义计划，并且派人到上海邀请同盟会领导人前来主持大计，并联络邻省策动响应。没想到一切都还没联系好，10月8日（一说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用洗脸盆检查炸药的时候，刘公的弟弟刘同站在旁边吸烟观看，漫不经心中把烟灰磕进了脸盆。呼哧一声，虽未爆炸，但浓烟四起，伤及多人，邻人急呼救火。孙武及几位伤员进了医院，其他人想把档案名册带走，却找不到钥匙，于是都跑了。俄国巡捕赶来，把文档册子搜走，并报告了清政府，刘同在哥哥的安排下陪着嫂子回家拿关键文档，被逮。湖广总督瑞徵一看刘同年少着洋装，遂重点审问他，一问还全招了。形势危急。10月9日蒋翊武召开紧急会议，认为不能仓促起义。其他人认为，反正刘同要招，名册被搜，起不起义我们头也不保了。于是蒋翊武决定当晚十二点起义。可是十一点多的时候，巡警就闯了进来，捕去一些革命党人，蒋翊

[1] 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159页；张成群：《首义元勋张振武》，《湖北文史资料》2001（3）。

武逃脱。其他联系与响应活动也没有组织成功。10月10日，湖广总督瑞澂杀害捕去的三名革命党人，并按名册搜捕其余人等。群龙无首中，新军工程营第八营的士兵起来了，他们冲向楚望台，占领军械库，然后直攻总督衙门。总督瑞澂与第八镇统制张彪纷纷逃亡。一夜之间，革命党人就拿下了武昌城。11日拿下汉口，成立了湖北军政府。由于群龙无首，连个能镇住场面的人都没有，所以革命军把躲在床底下的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协统相当于旅长）拖出来，拿着刀逼他做了军政府都督。12日革命军拿下武汉。革命就这样以近乎儿戏的方式成功了！

10月11日（农历八月二十日），袁世凯正在大过生日。革命的消息传来，大家相顾失色。革命嘛，从来都是两种可能，胜利或者失败。可是清政府这艘破船，即使失败的革命也承受不起了。大家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了政府：看尔咋办？

10月12日，政府命陆军大臣荫昌率陆军两镇赶往湖北镇压；湖北军队及赴援各军均归其节制调遣；饬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军舰，会同长江水师往援；瑞澂革职，暂署湖广总督，立功赎罪。

荫昌，京师同文馆德语班毕业，在奥地利学过陆军，甚至与时为太子的德皇威廉二世曾经是同学，后来又几次在德国进修陆军，但是学习归学习，指挥打仗归指挥打仗，两码事。而且这个家伙，连日常德语都对付不了，遑论军事理论与技术了。和平时期，这些满州人可做军事统帅，可是一到战争时期，他们立马傻眼。一般的评者认为，北洋都是袁世凯的旧部，荫昌指挥不动。评者忘了，北洋头头都被政府弄回老家了，何况北洋旧部？再说袁世凯在家蹲了两年半了，北洋陆军也应该成为满洲人的旧部了吧？铁良不是跟袁世凯争陆军指挥权吗？两年半了，还没暖热吗？铁良还是满洲人里的知兵者呢。革命爆发时，正做江宁将军，面对上海革命党人的围

攻，小子跑得比谁都快，直接躲日本军舰上去了。所以，别拿旧部不听指挥说话，八旗是您家祖传旧部，你指挥给大家看看？还是那句话，皇亲国戚和平时期可以做将军，上下自己的车还得有人推有人拉的；战争时期，草包能跑掉，就算够勇敢够机灵的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全国各地，纷起响应。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外国列强坐不住了，他们的意见竟然高度统一：局面非袁世凯出山，不能收拾！清政府内部的奕劻、那桐与徐世昌也要求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载沣不同意，那桐以告老辞职、奕劻以不上朝议事抗议，载沣只好含泪选择袁世凯。这让满族一些亲贵很不乐意，但是谁让自己人都没本事呢？于是载沣与他们商议曰：先让袁世凯出山收拾局面，最后不管他成功或是失败，我们都可以设法诛杀他。嗯，人家还没上磨呢，他们已经设计好了要杀驴。幸亏袁世凯的忠诚是有限的，否则就被这帮皇族玩惨了。

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之水陆各军，亦得会同调遣。

袁世凯虽然做的是大清那种体制下的官吏，但是必要的自尊还是有的，他对政府的回复是：足疾没好呢，等好了再说吧。亲友幕僚们商议曰：清政府没戏了，但是咱出山又有性命之忧。袁世凯表态说：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也不愿其为革命党。^[1]嗯，站在保守主义的角度，袁世凯是反革命的。但是，辛亥革命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还是存在的。只不过，革命之后怎办，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一切，也都是袁世凯要思考的问题，所以面对各路人马的劝导，他的

[1] 王锡彤：《辛亥记事》《辛亥革命资料汇辑·第二册》，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52页。

选择像张牧之一样帅：让子弹飞会儿吧！

让袁世凯出山，是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力挺的，时任内阁协理的徐世昌一看兄弟还在摆架子，就亲往彰德劝驾，袁世凯遂通过奕劻与徐世昌提出六条件：第一，明年即开国会；第二，组织责任内阁；第三，宽容此次事变的人；第四，解除党禁；第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第六，须给予十分充足的经费。

载沣不太情愿，犹豫中。他这么一犹豫，前线更不利了。23日，冯国璋到彰德看袁世凯，袁对冯的指示是：慢慢走，等等看。24、25日，袁两次奏请，派冯国璋总统前线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陆续往前线开拔。荫昌虽然在前线往来奔波，但就是没有战绩，湖南陕西九江还都革命了。载沣一看大势不妙，遂于10月27日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以冯国璋统第一军，段祺瑞统第二军，算是接受了袁世凯六条件中的第五项。但袁世凯还是不出山：一根棒棒糖休想哄我，继续在养寿园钓鱼！10月30日，载沣开始显示出最后的诚意，一连发布四道上谕：第一是实行宪政；第二是迅速起草宪法；第三是革除亲贵，组织完全责任内阁；第四是大赦政治犯，开放党禁。问题是，迟了——对于全国来讲。不过对于袁世凯来讲，则是恰好——嗯，完全责任内阁，早就让你们成立，你们不成立，这会儿，内阁总理还得归我。六条件，差不多都实现了，那我可以动身了。

10月30日，袁世凯终于离开彰德，南下视师。这个时候的北京政府吓得已经要巡幸热河了，被袁世凯拦住。10月31日，荫昌与袁世凯交接，长出一口气，回京了。他一走，11月1日，前方的军队就拿下了汉口。当天，奕劻辞职，其他阁员纷纷辞职（看来都是吃闲饭的，关键时刻没一个好样的）。11月2日，政府授命袁世凯做内阁总理大臣。11月3日，资政院将宪法信条十九条议决奏上，

载沣即命刊刻宣布，择期宣誓太庙：

第一条，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

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

第四条，皇帝继承之顺序，于宪法规定之；

第五条，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皇帝颁布之；

第六条，宪法改政提案之权属于国会；

第七条，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特别资格中公选之；

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第九条，总理大臣受国会之弹劾，非解散国会即内阁总理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两次解散国会；

第十条，皇帝直接统率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

第十一条，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紧急命令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

第十二条，国际条约，非经国会之议决，不得缔结；但宣战讲和不在国会开会期内，由国会追认之；

第十三条，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条，每年出入预算，必经国会议决，不得自由处分；

第十五条，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依国会之议决；

第十六条，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第十七条，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

第十八条，国会之议决事项，皇室颁布之；

第十九条，第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八条，
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十九条之精神，绝对是真立宪。清室看见棺材盖了，终于玩出了真的。英国现在搞的，还是这一套。问题是，每个历史的交叉口，在多种选项并存的情况下，中国总是选择最差项。一句话，革命党不喜欢玩这套。不过袁世凯还是先玩上了。对于内阁总理大臣，先是按照惯例辞谢。辞谢不得后提出，按游戏规则，内阁总理大臣得由国会公举，于是资政院开会，于11月8日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资政院正式选举袁世凯做总理的前一天，11月7日，发生了吴禄贞案——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自己的办公室被亲信马蕙田开枪打死。一般舆论都认为这是在袁世凯指使下发生的。

事实上，袁世凯南下与荫昌交接时，对方就提醒他，注意吴禄贞这个人。吴禄贞，革命党人，留日士官生。在湖北组织过最早的革命同志沙龙；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参加过张之洞的新军；在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手下做过事；跟宗社党的良弼是同学兼好友；贿赂奕劻做了保定陆军第六镇的统制。接任后大整顿，想换自己的班底，首先开刀的是十二协统领周符麟。说周符麟烟瘾甚深，行同盗贼，应该撤职。陆军大臣荫昌不批，他就写信大骂荫昌只知做官，不知尽责；之后又亲自跑到陆军部大闹，荫昌只得批了。但是荫昌从此看不惯吴禄贞，吴禄贞再整顿下去也没戏了，于是长期住北京生闷气，不大过问第六镇的事。

清政府预定1911年10月于直隶举行三年一次的秋操，吴禄贞部奉命参加。他联系与自己在日本同学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准备相机起事，引起政府怀疑，第六镇被下令

停止秋操。就在这时，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虽然被起用，但清政府最终要走的一步也是卸磨杀驴。良弼这些宗社党，甚至不想等到驴拉完磨那一天，欲联合吴禄贞先干掉袁世凯。吴禄贞呢，干谁都行，不但要干袁世凯，最终还要干清政府，不干白不干。之后又发生了诸多事，对吴禄贞来讲，都是混水摸鱼：截留政府运往前线的军火；策划直捣北京，挟天子以令诸侯，先解决袁世凯，再处理汉口前线的清军。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袁世凯督师在南，我直捣北京，看你袁世凯还有啥戏唱！袁世凯当然有戏唱，在前线找到周符麟，让他北上解决吴禄贞。周拿两万元买通吴禄贞的亲信马蕙田，马很痛快地就把吴给干掉了。

这样一来，袁世凯的后方才算安定下来。

吴禄贞死了，正式总理也当上了，袁世凯把前线军事托付给冯国璋，带领大批卫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11月14日，袁世凯接受载沣与隆裕太后的召见。16日，组织责任内阁。有评者曰，袁世凯弄的阁员都是他的亲信。评者忘了，按游戏规则，组阁就是组自己人嘛，哪有组外人的？再说非常时期不组亲信组外人，你傻还是袁世凯傻？

下面，就看袁世凯的了。

第九章

老乡，请问共和咋走？

清朝皇帝虽然不在了，但是其他东西都还在，所以走向共和不是那么容易的，正如唐德刚先生所云：

事实上，在此之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原都是整个民族在数千年中从生活实践中慢慢发展出来的文化整体。在这个整体的结构之内，帝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1]

一句话，面对早已处于锁定状态的中国特色的文化路径，袁世凯不一定能玩得转、行得通。世人都同情孙中山，不知孙中山的幸运正在于他没有上位；世人都恨袁世凯，不知袁世凯的悲剧就在于他的上位。试想走向共和这种华丽的制度转型，在中国这样民智未开的老大帝国，怎么能是一日之功？民国初建之时，不但袁世凯的智能条件不够，一般民众、革命精英，哪方条件足够？所以唐德刚先生才说，当时的客观历史注定袁世凯这样一个边缘政客，“不论前进或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的悲剧人物”。^[2]

[1] 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 同上，第19页。

面对这种悲剧，我们更需要的是心灵的悲悯、文化的反省和制度的重建，而不是简单地吐几口唾沫、骂几句不要脸可以了事的。

袁世凯泉下有知，说不定会拉住哪个骂他最凶的人问：老乡，请问共和咋走？

9.1 袁世凯统驭到

（一）袁世凯的底线与政见

武昌起事后，奕劻就电询过袁世凯怎么办，袁世凯的意思是：在此潮流转变之下，民心思动，已非一朝，不是单靠兵力所能平定，主张剿抚兼施。^[1]

可以说袁世凯出山前后，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思路。他派自己当年的幕僚、后来曾在湖北做过管带的刘承恩到革命党那边试探和谈，并让前线军队围攻汉口。但是黎元洪与革命党不是没有反应——不知道咋反应，就是反应激烈——袁世凯是什么东西，打几个胜仗就叫我们投降吗？纷扰间，传说中的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于10月28日赶到了武昌，黎元洪着多人肩扛“黄兴到”三字高脚牌分途游行街市，武昌沸腾了：我们的职业革命家到了，一切都好办了！其实黄兴本人是“感愧”多于“兴奋”，先生离港前和谭人凤诗曰：“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2]事实上我一直认为，黄兴这人最大的优点

[1]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269页。

[2] 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田伏隆：《忆黄兴》，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1页。

就是人品好，敢冲敢打，舍生忘死，还很有功成身退的范儿。但所谓的军事才能则是有限的。或者说，再有军事才能，率领着一帮乌合起来的革命军，也远不是经受正宗西式训练的袁军的对手。更不幸的是，革命军对黄的军事才能寄予了过高的期望。不管怎么说，他一来就亲临汉口前线督师去了，虽多有反攻，但还是丢失了汉口，革命军于 11 月 2 日撤往汉阳。黄兴返归武昌，出席都督府军事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指出：军官素质差，士兵未训练且天一黑就都潜回家了，还有，兵械不如人。总之，虽作战勇猛但结果不如意。于是大家公推黄兴为战时总司令。11 月 3 日黎元洪在阅马厂登台拜将——亲将印信委任状及令箭奉黄。当然了，革命党中有些同志甚至日人北一辉都老大的不乐意：堂堂的革命元勋怎么能屈居黎元洪这个“革命俘虏”之下呢？不如另组中央政府以控制全局。黄兴不反对组织中央政府，但他本人还是乐意上前线。并任命李书城为参谋长，认真组织军事。11 月 9 日，这个战时总司令写信给袁世凯，内有如下意思：

前由刘君（指刘承恩）转达尊意，敬悉一切。明公以胞舆为怀，爱民如命，来示嘱敝军停止战争，以免生灵涂炭，仁者用心。

满洲朝廷，衣冠禽兽，事事与人道背驰，二百六十年来，有加毋已，是以满奴主权所及之地，即生灵涂炭之地。如但念及汉口之生灵而即休战，毋乃范围过狭，无以对四亿生灵。

尊嘱开党禁等四条，乃枝叶问题，而非根本问题。兴等之意，原不在此。

难解者，我公之自为计也。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

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1]

黄兴这哪里是和谈？分明是策反。评者多讥袁世凯怎么配拿破仑、华盛顿之称，岂不知此乃黄兴策反时的阿谀之词。再说拿破仑与华盛顿本是两回事，加上袁世凯，更是三回事了。一句话，美国出不了拿破仑；法国出不了华盛顿；而中国，既出不了拿破仑也出不了华盛顿。什么样的土壤，产什么样的庄稼；什么样的母体，下什么样的蛋。对于袁世凯来讲，他的底线是和平加君主立宪；可革命党的目标是推翻清廷走向共和。凭袁世凯的能力，能不能完全镇压革命党人？应该能。可是他凭什么如此违背大势，又如此维护清廷呢？11月11日，他派刘承恩、蔡廷干为代表，带着他的亲笔信正式与革命党一方谈判。中心意思还是：清廷已立宪，革命目的已达，再延长战争，不但生灵涂炭，且恐酿瓜分之祸。革命党的意思是：袁世凯你不要再做满奴了，我们要推翻清廷走向共和。

11月16日，黄兴下令分三路自武昌、汉阳反攻汉口，黄亲自指挥第三路。结果失败得很惨，虽然有“临战不力，后退即斩”的军纪，且黄兴本人与司令部官佐持刀拦阻，还是无法制止后退的革命军。事后，撤一个协统，处死两个协统，但军纪仍难树立。湘军第一协甚至自动开拔回武昌，黎元洪犒赏五十万元，他们也不干了。参谋长李书城劝说他们重返前线，统将王隆中下跪求饶。总之，打死我们也不干了。湘军另一部由协统刘玉堂率领赶到汉阳增援，结果，刘本人阵亡。事实一再证明，革命军远不是袁军的对手。最后，革命军退得让黄兴的司令部都成了战场的最前线。虽在学生中征集

[1] 《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1），第70—71页。

敢死队，但大势已定。26日，黄兴遂决定撤守汉阳，退往武昌。袁世凯连得汉口汉阳，对于武昌，就留了一手，只让大炮居高临下镇着，不攻。黄兴想放弃武昌，张振武“眦裂发指，拔刀砍地”，大声疾呼“敢言弃武昌者斩”。^[1]黄兴灰溜溜的，提出要到上海组织力量打南京，以为武昌声援，遂一走了之。事实上，黄兴12月1日到上海，12月2日，南京就到了革命党之手。与此同时，革命党内部倾心袁世凯已渐成趋势，主要代表有汪精卫。汪精卫1910年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入狱。清政府难得的开明一回，没有杀他。革命后又把他放了。随后他选择了袁世凯，说：“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2]

汪精卫是拍马屁吗？不是。可以说，革命党人挑起了革命，但是革命后的形势他们控制不住：不但南半个中国风起云涌，各自为政；就连北中国也风波不定，四处冒火。但袁世凯的意思是共和吗？不是。1911年12月2日，《时报》发表了内阁总理袁世凯的政见：

中国数百年来号称专制，其实即专制亦不完全，致民人不知尊敬政府，民人亦不明白政府应担责任。现在所以鼓动民人，而民人乐从者，无非曰不纳税、无政府耳，此亦由国无责任政府，数百年于兹之故。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

[1] 张成群：《首义元勋张振武》，《湖北文史资料》2001（3），第12、13页。

[2]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115页。

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

除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各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

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是为经常之计！

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急进者，有过之无不及。故我所兢兢者，在改革之实行。明知所担责任宏大，顾余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但欲为中国恢复秩序，意在有益于中国，使无波折耳。故余仍望和议有成。凡民人意在保全中国者，务使其各党满意，恢复和平，建设一坚固之政府。余知国民意见明通，当不愿目睹其本国之破坏，故欲进共和党人与之筹议方略，使终战局，破除各种情意睽隔，而将从前种种不便于民者，一概除去。至各省纷纷独立，余观之与和议亦不甚睽离，当时政府之权力，既不能行于各省省会，其省会中必有数人宣布近于独立之政体，其实非全然独立，有数省，权尚在保守派之手，则迹近中立耳。其题目在推翻专制，其目的在保字治安，保护人民财产，愈言共和，愈见中立。故余拟召集各省之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

此问题既如此重大，故凡事应心平意和论之，不可靠一时之热忱。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

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

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

余之志愿既如是宏大，必有误解余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击，事非不知之，顾余必不因稍受波折，遂更变余最高应尽之职。盖余之作为，盖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计也。^[1]

袁世凯的政见高明吗？不高明，但很现实。只有成熟的政治家才能发出这样的政见，其中心词不外是：君主立宪、坚固政府、和平秩序。

问题是有些人比袁世凯高明，高明到我们都跟不上的程度。我一直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处于两极状态，一极是麻木不仁，一极是激进飞跃。前者反映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关己，也能挂起。心字头上一把刀，俺最大的本事就是能忍，爱咋咋。后者反映在每个中国人心底深处都有传销的能量与热情，相信一夜暴富，相信天上掉馅饼，相信跑步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萧功秦先生说得好：“经济和社会的种种弊病是体制不合理造成的，要求引入异邦先进制度以改造旧制度的求变心态的强度，不是与社会内部自发的现代化新质的成熟程度成正比，而是与人们对传统体制弊病的厌恶不满程度成正比，与他们主观上因外部现代文明的示范效应而感受到的文化失落感、危机感和焦灼感成正比。”^[2]

一句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结果就“杯具”了。

从袁世凯的政见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的成熟与稳重。可惜他面对的是革命党人，而革命党人天真地以为，共和乃是治疗百病的药方，一共和，万事OK（就跟我们现在把民主自由当宗教似的，以

[1]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13页。

[2] 萧功秦：《萧功秦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为一民主自由，啥事都没有了）。眼见得袁世凯倡议君主立宪，他们当然不乐意，有些党人甚至组织了暗杀团，以暗杀袁世凯为首要任务。袁世凯在北京，调冯国璋为禁卫军总统官；改编自己的卫队为拱卫军，由段芝贵统领，拱卫京城。再加上徐世昌操纵军咨府、赵秉钧掌握民政部，算是军警大权全抓在手了。还有，摄政王载沣被隆裕太后批准退归藩邸，岁给俸银五万两。政治大权也全在袁手了。即使这样，还是不安全的。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从宫中出来，行至东华门大街，革命党人的炸弹从酒楼投下，当场炸死护卫管带袁振标，炸伤双套马车的两匹马。大难不死的袁世凯这才有些服了，派人向革命党表示：效忠革命，推翻清朝，同志们别急，容我慢慢来。

一句话，共和也是被逼的。

（二）南北和谈

1911年11月9日，黎元洪为首的湖北革命党致电各省，请派代表赴鄂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他们是首义之乡，以武昌为中心组织中央临时政府乃天经地义。与此同时，上海都督陈其美联合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于11日发出通电，邀请各省谘议局和都督府代表各一名到上海开会，成立各省联合机构。革命刚开头，分赃就不均了。湖北一听就不愿意了，对派代表到上海表示不满，江浙集团做了让步，同意各省代表前往武昌开会，每省仍留一人在上海进行联络。问题是待大家来到湖北就发现形势并不妙，汉阳被清军夺回，武昌处于炮火中。30日，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举行第一次联合会。这一天，袁世凯通过英国领事提出了和谈要求，代表们同意了。12月2日，会议作出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革命党也知道，凭武，自己打不过袁世凯，

何况凭武真的是生灵涂炭，不如光荣革命一次，既减少流血牺牲，还可以让革命马到成功。

12月5日，代表会议提出和谈纲要四条：第一，推翻满清政府；第二，取共和政体；第三，礼遇旧皇室；第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并决定以汉口为议和地点，公举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汪精卫、王宠惠等人为参赞，与北方议和。

12月7日，清政府授命袁世凯为与南方民军和谈的全权大臣。袁世凯委派唐绍仪为总代表，严修（未行）、杨士琦为代表，杨度为参赞。12月8日，袁世凯召集他们谈话，定下的基调是：“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1]“将来国民程度渐渐开通，懂得共和的真谛，再慢慢改为共和政体。”^[2]

有评者认为，袁世凯这是演戏。这样评有些昧心。如前所述，立宪乃是袁的底线与政见，最后走向共和，却是革命党逼的，或者说是南北双方博弈的结果。而博弈，重点根本不是看你出啥牌，而是看对方出啥牌。

江浙方面，根本不愿意伍廷芳去汉口开谈，伍廷芳自己当然也不愿意。不愿意的原因，除了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还有一个汉沪争权在内。伍廷芳借口说有事不能去汉口，约唐绍仪前往上海开议。唐绍仪也不愿意在汉口，因为甲午战争后他在上海做过寓公，人情交际也都在上海，在人生地不熟的汉口开谈，他也备感不便。湖北虽然是首义之区，可是后续战争打得不漂亮，开会的立足之地也没

[1]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289页。

[2] 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册》，第357页。

有，不得不同意改在上海开谈。上海当时就是个小县城，可是县城里面有全国最大的租界，在西方文明影响下，上海成了各界名流荟萃之地，所以去上海开谈，天时地利人和都占。12月17日，唐绍仪一行抵达上海。18日，南北议和在上海开幕。20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伍廷方提出：今日人心倾向共和，若非承认共和，别无议和之法。唐绍仪表示了袁世凯的难处，他提出的办法是：开国民大会，定君主、民主问题；而国会一开，肯定是民主，这样，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其实难题都在袁世凯这边儿呢：革命党就是革命党，目标就是推翻清室，自认为正义在手，且可以不择手段。而袁世凯身为汉人，原先是清廷重用的能臣；中间一度遭贬几被杀掉；现在是重新出山的权臣，事成之后清廷肯定卸磨杀驴。对他来讲，任何选择都事关革命大义、民族大义、君臣大义。更关键的是，任何选择都会遭到谩骂与攻击。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事实上，以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为代表的满洲亲贵已经对袁世凯深表不满了，几次公推代表质问：“从前洪、杨革命，十三省都沦陷，而胡林翼、曾国藩都能讨平，现在南方革命党并无多大实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政府官吏，公然叛逆，若不讨伐，成何体统？”^[1]

这话问得很弱智，洪杨那样的太平天国革命，放哪个士大夫都会认真去讨平。虽然清政府不代表文明，但是洪杨代表更野蛮。袁世凯若面对的是洪杨革命，那么他会像对待义和团一样毫不留情。但是孙黄革命党，至少理念上在模仿西方近代文明，所以有没有实力，都不能一味以诛杀对之的。至于黎元洪与程德全这样的政府官吏，公然叛逆是不假，但是不成体统的不是袁世凯，而是满洲王室。

[1]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2页。

自己的官员都这样了，统治他们的王室成何体统？

当然了，袁世凯不会这样回。他回的是：“你要我讨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办得到的；你要我讨伐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我是办不到的，他们都是老百姓的代表啊！假如你们不满意，我只有向太后辞职。”^[1]据说亲贵们被他的回复搞得哑口无言。

正式议和之外，北方还有人进行着私密议和。发起人乃直隶陆军学堂总办廖宇春、第一军参议靳云鹏和北京红十字会会员夏清贻。他们认为，南北长期对峙下去，不是南北分裂，就是永无了期，当断得断，不断为乱。他们认为分歧的焦点就是南军忠于共和，北军忠于袁世凯。如果让袁世凯做了共和总统，南北军不就没有歧义了吗？于是从中疏通，南北双方于12月20日达成五项秘密协议，最关键的两条是：共和；先推翻清室者为总统。之后，靳云鹏奉段祺瑞之命北上谒见袁世凯。袁世凯这里不好拐弯儿，好歹他还是个厚道之人。

当袁世凯听靳云鹏说，段祺瑞也赞同他做共和总统时，他所能说的只能是这样的话了：“将置余于何地！若欲使余欺负孤儿寡母，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2]

赵匡胤不同样欺负孤儿寡母吗？但他善待那一对孤儿寡母，并且建立了一个忠厚有余、残忍不足的大宋王朝，成为中国人有史以来对士大夫最开明最宽厚的一个朝代。言论自由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风闻言事则大可随便，没有诽谤罪，没有文字狱，所以没遭后世唾骂。凭袁老四的人品，他只能比赵老大更厚道。他对靳云鹏交待说：“汝曹握兵权者亦复如此，我尚何言！但使我得有面目与世人相见

[1]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2页。

[2] 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76—377页。

足矣。”^[1]这话又给我们透露出多重意思：第一，不能高估北洋军对他的忠诚，事实上他称帝后，最让他痛心、对他打击最重的就是北洋旧部对他的不忠。第二，不能高估他在北洋军中的威权，毕竟是退休老干部了，新干部说不挺就可以不挺的。第三，即使是赵老大兵变，那种黄袍加身的戏剧也不是他一人能导演出来的。他兄弟领着一帮子军人逼他称帝，他不称也不行的。第四，清廷退位，我上位。这个可以考虑，但是对人要厚道，我可不想人前人后站不住。

现在，袁世凯被扭过来了；剩下的，该做清廷的工作了。

12月27日，唐绍仪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公决君主与民主方案。袁世凯与徐世昌密商，认为共和乃大势所趋，但是不能对清廷开口，只能召开国民大会，由会议提出。二人研究后又找奕劻商议。决定由内阁奏请隆裕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会议讨论。讨论结果，同意举行国民大会，由内阁迅拟选举办法协定施行。南北和谈代表就国民会议提出办法四条：第一，国民会议由各处代表组织，每一省为一处，内外蒙古合为一处，前后藏合为一处；第二，每处各派代表三人，每人一票，不足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权；第三，开会之日，到会人数达四分之三即可开会；第四，南方各省和山西、陕西代表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集，内外蒙古、西藏代表由两政府分电召集。这四条唐绍仪代表清政府表示接受。这四条明显不利于袁世凯。特别是代表方面，除内外蒙古、前后藏由双方召集之外，南方召集十四省代表，北方召集八省代表。南方代表占绝对多数。

南边的伍廷芳另有一层意思：1912年1月8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唐绍仪表示自己须向袁世凯请示才能答复。

正在这时，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孙中山先生回来了。武昌

[1] 夏清贻：《运动北军反正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404页。

起义时，孙中山还在美国流亡（据说在饭店打工），10月12日从报纸上获悉武昌革命成功，但没有匆忙回国，而是先寻找外援。致函美国国务卿求见，被拒。想以中国革命党领袖的身份访日，也遭拒。日本内阁一成员表示，假如孙中山用个假名来，也许还可以。但对于孙中山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孙中山拐向英国，英国表示，要钱没有，要我们中立可以（本来就是中立），但是我们希望袁世凯做总统（这个就不中立了）。孙中山再转向法国。法国方面倒是很热情，但还是跟英国一个意思：中立可以，这个钱是真没有。孙中山转了一大圈，一无所获，只好打马回国。这个时候，内部正扯皮呢。1911年12月4日，当各省代表依旧龟缩在汉口英租界举行会议的当口，闻听南京于12月2日光复了，立即决议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各代表定于七日内齐集南京，俟有十省以上的代表到后，就可以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同天，在上海的代表，认为湖北那边刚失去汉阳，武昌还在危急中，在湖北开会的代表干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也开了会，决议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湖北那边一听，老大的不乐意，认为上海自行组织临时政府，不合法，并以黎元洪大都督的名义，电沪请取消。随后，各代表纷纷奔赴南京，决定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可是马上有其他代表说，议和那边，袁赞成共和呢，位置给人家袁留着，我们暂缓选举总统。于是大家决议，承认沪方所举大元帅、副元帅合法，并且在临时大总统未举之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上海方面如光复会的章炳麟及部分江浙军人等又不愿意了，表示不愿意隶属于汉阳败将，也就是同盟会元老之一黄兴之下。同时，黄兴也来电表示，辞去大元帅职务，让黎元洪任之。于是大家议决，让黄兴的大元帅与黎元洪的副元帅颠倒一下，也就是黎元洪做大元帅，黄兴做副元帅。扯皮儿戏中，

临时政府也就一直组织不起来，一听说孙中山要回来，大家就没皮可扯了。

孙中山于 12 月 25 日回到上海。当记者问先生带回多少钱时，中山先生表示：要钱没有，要命，有的是革命精神！^[1]26 日，同盟会召开干部会议，专门讨论临时政府问题。针对宋教仁的内阁制，孙中山提出“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与会者多数赞成中山先生的主张。29 日，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去掉“临时”二字，未被大家采纳。选举结果，十七省代表，中山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黎元洪零票。获悉选举结果后，中山通电表示：今日代表选举，乃认为公仆。之后更是废除“老爷”“大人”称号，规定上至总统，下至一般公务员，都是人民公仆。公仆说就这样起源了。后来的资深军阀孙传芳对此很反感，说：“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公仆；凡是仆人没一个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我不是公仆。”^[2]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诞生。巧的是，唐绍仪的请示电报和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电报同时到达袁世凯的手上。后者，对袁世凯绝对是一种意外的打击：正商量推举我为总统呢，我还客气着呢，半路上却杀出一个孙总统来。由于心情极坏，袁世凯干脆否决了唐绍仪所谈的四条办法，认为唐未经他许可，实乃越权私订，应视为无效。唐绍仪进退维谷，只好引咎辞职。袁世凯接受了唐绍仪的辞职请求，同时电请伍廷芳北上直接谈判，伍廷芳则电请袁世凯南下，这样双方的和谈变成了电报往还，不得要领。

[1]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85 页。

[2] 吕伟俊：《孙传芳》，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5 页。

当然，和谈之外的内容还是很得要领的：第一，北洋二杰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余人联名请内阁代奏：我们不要共和，我们只要君主立宪。并请内阁转致南方代表伍廷芳，若以少数人的意见采用共和政体，我们必誓死抵抗。第二，清政府的驻外使节由出使俄国的陆徵祥领头，电请清帝退位。第三，张勋的辫子军反攻南京。第四，革命党内部也倾向于认定，孙中山只能是临时性的、过渡性的总统。这一点孙中山也明白，乃通电宣布曰：“袁世凯若表示赞成共和，当以总统相让，但须南下就职。”并且亲自致电袁世凯说：“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欠统一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1]

问题是袁世凯不明白孙中山，所以他回电曰：“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慚悚至不敢当，惟希谅解为幸。”^[2]孙中山赶紧回电解释曰：“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有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俱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诱致之意，则误会矣。”^[3]但袁世凯心里依然不舒服：

[1]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6页。

[2]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页。

[3]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页。

就是真心让我又怎么着？尔一下子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我算什么呢？

正窝心的当口，南方又踹来一脚：1月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且通过了各部总长人选，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得，不只大总统之位让南方占了，连各部总长，也都是南方人马了。

1月4日，袁世凯致电南方代表伍廷芳：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业经贵代表承认，我们现在正商议办法呢，怎么呼啦啦你们就成立政府啦？孙文还宣誓驱逐满清政府，啥意思呢？

伍廷芳回曰：俺们南方没有统一机关，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又咋了？还请问清政府，既然国民会议尚未议决实行何政体，那它咋不立即消失呢？前面与你们订约，国民会议取决多数，然则一旦定为共和，那你们的清帝是否立即退位？

已做了总统的孙中山认定袁世凯无和谈诚意，所以决定出师北伐，自任总指挥。可是他一举战，汪精卫等人就叫唤：敢情孙文是为了自己做总统才如此破坏北南议和的啊。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出面抗议了。虽然孙中山政府试图与西方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宣布之前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条约继续有效，所借的外债与赔款全部承认，让与外国的权利一体尊重，对自己管辖区内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一律保护，但是西方列强一直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接二连三要求列强承认民国，孙中山更是以总统的名义亲自致电法国政府，表示愿与法国建立友好关系，要求它接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法全权代表。但是，人家列强置之不理。可孙中山一北伐，列强不但理，还反应强烈。内外夹攻之下，孙中山的北伐，胎死腹中。

1月14日，唐绍仪问伍廷芳，清廷正筹商退处之方呢。若清廷果真退位，则袁世凯做总统有多大把握？伍廷芳立即电告孙中山，

孙中山回复曰：“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辞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1]与此同时，袁世凯的各路朋友也力劝袁世凯，请痛下决心当机立断吧。

（三）清帝退位

所谓的痛下决心当机立断，就是让袁世凯本人出手，不费一刀一枪把清室推翻。

但是袁世凯就是不容易转过这个弯儿。理念上，他本就是支持君主立宪的。伦理上，他一直是大清的臣子。除了自己难为之外，外有革命党人的高压，内有满洲亲贵的不满，让他成了夹缝中的人物，上下不是，左右为难。

对外他虽然一直坚持君主立宪，但是私底下他也明白，革命党的底线就是共和，自己别无选择。1912年1月16日，他上朝请隆裕太后作最后的决断，太后答以明日召集亲贵王公等开御前会议答之。回来的路上，袁世凯就遭遇了革命党人的暗杀。清室正怀疑他与革命党勾搭呢，这么一挨炸，清室才表示理解：都不容易啊！

从17日开始，隆裕太后连续召开了御前会议。清室方面，干脆组织以良弼、铁良、毓朗、载泽等为骨干的宗社党，准备关键时刻现身手。南京临时政府，先由伍廷芳转达，后直接在报上公布所谓的最后五条件：第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请转知各政府，或转饬驻沪各领事转达亦可；第二，袁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第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第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第五，袁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始能授受事权。

[1]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页。

本来是地下密商的筹码，现在公诸于众，看来要摊牌了。

宗社党控制的禁卫军及蒙古王公的勤王敢死队纷纷动作起来：袁世凯既然不保皇室了，那我们还是先干掉他为好。良弼给袁世凯写信曰：“欲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澌灭！”^[1]袁世凯不得不调曹锟的第三镇入京护卫，甚至一度打算在外国人的护卫下出走天津，后经人劝说才打消主意。

袁世凯发愁的当口，革命党人又帮上忙了。1月26日，彭家珍用炸弹炸去宗社党骨干良弼一条腿，彭家珍当场殉命，良弼做手术不用麻药，两天后也死去。原先炸袁世凯，乃是彭家珍与京津同盟会骨干人物组织的，袁世凯从此有借口不再早朝了；现在炸良弼，彭家珍亲自上场了。而且有关被抓后怎么交待也与同志们早有约定：落在袁世凯手中，即称良弼所遣；落在良弼手中，则说是袁世凯所派。总之，搅和得他们愈乱愈好。

没想到搅和的结果，袁世凯中了头彩：宗社党从此解体，没人再敢出头露面了。革命党没了敌人，袁世凯更没了敌人。27日，段祺瑞联合大小将校四十余人，向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并各王公发出猛电：请立采共和以安皇室而奠大局！1月1日孙文宣誓就任大总统的当天，段祺瑞这些人发的电文是：若以少数人的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二十多天的功夫，又从立宪转向共和了。可见，民国初年的政局太过复杂，任何人都没法坚持自己原则不动摇。或者说，原则最终都会发生变形的。袁世凯是被逼共和，北洋军人们又何尝不是呢？

1月29日，清室复开御前会议，奕劻与袁世凯都称病未到。其他人倒是到了，可是没有人再敢挑头反对了。

[1] 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83—384页。

1月30日，隆裕召奕劻、载沣入见，两人都说主动退了吧，还能落个优待。

2月1日，隆裕命袁世凯与军民协商退位条件。几天以后，条件议出，主要精神是：清帝尊号仍存不废，以待遇外国君主之例相待；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清帝岁用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给付；清帝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其他方面，皇族与满蒙回藏各族也有相应的优遇与扶植。

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清王朝终于谢幕了！

比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末代皇室，爱新觉罗家所得简直是极大的幸运。只可惜这种幸运没有保持下去，1924年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而且限时二十分钟，否则拿大炮轰。清室更没想到，他们虽然退了位，革命党也没接好班，把中华民国搞成了漏屋破舟，子民没有一天安生过。

（四）总统到手

1912年2月13日，也就是清帝下诏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凯致电南方，表明自己的政见：“共和为最良之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职——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

至此，袁世凯算是完成了议和五条中的前两条，即清帝退位，自己宣布赞成共和。

[1]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4页。

袁世凯与革命党都成功了。袁世凯逼宫成功，革命党人共和成功——连袁世凯都不得不表示，共和乃世界上最良之国体。

现在，该孙文与革命党履行剩下的三个条件了。孙文向参议院提交辞职书，14日，参议院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十七省十七票，袁世凯全额当选。

虽然全额当选，但通向总统的路没有那么简单，孙文在辞职书的末尾，给袁世凯提了三个附加条件：

第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

第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始行解职；

第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非经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

这就是孙文的不是了。临辞职前，给新总统穿小鞋：明明知道南京既不是袁世凯的地盘，而且北京皇位刚退，局势仍处不稳中，更兼外交使馆都在北京，却非要人家前来南京上任；所谓的临时政府约法，现在还没有制定出呢。你做总统时说自己不愿意做虚位的大总统，于是做上了美式大总统，也没有约法控制。现在袁世凯要做总统了，你又要人家遵守约法。遵守约法也就罢了，凭什么你做就是美国总统制，人家做就是法国责任内阁制呢？虽然孙中山表示自己不愿意做不掌握实权的总统，但是总统制并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各省代表与宋教仁唱对台戏的结果。当时孙中山一做总统，宋教仁就忽悠着要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由汉口的代表会议制订的，于1911年11月3日通过，采美式总统制，设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个部，各部部长直接对总统负责而不必对参议院负责。而总统，独立行使职权，也不必对参议院负责。这个大纲，不符合宋教仁的要求。他的目标，就是法

国式内阁制及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可是他越忽悠，大家越是烦他。结果宋教仁败得很惨，不但内阁制没有弄成，就是他自己连个阁员也没做成——孙中山本想让他做内务总长呢，可是代表们大都烦他，就让程德全替了他，最后的阁员名单如下：陆军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钟英；外交总长王宠惠；司法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陈锦涛；内务总长程德全；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可是等孙中山不做总统了，他们马上放弃前嫌，一致对袁，要让袁世凯做法国内阁制下的总统。

两者具体有啥差别呢？那就是美式大总统在国家政权中负有实际的政治责任，权力很大，对于若干职权的行使，诸如行政权、覆议权、统军权、宣战、媾和、缔约权等等，虽然规定要取得参议院的同意，但在原则上并不对其负责。而法式内阁制就惨了，总统大事小事，都得总理副署。而总理只对国会负责，不对总统负责！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愈是后现代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愈是需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才能提供起码的社会秩序，并对社会资源作出有效的整合，否则只能是秩序的失控、资源的浪费、现代化的蹉跎。革命党人知道不知道这一点呢？知道。因为孙中山制定的革命方略分三步走，第一步，军法之治，三年；第二步，约法之治，六年；第三步，宪法时期，永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军政训政向宪政的过渡。当然，也有革命党人曾经对此表示不解，说：清朝预备立宪九年，我们认为时间太长，骂人伪立宪。我们军政三年，训政六年，也是九年哇，岂不与清朝一样了？

可惜，做总统的是袁世凯。一者是革命党人对于中国式独裁的历史性记忆太过深刻了，所以不愿给袁世凯提供美式总统制那样的权威；二者是由于革命党的私心；三者是由于对袁世凯个人的偏见，导致他们有意无意的忘记了自己的革命方略，走向了事物的另一极

端——不给袁世凯提供任何支撑与威权，不给他提供任何过渡！

临时政府约法背后的隐情，因约法尚未出笼，袁世凯自然无法从反对，但是前两条他就不愿接受。事实上革命党人中也有人认为，总统府还是设在北京的好。但在孙中山的坚持下，大家也没法反对，于是派了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专使前往北京迎接新总统南下，袁世凯热情招待。但是2月29日夜，北京出现哗变，曹锟的第三镇士兵上街放火行劫去了，连专使们都差点丢掉小命。外国公使更是认为迁都南京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并要求各国限派军队二百名来京维持秩序。眼看着八国联军进北京的历史要重演了，专使们服了，连电南京，为了和平安全，总统就在北京上任吧。有人说，曹锟兵变乃杨度给袁世凯献的计；有人说，袁克定跟北方军人们商议给老爹黄袍加身呢，遭遇统帅禁卫军的冯国璋反对，攻东华门而不得，才转成抢掠之局呢。^[1]现在据吴相湘等教授的严密考证，一致认为兵变非袁世凯预谋。而且我们都知道，袁世凯有个不省油的长子袁克定，手下聚集一帮人，巴不得老爹赶紧做皇帝呢。至于北洋大小军政长官，更是各人肚里有算盘，谁知道他们算计什么呢？

不管怎么说，前两条袁世凯对付过去了。3月6日，参议院议决办法六条，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3月10日，袁世凯上任，誓曰：“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2]

[1]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页。

[2] 同上，第29页。

3月11日，参议院专为袁世凯量身定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

3月25日，由唐绍仪任内阁总理的新内阁成立。4月1日，孙总统解职。4月5日，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至北京。至此，中华民国形式上完成了南北统一。

但是对于袁世凯来讲，这一切都仅是个开头！4月25日，袁世凯出席参议院会议，并发表了演说。兹摘录如下：

古今立国之道，惟在整饬纪纲，修明法度，使内外相系，强弱相安，乃可巩固国基，争存宇内。迩来后事扰攘，四民失业，公私交困，已达极点。而士卒多昧服从之谊，人民鲜知公共之益，空谈者偏于理想，营私者多牟权利，循此不变，必将纪纲废坠，法度荡然。

现值改革之后，亟当维持秩序，利用厚生，建设从稳健入手，措置以事实为归。

百废待举，要在财政。……故先定整顿财政大纲，增加财政信用。

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愿我国民无从空中讨生活，须从脚底下着想。

近日军队复杂，数逾常额几倍，消耗过巨，闾阎何以堪此？已饬财政、陆军两部实行收束之方。

我国民习惯积重，急切难趋大同。教育尚未普及，改革尚多疑沮。军人缺少精神，训练当探本原。法律亦未完备，法权仍多放弃。交通未能畅达，风气难期划一。

从数千百年专制之后，一跃而跻共和，宜吾国民之色然而喜也。然世凯深以吾国之进步为忧也，深望我国民常入于不足，勿夸张自

满也，深望与公诚推与，勿互相猜忌也。^[1]

从袁世凯的演说里，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的政见，更可以看到刚上任时他还是满怀真诚与希望的。问题是，走向共和的路上，绝不可能一帆风顺。

9.2 内阁走马灯地换

(一) 三个月的唐绍仪内阁

袁世凯接任总统后，提名唐绍仪做他的内阁总理。这是南北双方都满意的一人选。袁世凯从私谊方面认定唐是自己人。革命党从党谊方面也认定，唐不是外人——南北和谈时，唐就倾心革命党了；参议院通过唐绍仪内阁后，3月26日南京临时政府举行的公宴上，唐绍仪当场加入了同盟会。

但是，不知是袁看错了唐，还是唐看错了袁，总之，两人矛盾不少。这其中，既有体制的原因，还有人事的原因，更有财政的原因。

体制上，对袁世凯来讲，也知道临时约法是制约自己的，但由于总理是唐绍仪，他没有多想。而对唐绍仪这个留美海归来讲，要坚持真正的内阁制，做真正的总理，该副署的副署，该驳回的驳回，甚至在总统府与袁世凯争得面红耳赤，以至于总统府的侍从武官看到，每每私相传曰：今日唐总理又来欺负我总统了！^[2]袁世凯有时忍无可忍，对唐绍仪说：“我们是没有几天好做的，这个位置早晚

[1]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9—42页。

[2] 张换宗：《唐绍仪与清末民国政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要让给你们的。”^[1]或者干脆直言：“我老了，少川你当总统吧！”^[2]为了迎合同盟会的主张，唐绍仪还在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内特设国务会议，规定每周会议三次，星期一、三、五会议，二、四、六各国务员谒见总统袁世凯。陆军总长段祺瑞与内务总长赵秉钧先是在会议上与唐绍仪吵架，后是干脆不参加会议，有事也不通过内阁，直接去找袁总统。

人事上，唐内阁成立时，唐希望黄兴出任陆军总长，但袁世凯坚持让段祺瑞做。作为安慰，袁世凯给黄兴一个没有实权的参谋总长，黄兴不受，袁世凯改任其为南京留守，负责维持南京地方和南方各省军队。黄兴接受了。革命党的意思是，在此非常时期，自己的军队还是自己来领导；袁世凯的意思是，革命成功后，各地军队合计百万，不是玩的。有黄兴在那里镇着，相对安宁些，遣散时的阻力也会相对少些。除此之外，受革命党的影响，唐绍仪提出由驻南京第三军军长王芝祥担任直隶总督。革命党的意思，当然是希望自己的军队进入袁世凯的腹心地区，以方便控制袁世凯。唐征求袁世凯的意见，袁世凯也同意了。

这都是小事，对政府来讲，最头疼的应是财政问题。自从革命后，各地方政府都乘机不上交赋税了，县款不解于省，省款不解于中央。1913年，各省承担解给中央的款项是3250万元，实解不过560万元。而据财政部报告，从1912年到1913年底，各省实解才260万元。^[3]也就是说，1912年的中央政府，地方几乎没上缴过赋

[1] 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168页。

[2] 张焕宗：《唐绍仪与清末民国政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3] 陈志让（加）：《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税。政府所能依靠的只有外国人管理下的海关。正如前述袁世凯在参议院演讲时所列数据，每年借款赔款本息总数为 5000 万两，而海关所入为 4400 万两。也就是说，政府收入不够赔款及借款利息，不管是孙中山政府还是袁世凯政府都得借钱。但是向谁借、人家愿不愿借、借的条件如何，就有争议了。孙中山做总统时，英法美德财团拒绝借他，他只好转向日俄。跟俄国没有谈成，最后就剩下了日本。直接间接向日本提出的借款有三笔：一是以招商局的产业为担保向日本邮船公司及中日汽船公司商借 1000 万两；二是以汉冶萍公司股票为担保向三井洋行商借 500 万元；三是江苏铁路公司出面向大仓洋行商借 300 万日元。结果第一笔没成，第二笔借到 200 万元，第三笔全额实现。一度穷到什么状态呢？安徽都督派专使来京，说需饷甚急，刚做了总统的孙中山大笔一挥：拨 20 万元。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提钱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 10 枚！^[1]

北京政府比南京政府也好不到哪里去。早在 1911 年 11 月 31 日，袁世凯作为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已开始考虑“善后”借款。两个半月后，他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立即提出全国的“善后”问题，主要事宜有：第一，整顿北京的统治机构，加强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统治力量，建立稳定政府；第二，结束南京临时政府，遣散南方军队。当时南京政府报告，需银 700 万两，其中 200 万两为急需，还有，黄兴的南京留守处有军队 30 万，按最低的遣散费也得 250 万；第三，偿还积欠的外债和赔款；第四，履行逊位清室的优待条件。

中央政府海关收入光还外债都不够，别说日常行政运转和诸多善后事宜了，所以只能向外国告贷。北京政府上任后的第一个借款

[1] 《胡汉民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9 年版，第 67 页。



袁世凯像

袁世凯上台后，中国的法式共和漏洞百出。1913年4月，第一届国会成立，着手制定宪法和选举正式大总统。在袁世凯干预下，国会于10月6日召开选举会，袁世凯派军警包围会场，强迫国会选其为正式大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要求，就是专为南京政府而提出的。2月28日，袁世凯让周自齐去找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对列强来讲，袁世凯是它们心目中“能负责任的中国政府”，条件合理，自然愿借。问题是袁政府甚至来不及办借款手续，急着花呢，让人家先给垫出200万两。第二天，也就是2月29日，袁世凯政府又由唐绍仪出面，向四国银行团提出一项完整的借款与垫款计划。3月9日四国银行团垫出第二笔110万两。3月11日，袁政府又向四国银行团要求贷款500万两，这次乃是黎元洪武昌政府所急需。袁世凯政府在短短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向四国银行团告贷，四国银行团遂召开专门会议，制定了包括监督原则在内的严苛条件：对6000万英镑的借款有“优先权”，此项借款以盐税为担保。谈判期间，唐绍仪又与俄国政府支撑的一个银行团签订了一个百万英镑的贷款合同。四国银行团抗议，唐绍仪道歉，借款合同废除。许多评者把这当作袁世凯与唐的一次矛盾交锋，事实上也谈不上啥根本矛盾，真正的矛盾是清政府的外债与革命的包袱。

直到发生直督问题——鉴于袁世凯同意王芝祥督直了，所以唐绍仪传话给直隶省议会，他们马上通过王芝祥督直的正式决议。孙中山也致电袁世凯，请他按照决议任命。待王芝祥到京后，袁世凯优礼待之。在此之前，唐绍仪表示王芝祥督直乃是民意所归，没想到直隶五路军队也马上回报一个民意——通电反对王芝祥督直。袁世凯各打五十大棒，又打又拉：一方面说都督之任免权在中央，不应由各省自己拒迎；另一方面说军人不得干政。一方面说要查反对王芝祥督直的电报是否有人托名假冒；另一方面给王芝祥换了一个南京宣抚使。唐绍仪呢，坚决要让王芝祥督直，袁世凯不给他的任命书上盖印，他不给袁世凯的任命书上副署。6月15日，袁世凯把没有唐绍仪副署的委任状给了王芝祥，还给他一笔远远大过实际

需用的宣抚经费，这家伙觉得当宣抚使比直督更实惠，才不管你们扯皮呢，高高兴兴南下了。唐绍仪则气得辞职不干了。袁世凯派人慰留，唐还是不干。6月20日，同盟会国务员全体辞职。

（二）装病躲开的陆徵祥内阁

同盟会告诉袁世凯，最好组织政党内阁或者超然内阁，如采用混合内阁，同盟会不愿意加入。袁世凯的意思是：非联合数党及无党人士组阁，断不是美满内阁。余之主意，不在党不党，而在才不才。而目前，任何一党的人才都不够用。

6月29日，经参议院通过，陆徵祥出任总理。7月9日，袁世凯通令劝告政党：

民国肇造，政党勃兴，我国民政治之思想，发达已有明征，较诸从前帝政时代，人民不知参政权之宝贵者，何止一日千里。环球各国，皆恃政党与政府相须为用，但党派虽多，莫不以爱国为前提，而非参以各人之意见……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附焉？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凡我国民，务念阋墙御侮之忠言，怀同室操戈之大戒，折衷真理，互相提携，忍此小嫌，同扶大局。^[1]

袁世凯这话不但真诚且苦口婆心，但是议员们听不进去，或者说，他们本就乐意看到袁大总统发愁呢。由于同盟会阁员纷纷辞职，7月18日陆徵祥向参议院提出补充阁员名单：财政周自齐，司法章宗祥，教育孙毓筠，农林王人文，工商沈秉堃，交通胡惟德。同盟

[1]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6页。

会控制的参议院全部给予否决。他们的意思很简单：我们不给你们做阁员，但你们提的阁员，我们一个也不给通过。

跟这样的议会玩儿，真是气死人没商量。按李剑农先生的评价：“参议院否决六国务员的举动，好比小孩得了一具铅刀，随处乱砍，不管有效无效，有害无害。”^[1]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对袁世凯也不利。美国想尽早承认袁世凯政府，但在日本的阻止下，这种承认被无休止地拖延。日本的条件是——中国只有建立起巩固的、具有实力的并能履行一切国际义务的新政府，才会考虑对它的承认问题。可是在日本的破坏下，袁世凯想建立巩固的政府，也太难了些：

第一，中国一革命，别人都中立的当口，日本却想武装干涉，并且打算借款给清政府，后来由于英国的反对而不得不作罢。再后看革命阻止不了了，就想混水摸鱼，拿下中国满洲，并为此策划满蒙独立。策划人川岛浪速，国内以肃亲王善耆为首的满蒙王公大臣做内应。这个时候，日本最大的假想敌就是袁世凯。清政府是没戏了，可袁世凯这个朝鲜舞台上的强硬对手要是一旦做大做强，日本还有什么戏呢？所以日本除了武力上的强压，舆论上更是不遗余力地攻击袁世凯，并且怂恿革命党人反袁到底。

第二，日本不安好心，英俄也没歇着。俄国除了策划外蒙自治还与日本密约，共同瓜分内蒙古势力范围，并且把爪子伸向了新疆。英国呢，打起了西藏的主意。

这一切，都让袁世凯焦头烂额。情急之下，袁使出了流氓手法——以军警势力联合通电，痛骂参议院不顾国家危急瞎捣乱。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个人通电及不具实名的小团体函件，威胁、恐吓，甚至扬言拿炸弹炸议员的言词都出来了。以至于老革命章炳麟看不

[1]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

惯了，出面替袁世凯叫不平，他联合数人致电黎元洪，中心意思是：中国快要被瓜分了，原在中国政府无能力；中国政府无能力，原在参议院筑室道谋。他们名曰议员，实为奸府。前清之亡，既在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请联合各都督协商，给袁大总统便宜行事之权！^[1]

这个俗称章炳麟的老革命，这次算是说到点子上了。非常时期，总统得有非常之权，也就是孙中山《建国方略》里的军政时期。参议院如此刁难袁世凯，心里根本没存什么国家利益，正如章炳麟所言纯粹是党见忌人、攻人利己。也许袁世凯利用军警的流氓手法起了作用，也许章炳麟的通电起了作用，总之，26日，陆徵祥二次提供的阁员名单，除了工商总长蒋作宾以外，其余五个：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皆通过。但是27日，参议院即弹劾陆徵祥失职。8月2日，又通过刘揆一为工商总长，陆徵祥的超然内阁算是组织起来了。

但是由于参议院的弹劾，陆徵祥应付不了，只好称病告假，不再出门上班了。所以民国的第二任内阁，没出娘胎就流产了。

陆徵祥虽然没有怎么做总理，但是在他的任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张振武案！

不得不承认，革命才成功一点，革命党之间争权夺利的激烈程度就超过了革命本身：湖北帮与江浙帮争，越争越失意。光复会与同盟会争，争的结果，擅长于搞暗杀的光复会倒被同盟会的暗杀搞得一蹶不振，从此在历史舞台上没了声响，导致落了单的光复会首领章炳麟频频给湖北的黎元洪与北京的袁世凯抛媚眼。湖北帮与同盟会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阁部中没有武昌首义一人，于是孙武

[1]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335页。

另挑竿子组织民社，创办《民声日报》，以黎元洪为精神领袖，专与同盟会对着干了。湖北帮内部也争，军政府以黎元洪为首，之下“三武鼎立”——孙武支持黎元洪，反对南京临时政府；蒋翊武亲黄兴，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张振武处于中间状态，声称要进行“二次革命”，甚至出巨资，派人办《震旦报》，专骂黎元洪。争来争去，黎元洪与张振武的矛盾愈发突出起来。

张振武，湖北人氏，早年入日本早稻田学习法律政治，并加入了同盟会。后回湖北发展革命，进入了比同盟会更激进的组织——共进会。起义前乃理财部副部长，主要负责筹款购运军火。起义时由于孙武与蒋翊武都不在现场，大家遂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理由如下：第一，黎元洪为当时名将，可慑服清廷，号召全国，增加革命声威；第二，黎元洪是鄂军的统领，平日较得军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第三，黎元洪素来爱护当兵的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易于合作。^[1]但是张振武瞧不起黎元洪，看黎元洪不太情愿做都督，甚至提议杀黎示众。黎元洪被逼做了都督后，张振武做了新政府的军务副部长，且以副代正（孙武名义上是正部长，但是伤未愈，仍在住院中）。名义上为黎元洪属下，但平日里飞扬跋扈，从未把黎元洪放在眼里。见黎元洪时，也是带着自己的卫队，全部荷枪实弹，且动不动就跟黎元洪拍桌叫骂。就连张振武的后人张成群都不讳言这一点，说自己的曾祖父每见黎“正颜厉色，一语不顺就执刀厉声道：‘我革命党人把你抬出来，如今倒要在我们头上赌起狠来！’黎甚惧。”^[2]南北议和时，张振武认为武昌革命不彻底，高叫购个“皮毛共和”，我们革命志士“何苦破产舍生”，且声

[1] 张成群：《首义元勋张振武》，《湖北文史资料》2001（3），第8页。

[2] 同上，第16页。



Chinese-American Group.

U.S. Legation to the Chinese Republic.

1912年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5月2日，美国率先承认袁世凯政府。这是袁世凯在总统府与美国公使等合影。左前第一人为孙宝琦，孙右后为荫昌，前右二为陆徵祥，荫昌之右为梁士诒，第三排右一为顾维钧。

言“革命非数次不成”！闻者咋舌。^[1]

和议时黎元洪派张振武携款 40 万元至沪筹购军火，遭人告发，被黎元洪发现“费多钱，购烂械，大肆挥霍”。而张振武也不是没有问题：第一，被日本浪人所坑，买的枪大都是废枪；第二，不是把购买的军火送别人，就是截留下来准备自己拉竿子；第三，首义成功后，在家置办了诸多小妾，有人说其小妾如夫人“将及十位”。^[2]有人说其临时夫人多至 28 人，且多为女学生。在上海购军械时，还跟一个妓女缠绵五天不忍别云云。^[3]

这行为颇有些 Q 哥风范，以为革命就是想睡谁就睡谁，其睡费难免遭人怀疑。而且军火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黎元洪给张振武查账，张振武自然不服气。黎元洪又跟张振武说，这事儿是孙武说的。黎元洪外号泥菩萨，这些兵大爷他谁都得罪不起，只好在中间如此推来攘去。推攘也不是办法，遂求助于袁世凯。袁世凯当然知道这些革命小将不好惹，遂召张振武等人进京委任。黎元洪一听高兴坏了，给他的旅费“庞大惊人”。张振武一听是总统府军事顾问官，当着段祺瑞的面就牢骚上了：“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耶？”不干！袁世凯复委任他为蒙古调查使，张振武仍然不干。袁的意思是，不管干啥，你领个高工资不就得了？张振武的意思是，革命成功了，你们就飞鸟尽良弓藏？没有实权我可不干！他上书袁世凯表示：“民国肇建，内地虽渐趋统一，而边事则殊形复杂，愿发起镇边团，召集热血志士，组织成军，分驻沿边要地，无事则农，有事

[1] 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80 页。

[2] 剪楚生：《张振武》，新民书社 1912 年版，第 32 页。

[3] 同上，第 66 页。

则兵，内可以保腹地之治安，外可以消强邻之觊觎。”^[1]袁马上任命他为东省屯垦使，但是张振武又“要求独立机关不归中央节制”。^[2]袁世凯未允。于是黎元洪发现自己没有高兴多长时间，这个张振武就又回来了。他一回来，湖北就发生了一个未遂的“第三次革命”。

为什么叫“第三次革命”呢？因为之前有“第二次革命”，且这个二次革命也不是国民党因宋案而起的二次革命，而是湖北继武昌起义之后，下岗派、失意派将革命进行到底推翻湖北军政府的兵乱。先是1912年2月27日，挂名在共进会之下的群英会（模仿水浒，计由108好汉组成）发动了“二次革命”，初谋推倒由黎、孙控制的湖北军政府，后又收缩目标，专门打击军务部长孙武，谁让你天天跟黎元洪粘糊呢？问题是没打着孙武，瞎打开了，军政机关一概破坏，伤及诸多无辜。谈判结果，应革命一方要求，孙武辞职，“养疴外游”去了，其职位由曾广大接任。已从总统位上辞职的孙中山进行调解，鞭长莫及。当然，鞭短也及不着，革命小将们谁也不挺。后是1912年7月，文学社的一帮人酝酿发动“三次革命”，也是要推翻军政府，改组政治。被人告发，黎元洪逮捕其三个骨干，杀掉。没有扩大追究，但是舆论谣传三次革命的主谋乃是军务副部长张振武，张振武甚至为此在报上避谣一通。

不管如何避谣，有张振武在，湖北就安定不下来。黎元洪配合袁世凯裁减军队、军民分治的政策，下令解散由起义老兵和革命党人组成的“将校团”时，被张振武阻止；黎又遣散兵站总监所辖六个大队千余人，张振武即将其改编为军务司（原名军务部）护卫队。此后，黎元洪“屡遣解散”，而张振武始终“拒不遵命”。更为黎元

[1] 张成群：《首义元勋张振武》，《湖北文史资料》2001（3），第17页。

[2] 剪楚生：《张振武》，新民书社1912年版，第22页。

洪所不能容忍的是，张振武在国民公校开学典礼上，竟公然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1]

黎元洪再求袁世凯。袁世凯再次邀请张振武北上。黎元洪再次出巨资赞助，并派邓玉麟等陪同，8月10日，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一行13人进京。8月11日黎元洪的催命电报也拍到了袁世凯手里，太重要了，全文录下：

张振武以小学校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张，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起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谋。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藉。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昼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弥祸无形。吾鄂人民，胥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恶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相济，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之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归籍者，就近酌拔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至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从，决不敢诛累一

[1] 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1页。

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上。阑茸尸位，抚养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临颖悲痛，不尽欲言。元洪印具。”^[1]

袁世凯看了电报吓一跳，急招亲信商量：黎副总统这是啥意思？这电文真的假的？于是回电询问。8月13日，黎元洪又发一电，强调“张不死大局必乱”，并派秘书、原电主笔饶华生及军官十余人乘快车到京，告袁以鄂军队俱已布置妥，万无他虞，请即日行刑。于是袁世凯出了手令。8月15日的军界欢迎会上，有人演说军界干涉参议院殊属不合，“张尚与之辩驳，谓政治上有不合者，军人自应干涉。各有主张，两不相下，几至冲突”。^[2]晚上，饭店宴饮，回旅馆的路上，张振武被段芝贵拿下，交给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此前方维也被拿下。陆建章示以黎的电文与袁的手令，对张振武与方维执行了枪决！

袁世凯倒是坦然，把黎的电文和自己的手令公而告之，后面附言张振武之前有功，照大将礼治丧云云。同时执法处公布了张的供词：“因与执政诸人宗旨不合，与方维主张二次革命，今夜被捕想必是事机败露。武昌来电发觉此事，振武既做此事，自知必死。但念首义时，光复武汉，不为无功。振武家中，尚有七旬老母，望每年恤给二百金。云云。”^[3]

舆论大哗：张振武再大逆不道，也得有个程序正义啊，比如司

[1] 廉楚生：《张振武》，新民书社1912年版，第25—26页。

[2] 同上，第26页。

[3] 同上，第28—29页。

法审判什么的。当然了，军人不适用民法，那军政执法处也不能这么蛮干吧？按程序，这会儿该出面的应该是参议院了，参议院此时有三大党：国民党、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三党表现出了空前的一致，大家联名质问袁黎：为啥不按法治来？有的议员，甚至叫嚣推翻政府呢。不过最后大家还是归到弹劾之路上来了。但是，是弹劾袁总统？还是弹劾国务总理（由于陆徵祥泡病假，8月20日，袁世凯任命赵秉钧为代理国务总理）？是弹劾黎副总统，还是弹劾陆军总长段祺瑞？或者，都弹劾，或者弹劾其中的几个？总之，具体弹劾谁成了议员们过不去的坎儿，大家吵得不可开交。其中最激烈的，当是湖北籍的几个议员。有痛快淋漓搞演说者，有号啕痛哭者，带动着整个参议院的会场全是痛骂痛哭、顿足鼓掌之声。

黎元洪那边公布张振武罪十四条，自引咎三罪，并要求辞职。整个电文让人读得荡气回肠，诸多句子堪称经典令人叫绝。只可惜太长，咱这部书的主人公又不是他，所以就不引了。只简单说说他的意思：二次革命三次革命，都是振武主谋，而武汉一隅，关系全局，三摘已稀，岂堪四摘？同志们责以杀非其时，杀非其地，杀非其道，责以法理，岂不知振武手握重兵，暗有潜伏，一经逮捕，立招干戈。北京军事裁判，尚未健全，军法会议，尤非一次。询谋佥同，始敢出此。况振武身参军政，遥领军权，绳以军法，洵为允当？^[1]总而言之一句话，俺实在是没法了，不立即枪决，天下大乱矣；俺也不想干了，这活儿不是人干的。时人对此电文评论曰：“文中有情，句外有味，颇足令人叹赏。平心而论，黎公于此案苟非大不得已，何肯冒天下之不韪，其手续虽不合，其心迹尚可谅也。”^[2]

[1] 蒋楚生：《张振武》，新民书社1912年版，第30—34页。

[2] 同上，第34页。

黎元洪公布张的罪状也就罢了，居然要求辞职，湖北地方就不愿意了，军界商界连电为他辩护并质询参议院。商务总会电文，大致意思是：振武一日不除，则民不能安其居，商不能安其业，现在终于商业复兴人心安定了；听说参议院诸君弹劾黎副总统，黎副总统有避贤让位之意，湖北人心又乱了；一路哭何如一家哭乎，诸君忍不为国家民生计乎？军界电文大致意思是：黎副总统乃我鄂省公推；张振武乃是以军人正军法；我湖北非副总统无以有今日，设一旦动摇，议院诸君能担此重负？^[1]

再开会，湖北籍议员就不敢大呼小叫了，湖北好不容易出个副总统，若真辞职了，别说湖北没脸，自己以后都没脸回籍了。其他籍议员依然拍桌子跳板凳，吵得那叫个民主啊，正因为太民主了，所以连个意向统一、能满足法定人数的弹劾案都立不起来。

再看看革命党两大元老孙中山和黄兴的反应。由于革命的烂摊子过大，共和之路难走，特别是党见纷争让袁世凯头疼，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就多次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但孙、黄一直没有成行。孙中山得知张、方被杀的消息时，正准备晋京与袁世凯“商榷救国大计”呢，许多会员劝孙中山不要北上，但孙中山的态度是：“无论如何不可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2]坚持如期北上。黄兴也只是拍发一个措词温和的电报，称未见司法裁判，最好给个更明白一些的解释。外间又风传黄兴与张振武“逆案”有涉，黄兴又致电袁世凯，请彻底查办。孙中山致电黄兴说：“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

[1] 蒋楚生：《张振武》，新民书社 1912 年版，第 34—35 页。

[2] 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82 页。

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并劝黄‘千万不要来此一行’。”^[1]孙中山的意思是，张振武有罪，袁黎杀之，仅在法律手续上有不当之处而已。

张振武案遂不了了之。政府所做的善后就是“优加抚恤，赡其母，养其子”。^[2]

按时人描述，张振武伏法之后，黎公即派人北上迎柩。当时诸起义人及军政各界，念张首义之功，特发传单，拟于柩车抵汉全到车站迎接，没想到参议院一弹劾，意与黎公为难，“激成鄂省公愤”。待柩车到时，迎者寥寥，仅男女二十余人，中有一年长夫人，九青年妇人，即张之母与妾。并有方维之妾、黎公所派人员、警厅委员、张之好友数人而已。真正悲痛者，只有张母一人，“其妻妾辈毫无戚容，间有一二掩而假作悲泣者”，待随张北上的第四小妾抱着其灵牌下车后，“张妻与他妾欲夺之”，被人喝止。^[3]

有关张振武案，有关共和民主，时人曾有精彩分析：

上年光复，不过数月。其间以血战所得之者，实属无几。战争之最剧者，实在武汉三镇，及南京之克复耳，其闻风响应如此之速者，一则舆论欢迎，一则报界之鼓吹，也国民久苦专制。一旦有揭橥共和者起，咸以为苟可成立，则可还有自由，增我幸福。盖莫不以除旧布新为同趋盛轨为号召。是以满清之覆也，如其此速。然自共和建设以来，前之战祸累我者，徒若邱山；今之幸福及我者，当无毫发。如武昌一隅，其间罹于吾难，以至流亡者，至今当多元气

[1] 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3页。

[2] 张成群：《首义元勋张振武》，《湖北文史资料》2001（3），第19页。

[3] 蕰楚生：《张振武》，新民书社1912年版，第67页。

未复。乃张振武复以元气未复之济，盛倡二次三次之革命。幸阴谋未成，必就刑戮。否则大局必不堪设想，势必至于亡国而后已。故居今日而尤以二次革命为号召，是明明逆民之好恶也。然而张方就戮，尚有为之称冤者。辈非为国家，非为张方。特欲借张方之死，以冀达其破坏之谋，而遂其攘夺权利之心。国家之生死存亡，所不顾也。^[1]

（三）闹出宋案的赵秉钧内阁

8月20日，袁世凯任命赵秉钧为代理国务总理。老赵是袁的心腹，大事小事皆请示袁世凯。双方合作愉快。之后，袁世凯更是与孙黄开始了短暂的蜜月期。

由于袁世凯的一再邀约，孙中山与黄兴早已定好，待孙到上海后，两人于8月18日一块儿登轮北上。岂知出了个张振武案，导致革命党内部出现振动。吴稚晖致胡汉民书，详细描述了其中一些内幕：“孙黄二字，至今尚可连称。然实际，其附属之人，同床各梦。此其联兆，早见于民元。方袁世凯欢迎总理与黄先生赴平，正将登舶矣。其日，袁竟以非常手段杀鸡惧猴，猝害张振武。党人之在沪者，自万分痛恨。而又疑惧总理不肯示弱，力主成行。有数十人集于同孚路黄先生之寓所，会议请总理先行，黄先生后去：总理无拳无勇，袁世凯害之不武，万一袁有恶意，有黄先生之师旅在，庶几亦有忌惮。黄先生首先赞同。”谁知大家送孙总理登轮时，黄的手下不愿意了，大声曰：“中山先生想去抢好事，强人落后。”^[2]

[1] 剪楚生：《张振武》，新民书社1912年版，第71—72页。

[2] 转引自吴相湘：《时代迭变中的文武政要：民国五十位军政人物列传·上》，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页。

孙于 8 月 24 日到达北京，受到袁世凯隆重接待。双方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会谈十三次之多，印象都特好。袁给孙中山以筹划铁路大权，月薪三万元高薪，孙中山欣然接受了。所以孙中山一直督促黄兴北上，如前所述，他数次给黄兴致电，说袁“境遇可悲”，要求黄兴“千万先来此一行”，于是，在陈其美陪同下，黄兴于 9 月 5 日登轮北上，9 月 11 日到京。袁世凯对他的接待与孙中山一样隆重。由于黄兴的南京留守处 6 月份就撤掉了，所以袁世凯给黄兴一个陆军上将的荣衔，黄兴拒绝了（黄兴南归后，袁又任他为汉粤川铁路督办，黄虽然上任了，但却由于财政的困窘旋又辞职）。袁还对黄兴的随员做了多种职务上的安排，宾主甚欢。怪不得中山先生先行北上，黄兴手下不愿意呢。再看吴稚晖致胡汉民的信，更能发现诸多别意：“其时，袁世凯方将任总理以铁路督办，而黄之陆军部长方告罢。其部下亦冀赴平各得好地位，不满足于仅仅留守南京，无多量之位置可猎分。但在总理辞总统而任铁路督办急望铁路之成，降格自污，人乃以好事目之。黄先生亦丝毫无代人赴平抢地位之意。然附属品之心目中，则觉铁路总局中大可位置某某。如黄先生早到平，留守府所不能容者，将于各部院会容之。故凤凰实翔于九天之表，人方在藩篱下求之也。终之，重要人物，各有附从，乃情势所不可避免。甲重要人之附从，与乙重要人之附从，愈离愈远，又情势之所必至。附从无贤不肖，甲乙各拥其重要人，在乙则冷淡甲，在甲则冷淡乙，复自然而然。”^[1]

接着说三大头的蜜月。孙中山和黄兴都邀请袁加入国民党。袁拒绝了。表示政党自是不错，但自己的加入今非其时。过后他跟人

[1] 转引自吴相湘：《时代迭变中的文武政要：民国五十位军政人物列传·上》，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0—141 页。

解释说：“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甲党为敌，实不敢以一己之便安，而起国中之纷扰。昔英国有女王终身不嫁，人问之，则曰：吾以英国为夫。鄙人今日亦曰：以中华民国为党。四海之内，皆吾兄弟，三人同行，厥有吾师，俟将来政党真正稳固，或不能终守不党主义。”^[1]

果真老诚之人。这话说得与吴稚晖致胡汉民的那封信，倒是一个意思。但是赵秉钧却加入了。黄兴的推动下，9月下旬，赵秉钧顺利当上了国务总理。

背后，袁世凯对孙、黄如此评价：“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2]

反过来，孙、黄对袁世凯的评价也很高。8月28日，孙中山即表示同意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9月2日又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宣布，自己以后不再过问政治了，政治有袁大总统及一班国务员即可。自己要一心搞社会事业，也就是他的铁路。10月6日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上演说：

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总不能全采新法。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并不谬误。

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袁总统既赞和

[1] 李宗一：《袁世凯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03页。

[2] 许指严：《新华秘记》，《近代稗海·第3辑》，第350页。

吾党党纲及主义，则吾党愈当出全力赞助之，建设前途，于此望之矣。^[1]

黄兴说的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兴至京时，觉有一绝大希望及一绝大乐观之事，为袁总统之苦心谋国是也。报纸有以拿破仑诋之者，殊为失当，且亦绝无之事。

今日北有袁大总统，南有黎副总统，犹之屋有栋梁，而吾辈方能住居寝室、歌哭于其下，故我辈一面监督现今之政府，同时复当尊重此两大伟人。^[2]

袁世凯是演戏吗？不是。他作为民国第二任总统当然诚心想把民国搞好，而孙、黄二位革命元老，也不至于会被所谓演戏的袁世凯蒙蔽。9月29日，《时报》发表了袁、黎、孙、黄四大头调和党争的政见协议书，也就是袁世凯的八大政纲：第一，立国取统一制度；第二，主持善恶是非之真公道，以正民俗；第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第四，门户开放，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第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第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第七，迅速整理财政；第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3]

[1]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4—485页。

[2] 《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0、289页。

[3]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8页。

事情如果按这八条政纲来,那将是很好的走向,只可惜,光第八条就做不到,党见不但没有向孙、黄所预言与助推的那个方向走,还走向了最不该走的方向,宋案发生了!

宋教仁,字遵初,湖南人,乃革命党阵营内杀出的一匹黑马。宋教仁才华横溢,理论过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他一夜草书而成的;志气逼人,行动更非凡——孙中山做总统,他想做总理,却被同志们摁住了。现在袁世凯做了临时总统,同志们遂放手让他撒欢。本来他就是撒欢的个性,一张毫无顾忌、拔毛成兵的大嘴巴,端的是横扫天下,所向披靡。按照临时约法,十个月之内,要正式组织国会(两院制),选举正式的大总统。而他的梦想——政党内阁和民国总理,也想藉此而实现。8月10日,袁世凯公布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所以此时的参议院停止了与袁世凯的斗争,纷纷改入党造党并党去了(一句话,他们并没有响应孙黄号召,而是投入到更大的竞争中去了,以至于陌生人一见面,问过尊姓大名后,必问及贵党)。成绩最可观的当然是宋教仁啦。一者是为了自己的梦想,二则是当时的同盟会已经变得让人侧目了,按李剑农先生的说法,该会中的少年党员,妄自骄功,举动暴烈,干部领袖不能节制,为人所诟病。^[1]

8月25日,宋教仁的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开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孙辞却了,宋教仁就当上了代理理事长。不用说,国民党乃民初第一大政党,于是与它相对应的政敌党便出现了,主要有三个:共和党(首领黎元洪)、统一党(首领章炳麟、张謇)、民主党(首领梁启超)。由于是新生事物,所以这个时候的

[1]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2页。

中国政党，有几个与众不同的方面：

第一，诸多党员是跨党人士，比如秋瑾，据陶成章描述，那是有会即到，有党皆入的。先加三合会，后入光复会，再后又入同盟会。再比如柳亚子，同时加入了同盟会与光复会。

第二，党纲模糊，有些党员干脆没有政治信仰，把入党当作仕途，政争却一点也不模糊。如果说国民党是由革命党演化而来，那么后三党便是由立宪党演化而来。

第三，一切党都没有群众基础。按李剑农先生的说法，中国“自有政团以来，都是没有民众做基础的政团，政团不过是读书绅士阶级的专用品。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和立宪党虽然都没有民众做他们的后盾，但因为清廷的恶政和满汉民族的反感，在民众心理上发生了一种消极反对清廷的意味；所以革命党依靠依仗这种民众的消极反满意味成功。清颠覆后，所有的政党都与民众不发生关系，都成了水上无根的浮萍”。^[1]一句话，原先大家讨厌清政府，清政府没了，现在大家开始讨厌革命党了。宋教仁有所意识，所以开始整党造党。

唐德刚先生称宋教仁为大嘴巴。确实如此。我们先看看宋教仁自己挨嘴巴的事——公开场合，宋教仁曾两次被扇耳光：一是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定推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与部分开国元勋主张，一定要袁世凯离开北京到南京就职。另一些元老不以为然。后来不知哪位提议，干脆让黄兴带兵北上，以迎袁世凯的名义把北洋军消灭掉。宋教仁不赞成，认为北洋军有重兵把守直隶、山东，革命军根本无法北上。话刚说完，同盟会元老、广西才子马君武上前就是一巴掌，打得宋左眼流血。马君

[1]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8页。

武还骂宋教仁给袁世凯做说客，想出卖南京，出卖革命云云。宋教仁想还手却没还手。二是 1912 年 8 月 25 日，宋教仁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宣布新党章，宣布一条说明一条。说到新党章规定不吸收女党员时，坐在台下的唐群英冲上主席台打了宋教仁一耳光，宋教仁捂面退避。唐群英，也是湖南人，被孙中山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同盟会中第一个女会员。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以英国宪政为榜样，认为英国妇女没有参政权，咱也可以不接收女党员。唐群英不接受，就上去扇嘴巴了。^[1]

下面我们再看看宋教仁的竞选宣传。

第一，他坚持内阁制，认为内阁不善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无术易之。^[2]

第二，他向党员们发出号召：“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3]这话表面上讲也算客气。但与袁世凯的政见有了显著的不同。袁世凯一直不接受政党内阁，认为当前情形下，任何一党的人才都不敷使用，只有混合内阁才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各路人才，这也是袁世凯拒绝加入国民党的原因之一。

第三，在国民党湖北支部的欢迎会上，宋教仁说：“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

[1] 李友唐：《宋教仁两次当众挨打》，《钟山风雨》2009（3），第 53 页。

[2] 陈旭麓：《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460 页。

[3] 同上，第 456 页。

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1]

在1912年11月的参众两院初选和1913年2月上旬的初选中，国民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国民党一时志得意满，都在等袁世凯的好看。另外，社会还私传着这样一则消息：宋教仁的目标不仅仅是政党内阁与内阁总理。他还想换总统，以“最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代替能干精明的袁世凯。

袁世凯倒是很看好宋教仁，之前曾对他做过有意拉拢，又是送钱又是送物的。但宋教仁只接受一套西服，银票奉还了。那么袁世凯会不会因为这个就对宋教仁痛下杀手呢？不见得，一是瓜田李下，袁世凯得避嫌；二是宋教仁对袁世凯构不成威胁。宋不就是想当个内阁总理吗？唐绍仪也是内阁总理，三个月不就乖乖辞职了？第三，如果说宋教仁有敌人的话，那么最大的敌人当是第三任内阁总理赵秉钧。也就是说，宋教仁要做总理，直接影响的是赵秉钧的位置。

不管谁嫌疑最大吧，事故发生了。1913年3月20日22时45分，上海火车站，离沪北上的宋教仁背后，有子弹在飞：一颗，两颗，三颗……宋教仁背部中弹，伤情严重！

宋案一出，袁世凯就是最大的嫌犯了。

21日，袁世凯得悉宋教仁被刺，除了惊诧还是惊诧，同时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等人前往医院慰问，立悬重赏，限期破案。22日，宋教仁不治身亡。袁世凯别无选择，还是得先破案

[1] 陈旭麓：《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6—457页。

再说。这里需要特别注明的是，当时的袁世凯政府还真有些共和的意思，检察厅发出了《地方检察厅赏格》，以悬赏捉拿罪犯。参议院也向政府发出质问政府书，要求政府在3日内答复。一句话，套路上很有宪政的样子。同时，国民党自己也悬了重赏，并且让上海的党员们集体出动，寻找破案线索。

根据线索，24日零点过后不久英捕房总巡带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捕获应桂馨（又名应夔丞）。当天，法捕房又在应桂馨家里逮捕了武士英，并搜获应夔丞与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奉赵秉钧之命，专管国务院密电事宜）来往密电和函件等多种证据。经过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和法租界会审公堂分别预审，确定此案为暗杀。据武士英招供，是共进会的陈玉生和应桂馨让他干的。武士英，在云南军队当过管带，军队被撤之后来到上海。与共进会的陈玉生认识。陈玉生告诉他：我们现在要办一个人，这个人与中国的前途有非常的关系，是个无政府党，我们要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之后，陈玉生约武士英加入共进会，并且让他见了应桂馨，于是武士英就雄赳赳气昂昂地“为民除害”去了。三颗子弹，飞了两颗，但是一颗就够了，准确地说，第一颗就够了，后两颗是他逃跑的时候倒在地上朝天放的。

至于应桂馨，原是青帮大佬，陈其美把他拉进了同盟会，他把陈其美拉进了青帮。与此同时，他还是武昌起义核心小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与湖北首义中的革命小将三武（张振武、蒋翊武、孙武）走得比较近，应桂馨本人更是张振武的党羽。而共进会乃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是一部分同盟会员嫌孙中山革命动作过慢而另组的激进组织。总之革命党与各种各样的秘密结社之关系，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我们的教科书一提应桂馨就是上海的流氓帮会头子云云，绝口不提人家是革命党。事实上这家伙干革命时很卖力，革命党光复上

海时，他组织了敢死队，带领几千名帮员参与战斗，功劳大大的。上海光复后，他先是做了陈其美沪军都督府的谍报科长，后来做了南京总统府的庶务科长，兼管孙中山的卫队。能走到这一步，可谓革命党骨干了。南京临时政府解体后，应桂馨重回上海。把自己的青帮与洪帮等势力联合，改组为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不久，陈其美的上海都督府被政府撤销，应桂馨被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以江苏驻沪巡查长。正应了陈其美那句话，革命党杀革命党！

革命党内讧，向来不稀罕。试以同盟会与光复会为例。众所周知，光复会的诸多会员都是跨党的，既是同盟会又是光复会。1910年双方因革命经费、革命理念与派系观念的纠纷而正式决裂。但是上海起义，是同盟会与光复会合作之下成功的，双方各出一个功臣，同盟会这边是陈其美，光复会那边是李燮和。甚至有人认为李燮和功高于陈其美，于是在会上，陈其美的卫士刘福标掂着手枪叫唤，必须组织都督府，由陈其美做都督。再后的会议上，刘福标干脆拿着手榴弹上了，声言再不让陈其美做都督，大家就得吃他的炸弹。而且李燮和根本没被邀请参加会议。总之，革命的果实就这样被同盟会独占了，陈其美做了沪军都督，给了李燮和一个点缀性的参谋。端的是革命尚未成功，个别野心家的争权夺利就超过了它所要革命的对象。光复会只好另起炉灶，在吴淞成立一个什么军政分府，举李燮和为都督。1911年11月9日，李燮和在赴任的路上遭遇枪击。谁的子弹在飞？肯定不是清政府的。于是光复会与同盟会矛盾激化。1912年1月，光复会的另一大佬、副会长陶成章（正会长章炳麟）被人枪杀。于是两个党彻底决裂。李燮和干脆不敢在上海混了，率队北上，投奔了袁世凯。于是上海就成了同盟会的地盘。宋教仁倒在革命党自己的地盘上。挨枪前没人护卫，挨枪后没人拦凶，确实是对革命的一种讽刺。而且宋案当天，上海的革命党

人、青帮大头目陈其美还在送行宴会上跟宋教仁嚷嚷：“当初（亦作钝初），你不要快活，他们会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你。”宋教仁回的是哈哈大笑：“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1]

可是，这次暗杀不是革命党与清政府之间，甚至不是革命党与革命党之间，中间还掺和上了袁世凯政府。因为在搜获的证据中，很多是应夔丞与洪述祖的往来密电，还有国务总理赵秉钧与应夔丞的来往信件。据此会审公堂初步判断洪述祖为本案的间接正犯，而且案关国务总理赵秉钧，甚至涉及袁世凯。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就立返上海，与黄兴、陈其美商讨。黄兴的意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咱也去暗杀袁世凯。孙中山的意思是，举兵讨伐袁世凯，但是革命党能掌握的兵力甚少。于是黄兴建议，暂不谈兵力解决，先司法解决吧。

于是就走司法程序了。

经过交涉，4月16日至18日，英法租界当局将应、武二犯及涉案证据解交给中国当局，也就是上海地方检察厅。然而，就在法庭公开审理的前一天（24日）上午，凶手武士英在狱中死亡。谁干的？在同盟会的地盘上，袁世凯与赵秉钧的手能伸这么长这么快吗？甚至可以说，这一切让袁世凯与赵秉钧更加被动了。祸不单行，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等通电大总统、参议院、众议院和国务院，公布了本案的证据，并将应、洪来去函电在全国各报上发表。中国人民群众的眼睛向来是雪亮的，大家一看电报，比法官判案要明确迅速多了：证据确凿，主谋就是国务总理赵秉钧，

[1] 杨思义：《宋案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8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579页。

至于民国总统袁世凯，嘿嘿……

袁世凯没意思，赵秉钧更没意思。赵几次要求辞职避嫌，袁世凯不批，认为越是避嫌，嫌疑越大，请假吧你，让段祺瑞代其理事。关于烈士后事，稽勋局局长冯自由送上呈文，请求给宋教仁一次性补恤三千元，遗族年补恤金一千六百元，并将宋教仁入国史馆立传。这方面袁世凯向来大度，二话不说，批了。而且他比冯自由这些革命党想得还要周到，责令他查明宋教仁有子几何，一律送孩子们游学深造。但是你做得越周到，越证明你心虚。黄兴更是写出了为天下广为传诵的那副对子：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1]

袁世凯杀吴禄贞，这个可以有；袁世凯杀张振武，这个也可以有；但是袁世凯杀宋教仁，却不见得有。宋教仁一个大嘴巴，对袁世凯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杀他没有必要。当然赵秉钧有必要，因为宋教仁威胁了他的总理职位。还有，中国人做奴才，都会揣摸心思的，主子不喜欢某个人，不待主子吩咐，奴才就可能自己干去了。还有，吴禄贞当年的人头值两万，现在的宋教仁才值一千（武士英交待，应许诺给他的是一千，但最后只拿到三十元），价格确实有些低。这是动机上的分析。法理上讲，疑罪从无。直到今天，我们还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是不？

不得不承认，有关宋案，新政府在司法方面做得够好了。因案涉国务总理，程德全、应德闳致电袁世凯，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讯，

[1] 《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9页。

但是司法总长许世英力持不可。理由是，从法律方面讲，特别法庭之组织、约法和法院编制法中都没有规定，这样做是以命令变更法律。且先例一开，就会造成以令代法的问题。违法！从事实方面讲，被告律师来电拒绝出庭，即使强开审判作出判决，被告不服，则判决终归无效。最后，还是按照普通程序来吧，依据《中华民国暂行法院编制法》，应由上海地方检察厅提起公诉，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上海地方审判厅开庭了，但一直未能作出判决。因为武士英于关押中死亡；洪述祖未能抓获；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应桂馨乘乱逃跑。再之后，应桂馨与赵秉钧均死于非命。袁世凯于1916年死，涉案人员就只剩下了洪述祖。洪述祖当初逃跑成功后，就在青岛租界发过通电，说应桂馨只是不满宋教仁搞党派专制而欲毁其名，根本没有谋杀之意。而自己在与应桂馨联系的过程中假借了中央名义，目的是为了促其行。但是他这通电谁信呢？1917年洪述祖在上海被抓，经过北京地方审判厅和高等审判厅两级审判后，1918年被大理院判处死刑。

袁世凯乃主谋的证据何在？特别是武士英死于狱中，应桂馨从上海逃走，仅从技术角度看，这些事都是袁在陈其美的地头上做不到的事。

“宋案”就这样成了世纪糊涂案，袁世凯从此背上祸首的罪名。然而在中国司法史与政治史上，“宋案”还是很有亮点的：司法史上，那就是一个地方审判厅，敢于两次对国家总理发出传票。赵秉钧虽然没有到案，但是能拿到传票就是中国司法上从未有过的事情了。而且，由于赵秉钧两次未到案，有参议员向其发出了质询，他为此作出了答辩——既然洪述祖说他自己是假借中央名义，那就没我什么事了。这更是中国政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事。

“宋案”中间，还搅合着一个善后大借款案。前面讲过，从唐

绍仪内阁开始，政府就开始筹借贷款了，不迟不早，恰在 4 月 26 日深夜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谈成签字了。对于袁世凯政府来讲，善后大借款交涉两年了，一直谈不成，现在忽然谈成了，那是久旱逢甘霖。大家高兴还来不及呢。不高兴，或者借题大作的只能是国民党。他们故意忘记，这种以路矿税收作抵押的贷款，乃是他们的孙公做临时大总统时首行的。前清这么干，再革命的党也得这么干，否则政府如何运行？就是黄兴的南京留守处，裁撤 30 万军队就需要 250 万元，何况当时遍地革命英雄需要安置呢？

有意思的是我们有些论者，也跟着亢奋。说什么善后大借款的消息一出，又是群情激愤。这里的“群”被夸大了，“愤”也被夸大了。各省都督，通电赞成借款的是 17 省，反对的只有 4 省，也就是国民党那边的。至于国会，由于国民党人多势众，没理也声高。不说几百罗汉了，只能说几百孙行者大闹天宫，当然有的热闹。我们现在还有些史家跟着大闹并且思维超前，认为袁世凯为的是镇压革命。事实上革命党都没这么想呢，他们想的是，如何让袁世凯政府没有一分钱花，最后倒台。当然措辞不能这么说，说大借款没有经过参议院同意，贷款条件太苛刻，袁世凯卖国。袁世凯回的是，去年总理赵秉钧及财政总长周学熙都向参议院做过报告，均经表决通过。参议院回答说，这两位是来过，但是仅携借款情形说帖、合同大意和附录特别条件草稿给我们看来看着，并未带正式公文。而且我们特别交待，将来合同成立前政府必须提出借款全案，正式交参议院议决……于是袁世凯让代理总理段祺瑞到国会答复质询，民主就上演了——有人跳到凳子上大骂袁世凯；有人拍桌高叫打倒袁世凯；更有人拿着墨盒直接向段祺瑞投掷！

袁世凯一看民主原来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也民主一下吧。派亲信梁士诒和张一麐四处活动，把统一、民主、共和三党合并成一个



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乱象横生，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也没有安全感，他曾让人在英格兰买下大片庄园，在法国银行存过二百万法郎，给自己预做退路。

进步党，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汤化龙等为理事。其党纲是：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律自由；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和平实利。对于政局，他们的意见是：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候选人；改组现内阁；先选举总统，后制订宪法；大借款在今日之财政上不能反对，只能监督其用途；宋案以法律解决之。

问题是，有人不按法律来。也许，袁世凯更恼火的是那些身兼民政长及地方都督的革命霸王们——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等人在大借款一事上通电反对，对此袁世凯做了认真的批评：

都督为现役军官，有绝对服从之义务；民政长为行政长官，有服从中央命令之义务……该都督、民政长等近日电文多出于职任范围以外，竟置行政系统于不顾。该都督等也有属官，如相率效尤，何以为治？且唆同僚以抗争，陷国事于危险，雌黄信口，更非身列军界政界者所当为。^[1]

袁世凯批评得不对吗？连孙中山自己后来都愤言南与北乃一丘之貉，南方督抚们所谓的革命，怎么也掩不住私利的本相！

5月24日，《时报》载北京专电“袁总统令传语国民党人”，云：

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

[1]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页。

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诱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1]

5月29日，《时报》载袁总统访谈稿。关于革命党中的一些人，袁评价如下：

此种人已有革命习惯，无建设思想，无实地经验，不识中国大势之真相。然人民必不助其所为。大概此种人可分为两种：第一种已得政府酬报或官职而不满意者；第二种尚未得政府酬报或官职者。^[2]

一看新的战争即将爆发，马上有人出面调和。袁世凯的意思是：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调和南北问题，而是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如何统一的问题。而且宋案自有法院，借款自有议院。现役军人不能说话，地方长官更不能凌驾于中央权威之上。南边的意思是：举袁世凯为正总统；袁世凯在临时期内不能撤换都督；宋案及罪人洪述祖、应桂馨，不再往上追究。但是袁世凯已丧失了和他们再玩下去的耐心，先是免去李烈钧的江西都督，后是免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兼民政长，再后是免去柏文蔚的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国民党籍的军政要员就这么几个，怎么办？于是，二次革命就这样爆发了——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最先在江西湖口誓师。紧接着，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纷纷宣布独立。问题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两个月后，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

[1]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9—50页。

[2] 同上，第51页。

(四) 一流内阁来了

1913年5月1日，赵秉钧终于辞去了内阁总理一职，还是由段祺瑞代理。这个时候，袁世凯希望徐世昌出面做总理，徐拒绝了。袁世凯又想到了进步党人士张謇，张謇也知道做总理不好玩，又拒绝不得，遂推荐一代名流、大清进士熊希龄。袁世凯并不喜欢熊，但是有人勇于担当，总是不错的。7月31日，袁世凯正式任命熊希龄为总理。熊希龄知道这活儿不好干，迟迟不上任。在袁世凯与梁启超的多方催促下，8月28日上任。熊希龄要把其他名流拉进他的内阁来，特别是梁启超与张謇联袂加入。9月11日，所谓的“第一流人才内阁”组成，各部总长是：外交孙宝琦、内务朱启钤、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交通周自齐、司法梁启超、教育汪大燮、工商张謇、财政熊希龄兼。

与此同时，国会也在走向正轨。1913年4月8日，两院议员于众议院举行国会开幕式。据《临时约法》，前时之参议院于同时解散。5月1日，参众两院进行议长选举：参议院选举张继为议长，众议院选举汤化龙为议长。国会既开，须制宪法，以便依宪法选举正式大总统。然宪法的出产，不是一日两日之事，而政府又不能长期无正式元首。遂有先举总统，后定宪法之说。黎元洪与十九省都督、民政长发出通电，主张先选出正式总统，再定宪法。或者先定宪法，再选总统。但是不管哪种方法，都要在两个月内完成。9月5日，进步党在众议院提出先制订大总统选举法、选出总统，再制订宪法的议案，以213票对126票通过。随后，参议院也通过。9月12日，参众两院联合会，决议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制定宪法中《总统选举法》一部，循各国通例，以宪法会议名义宣布。这些工作做好后，10月6日，国会选举正式总统。一般的说法，都是说袁

世凯心虚，怕自己选不上，所以让军警扮作公民团包围了众议院会场，挟迫议员们选袁。我觉得，袁世凯心虚也是正常的，因为议员们第一次投票，袁世凯没有得到法定总票数的四分之三。第二轮投票，袁世凯仍不足法定票数。天黑了，第三轮投票，改变办法，就第二次得票最多之袁世凯与黎元洪两者之间进行决议，议员们这才让袁世凯通过。然则这些议员到底想选谁做他们的总统？当时的形势下，又有谁堪以代替袁世凯才能让中国的政局有希望走向稳定统一？

次日选举副总统，黎元洪以高票当选，一次通过。看来，议员们还是在给袁世凯颜色看了。

10月10日上午，袁世凯发表了漂亮的演说，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下午，登上天安门城楼，举行了大阅兵仪式。晚上，在外交部举办了茶舞会。这一正式，西方列强纷纷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在此之前，也就是1913年4月国会正式成立之日，美国、秘鲁、巴西三国承认了中国政府，特别是美国，一直急着承认，但是日本拦着，就是不让承认。现在，它们都承认了，是为日本、奥地利、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墨西哥、德国、俄国、意大利、法国、瑞典、英国、丹麦、比利时、挪威、瑞士等。上海的《字林西报》发表社论说：“中国长期生活在旧制度下，现在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固定的领袖。列强支持明智的官方。”^[1]嗯，中国总算有戏了。

袁世凯做了正式大总统以后，做了以下大事：

第一，把黎元洪请到了北京。1913年12月，袁世凯把黎元洪请到北京，让段祺瑞署理湖北都督。一般人喜欢说，袁世凯这是调虎离山。问题是，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正副总统不在一个城市办公，

[1] 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85页。

居然一在北方，一在南方呢？或者说，有哪一个国家的副总统是不在首都上班的？

第二，制订《中华民国约法》。宪法起草委员会本来拟订的是《天坛宪法草案》，其基本精神仍是立法权属于国会、责任内阁制等。但是袁世凯认为，与其订一个新的《天坛宪法》，不如在原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基础上增修一下。当然，这两部宪法都让他深感不便，大总统无权，纷扰至今，什么事也干不成。问题是国会对于他的要求置之不理，没有办法，袁世凯派了一个八人委员会，希望参与制宪，却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所拒。

10月25日，袁世凯通电各省民政长官，认为国民党的议会专制有害于政府，导致临时政府一年之内三易内阁，陷于无政府状态。同时举例说明，美法制订宪法时，总统都可以参与其中的。各省长官看到通电，多主张解散国民党，恰巧国民党也有把柄被袁世凯抓住了：段芝贵打入南昌，李烈钧的密电本未带走，被电局搜查译出，他与国民党议员徐秀钧的往来密电有几十件，里面全是二次革命的密谋，并且指出只要革命一起，外国出面调停，就可造成南北割据。更要命的是，密电里还说，这些意思乃该党议员一致同意云云。于是，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438人。众议院为此质问政府：处理叛党及议员，自有法律与程序，政府你不能这么法盲啊。参议院也质问政府，除了重述众议院的意思之外，还额外加一重意思：议员人数不够法定的一半了，国会还咋开会呢？不管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都要求政府：限三日内答复！

二十天之后，政府才回复曰：议员有质询政府之权，但是得由各院转咨政府。问题是各院议员不够法定半数议院无权开议啊。还有，查两院议长，已于11月13日声明，由于议院不足法定人数，

不能开议，不得已于 14 日起停发议事日程等。议院都停了，你们咋弄出的质询书？总之，对于你们的质询，国务院本无义务回复的，只是觉得情况特殊，才给你们解释一下以免误会。^[1]

当然，没有国会也不是个办法，总得制宪。于是袁世凯召集政府会议，政府会议议决结果：解散国会；特设机关，也就是约法会议。由它来解决临时约法的增修问题。

1914 年 1 月 10 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另组改良国会。对成立于去年 4 月的现已被解散的正式国会，袁世凯评价如下：

国会常会四阅月，一法未经议决。延长会期以后，迟迟至于上年九月，始议决一议院法案。其余应有职权，则悉有挟持党见者所蹂躏，几酿成暴民专制之局。而议员中之持稳健主义者，率相与叹息痛恨而无可如何。因此结果，立法机关既无法之可议，行政机关亦无法之可行。

国会定期四个月，延长之限，虽未明确规定，而各国国会通行办法，遇有延期情形，绝无倍于法定会期之例。我国国会开会，计至民国二年四月至今，已逾九月，延期倍过正期。立法机关，终岁常设，即使人数过半有余，亦非政治良轨，何况议员实存少数，无庸再拥延会之虚名。^[2]

除了袁世凯的评价，这里有必要对民初的国会做一点小小的交待。民初国会，取美国制，上下两院，也就是参议院与众议院。参议院按省区分配名额，总计 274 人（有些地方未选出，实际只有

[1]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76—86 页。

[2] 同上，第 92、94 页。

263人);众议员按人口多寡分配名额,总计是596人。两院合计859人。当时媒体戏称之为“八百罗汉”。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八百罗汉”在民初的中国大闹天宫,真是闹得个天翻地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八百罗汉”在民国初年是没有选民的。^[1]他们谁也不代表,就代表了自己的前途。以前是科举做官,现在是入党做官。

1914年1月26日,袁世凯的《约法会议组织条例》颁布。

1914年2月3日,政府宣布取消地方自治会。政府公报中,发布有解散之原因,据各省民政长陆续呈电,大体是各省自治会,良莠不齐,平时把持财政,抵抗税捐,干预词讼,鱼肉乡民,动称民权,不知国法,侵权违法,无所不至。^[2]

1914年2月3日,经政治会议决议,袁世凯政府解散省议会。2月28日,袁世凯正式下令解散国民党。

袁取消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各省议会及地方自治,熊希龄不满意。他的裁军废督、虚省设道等政治体制改革,又推行不动,遂于1914年2月12日,辞职。孙宝琦被任命为代总理。

1914年3月18日,约法会议开幕。5月1日,袁世凯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这次是他的胜利,既拥有了宪法公布权,还让约法给他量身定做了美式总统制。

9.3 帝制闹剧

(一) 美式大总统的滋味

《中华民国约法》一过,袁世凯终于能活动筋骨了,算是体验

[1] 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2]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7页。

上了美式总统的滋味。

第一，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根据《中华民国约法》的规定通令全国，宣布废除国务院，于大总统府设立政事堂。特任徐世昌为政事堂国务卿。这个角色应相当于美国的国务卿。但是并不妨碍你把它理解为明朝的内阁大学士或者清朝的军机大臣。另外其他各级官员的级别，也按古制，分卿、大夫、士三等九秩。

第二，袁世凯撤销了前总统府军事处，成立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掌管全国军事，由他亲自掌握。这个也相当于美国的总统，美国总统是陆海空三军大元帅，咱谈不上空军，只能陆军了。这样一来，陆军总长段祺瑞的军权也有所影响。

第三，先削弱都督之权，后裁撤都督。袁世凯本来想废督的。革命成功之后，首要的问题是军队国家化，而不是私人化、地域化，甚至党派化。可是督们不愿意啊。他们一不愿意，掂着枪杆子就上了。袁世凯没有办法，只好先来点温柔的，改变地方官制，省下增设道，变成了省、道、县三级机构。各省民政长改称巡按使，为一省行政长官，负责监督财政、司法及行政事务，还管辖巡防营、警备队等地方武装，试图从都督们手里分得一点点军权。做了一定的铺垫后，袁世凯开始裁撤都督，于京师建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规定督理各省军政者，就所驻省份开府建牙，未有督理军政任务的在将军府任事。

第四，撤销政治会议，设立参政院，代行立法事宜。相当于议院吧。根据《参政院组织法》，袁世凯任命了73位参政员。任命黎元洪为议长。后面这点也是学美国的，由副总统担任参议院议长。

第五，建立模范团。灵感始于蒋方震的建言。蒋方震，日本士官生，德国军校深造过，海归后一直担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这个人学了日本与德国的尚武精神，一直希望中国也走向同样的道路。

袁世凯受了他的启发，更鉴于北洋军的暮气和正在步袁大帅后尘、冉冉升起的段祺瑞，促使袁世凯把儿子推到了幕前，具体来讲，是让儿子袁克定做模范团团长。没想到陆军总长段祺瑞对曰：我看他不行吧。谈了半天，段祺瑞就是不同意，于是袁世凯气咻咻地问：你看我行不行呢？^[1] 噗死段祺瑞了，于是袁世凯亲自做了模范团团长。

第六，成立了平政院（相当于清朝的都察院）和肃政厅（相当于中国传统的御史台）。前者是处理官民诉讼与官官诉讼的特种法庭；后者隶属于平政院，但在纠弹违法官厅与官吏方面，是独立操作的，被人视作中国监察制度的现代化。据袁政府规章，各级官吏，贪污逾五百元，即处死刑。之后，袁的京师警察总监、升任京兆尹的王治馨即因为一桩五百元的贪污案被袁饬令枪决。

曹操曰：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说得好。唐德刚认为，袁世凯乃“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而且对于他这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做法，也“未可厚非也”——“予岂好独裁哉？予不得已也！”^[2]

（二）政见表达及传统回归

前面说过，袁世凯 1913 年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之时，曾发表了就职演说。演说太长，大家也没耐心看，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段落大意，提炼一下他的政见：

第一段：余不才，忝居政界数十年，向持稳健主义。革新诸政，

[1] 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 41 辑》，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246 页。

[2] 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0、121 页。

凡足以开风气者，必一一图之，但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以国家人民之重，未可作孤注一掷。

第二段：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道德为体，法律为用。今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吾国民性最驯，惟薄于守法之习惯。

第三段：人民希望安居乐业，可是改革之后，人民受种种刺激，言之惨然。余日望人民恢复元气，不敢行一扰民之政，而无术以预防暴民，深以为憾！

第四段：国民饥寒交迫，狡者利用他们，驱之死地，可悯之至。欲国之长治久安，必使人皆有生计。余闻文明头等人物，往往愿为实业家。余愿全国人民注重实业。

第五段：实业不发达，原因有二：一在教育之幼稚；二在资本之缺少。无论何项实业，皆与科学相关，理化之不知，电气之不讲，人方以学战、以商战，而我则墨守旧法，迷信空谈。余愿国民输入外国文明教育，即政治法律等学，亦皆有实际而无空言。

第六段：我国物力、地质皆丰富，岂得谓贫？只不过缺少开办资本而已。我愿输入外国资本，以振兴本国实业。

第七段：输入外国文明与资本，是国家主义，实世界主义。世界文明之极，无非以己之有余，济人之不足，使社会各得其所，几无国界可言。

第八段：凡我国民，既守本国自定之法律，尤须知万国共同之法律。与各国往来，事事文明对待，万不可有歧视。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前清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契约，亦当恪守。与国际真心和好，以礼往来。需要重言以申明者，不外道德，而道德，圣贤千言万语不能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也就忠信笃敬而已。

第九段：所谓的忠，忠于一国，非忠于一人也。

第十段：孔子曰：民无信不立。吾国向重信义，近来人心不古。立身且难，何况立国？

第十一段：文明各国，保存国粹，虽一名一物，惟恐或失。吾国向以名教大防，经四千年胚胎变化，自有不可磨灭者存。有些人偏于理想，毁弃一切。不做实事，专说大话，未得外国之一长，先抛本国之所有。天性浇薄，传染成风，本之不存，叶将焉附，故救之以笃。

第十二段：何为敬？有恒心然后有恒业。人而无恒，则有事时犯一乱字，无事时犯一偷字，职业所在，惰气乘之。万事败坏于悠悠之中，而无人负责，徒劳旁观嘲讽之语。而自己分内事，转漠然不察。

第十三段：忠信笃敬四字，我愿与国民共勉之。

第十四段：法律与道德同时并进，则共和之国度，稳固而不摇。至国防问题，吾国正在修养生息之时，尚非武力竞争之时。惟余所切切于心者，海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义务，以保护人民为天职。各将领谁不知之，惟此二者，颇为近日风潮所鼓荡，未能完全收效。是余统率之责，此后当十分注意精神教育，以对于人民。

第十五段：以最诚挚亲爱之意，申告于国民：余一日在职，必一日负责。中华民国，四万万人之中华民国也。兄弟睦，则家之福。全国之人同心同德，则国必兴。余以此祝我中华民国焉！^[1]

袁大总统这演说怎么样？还不能算是废话空话套话吧？

不得不承认，任何社会转型时期，都是新旧纷陈，歧义多重的。任何深度改革，都会触及人的物质与精神层面。有人走向未来，必

[1]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0-65页。

有人走向过去。未来不见得没有歧路，过去也不见得全错。我们这里不作价值判断，只是描述一下。在走向共和的另一面，还有人要拥抱传统！

第一，尊孔。康圣人对民主共和十分不满，革命前后一直坚持孔教至上。其徒弟陈焕章，大清末科进士兼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贯中西，虽然反对老师的帝制思想，但也提倡孔教，1913年创办《孔教会》杂志，且与严复、梁启超联名上书参众两院，要求奉孔教为国教。黎元洪、冯国璋等更是通电响应。不得不承认，这也是民意之一种。袁世凯选择的是听从。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9月3日，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祭孔大会。袁世凯特派梁士诒参加，以示尊重。之后更是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尊孔活动。

第二，复古。指责袁世凯复古的最大证据，是祭天。虽然袁世凯认为“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古老的政治智慧里也含有“天下为公”的意思，但是指责者只想到了“天子”二字。袁世凯祭天，我倒不认为出格，仰望星空嘛。

第三，尊崇清室。1913年元旦，袁世凯特派朱启钤到乾清宫向宣统皇帝道贺。2月15日隆裕太后寿辰，又特派梁士诒致送国书，祝太后万寿无疆，并命赵秉钧率领全体国务员，以外国使臣礼进宫祝贺。时隔七天，隆裕太后病逝，袁世凯亲臂黑纱，命国务员至祭，令国务院通电全国，各官署一律降半旗27天，文武官员一律服丧，以志哀悼。10月19日，袁世凯向大清皇帝陛下写了一个报告，陈述了自己奉太后懿旨，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共和国体，自己当选总统的经过。最后保证自己要好好干，并恪守优待条件，以慰太后在天之灵。袁世凯这样做过分吗？一点也不。也许是太厚道了，让某些前清遗老遗少产生了幻觉，或者说，就想骑袁世凯头上了。代表人物是劳乃宣。义和团之乱时，他是直隶吴桥知县。现在，觉得

袁世凯应该还政于清了，给袁世凯上了一个方案，说辛亥革命误解了共和，共和就是皇帝年幼，内阁总理和国务大臣共同负起责任而已。估计这老兄想起了历史上的周召共和，所以他建议袁世凯：中华国不能再称中华民国了，得称中华共和某年；总统任期五年，如需再任，得延长至十年；袁世凯还政之后，大清皇帝赐袁世凯世袭王爵。袁世凯本就与他交情不错，看了之后，不但不生气，反而邀请他来京参政。这一来，清室遗老更张狂了，纷纷叫嚣起来，弄得好多人士沉不住气了，纷纷质问政府。于是袁世凯要求查办，并对清室做了尊重中华民国统治权的一些细节规定，清室复辟派这才消停下来。

第四，修正《大总统选举法》。1914年12月，袁世凯公布了新修正的《大总统选举法》。主要精神如下：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选连任；大总统连任，参政院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即可；大总统有权举荐三位总统候选人，其姓名由总统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藏诸总统府特设的金匮石室中。金匮的钥匙由大总统掌握，石室钥匙三把，由大总统、参政院院长和国务卿分执其一，只有大总统令才能开启；大总统由大总统选举会产生，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立法院议员各五十人组成，选举之日，大总统将三位候选人公布，他们可与现任大总统一块儿参选。

有人认为，袁世凯不但想做终身总统，而且还给儿子孙子预留了总统之位。还有人认为，袁世凯想当皇帝的野心终于暴露了。我看袁世凯这样做，固然有可能是出于权力欲、控制欲，但也不能排除是为了权力的平稳交接。

（三）小日本添堵

1915年3月18日，约法会议闭幕。其主要内容，就是制订《中

华民国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这一切意味着，袁世凯的中央集权型政府终于建立起来了。问题是有人添堵。

正如项羽所言，时不利兮骓不逝——内忧下去了，国民党暂时不再构成威胁了；外患却上来了，小日本给袁世凯扔过来一个“二十一条”。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奥同盟为一方，英法俄为一方。中国政府当然只能宣布中立了。日本对德宣战，但是它之宣战，不是打向德国本部，而是打向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具体来讲，是要求德国交出胶州湾租界地，并要求中国于黄河以南划出交战区。中国政府想完全中立都不成，不得不援照1904—1905年日俄战争成例，把龙口、莱州及连接胶州湾附近各地方划为交战区域。问题是日本超越战区，占领了交战区域之外的潍县，袁世凯政府提出抗议。日本政府不加理会，继续扩大战区，占领济南车站和青岛，胶济全线和整个胶州湾落入其手。袁政府几次提出撤销中立区，要求日本从胶济线撤退到胶州湾之内，日本不但不允，还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抛出了“二十一条”，并要求中国不得对外泄露。“二十一条”分为五号，总计二十一条，故此得名。主要内容是：

第一号四条，要求享有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中国不得将山东的土地和岛屿出让或租与他国，日本得在省内建立铁路，开辟商埠。

第二号七条，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和南满、安奉两铁路交还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七年为期，日本人在南满和东部内蒙古享有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以及开矿等各种权利。

第三号两条，要求将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其附近之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中国不得将沿海港口、海湾及岛屿出让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七条，要求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日本在中国内地所设医院、学校和寺院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警政和军械厂，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建筑铁路，福建省内铁路矿山建筑开采，日本有优先权。有在中国传教权等。^[1]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面交“二十一条”的时候，既有威胁，还有利诱。威胁是：在日本的革命党与日本要人有密切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出友谊证明，否则日本政府不能阻止他们扰乱中国。利诱是：袁政府若答应“二十一条”，那么日本政府对袁总统将遇事相助。据史家评论，所谓的遇事相助，就是支持袁世凯称帝。其实日本谁也不支持。支持孙、黄搞革命，只是想让他们把中国搞乱。对于袁世凯，更不希望他统一中国，建设强固政府，否则日本如何有机会混水摸鱼？黑龙会策划侵华的秘密文件中，更是言明，袁世凯不是真心亲日，所以日本的政策就应该是鼓动革命党、宗社党和其他不平党，在中国到处蜂起，使中国陷于混乱，袁政府瓦解。^[2]

当晚，袁世凯召集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和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开会，连着讨论三天，并让曹汝霖、顾维钧等人同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会商对策。1月21日，日本向孙宝琦提交了“二十一条”，袁世凯马上将孙宝琦免职，代以陆徵祥，因为陆有陆的本事。

1915年2月2日，双方在外交部举行第一次秘密谈判。对于“二十一条”，袁世凯提前做了详细批示，特别是第五条，直接坚持不议。其他条款，一条一条地谈，一条一条地磨。同时大打外交战术，故意向外界泄露日本的要求及谈判情况（顾维钧化妆进入北京

[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5—78页。

[2]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页。

的英美使馆，“二十一条”一下子成为纽约、伦敦的新闻头条），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同时派有贺长雄回国找日本元老，探听日本的底线及真实意图。

陆徵祥据说是個慢性子而多礼的家伙，每次会议之前，请坐喝茶就是半天。再把会期减少，每周一会。再把会议程序无限期延长，一条一条地来。磨蹭的时间太长，日本不耐烦了，担心夜长梦多，引起国际干涉，遂自动降低条件，于4月26日提出最后修正案。中国也于5月1日提出最后修正案。双方还是互不让步。5月6日，中日双方即将闹崩的时刻，驻日公使陆宗舆发回消息，日本元老会议已让其政府撤回第五号条款。中方长出一口气。5月7日，日本向中国递送最后通牒。果然撤回了第五条，其他各条要求按4月26日的修正案。

5月8日，袁世凯召集副总统、国务卿、政事堂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参政、外交次长等开会。会上，袁世凯声泪俱下，要求诸位勿忘国耻，卧薪尝胆，埋头十年，或可再与日本抬头相见！如不好好干，恐十年之后，中国之危险会甚于今日。^[1]

历史，不幸被袁世凯所言中。大约二十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5月25日，双方正式签约。虽然已不再是原先的“二十一条”，但是大家习惯称其为“二十一条”。其实把谈成的协议与原先的二十一条对比一下，可见两者有霄壤之别。只不过，再有别也算屈辱的条约了。

袁世凯是合格的民族主义者，并且是坚定的反日派。早在朝鲜

[1]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4—125页。

任上，他就与日本势不两立了。条约签订后，他即对人说，我早已想好了破坏的法子：第一，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第二，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第三，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用间给他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却在我。用法律破坏不了条约，用行政手段则可。其他各条都有破坏之法。^[1]

(四) 自己给自己添堵

国民党添堵，小日本添堵，这都不算啥。要命的是自己给自己添堵。袁世凯终生最笨的一着，就是称帝。

我们现在很难说清楚，袁世凯这称帝是让时事逼的，还是缘于自己心贼的膨胀；是身边宵小忽悠的结果，还是想当皇储的袁克定的策划；是民意的反弹，还是家族男人活不过六十的风水催的。总之，他扭扭捏捏地走向了称帝的不归之路。

袁世凯没有想到，心理上，中国民众对于皇帝二字已深恶痛绝。支撑上，原先的老部下段祺瑞与冯国璋都反对帝制，就是为自己着想，他们也会反对的。如果行总统制，他们还有希望做总统。如果行帝制，不但没有做总统的希望了，以后还得天天给袁家提鞋。这怎么成？而且，袁世凯对于段祺瑞早有所防范，一直在削弱其兵权。之后更是屡次说他有病须休养，说得次数多了，段祺瑞不好意思了，称病辞职，袁世凯先是给假俩月，后是免掉其亲信徐树铮的陆军次长。再后来，把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也给免了，代之以王士珍。

至于冯国璋，1915年6月曾与梁启超一道进京摸底。袁世凯

[1] 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8页。

对其表白曰：“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1]

据7月9日的上海《申报》，袁世凯甚至对冯国璋表示，若真有人逼他做皇帝，他就到英国做田园老翁去。^[2]

一般人气愤的是：老袁这个老猾头，不但骗百姓，居然连自己的亲信都骗！

在这一点上，老袁有点冤，我认为，老袁一开始并没有称帝的意思。只不过架不住外间的纷扰与哄抬，当然也不是没有民意的成分：

第一，民间各种零星上书持续有之。比如湖北商民裘治平，呈请缓图共和，暂改立宪帝国。袁世凯令查拿究治。比如四川某县知事，呈请总统任期改为终生制。袁世凯看了震怒。

袁世凯真怒还是假怒，咱就不追究了，只说这些商民小吏，难道他们的上书就不代表民意吗？至少代表他们自己的意思：共和太乱了，商民受不了了。湖北商人裘治平的上书中云：“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曷若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3]

裘治平为什么急切到“共和不如亡国奴”的程度？作为商民，他是有切身之痛的。民间谚语云：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对于

[1] 张国淦：《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6页。

[2]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5页。

[3] 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页。

百姓来讲，管你紫禁城里坐的那个东西叫啥，只要你们不打仗，叫我们安静地过日子就行。问题是，安静的日子从此不再有。湖北作为革命首义之地，更是乱到不能行。哪方革命派都认为自己分赃不够。先是 1912 年 2 月 27 日，挂名在共进会之下的群英会发动他们自己所谓的“二次革命”；后是 1912 年 7 月，文学社的一帮人酝酿发动“三次革命”，黎元洪为此布告，诛掉三个，其余概不追究，并强调：“政治如有不良，议会有纠举弹劾之责；地方人民如有政见，仅可照章向议会呈请，断不容干犯名义，以危害政府。”^[1]问题是大家革命惯了，不按规则来。再后是 1912 年 9 月，南湖马队兵变。再之后湖北就乱套了，“同志乞丐团”“军官建设会”都出来了，其宗旨皆在破坏大局攘夺政柄，一时间武汉三镇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城中每夜必有枪声，或断或续，或为连珠，未知从何而发。巡哨与警长闻声寻找，终无所获。黎元洪政府坐卧不安，疲于应付。过年了，连鞭炮都禁了。因为政府区分不出鞭炮声与枪炮声，导致商民们“无不嗟怨共和反不如专制之自由也”。^[2]

第二，美国古德诺的支持。古德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创始人、中国外交与国际法方面的大才子顾维钧的博导，受聘做了袁总统府的宪法顾问，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成为袁世凯走向帝制的理论支撑。其实他是个称职的法学顾问（袁世凯的另一个法学顾问是日本的有贺长雄，这个家伙比古德诺强多了，不但跑到日本给袁活动帝制，甚至自称袁的外臣）。基于共和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他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后来的《天坛宪法草案》都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认为，两个宪法都采用法国式

[1] 剪楚生：《张振武》，新民书社 1912 年版，第 15 页。

[2] 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86 页。

的内阁制，根本不适合中国。中国是个大国，乱源甚多，所以中央行政权应该强劲有力。更鉴于国会中党派偏见太深，导致国会一权独大，所谓的三权平衡，特别是行政权被压成个橡皮图章，很让古德诺不以为然。所以袁世凯二次革命胜利后一系列的集权措施，既有本能的政治伦理选择，也有古德诺的理论支撑。当然，支撑最大的是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

《共和与君主论》，站在学理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共和与君主制的优劣。其要点是：共和君主本无优劣，就看历史习惯与社会经济是否适合了，比如美式共和就很好，法式共和就有些乱，英式共和还是走向帝制复辟之后好；民智低下之国，其国人无有参与政事的政治智慧，实行共和，断无善果，比如南美诸国，共和变成了寡头，而且因为没有君主制下的继承人制度，会导致接班人之争之乱；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但是目前情形下改行君主，也得有诸多前提条件，比如全民认可、列强特别是日本同意、真正落实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1]

第三，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人发起了筹安会，专门研究中国适合何种国体，时人称之为“六君子”。但是在后来的一些人眼里，他们可能更像“六小丑”。

撇开革命道德评判，我们只说这六个人，个个来历不凡。杨度，人品潇洒，智商甚高。留日时颇有才名，是个颇孚众望的学生领袖。虽得中山先生赏识，但他有他的追求。其作为帝制的赞成者，代表作是《君宪救国论》上中下三篇。中心意思是：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后，必欲逼成共和，反而耽误中国的救亡之策；以二

[1] 参见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解析中国·附录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

次革命之例推之，此后国中竞争大总统之战乱，必致数年一次；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中国即使共和，也必得以专制精神才能治也；人民虽愚，但民权方面，宁可少与，不可欺民，咱得真立宪。^[1]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原都是同盟会的骨干，后来才转变为帝制的拥护者。

下面说刘师培（一名光汉），国学泰斗，与章炳麟齐名。这种人参与帝制，更与功利无关，只与政治理念相关。

最后说严复。这是俺最敬仰的一位了，学贯中西，一代启蒙大师，民国第一任北大校长。正是他的《天演论》以生物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理启发了中国的“救亡图存”的热切心理。也叫报应吧，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武昌起义后，他给莫理循写信曰：“按目前状况，中国是不适宜于有一个像美利坚和众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30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2]

1915年8月28日，已在多地办有分会的筹安会对国体进行投票表决，结果是一致同意君主立宪。第二天，筹安会向全国宣告投票结果。有人问袁世凯是否查办，袁世凯回的是，学界研究，没涉及秩序，无干涉之必要。

第四，外国政府的支持。英国公使朱尔典在欧战爆发前与袁世凯密谈，他与美国公使都支持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但他的条件是，

[1] 参见杨度：《君宪救国论》，《解析中国·附录二、三、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

[2] 骆惠敏（澳）：《清末明初政情内幕·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85页。

若中国无内乱，才可行之。日本一开始就反对中国共和，认为中国人民根本不适合共和政体，而应效法日本行君主立宪。但是它支持袁世凯立宪，又成了拨弄中国内乱的策略。那就是，怂恿袁世凯称帝的同时，又支持革命党反对袁世凯称帝，左右互搏，什么时候把中国搏完，它才满意。它一直认为，蒙古族与满族何德何能？他们都可以入主中原，我大和民族凭啥就不能？而日本庇护下的革命党，更巴不得袁世凯称帝呢，袁一称帝，正好乘机倾而覆之。^[1] 就跟当年巴着清政府假立宪一样。

当然这些都是外围的纷扰。内里，袁世凯还有一个帝制中枢，核心成员是十位：内务总长朱启钤、税务督办梁士诒、奉天军务段芝贵、农商总长周自齐、参政张镇芳、参谋次长唐在礼、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宗、步军统领江朝宗、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拱卫军军需长袁乃宽。这个班子将密电发往各省将军、巡按使，询问国体问题。各省将军及巡按使纷纷回电，同意变更国体，由共和走向帝制。

与此同时，反对的声音也不是没有。张謇与袁世凯密谈，劝他要做中国的华盛顿，切不可学法国的路易十六。问题是这个时候的老袁，已听不进这些意见了。与此同时，汪凤瀛发表了著名的《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对于帝制的恢复，提出了“七不可”之说。声明：自己也知道中国人自治能力不够，共和不适中国国情，可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切不能再改国体，摇国本了。而且，所谓的共和，就目前来看只留“共和”二字，行的已是极端的开明专制，这还不够吗？^[2]

[1]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3页。

[2] 参见汪凤瀛：《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解析中国·附录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

最漂亮的是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声明：我们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只要是立宪政体，管它国体是共和还是君主呢；原先君主政体时，我反对共和，现在共和了，你们又要君主。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古氏《共和与君主论》中各要点，哪一点不是我十年前就说过的？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耳，难不成就因为我睛不蓝、髯不赤，所以国人不愿意倾听？原先吾曾有诗云：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吾生之言多矣，大抵十年之后，未有不让人怀思者，然非至十年之后，则终无道以得国人之倾听，其为吾之不幸也，其为国家之不幸耶？^[1]

我觉得，坏就坏在袁世凯心里有“贼”，这“贼”就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中国小农特有的皇帝梦。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刘邦说：“大丈夫生当如此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就连孙悟空都知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袁世凯有此心贼，只是原先的他并不明白，或者说感觉不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成熟，他的贼心才可能膨胀。而里里外外的亲信、外间的舆论与所谓的国情又加速发酵了他的贼心。他的悲剧就在于，只看到了中国的一面——没有皇帝不行；但是没有看到中国的另一面——觉醒的愤青不能防止不穿龙袍的独裁皇帝君临中国，但却不能容忍穿龙袍的立宪皇帝君临中国。而袁世凯傻就傻在以为只有穿上龙袍才叫皇帝。于是我们看到的情形便是，老头傻乎乎地对亲信们表示：“如果全国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2]

[1] 参见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解析中国·附录六》，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8 年版。

[2] 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 53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09 页。

一般人看到的，是袁世凯的厚脸皮，而我看到的，则是一个中国男人的可怜！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诚哉斯言，能破心贼的，世上没几个人啊。哲学家有一个，元代的理学家许衡，和友人们路过一处无人看管的梨园，大家都摘着吃，只有许衡没有动手，并且撇下了一句千古名言：“梨虽无主，吾心有主。”中国出世的高僧们也能做到：一个女人半夜借宿寺中，主持领她走进一房间，她问：“门上缘何无锁”？主持回答：“门上无锁心中有锁。”政治家也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华盛顿。独立战争结束后有部将建议他做皇帝，他坚决不干。心中无贼，或者说心中有锁，外人再起哄，再架秧子，我自岿然不动。可叹袁世凯修养不到。而且，一个梨子，一个女人，跟一个皇位的分量也不一样啊。假设许衡面对的是无人就座的皇位，倒不见得还能保持住我心有主的从容；假设一个僧人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普通女人而是全天下女人任我挑的彩头，也不见得还能保持住我心有锁的风度。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永远结不出华盛顿这样的果子，中国政治家，更没有此等修养，有的只是司马昭之心。

亲信们一看，老头想做皇帝都到这个份儿上了，步子不得不放快，胆子不得不放大。筹安会搞得不尽如袁的意，遂采纳了徐世昌的主意，改由国民代表决定国体选举皇帝。同时由梁士诒出面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五毛大动员了，吃饭，看戏，大有大份钱，小有小份钱，于是公民请愿团出笼。9月2日，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递交请愿书，请求改变国体。

既然全国人民都这样了，9月6日，袁世凯派杨士琦为代表向参政院表示：本来应该维持共和政体的，本来这个总统职位就是人民给的，人民现在想改变国体，我们也得深加注意，听人民的。

在此之前，袁世凯的帝制十人小组就快马加鞭干上了。据十人

小组成员之一、时为参谋次长的唐在礼事后回忆，当时是两条战线上斗争。第一条战线是专门做一套与实际选举毫不相干的表面宣传，以命令指定“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为全国决定国体选举皇帝事务的总机关，大搞舆论造势，把帝制打造成全国人民的心愿。第二条战线是由唐在礼所在的十人小组向各省都督、巡按使们发出密电，一份密电要求他们配合“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做官样文章；一份密电告诉他们实际如何运作，运作要秘密进行，而且可以不择手段甚至违法。特别是违法的时候，不能拍电报询问事务局，因为事务局回拍电报的时候，肯定也要做官样文章，循法律办理云云。这样就乱套了。

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两套语言系统的操作运用了。事实上各地方还是给十人小组绕晕了，纷纷拍电请示，戏到底咋演。特别是第一步，先在各省区选举出参加国体投票的国民代表就一直完不成。于是十人小组再次详电解释，并且明确规定，10月25日选出国民代表，10月28日投票决定国体，11月20日选举皇帝。与此同时，第一条战线高潮频现，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出笼了：“各省公民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女子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

第二条战线也不甘示弱，国民代表选出来了，但是并不集中举行国民大会，就在各省让代表们记名投票，票上印着“君主立宪”四字，让代表先签全名，然后写下“赞成”或“反对”的字样。投票前，每个国民代表可以拿到五百元大洋的辛苦费。投票结果，1993名代表全部赞成君主立宪。看到这些数字，我们有些人士就憋不住地冷笑。难不成，在中国大地上，全票通过的事例您还见得少吗？事后，全部投票被封存到参政院里，更有意思的是，密令各省把有关选举事宜的一切密电全部焚毁。再后，是有关选举皇帝，

所谓的选举，就是推戴，最滑稽的是，连推戴书都是统一的字样统一的字数：“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代表们就是在推戴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唐德刚对此评价曰：“袁世凯早就感觉共和体制不适用于中国，再经过与国民党一番痛苦的斗争之后，金窝银窝，终不如狗窝，他老人家就要回头去做皇帝了。吾人从今世纪之末，回看世纪之初，大概没有什么历史难题不能理解的吧？”^[1]

是的，特别是立足于现在回看，更觉得袁世凯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老头不理解他的手下，更不理解在中国什么样的民意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他的儿子袁克定可以给他单独制造一份支持中国帝制的《顺天时报》哄他这个老爹，他的手下更可以投其所好制造出所谓的民意哄他这个老领导。于是老头就这样被他们哄到了孤家寡人之地，一步一步走向早就给他备好的坟墓。

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举行全体会议，汇集了出席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的人数和国体投票的总票数。杨度等人提议，既然全国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推戴袁世凯为皇帝。那么参政院作为全国人民总代表，是不是也应该上个总推戴书，于是参政院也写了推戴书，当天上午，把参议院的推戴书与其他推戴书一齐呈送给了袁世凯。袁世凯辞让一番。当天下午，参政院上了第二次推戴书。袁世凯接受了。12月12日，申令各部院详细筹备。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怀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仪式比较文明，大家对新皇上行的是三鞠躬礼，没有跪下叩头。

行礼之后，老头发表讲话，认为帝制乃民意民心所趋，自己不

[1] 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敢违背。但是“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良结果，即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有限制，不能自由。予今为救国救民计，牺牲一身，牺牲子孙，亦义不敢避”。最后表明，皇帝只不过国家元首一种尊号，以后咱们还是得卧薪尝胆，共济艰难！^[1]

杯具啊！老袁一辈子防人，最后没有防住自己的儿子与亲信。当然，最大的杯具，是没有防住自己，就这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位失足老男人！

[1]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41页。

第十章

历史的吊诡

据统计，从 1912 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 1928 年北洋军阀彻底覆没为止的十六年中，民国政府更换了九次元首（不包括由国务院摄行总统位的三次在内），约五十届内阁。就是同一个内阁，死而复活，活而又死者，亦屡见不鲜。内阁最短的只有六天，甚至还出现过两次一人内阁（即除国务总理外，各部总长全部辞职或不到任）。有一位内阁总理，上午就职签署文件，下午即逃之夭夭。有学者对此评价说：“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1]

我有些纳闷，这不就是大家要求的共和吗？而且，共和之初闹些政治丑闻也是意料中事。我们现在的改革，都叫摸着石头过河，何况那时是走向共和呢？估计有时连石头都摸不着。

在《建国方略》里，孙中山自己都承认，美国可以共和，法国则不然：“法虽为欧洲先进文化之邦，人民聪明奋厉，犹不能由革命一跃而几于共和宪政之治者，其故何也？以彼之国体向为君主专制，而其政治向为中央集权，无新天地为之地盘，无自治为之基础也。”法国都不行，我中国当然更不能行：“我中国缺憾之点悉与法同，而吾人民之知识、政治之能力更远不如法国。”^[2]

法国的共和至今已经走了五回，从第一共和（1792—1804）、第

[1] 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前言。

[2] 孙中山：《建国方略》，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8 页。

二共和（1848—1852）、第三共和（1870—1940）、第四共和（1946—1958）一直到现在的第五共和（1958—今）。与民国同时代交叉的，是第三共和。第三共和前期且不说，只说第三共和的最后二十年（北洋政府执政时期是十六年），从1920年1月米勒兰内阁起，到1940年达拉第止，法国共出现四十届政府。这些政府，有一届干三个星期的，有一届干三天的，典型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但是比上中国北洋还是略逊风骚：一是换届没咱频率高；二是最短内阁没咱短。至于法国的第四共和，从1946年到1958年戴高乐重新出山，12年间换了19届内阁。法国人会说这是法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吗？

共和不黑暗，军阀混战才黑暗。军阀为嘛混战，还不是因为袁世凯这个唯一的威权不在了？

袁世凯不在之后，谁最高兴？

有人说，是革命党！

非矣，最高兴的是小日本！

袁死后，张一麐在袁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袁世凯为自己拟的挽联一则：“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

10.1 帝帝死了，皇帝梦没死

帝制筹备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袁世凯发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原先支持帝制的人纷纷翻脸。

首先是外国公使们。1915年10月28日下午，日本公使和英、俄公使都到了中国外交部，一本正经地劝告中国暂缓变更国体。警

[1]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告信由日本公使口述，英、俄公使在旁附合。警告内容如下：“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毛皮，而非实际。鉴于国际和平安宁，鉴于中国与日本之特殊关系及东亚和平，故希望袁大总统顾全大局，暂缓改变国体。日本这样做，乃是出于友邦之谊好意提醒，没有干涉内政的意思。”^[1]

过了几天，法使也提出了同样的劝告。再之后，意大利也插足进来。12月15日，英、俄、日、法、意五国联合提出警告，主角还是日本，谓“日本及其他四国，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态度”云云。^[2]日本为什么这么热心呢？请看日本黑龙会的备忘录：

中政府之保持共和形式，乃中日同盟前途之障碍。何则？共和国之主旨，及其人民社会道德上之目的，与君宪国绝然不同；其行政与法律，亦相抵触。若日本做中国之监护人，而中国一一模仿日本，则两国遂可彼此尽力解决远东问题，而无不一致不同意之处。故为再建中国政府起见，为保持远东永久和平，及为实现日本帝国政策之成就起见，我日当利用目前时机，变中国共和政府而为君主立宪，使与日本之君宪一致而与他国各不相同为起点。

变更中国政体，实再建中国时所当采用唯一之主义。且现时亦为我日鼓励革命党及其他不满于中政府之人物，在中国起事之良机。现时此等人不能肆志之原因，乃因资本之不足。若帝国政府能利用其资本之不足，假以借款，唆以起事，则中国全国，大乱立见。我日于此，乃可起而干涉并整理之。

[1]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2—253页。

[2] 同上，第256页。

吾人当容纳中国革命党、保皇党及其他不满中政府之人物，以扰乱全中国之地。其全国既扰乱，而结果乃推翻袁政府。^[1]

明白了吧？袁世凯的称帝，乃是日本人的一箭双雕。事实上，革命党，也就是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早就动手了。帝制公开后，8月，革命党在广州谋炸广东都督兼民政长龙济光未遂；9月，革命党轰炸了鼓吹帝制的上海《亚细亚报》分社；11月，日本大正天皇登基，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前往日本领事馆祝贺，中途被革命党击毙；12月，上海革命党占领肇和兵舰，炮轰制造局，进攻警署。这些动作，大都有日本人力、财力上的支持。日本不但支持革命党，还支持宗社党搞满蒙独立运动（宗社党的总部不但设在东京，头山满与川岛浪速等人甚至是宗社党党员）。中国遍地开花，他们才高兴。

袁世凯大意了。他认为，革命党零星的恐怖袭击和宗社党的蠢蠢欲动成不了气候；五国公使的劝告也可以应付过去。他的主要心思，都放在称帝一事上了。既有自己登基大典的事宜，还有文臣武将的上下封赏，忙呢。

12月19日，政事堂奏请设立大典筹备处。21日，封龙济光、张勋等49人以五等爵。

12月23日，麻烦来了——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给袁世凯发来了最后通牒，大意是：民主共和载在《约法》，大总统也宣誓谨守。现在又变更什么国体，请处杨度、朱启钤等十三人极刑，更为拥护共和之约言，焕发帝制永除之明誓。限二十四小时答复。谨率三军，翘企待命！^[2]

[1]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1—252页。

[2] 同上，第258—259页。

袁世凯很纳闷，于 25 日回电曰：明明贵处两次来电，请早定大位。何以事隔三日，背驰千里？贵处有此等极端反复之电，让人如何相信？是不是有人捏造？请另具印文，亲笔签名，迅速寄京，以便核复！^[1]

回电没人理。当天，蔡锷、唐继尧等人宣布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与护国军政府。随后，护国军分道出师，蔡、唐等人发表讨袁檄文，列出袁世凯的罪状共计十九条。

袁世凯仍不以为意。12月 31 日申令改元，以明年 1 月 1 日为洪宪元年元旦。第二天，他将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称中华帝国，开始使用洪宪纪年。虽然没有举行登基大典，但皇帝算是当上了吧。相当于乡下人结婚，扯了结婚证，没有办婚礼仪式，但婚姻已成法律事实。问题是外国不承认这等婚姻，中国政府发给它们的外交公文，因书洪宪纪年而被退回。

1916 年 1 月 5 日，袁世凯命曹锟出师。1 月 18 日，新华宫发现了炸弹，原来是袁世凯最信任的大管家袁乃宽的儿子袁英干的——小伙子为了表示自己与他们不同，干脆改名叫袁不同。1 月 21 日，日本来电：中国变更国体影响了东亚和平，请暂缓改制，否则日本出兵中国。袁世凯立即回应：皇帝不正位，不登基，一切作罢。但并未对内宣布。不好意思啊。婚礼仪式还没办，就有人叫唤着让咱离婚。

形势继续恶化。1 月 27 日，贵州独立。

令袁世凯气恼的是，后宫也着火了。一是太子之争出现。老二袁克文、老五袁克权都影响了老大袁克定的皇储位置，他们的娘亲也都参与了进来，想给儿子争个太子当当，那样自己就是皇太后啦，

[1]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56 页。

如此美妙的前程让这些娘们无法淡定。特别是老二，中朝混血儿，风流小名士，翩翩佳少年，放现在咋也是个快男，粉丝会多得数不完，做了太子也是明星小太子，帅呆了。像父亲一样骑马摔伤腿、走路有点跛的袁克定一看不妙，遂放出狠话来：老爹要立二弟为太子，我就敢把二弟杀了！二是《顺天时报》被三女袁静雪揭穿，严重打击了袁世凯的自尊心——敢情民意都是自己的儿子这么制造出来的！气得他大骂袁克定欺父误国。袁克定也真是混蛋，别人都是伪造舆论糊弄公众，他却是伪造舆论糊弄自家，简直是身残志也残，不带这么玩的。三是嫔妃之争。袁世凯口头封过，大、二、三、五姨太太均为妃，六、八、九姨太太均为嫔，于是嫔们就不愿意了，吵闹着要领孩子回彰德。真是娘们见识。闹得袁世凯这个大肚汉饭都吃不下了，筷子一摔，叹曰：“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1]老头预感真准。不过老头这里也有错，本来家庭挺和睦的。他一位仅有一妻一妾的部下因家无宁日曾向袁世凯讨教：你有一妻九妾，用什么法子摆平她们呢？袁世凯笑嘻嘻地回曰：无它，你的妾太少了之故。部下不明白。于是袁世凯告他：男人置妾，大妇再贤，也会妒的，认为自己的专房之宠被一妾所夺。如果多置几个妾，大妇还如何吃醋？地位虽尊，孤立无偶，置之度外，遇事得忍。至于男人，不听谗言不存偏爱就行了。

这妾经算是不错，也叫引进博弈吧。问题是现在，既有了皇后还有了嫔妃，人为地增加了新的不平等，打破了原先的稳定与平衡。全国人民增加个皇帝，生活不会发生变化。但是老袁做皇帝，自家却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大变化，这不胡折腾吗？

[1]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安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232页。



这是袁世凯送给《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的照片，莫理循在1912年受聘担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还将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以嘉奖莫理循为其做出的贡献。

与此同时，袁世凯发现原先的亲信也使唤不动了：段祺瑞说自己病未好呢——当初是老袁说人家有病需休息来着，而且这一手也是他这个老领导之前跟大清用过的，小段自然套儿熟；江苏将军冯国璋倒是没病，却袖手旁观——当初探尔口风，尔亲口说“放心俺没有皇帝思想”，跟亲信不带这么玩的！

2月13日，袁世凯不得不对内也宣布，暂缓办理登基事宜。

3月15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

康有为来函，直呼袁世凯为慰庭总统老弟，说：你速速退位吧。
徐世昌来函，警告及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

冯国璋联系四位将军致电袁世凯，请速取消帝制。他学当年袁世凯逼宫的小样儿，搞起了同样的把戏。袁世凯一看电报，就知道自己完了，跟亲信说，自己的历代祖先都是59岁以前死亡的，自己现在已经58岁（老袁也是按传统的虚岁制给自己计岁的），怕是过不了59岁的关了。本来他称帝就是想冲关呢，没想到反而成折关了。

3月21日，袁召集会议，准备撤销帝制。袁克定表示反对，认为皇帝既然不保，总统也将不保。这回他倒是聪明一次。可是前面呢？电视剧里，袁世凯骂人的口头禅是混蛋加三级。他这儿子，干脆是混蛋加特级了，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帝制不撤也不行。3月22日，袁终于宣布撤销帝制，废“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又自称为大总统，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并由徐世昌发布申令，相当于罪己诏吧，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按曾任总统府机要秘书、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张一麐的眉批，这申令的出笼还有如下背景：“是日，项城召余曰：予昏愦不能听汝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汝作不可，因出示王式通原稿示余。乃曰：吾意宜径令取消；并将推戴书焚毁。因曰：此事为小人蒙蔽。

袁云：此是余自己不好，不能咎人，犹是英雄气概也。”^[1]

张一麐的机要局局长仅次于政事堂国务卿，当时由于不支持帝制，改迁教育部总长。但他对于袁世凯的人格还是折服的——帝制这事怪不得别人，要怪只怪自己。不像某些人，把罪过推到一奸相、二奸臣、三太监、四帮人头上，叫俺们观众憋不住地冷笑！

帝制撤销后，袁政府致电护国军政府，停战议和。袁方提出六项条件：第一，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取消独立；第二，三省治安由三省军民长官维持；第三，三省招募的新兵一律解散；第四，三省开赴战地的军队一律撤回原驻地；第五，三省军队自即日起不准与国兵交战；第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护国军看了，提出了自己的六个条件：第一，袁世凯退位，可贷其一死，但需驱逐至国外；第二，诛戮杨度等策划忽悠帝制的十三太保以谢天下；第三，抄没袁世凯及十三太保的家产；第四，剥夺袁世凯之子孙三世的公民权；第五，袁世凯退位后，按《约法》由黎元洪继任总统；第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一律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扎地点，须听护国军都督之指令。

这条件，比当年优待清室差远了，而且秩序继续失控中：广东乱套了；浙江独立了；湖南独立了；好多地方都冒火了，真独立、假独立、真假独立火拼中。与此同时，诸多名流——唐绍仪、张謇、汤化龙、伍廷芳出面通电，要求袁世凯下台：皇帝做不得，总统你也不要做了！附合的有原国会议员、各省公民、各界政要，甚至海外侨胞。墙倒众人推，就跟前一阵子各地拥戴袁世凯做皇帝一样，直让老袁恍惚：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民意？

4月11日，驻日公使陆宗舆求见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要求日

[1]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3页。

本政府减缓对袁政府的压力，并表示袁世凯在中国当下是不可替代的，没想到这外相回的是：欢迎袁大总统全家到日本来安享晚年！

袁世凯请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出面交涉。黎元洪之前因帝制而下岗，袁世凯封他一个亲王，他没要。现在虽然出面，却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徐世昌看双方的要价驴唇不对马嘴，拢不到一块，也知难而退，建议由冯国璋主持斡旋。

4月21日，袁世凯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4月22日，徐世昌辞职，袁世凯改任段祺瑞为国务卿。冯国璋以个人名义提出办法六条：往事不追究；不剥夺公民权；不没收私产；居住自由；全国人民给予应有的尊重；民国政府给以年薪十万元。护国方一看，尔这不是学当年的袁老师吗？而且比袁老师当年还要卑劣，不干。于是冯国璋召集未独立各省在南京举行会议。与此同时，护国方成立了自己的军务院，推举黎元洪为总统。

5月18日，十五省及上海、徐州代表在南京开始了会议，关于袁的去留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有代表提议，邀请独立各省代表也参加会议，但是谈不拢。护国军这边干脆拒绝参加，南京会议无果而终。

5月22日，袁的亲信陈宦宣布四川独立。这家伙，独立就独立吧，还在电报上揭露袁世凯在英国存了三千万元，为将来逃亡计。气得袁世凯当场晕厥，说：人心大变，乃至于此。5月27日，袁世凯大病发作，但仍然带病工作。5月29日，另一个亲信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手下人不想让袁知道，可又瞒不住。袁看了电报后说：我不为这帝位可惜，我为这天下的人心可惜！

袁世凯终于卧床不起了。事实上2月份，他就生病了。3月，病情渐显。5月底，大发作。6月初，卧床不起。最初患的是膀胱结石，后转变为尿毒病。袁的三儿媳、克良老婆割股疗亲，袁世凯

知道无济于事，没喝。他又不信西医，待病情恶化后再找西医，也晚了。6月6日上午10时40分，袁世凯逝去。

袁世凯是死了，可是皇帝死了吗？

中国人反皇帝，只反皇帝表层的东西，对于皇帝的中层及深层，则不是触及不到，就是干脆看不到。一句话，袁世凯是死了，但是皇帝依然活在千百万人民心中！

当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因辫子问题在北大讲台上遭遇学生哄笑时，他对学生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也很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的那根辫子，想去掉可很不容易。”^[1]

10.2 一个模糊的愿景

二次革命还没有完全失败呢，孙中山先生就逃向了日本。虽然袁政府要求日本不得接纳中国的叛党，但是一则孙中山在日本有人缘；二则，日本一直利用孙中山反袁，给北洋政府制造麻烦呢，所以中山不但在日本落了脚，还开始组建中华革命党。其基本构架是：

第一，党中所有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由党魁指派。这带有明显的封建色彩。袁那边在国中称帝，孙这边在党中称党魁。经过二次革命，两人倒是殊途同归了。按唐德刚先生的评价，两个人乃一枚铜元的两面，只不过一个在野，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个在朝，将独裁进行到底。^[2]

第二，党员分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级。这样分级，

[1] 《沈从文文集·第10卷》，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第328页。

[2] 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一是革命时好说话，党大一级压死人；二是革命后方便论资排辈、论功请赏，具体方式为：首义党员有优先参政、执政的权利；协助党员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普通党员仅有选举权。

第三，他党不得存在，全国人民均成为革命党党员之后才会有真共和的出现。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不得有公民资格！

最悲哀的是，孙中山还让党员们立约宣誓，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不惜牺牲等等。有的党员提出异议，孙先生不以为意，解释说：革命必须有唯一之领袖；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首倡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离开我讲民主共和，乃是南辕北辙，大家要盲从我；再举革命，非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没有革命导师了。^[1]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孙行者蓦然发现，列宁才是真正的革命导师——俄国革命比中国晚六年，却能成功，成功的原因当是以党治国！于是他决定以俄为师。可是当有日本人问他，其三民主义是否师承列宁学说时，他很不快，回曰：“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程颐，北宋洛阳伊川人，世称伊川先生。与胞兄程颢合称二程，是为小程）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其说民主、尊民生之议论，见之于二程语丝。仅民族主义，我辈于孟子得一暗示，复鉴于近世之世界情势而提倡之也。要之，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未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文虽不肖，岂肯尝列宁等人之糟粕。况如共产主义，不过中国古代所留之小理想者哉。”^[2]

[1] 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2]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2页。

中山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虽然他一直宣称自己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是把他的三民主义称作列宁主义，他不乐意。一句话，他不想宗列宁的主义，他只想拿列宁的以党治国来完成自己的主义。

另一方面，即使对自己的主义，中山先生也一直处于变化中、矛盾中。比如三民主义。辛亥革命后，他认为民族、民权的目标已经实现，所以提出了一民主义；宋案之后，他认为民权主义仍没有实现，又改为二民主义；袁世凯死后，他以为一死百了，遂再次改为一民主义；发现袁世凯死了也没解决问题，又恢复三民主义。有关民族主义，他认为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民族，但却没有民族主义，于是开始提倡民族精神，什么忠、孝、仁、义、信、爱、和、平等，甚至连人心问题都提出来了。有关民权主义，共和那样的代议制，民国都玩不好，他反而提出了直接民权；直接民权也罢，反过来他又认为人按天赋分为三等，即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不知不觉者不会争民权，那么需要前两种有知有觉者争出民权奉送给大家……有关民生主义，他认为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有四大流派：共产社会主义、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而他所取的是国家社会主义。但这个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主义，他的解释又很模糊。虽然如此，他有一个主义却是确定的——那就是举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会革命，毕三功于一役，一揽子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也叫跑步进入三民主义吧。当然，二次革命的失败告诉他，一下子跑进不容易。于是他重新调整跑速，确立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如何一级一级完成呢？先是以党建国，后是以党治国，形象的说法，就是：“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

成年而后还之政也。”^[1]

1921年，中华革命党改称国民党。再之后，就是联俄联共了。他对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人说：“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2]

联俄联共之后，先生的党治思想进一步明确：第一，以党治国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党建国，第二阶段以党治国；第二，党和政府的关系是，党在政府之上，党是政府的总枢，政府接受党的指导；第三，党和他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第四，党治的最终目标是民权。民国以民为本位，而民以党为凭藉，党是全国人民的代表。……后来的蒋介石把党治精神推向极端，走向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脑袋的最高境界，铁打的江山，蒋介石一个人党政军全兼。

看来，党治如何走向宪政，先生考虑不周。

如果历史给中山机会的话，我们真不知道他会走向何方。因为直到走向生命终点，中山对于中国的设想也还是一个模糊的愿景，他把它叫作“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正如陈志让先生所言：“他所憧憬的新中国不很清楚，达到那个新中国的步骤更不清楚。”^[3]

中山先生曾设想，自己以在野身份筹60亿元，10年时间修20万里铁路。以实际投资来看，到1911年，中国所有官办与民办近代企业资本总额是3亿元。内资不行，就借外资，而外国对华铁路直接投资，截止到1913年，总额9.6亿元；铁路贷款截止到1937

[1]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页。

[2] 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1页。

[3] 陈志让（加）：《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欲登龙位的袁世凯

据说袁有午睡的习惯。某次一书僮献茶，失手打碎袁心爱的玉杯。袁醒后大怒，欲杀书僮。书僮说：“我端茶来时看见床上不是大总统……是……是一条五爪大金龙。”袁世凯回嗔作喜，赏书僮一百元，嘱其不要乱说。不管这些传说是否可信，但可信的是，袁世凯是架不住这种“群哄”的。

年，总计 7.2 亿元。而 1912—1919 年，北洋政府修建的铁路总计不到 2000 公里。一百年过去了，据新闻报道，中国铁路运营里程到 2012 年将达到 11 万公里！

某种程度上，中山先生的毕其功于一役，让欧美瞠乎其后的狂想，不亚于我们后来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910 年，先生在旧金山给华侨们演讲曰：

革命为吾人今日保身家、求性命之唯一法门。

有明知革命乃应为之事，惟畏其难，故不敢言者。此真苟且偷安凉血之动物，而非人也！若人者，必不畏难者也。如诸君之来美，所志则在发财也，然则天下之事，更有何事难过于发财乎？然诸君无所畏也，不远数万里，离乡别井而来此地，必求目的之达而后已。今试以革命之难与发财之难而比较之，便知发财之难，必难过于革命者数千万倍也。……凡一民族立志革命者便无不成功，而凡一人立志发财则未必成功。……以有千万倍之难之发财，而诸君尚不畏，今何独畏革命之难哉？

革命直一反掌之事耳。惟惜中国人民尚未有此思想，尚未发此志愿。是中国革命之难，不在清政府之强，而在吾人之志未决。望诸君速立志以实行革命，则中国可救，身家性命可保矣。^[1]

1924 年，先生给广州的商团和警察演讲曰：

革命是人类的觉悟，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所以造成这种大力量。有了这种大力，便无大力可以阻止。……革命之成功，就像

[1]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441—443 页。

大石头从白云山顶滚到山脚一样，一经发动，断没有中途停止的。我在三十年前便提倡革命，当中失败总不下二十次，但每失败一次，势力便加大一次。此次在广州来革命，诸君如果问我可不可以成功，我的答复是“不知”。

成功是人民的事，于我没有关系。我不过是革命的发起人，要人民来赞成革命，如果多数人赞成革命，便可成功；少数人赞成革命，自然难以成功。我为革命始终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功不成功，是人民的责任。^[1]

老实说，这还不算最激进的。最激进的是，革命由一种信仰走向神圣权威。正如姜义华老先生所言：

由于革命已成为神圣的权威，革命便成了衡量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在理性法庭面前，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现在，在革命法庭面前，人民由于对革命的态度不同，而被划分为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只要赞成革命，有利于推进革命，一切手段都受到肯定；而只要不赞成革命，或仅对革命有疑虑、有保留，更无论反对革命，他们的主张与行动不管是否具有合理性，都要被斥责，被否定。^[2]

中山先生也知道革命动机与革命结果不是一回事：

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

[1]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64页。

[2] 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0页。

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1]

也许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才感慨曰：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民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2]

窃以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家庭教师、英国的中国通庄士敦先生的一番话更足以概括革命的本相：

当北京和南京发生这些重大事件的时候，我正在威海卫……我们发现，很难使当地 18 万中国居民相信皇帝已经退位的事实。一连几个星期他们都默默地对此抱着怀疑态度。在那个离孔夫子家乡不远的地方，人们对革命的反应十分冷淡。居民们真正理解共和概念的也许还不到 50 人，他们也不想理解这种概念。

威海卫人的愚昧（或称之为冷漠，如果这个词更合适的话）和

[1] 孙中山：《建国方略》，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页。

[2] 鲁迅：《华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7 页。

他们的大部分中国同胞是一样的。

大部分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前途将随着共和制的建立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此对共和制的优劣毫不关心。

尽管人们对清政府的懦弱表示不满，但对满族的痛恨也并非那么普遍。革命党人发明的反满口号很快被大量中国人拾起，虽然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概念并不清楚。像鹦鹉学舌一样，他们也学会了呼喊“打倒满清”。从此以后，随着风气的改变和时代的需要，无数学生和群众也学会了呼喊诸如“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英国”“打倒日本”“打倒不平等条约”打倒这个或那个将军、政治家等等之类的口号。无数中国人在1911年被革命的细菌传染，并于一夜之间在没有具备任何新思想的情况下变成了暴力反满和反君主政体者。后来，据我所知，他们中间很多人为此感到惭愧，并承认当他们被卷入政治漩涡时暂时失去了理智。^[1]

10.3 共和，你在哪里？

袁世凯死后，人们打开了金匮石室，他给预定的接班人是三个：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但是弥留之际，他做的遗文则是，遵照《约法》，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

一个钟头后，段祺瑞以国务卿的身份拜访了黎元洪，迎接他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当天下午一点，聚集在外交部的外国公使就得到了消息：黎元洪总统已经履任。大家放心吧，和平与安全是有保证的。

[1]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57—59页。

6月7日，国务院下令：为袁世凯下半旗致哀；学校停课一天；全国停止娱乐一天；文武官员停止宴会二十七天；政府赠与丧仪一百万元。

6月23日，政府为袁世凯举行公祭。杨度送的挽联最具深意：

共和误民国，民国亦误共和，千载而还，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犹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1]

一句话，对袁世凯盖棺论定，还不是时候。那么现在是时候了吗？

袁世凯死后身体浮肿，所有衣服都穿不上了。经袁克定与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商量后，把准备登基的龙袍给他穿上了。可谓是身前没着龙袍，身后永久地穿上了龙袍。袁世凯泉下也该安歇了吧。说起来，1915年12月13日，老头在中南海怀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时，都没好意思坐龙椅，站一边手扶龙椅举行的仪式，以至于属下走出时都面面相觑：这就叫改朝换代了吗？

看来老头称帝，挺不自信的。现在，能拿龙袍做葬衣，好歹圆了心愿，大家也都没意见。大活人谁会跟一个死人争寿衣呢？可见中国人民还是挺宽容的。

按袁世凯之前的安排，灵柩归葬我们安阳洹上（现在称袁林）。由于政府拨款有限，袁世凯家财也有限，亲信旧属们纷纷慷慨解囊。

6月28日，灵柩由怀仁堂出新华门出殡，经天安门、中华门、正阳门一路到车站。专车沿京汉路南下，6月29日到达安阳，送入袁林石屋，闭门封墓。完了。

[1] 潘国璋：《名人与诗联》，金盾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